

我家

遇罗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家
遇罗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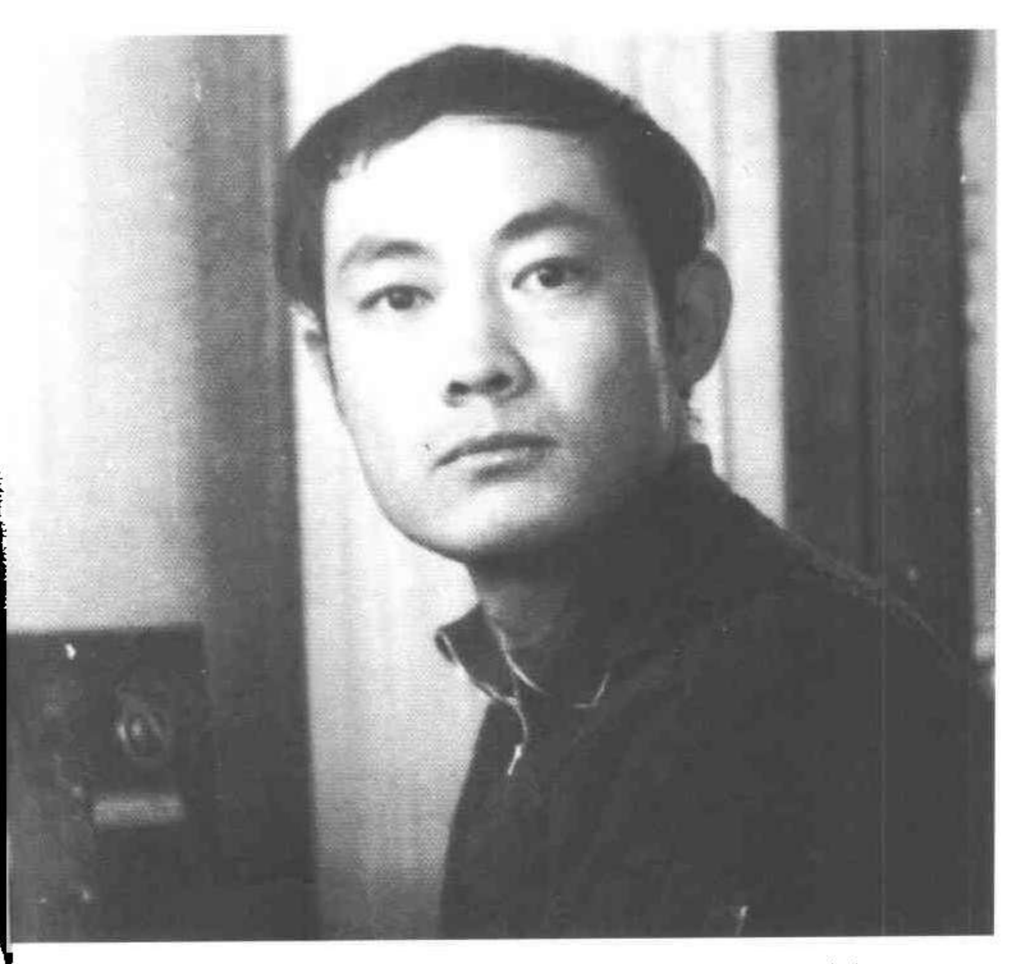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家/遇罗文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
ISBN 7-5004-2737-9

Ⅰ. 我… Ⅱ. 遇… Ⅲ. 遇罗文-家史 Ⅳ.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90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100720)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广增装订厂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625 插页:18
字数:245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22.00 元



遇罗文,发明家,遇罗克、遇罗锦胞弟,1948年生。童年时,赶上家庭遭遇磨难;文革初期,为宣传遇罗克写的《出身论》,创办《中学文革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6年。先后在陕北、东北插队落户,当过木匠、会计,盖过医院,办过工厂。1979年平反回京,才有机会从事心爱的发明创造。近年与其弟遇罗勉合作研制的高压水切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摄于1980年。)

弟弟遇罗勉的人生遭际，虽然没有遇罗克和遇罗锦那么具有爆炸性的雷声炫光，却也相当坎坷诡谲、惊心动魄，反映出上个世纪后半叶相当大数量的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心路轨迹，具有典型意义。因此，这本《我家》，确实是值得我们作为历史个案，仔细加以检视、研究的。

遇罗文写出书稿后，请当年他家的邻居任众写了一篇文章——任众的遭遇曾被我写成《树与林同在》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任众在文章里，把遇家的遭遇和他自己，以及许许多多有着类似命运的人们的生命轨迹交汇在一起，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和"不能让悲剧重演"的彻腑疾呼。我的心弦当然也与此强烈共振，但任众讲过的话我不拟重复，我想特别强调的是，遇罗文的这部著作还有着更为丰富的现实意义。

我们现在已置身在一个崭新的世纪里。我们沐浴着新的曙光，但无可讳言，我们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希望使我们兴奋，问题令我们焦虑。有些人士，把"冷战"结束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推行，视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重要的事件，提出"历史为零"的论断，呼吁"制度创新"。他们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跨国资本的运作如大象巨脚，正无情地践踏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个性；而中国大陆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确也是在公平的"游戏规则"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就已"玩"得人人心跳——仅这两大问题，就引出了深重的焦虑，焦虑者为了化解自身的焦虑，并以己度人，力求达到清明澄澈，有的就如饥似渴地从历史中抓取"可利用资源"，上个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是重要的"资源"之一，比如，有的人士就提出来这样的论点：有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

的"文革",他要解决的是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另一个呢,是"民间"的"文革",所期盼解决的,是官僚主义压迫、特权思想与特权制度等等问题。主张有"民间文革"的论者,所常常举出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初期,一般民众在享有"大民主"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办报"、"自由结社"、"自由发言"。在某些人士看来,"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民间文革"那"全民参政"的实践,还有当时对跨国资本的坚决排拒,以及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所获得的可触摸成果(如南京长江大桥和大庆石油开发),都提供着"零历史"境况下,从事"制度创新"的借鉴,至少是能激活灵感。好了,现在我们有了遇罗文的这部著作,从他翔实的回忆里,我们可以了解到,那时像他和他哥哥那样的社会存在,是怎样利用时空中的可利用瞬间缝隙,来"自由办报"、"自由结社"和"自由发言"的,并且可以了解到,为此他们分别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还可以从他父母,他姐姐和弟弟,以及他自己在他哥哥被杀害后,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引出深重的思考:从中是否可以找到抗拒全球一体化的悲壮之美,或能提炼出"创新资源"?遇罗文写作时并没有跟我交流过,他完全没有我上面所陈述的思考前提,只是客观冷静地回叙那个渐渐远去的时代里,已然成为历史的种种细节,他本身并没有参与是否存在"两个文革"的争论,也并不清楚"历史为零"与"制度创新"之类的新论,但我以为,他的这个文本,在有关的讨论中,具有着无可替代的巨大参考价值——讨论的双方,甚至都可以从正面引述他的文字,以为立论的依据。

像任众那样的"过来人",所时刻提防的,还是那些整过人的极左分子。这种戒惕是值得尊重的,也是必要的。但实际上

那样的一些人从年龄上说大都老迈，从社会占位来说也多半已经边缘化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程度，似在与日俱增，但却回天无力。真正能左右现实中国走向的，应该说已是新的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而这些人里，有的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生，全然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生命体验，甚至改革、开放初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中，以及后来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过程里，“拓荒牛”们所遭遇的那些阻力，对于他们来说，也了无印象，他们其中一部分人的思考与行动，似乎更多地会受到现实中负面存在的强烈刺激，以及从西方——比如法兰克福，以及实际上也是用财团的基金支撑的高等学府那类地方——传进来的某些高超理论的影响，从而形成某些独特的思路和作为，这有令“过来人”理解、尊重的一面，却也有令“过来人”不解、担心的一面。遇罗文的这部著作，我以为应是新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的重要参考材料——毕竟，这是本土的，浸着血泪的，具有典型性的，而且还活着，并继续生长着的历史。我祈盼，新一代的中国思考者与行动者，终能具备睿智的头脑与坚实的脊梁，离开误区，面对国情，实事求是，稳健推进，掀开这东方古国闪烁着新辉的一页。

公元2000年，中国新龙年即将来临之际

序　二

丁　东

1998年夏天以后，因为编辑《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我一直设法与遇罗文先生联系，但找了许多线索，最后都中断了。直到年底，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遇罗克是谁》的短文，却意外地接到了遇罗文的一个传真。原来，他看了报，通过编辑陈明洋查到我的电话。由此我们相识而成为朋友。可惜认识得太晚，联系上的时候，那本书已经出了软片，开印在即。当时只好请他写了一个简短的《跋》补在书末，来不及让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他相识一年多来，我们一起去人民大学参加过与学生社团的对话，一起去拜访过“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郑兆南烈士的两个女儿，也一起接受过记者的采访。我感到，他是一个头脑清醒、阅历丰富、充满了社会关怀、对历史有独特思考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发言的机会，长时间地被拒于公共话语空间之外。其实，他的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的经历本身就蕴藏了一页珍贵的历史。他和我都是老三届，年龄比

我稍长。他和他的家人所承担的苦难,远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他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用牢狱钳制思想,不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独有的现象。区别只是在于有人记录和无人记录。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也应当有人记录下我们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基于这种想法,我建议遇罗文写一本回忆录,记录他的经历和他们全家的命运。

遇罗文接受了我的提议。他不愧是遇罗克的合作者和《中学文革报》的创办者。虽然多年从事技术发明,不与文字打交道,一经动笔,却表现了很高的驾驭能力。他写一部分,就给我看一部分。我的感觉是,他不但是一位苦难的承当者,也是一位十分到位的历史见证人。他的文笔准确而洗练,记忆力极好,丰富的历史细节从他的笔下从容地流出,展示出一幅广阔深沉的历史画卷。他从 1999 年初动笔,到秋天就完成了这本书。书名取了朴素而意味深长的两个字——《我家》。

《我家》可以说是中国 50 年代到 70 年代人权状况的一个缩影。中国当时发生的人权歧视不同于过去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它不是以保守的或宗教的名义出现的,而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革命名义实行的。在这种秩序里,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人同等的公民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富、反、坏、右,因为他们的亲属中有阶级敌人,所以,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就业和参加党、团组织。遇罗文的父母本来都是留学归国、学有专长的建设人才,一个擅长工程技术,一个擅长企业管理。但不幸的是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从此不但他们自己被打入地狱,子女也沦为贱民。遇罗克本来是一个功课拔尖的好学生,但两度参加

高考都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遇罗文和他们另外几个兄妹也在这种秩序中被打入另册。这种“左”的理念和政策在“文革”前就已经成型,到“文革”初期恶性发展,达到极致。当时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们,不但失去了参与社会的公平机会,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遇罗克在当时能够以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徒工的身份,成为人权思想家,不是偶然的。这种秩序的苦果已经让他品尝了多年,促使他思考了多年,准备了多年,他从马克思到卢梭,沿着人类思想的长河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直到1966年末及1967年头几个月相对失控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他不是抱怨个人和自己家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是为所有受到人权歧视的人们争取公道,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这种不合理的秩序发出了深刻的批判。这就是以《出身论》为代表的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的一系列文章。这些代表着良知的声音一经传播,马上得到千百万人,特别是在政治上被歧视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强烈共鸣。当然,遇罗克、遇罗文兄弟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好景不长。这种声音不能为当时的统治者“四人帮”所容忍,1970年3月5日,遇罗克为此献出了27岁的生命,遇罗文两度陷入牢狱之灾,其他许多朋友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磨难。直到十几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了社会政策,家庭出身这片笼罩在千百万人头上的阴云,才逐步散开。遇罗克虽然没有看到这一天,但他以生命倡导的人权思想是不朽的。人与人生而平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家庭出身歧视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遇罗克为之献身的人权理想还有赖于后人继续努力。

《我家》又记录了中国新闻报刊史上的重要一页。遇罗文

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记载了《中学文革报》诞生、发展、夭折的始末。这份报纸虽然只是当时数以千种的小报之一，前后只出了7期，活动不到半年，它是由一群不知名、没有财力、也没有办报经验的年青人仓促地办起来的，青春的热情在他们心中燃烧，他们代表着良知和正义。它因声张人权思想而诞生，又因人权思想为当时的当权者“四人帮”们所不容而夭折。这就使它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特殊的座标。在60年代中国大陆报纸当中，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它都堪称最辉煌的一笔。

遇罗文的陕北和东北当了多年知青，两度入狱，他和家人、爱人、亲戚、朋友、难友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以及他们在磨难中如何顽强地求生，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是重宫廷活动的记录，轻底层活动的记载。这种畸轻畸重的格局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高层人物在“文革”或其他运动中经历的冤屈，被各种传媒反反复复地讲述；而平民百姓所受的更多的苦难，又有多少忠实的文字记录？小说、影视等等文艺作品虽然讲了一些，但虚构性又使得这些故事不足以成为历史的凭证；而史学家对底层的遭遇虽有涉及，往往只是笼统地概括一下，少见细节的描述。其实，一个国家搞得怎么样，关键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日子过得怎么样。底层的大众不能安居乐业，再怎么吹国家也是出了毛病。遇罗文这本书，可以让读者身临其境般地进入那个时代的社会底层，从城市的贫民，到穷苦的农民，一直到监狱牢房里的囚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家》又是一份难得的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底层的政治、经济、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档案。

遇罗文一家也曾有过欢乐与荣耀，他的母亲打成右派以前当选过市人大代表，平反以后又担任过区政协委员，他的弟弟也曾被评为市劳模，他父亲当年设计的竹筋楼和他们兄弟发明的“前混式水切机”都令人自豪。但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本书惜墨如金。他把主要的笔触都用于展示他的家庭和我们整个民族共同经历的苦难上面了。就我读过的中国人撰写的回忆录而言，类似的写法并不多见。多数情况是大谈一生中怎么过五关斩六将，而谈到走麦城却一笔带过。这种反差正体现《我家》的特色所在和分量所在。二十多年前，朋友向我介绍过一首佚名诗人的《痛苦颂》，最后几行我至今记忆犹新：“你虽然痛苦，却不是人类的不幸。哪个民族承担了你，就是说，他在奋起、攀登和高翔。”我是赞成这种痛苦观的。道理很简单，只有正视痛苦，才有可能治疗造成痛苦的病因。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这篇序言写完的时候，正逢遇罗克殉难30周年的祭日。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遇罗克30年前还是当着万众公判的死囚，30年后，当人们回顾20世纪的时候，却把他推举为思想先驱和为真理而献身的英雄。文明的进程终究是阻挡不住的。他没有纪念碑，但这本书的结尾说得好：他的纪念碑，就建立在人民心中。

2000年3月5日

前　　言

身边的事都是平凡的，直到后来，才发现其伟大。

我曾经有一个温暖、和睦、规矩的家。

父亲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重感情而少言寡语，最喜欢的人生格言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母亲也曾到日本留学，学的是财商。性格理智而坚强，喜欢社会工作。父母从来不干涉我们的爱好，甚至连学习也很少过问。但是，在哥哥罗克的表率作用下，我们全都以读书为乐、以兴趣广泛为荣，学习成绩不甘居人之下，视同情弱者为己任。

父亲的指纹是十个“斗”，据说“相书”认为，这种人要么是江洋大盗，胆大包天；要么胆小如鼠，遵纪守法，决不犯错误。父亲自认为是后者，因为太老实、善良了。可是这样一个家庭，两代六口人，倒有四人六次与牢狱结缘；同一座监狱，曾有四人五次在那里羁押。噩梦一样的命运，接连不断地光顾我的家。

最早坐牢的是父亲，发生在1952年“三、五反”运动中。失去自由时间最长的也是父亲，因为“右派”问题被“劳动教

养”,7年不能回家。坐牢时间最短的是哥哥罗克,只有两年零两个月,却以死刑而结束。

如果算上“群众专政”,家中就无人幸免了。虽然也失去人身自由、滋味可能比坐牢更难受,但那毕竟不是进了“专政机关”,估计档案里都不会有记载,因此我也没有把这些遭遇统计在内。

在不幸中生活,更体会到亲情和友情的可贵,除了毕生难忘,难免也干出一些别人无法理解的傻事,以至今天我还受到家人的埋怨。同样,有的朋友对我们的评价也是“个个聪敏过人,但在某些事情上,愚钝异常”。在一个荒诞的社会里,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我家的遭遇,既奇特又自然。

有人看过此文的初稿,惊讶地问我:“想不到能有人家遇到这么多磨难,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活过来的?”

是的。如果没有这些亲情和友情,我也无法想象怎样挺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我更佩服的是我的母亲和姐姐。作为女人,她们一定比我们更具有超人的毅力。而母亲又是那么刚强,领取哥哥遗物的时候,父亲哭得坐在了地上,母亲都没有落泪。她把多少痛苦,生生地咽了下去。坚持了13年,痛苦终于夺去了她的生命。

她去世的那一天,正是哥哥的生日。死后从她的日记里我们才知道,从哥哥的忌日那天(3月5日),因为想念哥哥,想到了他幼年的童真,就感到身体不适,到哥哥的生日那天(5月1日),再也熬不过去了。

她每天上班都要路过宣判哥哥死刑的工人体育场,她只

好扭过脸,不看那个地方,来抵御痛苦的回忆。

感情细腻的姐姐，又何尝不是如此？她是我家惟一的女孩,也是子女中第一个尝到铁窗滋味的。我非常爱我的姐姐,尽管恶劣的环境使她变得有时脾气古怪；尽管我不满意她总爱无情地剖析身边的人,甚至有些过分。

要求不幸者,能是完全的么?

她永远值得我同情和理解。我不能理解有些作家，甚至是很知名的作家，自己也经历过漫长的磨难，却恶毒地诽谤她。但愿有一天,他们能知道忏悔。

我用这篇文章,纪念我的父母和哥哥,献给我的姐姐,献给一切善良的人们。

目　录

一、水獭胡同12号

1. 城里少有的大院子

大约在1952年,我开始有了记忆,那时我四岁多了。

我家坐落在北京东城水獭胡同12号,东墙隔壁是北京五中。

据姥姥说,这个院子有四亩地。一排松墙和一棵四人合抱的大榆树,把院子分成南北两部分。南半部,长年堆放着砂石和木料,是父亲开办的“大业营造厂”的料场。紧靠南墙,有一排平房,是工人宿舍和食堂。北半部稍大些,西边靠近大门,是母亲和她的两位女友——杨姨、栾姨,各出资1000元开办的“理研铁工厂”。东边一座孤立的日式洋房,是我们的住房。洋房北边,是个荒芜的后花园。洋房与东墙之间,有十几棵枣树和桑树。

营造厂离不开木料,松墙南边总是堆着木料。那时候,电锯还很少,经常见到有人在大榆树的树阴底下拉大锯。木料斜支着,一人站在上面,一人坐或单腿跪在下面,不紧不慢地一天天地拉。拉出来的木板,就在旁边码成一个个高高的方垛。

姥姥常领着我去给他们送茶水，顺便欣赏他们干活．因为姥爷是木匠出身，姥姥对木匠活情有独钟．而我却爱问，上边的人和下边的人，谁听谁的。姥姥耐心地告诉我，年龄大的是师傅，不一定在上边还是在下边。

姥姥触景生情，教我第一首儿歌：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也要去……”

罗克常约同学到家里来玩。砂石堆和跳板（盖房搭脚手架用的）搭成的方垛，是他们经常攀登的地方；房角和树后，是捉迷藏隐身的场所。

夏天，桑葚儿熟了，一个个又大又紫，好像糖水都要从里边挤出来似的挂满了枝桠。罗克同学中有能爬树的，上去给我们摘，我们在树下接。接不住的，摔在地上变成了一滩紫水。最后大家吃得牙都变成了紫色。

秋天，枣儿又熟了。自家产的总是和街上卖的不一样——又脆又甜还没有虫。罗克他们用竹竿把一串串的枣儿打下来，我们这些小孩往竹篮里捡。这时姥姥准把一篮篮的枣儿扔过墙去，那边五中的学生再把空篮子扔回来。她说，这样人家就不会爬过墙来摘了。

哥哥和小伙伴儿说起学校学到的知识来，我和姐姐只有听的份儿。

有一次，他们指着一块埋在土里半截的石头讨论它能不能长大，根据是：山能长高，山又是石头形成的，所以石头也能长大。从此我也把石头看成了有生命的东西。还有一次，一个同学神秘兮兮地说，他有一支能射中太阳的“镖”。在我们

再三央求下，他才不情愿地从裤兜里拿出一个长纸包，打开一层又一层的纸，最后露出的是一根磨得锃亮的大洋钉。哥哥气得扭头就走了，我还欣赏了半天。

对我更有吸引力的，是洋房西边的铁工厂。从我家出来往西走，穿过一个藤萝架，就到了工厂区。十来间平房里只有几台老式的车床，大部分是手工工具，平地上到处是铁料和大大小小的铁砧。大概是从小听惯了“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的缘故，我也爱找把锤子找根铁棍胡乱敲打，哪怕把手震得生疼。工人们常对母亲说：“罗文这么小就喜欢鼓捣铁业，长大了准跟他爸爸似的，当个工程师。”母亲总是说：“长大还是先跟你们学手艺吧，给你们当徒弟。”

由于我老爱往铁工厂跑，和工人们越来越熟了，他们经常在工间休息的时候，和我逗着玩儿，有时把我举过头顶，也有时让我头朝下打秋千，以试我的胆量。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工人不小心让我的脸蹭着了地，立刻血流满面，一下子把他吓傻了。他父亲也是“理研”的工人，气得拿起锤把就要揍他。母亲这时顾不上我，先去安慰那父子俩，直到那个父亲保证不打他儿子了，母亲才把我领回家去上药。

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非常在意和周围的人处好关系，无论是新朋老友，不管高低贵贱，不在乎年老年少，她从来对人是谦虚、礼貌、豪爽、热情。工人们也十分尊敬她，不称呼她“厂长”、“遇太太”，而称她为“王先生”(母亲娘家姓)。

那时，有个“严叔叔”，在工作时被机器轧掉了手，养伤期间经常坐在藤萝架下。我每次经过时，他总要拉住我说话，有时让我摸摸缝合的手臂，有时送给我他抓到的小鸟或蝴蝶。伤口完全痊愈后，母亲安排他做轻微的体力工作；公私合营

后，他调到了别的工厂，母亲特意去他所在的单位，请求那里的领导对他给予照顾。

后来，许多职工虽然分配到各个单位，依然保持着和我家的来往。“文革”期间最困难时，弟弟走投无路，投奔的就是“理研”的三轮车工人王叔叔。

我家住的“洋房”，是日式结构，方方正正。进门是间很大的客厅，四周是四间卧室和厨房、厕所。每间卧室住两个人，分别是父、母，哥哥和姐姐，保姆吕姨和弟弟，我和姥姥。屋子不高，地面是木地板。房前不远处，就是那棵四人合抱的大榆树。一年中的三个季节里，从窗向外望去，四周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家里除了八口人以外，还养了一条大狗“哈利”和一只花猫“咪咪”。

“哈利”在院子里有窝，“咪咪”就住在我和姥姥的屋里。每次姥姥起床出去，只要我醒着，都会把“咪咪”叫进被窝。等姥姥回到床上，很快会发现被窝里多了一个生命，马上命令我把它撵下去。

“哈利”呢，虽然是条大狼狗，蹲着都有我那么高，可是和人非常友好，从来不对着人乱叫，更爱和小孩们一起玩耍。家里来了客人，只要父母说声：“哈利，握手。”它就会抬起右前爪伸给客人。

“哈利”总是友善地对待“咪咪”，“咪咪”也不怕它。有一次姥姥讲故事，说猫狗是冤家，我奇怪地问姥姥：“咱们家的‘哈利’和‘咪咪’怎么不打架？”姥姥认真地说，动物也懂自己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再说，“咪咪”小时候刚抱来时，让它和

"哈利"握过"手"。

家中虽有保姆，可是弟弟太小，所以姥姥每天总是很忙。大约每一两个星期，要去不远的"土儿胡同"看二姨。每次去都要带上我，要在那里呆上一整天，算是姥姥得到休息的"假日"。

2. 姥姥

姥姥姓杨名瑛，出生在1896年，老家就在北京沙子口一带，是个典型的"老北京"人。

姥姥的娘家，不是大户，只是个小康人家，所以不供姥姥上学。她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和数字，几乎就是大字不识。她也缠过小脚，但是因为疼，她没有坚持到底，家里也不再强迫，可见还是个比较开通的家庭。

姥姥虽然没有文化，却不是不想上学，估计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她支持自己的女儿出国留学，就足以证明了。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教姥姥认字，那时她已经是五十几岁的人了。我哪儿懂得教书?不知道教材的重要，就用字典当课本。姥姥也十分认真，把我们用剩的练习本，每本撕下空白的几页，凑在一起，钉成一个新的练习本，用来写字。

姥姥写了满满的几页以后，就停止了学习。可能因为"课本"太枯燥，一时不能看到学到的字有什么用；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她的家务活太多。

其实，那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好，年龄最小的罗勉都已经六岁，看他的保姆吕姨还留在家里做家务，姥姥本来是可以享清福的，可是喜欢干净和节俭的她却闲不住。每年她和

吕姨要把全家的棉衣、棉被拆洗一遍，还要给每条棉被缝上被头，隔两三个星期就要晒被子、洗被头。家里的房间比较多，她容不得有一点儿灰尘，除了做饭、做针线活，全部时间都用来打扫卫生。

冬天，姥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拣炉灰里的煤核儿。有时她也抱怨，说炉灰最费手，把手弄得特别粗糙，经常裂开大口子，得用橡皮膏粘上。母亲就劝她，"煤核儿能有什么价值，扔了算了"。

姥姥依然乐此不疲——她把节俭的意义，看得比节俭出来的物质大得多。

我是姥姥带大的，最原始的启蒙教育，自然是从她那里得来的。除了"拉大锯"那样的儿歌，她也讲些有意义的传说。记得她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古时候，麦子不像现在这样，每根秆上不是一个麦穗，而是好几个。那时候家家的粮食都吃不完。有一天，玉皇大帝到人间来查看，见一个妇女在烙饼，儿子在旁边拉屎。小孩拉完了屎，母亲扔给他一张烙饼去擦屁股。玉皇大帝见人间这么糟蹋粮食，非常生气，从此让每根麦秆上只长一个麦穗。"

我家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尚未到大饥饿年代)，姥姥也特别注意节约粮食。不仅是粮食，是物品她都不轻易扔掉，哪怕是一张白纸。我们穿破的衣裳，送人已经拿不出手，她用它们打成袼褙，给我们做鞋垫儿或纳鞋底。

"老北京"人有许多美德，节俭，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诚实、助人为乐，也是非常普遍的。最典型的，莫过于说话的文明礼貌了。称呼对方，只要是成年人，决不说"你"而用"您"；对长辈或年长的人，第三人称都要在"他(她)"字下面加"心"

旁。如果在街上遇到有人问路，一定会十分客气而且不厌其烦地向人家讲解，直到对方满意了为止——不知道的，以为是两个老朋友见了面，姥姥虽然没有文化，却最反对说话带脏字或“野调无腔”。

姥姥很少说起自己的娘家，可能是太平淡或人丁不兴旺的缘故，倒是常对我们说起姥爷。

姥爷是河北南宫县人，从小就在北京学徒，学的是木匠手艺。后来自己开办了营造厂，规模越来越大，成了京城有名的营造业大户。姥爷爱钻研技术，当时北京第一座两层观众席、楼下无立柱的剧场——长安大戏院，就是由他设计、施工的。因为无先例，姥爷也没有十足的成功把握。剧场第一次使用那天，姥爷紧张得没敢去听戏，让姥姥带着母亲、二姨去，自己在家等着听结果。姥姥她们听了多长时间的戏，姥爷就在家坐立不安地来回走了多长时间，直到姥姥她们回来告诉他剧场没事儿，他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姥爷兄弟七个，他排行老大。在北京城工作的就有三个兄弟，可见过去城乡差别并不是很大。50 年代初，许多人感到了城乡差别，想从农村到城市，母亲还安置了几个堂兄弟到她的工厂。又过了几年，城乡差别明显大了，农民再想进城当工人已经不可能，母亲其余的堂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只好永远呆在南宫县，守着身边贫瘠的盐碱地。那里因为非旱即涝，近年已划为贫困地区。

姥爷的寿命不长，五十多岁就去世了，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姥姥是兄弟中的大嫂，为人又十分谦和，自然受到大家的尊重。1956 年，姥姥六十大寿的时候，几十位亲戚到我家给她祝寿，光在我家吃饭的就有 54 人。

姥姥最怕火葬，那天不知道她怎么就说出了自己的这块心病。立刻就有几个舅舅拍着胸脯安慰她说："您放心，我们就是背，也把您背回南宫去土葬。"姥姥感动得落了泪，我也为有这么仗义的舅舅而自豪。但是一年多以后，父母成了"右派"，来我家的亲戚越来越少了，也听不到那种豪迈的大话了。到了"文革"时期，绝大多数亲戚都和我家断绝了来往，当初安慰姥姥的那几个舅舅，见都见不到了。

姥姥好拜佛，相信有鬼神，也相信转世轮回。也许因此才怕火葬。一年中有那么几天，她要吃素；清明，要给姥爷烧纸；在一些特殊的日子，等我们都熟睡以后，她要烧香。她也爱给我们讲有鬼怪的故事。

我小的时候很爱哭，往往为一点儿小事就哭个没完。父母就会装听不见，他们以为没人理我，我会觉得哭得没劲，自然就停止了。我虽然确实不想哭了，可是又认为突然不哭了太丢面子，一时下不了台阶。姥姥心很软，她总是担心我哭的时间长了伤身体，就会拿出几分钱来，让我去买零食，同时给了我一个不哭的理由。每次我都感激得不得了，心里暗下决心：长大以后挣了钱，一定要好好报答姥姥。

姥姥的享受很简单，一是爱听评剧；二是爱喝一两白酒，吃点儿香喷喷的酒菜。于是我的理想就是，天天让姥姥去戏园子听评剧，喝酒，吃普云楼（东四一带有名的肉食店）的酱肘子。遗憾的是，直到姥姥1970年逝世，也没有得到我的一点儿报答。

小孩儿也有小孩儿的忧愁，那时候，只要姥姥不在家，我就常会担心：要是姥姥死了怎么办？

姥姥虽然相信有鬼，也许是问心无愧的缘故，她并不怕

鬼，有时晚上她一个人在屋里休息，为了省电，连灯都不开。比她年轻的吕姨，反而不敢一个人呆在黑屋子里。但是姥姥却怕土鳖虫——只要见到，一定会躲得远远的，叫我们来捉走。有一天她正坐在小板凳上擀面条，好开玩笑的哥哥偷偷走到她身后，在她头上伸出三个指头，表示"三毛"——孩子之间常以此互相取笑。姥姥以为土鳖爬到了她的头上，立刻吓得背过了气。我们喊来邻居家的大人，费了一番周折才让姥姥恢复了神志。从此哥哥再也不敢和姥姥开玩笑了。

"老北京"人很具备幽默感，所以诞生了相声这门绝妙的艺术。但是严格的敬老精神和尊卑观念，限制了幽默的发展。姥姥常给我们讲笑话，但是绝不允许晚辈和她开玩笑。她讲笑话很富于相声特点——即使我们都哄堂大笑了，她还是若无其事地故作严肃状。

也许因此诱发了我想当相声演员的念头。记得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突然对相声很痴迷，甚至想进曲艺团，但是马上遭到了反对。班主任是四川人，偏巧他最讨厌的艺术就是相声。姥姥并不一定以为我真的会去说相声，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学那个干吗？贫嘴呱舌的。"姥姥对相声艺术的不良印象来自于她年轻的时候，那时相声登不上大雅之堂，只能在天桥一带的地摊表演。每次表演之前，先要劝观众中的女宾离开，以免说到下流笑话让她们尴尬。

没学成说相声主要还在我——嘴上的功夫不行，也没有当众表演的胆量。

"老北京"人的幽默，还表现在能把深奥的哲理，用简单的事实表达出来，不仅风趣，而且少费许多口舌。没有文化的姥姥，居然也能编出一句至今我还受益匪浅的至理名言——

"家里有一百间房子，最后还感觉少一间。"

真是形象地描绘出世人的心态。

3. 二姨

姥姥只有我母亲和二姨两个女儿。母亲刚参加工作，姥爷就去世了，而二姨家境又贫寒，所以姥姥一直和我们一起过。

二姨和母亲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母亲好学习（两次去日本留学），身体健康，事业心强，喜欢轰轰烈烈，心胸开阔，交际广泛；二姨从小体弱多病，不爱上学，不爱参加工作，心眼小，愿意过温馨的小家庭生活，不善于交际。母亲是左嗓子，吹拉弹唱一窍不通；二姨酷爱戏曲，听到评剧就陪着落泪，听到京剧就跟着哼哼。年轻时曾决心去当演员，但是姥爷觉得自己是京城营造业知名人物，认为女儿做"戏子"有失自己的身份，坚决不同意。

如果是母亲，可能早就叛离了家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二姨天性怯弱，毫无反抗精神，及至姥爷去世，二姨也早已超过了学戏的年龄。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一终生的遗憾吧，她嫁给了同样酷爱戏曲而且拉得一手绝妙京胡的姨夫。姨夫家境贫寒，婚前，二姨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多盛些饭菜藏起来，偷偷送给姨夫吃。

姨夫对京胡的爱好，简直达到了"癖"的程度——他经常半夜两三点起床，赶到京剧名角的琴师家，站在墙外偷听人家怎样练功。

他每年春节，都要去我家演奏一次。尤其是他拉的京剧

曲牌“夜深沉”，每次我们全家老少都听得如醉如痴。演奏完了，窗户外面准趴满了好奇的邻居们。

可是，艺术不能当饭吃，他必须去工作。他当过交通警，拉过洋车，去协和医院做过会计……一旦业余爱好和工作发生冲突时，总是工作让位，于是什么也干不长。刚结婚那两年和我们一起过，可是姐俩的脾气、两家的生活习惯又那么不一致，所以最终还是分开了。母亲介绍他到摩托车厂当了一名会计，以后再没有离开那个单位。

做家长的可能都是这样——子女当中，越是“没出息”的、越是离自己远的，她(他)越是惦念。

姥姥一到二姨家，尽管房间只是阴暗潮湿、狭长的一条，尽管只能容纳三个人的一个通铺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她仿佛感觉这才是她最舒心的地方。

二姨不像母亲说话那么直，嘴出奇地甜，往往说得姥姥心花怒放。姨夫和二姨说话常用京剧的“道白”：

“娘子，给我两毛钱我去买猪肉黄酱是也——”

“相公，早去早回不要延误时间哪——”二姨随声附和。逗得我哈哈笑个不停。可惜他们不会编唱词，只能念，不能唱，否则和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戏迷》别无二致。

姨夫好说笑话，对我们晚辈又十分和气，我特别愿意和他相处。别看我家的伙食比姨夫家的好，我反倒更爱吃他家的饭。

有一回姥姥和二姨去串门，姨夫留下来给我做饭吃。做饭前，他先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想吃什么。看我说不出来，就用商量的口气说：“咱们吃‘小金鱼’怎么样？”我问：“‘小金鱼’是什么饭？”他故意卖关子不肯说，吊我的胃口。等到他做

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就是用面做的“拨鱼”。如果是在家的话，我对它可能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可是跟姨夫在一起吃，就觉得格外香。

回到家，想让母亲也好好奇，特意炫耀我吃了一顿“小金鱼”，不料母亲平淡地说了声：“噢，你们吃的是拨鱼。”弄得我大失所望。

在了解小孩心理方面，我更佩服姨夫和二姨。

4. 初遭劫难

1952年春夏之交，有一次我和姥姥从二姨家回来，发现家里气氛和往常大不一样——家里见不到父亲，母亲关在卧室里写东西，其他人说话、走路也都轻悄悄的。听姐姐说，这是“三、五反”运动，爸爸被抓走了，昨天工作组在客厅还审问了妈妈、杨姨、栾姨，杨姨吓得尿了一裤子。

我全然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前几天我们不是还唱着一首歌谣“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吗？怎么“三反”又“反”到我家了呢？后来才知道，所有私营业主，全是被怀疑对象

父亲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年营业额才几十万元），遭到逮捕，关押在半步桥监狱。母亲既是案犯家属，又是“理研铁工厂”厂长，双重身份，被隔离审查。

第一次蒙受不白之冤，母亲异常伤心。保姆害怕她会寻短见，告诉了哥哥。哥哥带着我们几个弟弟、妹妹去求妈妈不要想到死。感动得母亲痛哭起来，憋闷了多日的痛苦一下子收不住了，把我们一个个搂在怀里，安慰我们说：“妈妈不会

死的，妈妈就冲你们几个孩子也不会去死，妈妈离不开你们。”

幸亏我那时还小，还不懂忧伤，第二天照样在院子里玩，照样跟姥姥要几分钱，从大门底下钻出去买芸豆饼吃，照样去职工食堂找厨师胡大爷玩耍。胡大爷知道母亲最爱吃他蒸的刀切馒头，趁人不注意，用屉布包上两个塞给我说：“快拿回去给你妈吃。”

没多久，代表政府的工作组怀疑工人协助我家藏匿了偷税的巨款，胡大爷也在其中。

有一天，姥姥有了不祥的预感，让我去食堂看胡大爷。我回来向姥姥学舌：“他还冲我笑呢，就是脸有点儿红。”四岁多的我，还看不出来有更多的异样。

不料，当天晚上胡大爷就不见了。工作组和所有职工相信他跑不出这个大院，在院子里挂起几个特大的灯泡，在各处犄角旮旯寻找，甚至有人用长竹竿到水井里去搅探。外面的嘈杂人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看到全家人，除了弟弟，都从床上起来向屋外张望，只见好多人影在院里晃来晃去。

忽然，有人发现大榆树上有人拴了一根绳子，另一头通到跳板方垛的空穴中。方垛足足有两人多高，此时谁也不敢爬到上边去看，只是在下边乱喊：“老胡，快出来！”

约莫一两分钟的时间，有人商量着要爬上去看。

突然，胡大爷从里边蹦出来，一下子就被绳子吊在了树上，只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

这些都是后来听大人讲的。当时大人们怕我们被吓着，早打发我们钻回被窝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大榆树下，看见一领席下面盖着胡大

爷，露着脚。活着的胡大爷好像还在我身边。我永远忘不了他那花白的胡子和眉毛，忘不了那双笑眯眯的又像是刚刚哭过的红肿的眼睛，忘不了他蒸的又大又暄的刀切馒头。我想看看他死后是什么样，可是不知道该不该拉开那领席子。

那时候，还不懂得害怕，也可能是胡大爷生前对我太好的缘故。

一个生命，就这么轻易地走了。

几个月后，“运动”结束了，父亲被放回家，继续经营他的“营造厂”，母亲接着当厂长。经过这么一折腾，“营造厂”业务大受影响，当年收入几乎没有，职工也无法分红，气得郝叔叔（后来和我们一起办《中学文革报》的郝治的父亲）老爱说：“找他们要那好几十亿去！”父亲这时总会笑笑，什么也不说。尽管他比别人还多坐了几个月的牢，但他涵养极深，好像天生就能容忍委屈和冤枉。

比起坐几个月牢更让他痛心的是，不久又兴起了“套狗运动”。他的爱犬“哈利”在他面前，被装进了垃圾车，不知将被运到什么地方去处死。

车到我家之前，已经装了好几只别人家的狗。它们惊恐地东张西望，全然不知等着自己的是什么下场。“哈利”被强行装进车里，被迫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难过得汪汪直叫。爸爸不忍心看下去了，躲进屋里哭去了。

养过狗的人都知道，有时和狗的感情不亚于人。眼睁睁地和爱犬生离死别，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父亲是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又极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此时他一定肝肠寸断。可是，刚刚经过“五反”运动的他，再哀伤又能怎样？

又一个生命,也这么轻易地走了。

狗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据说人类把狼驯养成狗的历史已有一万多年。也可以说,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但是,常以文明史悠久而自豪的中华民族,却总是和狗过不去。1952 年,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套狗运动”,但是还没有做到赶尽杀绝。1954 年,又来一次“套狗运动”,这次无论什么原因,一律不许再养,哪怕它正与孤寡老人相依为命也不能幸免。据说因此引出了数不清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1958 年,上级强迫农民深翻土地,还让把狗肉汤洒在 5 尺深的地下,当作粮食高产的灵丹妙药,结果广大农村的狗几乎绝了种。以后,各种屠杀狗的“理由”层出不穷:“四清运动”时,防止狗咬了工作队的人——杀狗;解放军拉练时,防止狗咬了子弟兵——杀狗;备战紧张时,防止狗把民兵隐蔽的行动暴露给“敌人”——杀狗。更不用说大饥饿年代,熬狗肉汤使劫后余生的狗,又变成了饥民的腹中之物。

许多伤心的事凑在一起,往往会使人对生活的环境有了恶感。尤其是胡大爷自缢的大榆树就日夜立在门前,谁看到它都会立刻想起那个不幸的冤魂。最后父母决定花 3000 元买下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移到那里去。

哥哥为了纪念他儿时的乐园,在作文《我的童年》里,详细地描写了那里的花草树木。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作文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也是他惟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5. 父母的性格差异

父亲是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他把感情看得高于一切，可以为感情不讲原则、丧失理智；而母亲是个理智型的人，不会因感情失去理智。父亲是内向性格，纵然有天大的激情，也不会用语言表露；母亲则性格外向，除了需要保密的她能守口如瓶以外，内心所想的一切都要流露出来。母亲喜欢交往，与人见面总爱热情地打招呼；父亲不善于交往，除非是好朋友，即使见了邻居，也从不主动打招呼，因此母亲总是埋怨他太"死性"。

像父亲这种"死性"的人不少，他们并不是傲慢，而是发憷寒暄，或是记不住人家的称呼，或是根本就想不起来打招呼这件事。后来我家搬到东四去住，院里最早的邻居，福建人陈奶奶，也是这种性格。姥姥和母亲像说笑话似的说过这么一件事：

有一年冬天的半夜，父亲从外边回家。因为我们早都睡着了，没有听见他叫门的声音。陈奶奶觉轻，她穿上衣服起床去开街门。因为从住屋到街门要走一段路，冬天又那么冷，即使没睡觉我们都懒得去开大门。陈奶奶开了门扭头就走，两人居然连招呼都没打。他们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相反，有时陈奶奶给我们开大门，我们叫她一声表示感谢，她绝对不会答应，总是不耐烦地扭头就走。但是陈奶奶绝不是刁钻古怪的人，求她办事，她一定会热情帮助，就是话少；1960 年她家就有了电视机，全院子的十来个小孩儿天天到她家看电视，没见她烦过。可见不能从表面现象去推断一

个人的人品。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父母性格上的差异，虽然有一定的好作用——比如在事业上母亲能帮助父亲维护人际关系——但事业和家庭毕竟不能混为一谈。朝夕相处的夫妻，需要另一种感情的纽带来维系，尤其需要在性格上有互相兼容的可能。父母都有固执的一面，性格反差又如此之大，难免产生感情的裂痕。

父亲最喜欢温柔、甜蜜、娇滴滴的女人，如果整天甜言蜜语，即使明知在作假他都高兴。而母亲却豪爽有余、温柔不足，不会装假，更看不起依赖别人的人。所以，父亲遇到了与母亲截然相反的边姨，立刻就被俘虏了。

1952 年“三反、五反”前夕，父亲提出离婚，母亲痛快地答应了，父亲只身去找边姨。1954 年初，父母又复了婚。除去坐牢的几个月，父亲和边姨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边姨是个很讲究实际的人，她发现父亲虽然感情炽烈，但终究不是理想中的人物；父亲也终于明白，矫枉过正会适得其反，光靠甜蜜蜜也不能维系婚姻。母亲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个结局，因为她从来就不相信人能在幻想中过日子。

父母的婚变带有戏剧性，没有财产的纠葛，也没有吵吵闹闹，难怪“三反、五反”时，有人批判他们是“假离婚”。虽然父母性格差异很大，但是他们一生从没吵过架。

父亲祖籍是山东，他的爷爷逃荒到了东北。到我的爷爷那一辈，已经是营口市的大富人家，能够拥有整条街的店铺。为了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消耗掉了全部家业。到了父亲上中学的时候，家里已经一贫如洗。

父亲上的铁路学校，按照惯例，毕业考试第一名，分配做站长，第二名做列车长，第三名做报务员。父亲是第一名，工资待遇很高，他能够养活奶奶、姑姑了。

不久，他又考取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了公费留学生。虽然自己的学费、生活费不成问题，但是不能养家。

父亲到了日本，发现新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苦于看不懂日文报纸，生活十分不便。于是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这本书的稿费，解决了几年留学期间的养家问题。这书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一本。他用的笔名是"罗茜"，因此给我们这些子女起名都用"罗"字，而不用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有一次我问起父亲"罗"字的含义，父亲说，繁体"罗"字可拆成"四"、"维"两个字，"四维"是"礼义廉耻"的意思。

父亲的所作所为，人们见仁见智，看法不一，但公认的两个优点：一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二是极深的涵养。

他无论学习什么，非要学透、学精不可，直到运用自如为止。他最反对的是满足于一知半解，如果发现我们有不求甚解的现象，就会说一两句不满意的话——这已经是他最"激烈"的表达方式了。

父亲很少急躁，更不会与人争吵、骂人。家里出现一些没人承认的小过失，栽到他的头上，他从来不去辩解。即使是原则的问题冤枉了他，他也顶多说一句否认的话，再不多说一句。好像他知道人家早晚会明白真相，无须过多地辩解。

我佩服母亲的性格。她在我成长时期，充当了父亲、母亲的双重角色，是家庭的顶梁柱，是我们后来承受压力的楷模。

“文革”时期，流行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么一句话。父亲的经历，正是这个论题的证据；而母亲的经历，却是这个论题的反证——母亲参加工作以前，是在优越的环境中度过的。但是，她比父亲更出色地当好了家，而且开始当家的年龄也并不大。

等到我过了而立之年，才体味到母亲很了不起。她的所作所为，不是人人能做到的。说她了不起，并不是光指她承受住了太多的磨难，而是在磨难当头的时候，显示出来的刚强。母亲有时候也哭，比如父亲被抓走、亲友来慰问的时候，突然见到关押三年的姐姐的时候，她只是唏唏地哭几声立刻止住。她明白光哭没用，还会影响大家的情绪。她一生当中，伤心事不可谓不多，但是我们很少见她默默地流泪，从未听她说过悲观厌世的话。

母亲是乐观的，她常以心宽体胖自豪。她年轻的时候喜欢运动，又是个注意营养的美食家，所以身体一直都很健壮，很少见她生病躺下。若不是家里的不幸遭遇接连不断，相信她的寿命一定很长。

1959年开始的三年大饥饿时期，喜爱美食的母亲自然备感煎熬。那时，我们四个孩子都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父亲关在教养所更是苦不堪言（连食盐都要限量），全需要母亲去想方设法解决。在我们的心目中，母亲永远有办法。她就像变魔术似的，总是能从家里找出可以变卖的东西，换成我们的食物。一箱子高跟鞋也许还换不来一斤肉，但是能卖出去就不容易——那时谁敢上街穿高跟鞋？姥姥说，除非当戏装用。

小孩儿想不了那么多，只是觉得有了母亲，就有了依靠。

二、东四北大街519号

1. 新居

1954年，父母买下了东四一个四合院，我们全家搬到这个新的地方来住。这是一座典型的中档格局——北房五间，南房四间(门道和厕所各半间)，东西厢房各一间。

我们住进来之前，刚刚油漆粉刷一新。院子铺上了几格砖，只匀称地留出四个方方正正的花池子。两间南屋住着一家房客，姓陈，老母亲和早已成年的两儿一女，父母同意他们继续留下做房客。

刚把家具摆放好，父母就带着我们去隆福寺买树苗，要把这个光秃秃的院子装扮起来。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了三棵——一棵丁香、一棵海棠和一棵珍珠梅。哥哥坚持要给他留一个花池子种草本植物。他和姐姐每人在这个花池里种了一棵向日葵，后来还种过蓖麻、鸡冠花、美人蕉。

几年以后，三棵树都长大了许多。丁香和珍珠梅是灌木，枝叶越来越茂盛，占满了整个花池；海棠越长越高，树梢早已超过了房脊。每年晚春初夏，丁香和珍珠梅开满了一串串紫色和白色的小花，能持续整个夏天，散发着一阵阵淡淡的香

味；海棠花开得早些，浅粉红色，持续时间也短，但是绽放得热烈。再加上嫩绿的新叶衬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小孩儿的心情总是急切的。春天一到，看见街上有的树开了花儿，就去问姥姥："咱们家的树怎么还不开花儿？"于是姥姥教我们："桃花儿开，杏花儿谢，谁管梨花儿叫姐姐？""海棠什么时候开？""咱们家的是秋海棠，应该和梨树一样，等桃花儿开败了就该它了。"

深秋，花托都变成了黄白透亮的海棠果儿，是我们小孩儿们日夜盼望的食物。后来院里又多了三家邻居，比我小的小孩儿也有十多个了。终于大家盼到了每年收获的一天，姥姥请陈家二叔站到树上去摇打，我们大家去拣，每年收获总有二十多斤。姥姥总是把它们平均分成几份儿，每家邻居送给一份。海棠谈不上多么好吃，酸甜中略带苦涩，可是在万物奇缺的大饥饿年代，这也算得上不可多得的水果了。1965 年，姐姐从工艺美校毕业前，画了一幅海棠的工笔国画，哥哥配了一首词："南风好，南风好，海棠初绽刚报晓，心比春来早。"父亲的字写得好，负责题字。姐姐问哥哥，为什么写"南风"而不写"东风"，哥哥说："到处都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写'东风'，太俗。"

搬过来的这一年(1954 年)，罗克考入了北京第 25 中学。

进入中学，随着见识的积累，也增长了罗克的想象力。从他那里我们知道 25 中有一个小动物园，里边养着鸡、狗、兔子、羊；也知道了鸡得吃石子儿，狗可以消化骨头，兔子不能喝水。他经常给我们讲稀奇古怪的故事，让我们三个弟弟、妹妹和他一起演他编的木偶戏、皮影戏以及他照小人书改编的话剧。有时大人们也好奇地来看。他还给我们编写"小报"，是

他在一张 16 开白纸上用钢笔和铅笔写、画成的。

我还记得他曾经画过一个无精打采、贼眉鼠眼的人站在路灯下，旁边写着："流氓不回家，住在大街上，警察把他抓走啦。"还有他新编的"龟兔赛跑"——讽刺机械教条的乌龟认准了兔子一定会在半路上睡大觉。可是这只聪明的兔子并没有睡觉，而是早就到达了终点。

他让我们也投稿，虽然我什么也没写出来，可是知道了报纸和书不一样，不能出现"空白"，必须用文字或图案填满。

他还组织我们举行自编的诗歌朗诵会。更经常的，是他给我们朗诵寓言故事。有时他也会突然考我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还是吃饭为了活着……"

罗克最爱领着我们做的游戏是"比赛谁的胆儿大"。

通常吃过晚饭，姥姥带着我们在南屋休息。如果赶上父母工作忙，回来得晚，北屋就没有人，一片漆黑。哥哥让我们单独走进黑屋子里去，比赛谁敢进的黑屋子多(每间屋最少呆5 分钟)。为了增加恐怖效果，他把别的屋子的灯也全关上，不出声响。

如果家里来了带小孩儿的亲戚，罗克就更来劲儿了。他先带我们大家到东四一带行人很少的小胡同去转，看到一些紧闭大门、古色古香的小院，就讲起了吓人的故事，然后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回到家又开始了"比赛胆大"的游戏，好几个比他年龄还大的小孩儿刚走到院子当中就吓得跑回南屋来了。

哥哥看到姐姐和我胆子越来越大，黑屋子已经不起作用了，又把游戏地点转移到北屋东头的"小煤屋"。

这是一间一米宽，五六米长的小屋，没有门窗，专门存放

煤和劈柴，即使白天也需要开灯照亮。他画了好几张青面獠牙的人物，又把电灯遮住一些，然后让我们一个个进去参观，问我们哪张最吓人。我们一致认为一张苍白精瘦的“吊死鬼”最可怕，可是也没把我们吓住。他有点儿失望，于是眯着眼睛从一只大竹筐的细缝往里看，说这是最吓人的一个东西了，问我们谁敢看。看到他认真的样子，我们都说不敢，他才得意地走了。第二天，我和姐姐把灯光弄亮，从筐缝里一看，原来什么也没有，都十分后悔没通过最后一关。

罗克除了学习好以外，象棋也下得好，他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后来他能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不管学什么，只要他学起来，都能学得出类拔萃。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和写大字。

罗克从小体质很弱，为了增强体质，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坚持练哑铃和长跑，后来他又喜欢上游泳和爬山。但在运动上他就是显得笨拙。比如游泳，尽管他可以靠毅力在水中游很长时间，游很长距离，但速度却不快。写大字也如是，虽然下过一番功夫，临摹各种字帖，但总也不能使自己满意。

罗克的中学时代，像无数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一样，显示出这样一条真理：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正如他后来在《出身论》中所阐述的：

> 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但是,罗克当时接触到的社会影响,只是报纸、广播和课本,都是照本宣科的说教。纯洁的罗克,从善良美好的愿望出发,并不知道,许多事实与宣传大相径庭。记得有一次一个人到我们家门口要饭,那时罗克还以为要饭的都是好吃懒做的人,就规劝人家"应该回家好好生产,不要不劳而获"。结果,把那个人给吓跑了。

后来,罗克接触到真正的社会,再遇到要饭的,就经常解囊相助了。

1956年,单纯的哥哥,劝说诚心诚意拥护社会主义的母亲,把自家的四合院献给了政府。姥姥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房子反要向房管局交房租?"哥哥说:"这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姥姥叹息着不说话了。

公私合营了,妈妈兴高采烈地回家述说了这一喜讯,以为这样自己就不再是"私方",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再也不被政府宣扬的"劳资矛盾"所纠缠了。母亲与合伙人积极响应,让铁工厂与公家合营了。喜悦的母亲放弃了"保留工资"这种优厚的待遇,而给自己工资定为70元。全家人在哥哥的笑声渲染下都显得很高兴,妈妈以自己开明资本家的身份自豪,全家人也为妈妈被选为市人大代表而高兴。

父亲在水电部定为二级工程师,他也受到单位的重视而展露出自己的才华——在良乡设计了一片竹筋楼。竹筋楼每平方米造价只有40元,原计划使用5年,但至今还在使用着,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万元资金。

1998年,我又采访了"竹筋楼",如今取名"竹筋巷"。当初盖了四十多栋两层楼,如今有二十多栋被部队占地拆掉

了，还剩下22栋。这些年经过邢台、唐山两次地震，没有一间损坏。一位在那里住了四十多年的居民说，“再住一百年也没事”。

记得1956年国庆节，父母都被请到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罗克参加了乐队前的少年儿童队伍，罗锦被学校选为献花的少先队代表。晚上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全都沉浸在一片欢乐幸福之中。

第二届普选时，罗克被选作东四区监票人。他昂首挺胸地站在票箱旁边，把这看作是莫大的荣誉和神圣的使命。

这时，是他金色的童年。

2. 再遭劫难

1957年，父亲设计的竹筋楼建成并被评为“有贡献的工程师”。没多久，就因为反对“小汇报”制度，并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当时《北京日报》用很大字体的标题，开展对母亲的“批判”。

有一次，罗克陪伴病中的母亲去工商联作“检查”。散会时，他跑向母亲，安慰她说：“妈妈，我相信您是个好人，受委屈的不是您一个人。”一向刚强的母亲哭了。周围几位老人也潸然泪下，他们至今还记忆犹新。

正受围攻的母亲，得知在良乡工作的父亲也挨了整，不能回家，非常担心他想不开。十四五岁的罗克一个人坐火车到良乡水电部电管局去看望父亲。父亲吃惊地听着从一个孩

子嘴里说出的老成的安慰话。他欣慰了——能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孩子,他藐视一切诽谤、诬陷、误解和嘲笑。

其实,父亲是个极不爱说话的人,更不用说给谁提意见了。单位领导为了让他说话,特意选他当"职工代表",结果一句无关痛痒的话,带来二十多年的磨难。

母亲被分配到密云水库劳动。为了安慰在寒风中劳动的母亲,罗克让弟弟、妹妹们给母亲写信。罗克写了很长的一篇,年龄最小的罗勉,当时只上小学一年级,就写了一句:"妈妈,我想您。"罗克夸他说:"这就可以了。"然后把四个孩子的信装在一起邮走了。

许多人回忆童年的时候,总爱用"金色"、"幸福"、"快乐"这些美好的字眼。哪怕生活是困难的,可能他们更看重的是童年的无忧无虑。而我对童年最大的印象是担忧。

"反右"那年,我才上小学二年级。父亲已然离开了家,无法顾到我们。我们最担心母亲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岂不成了一群"孤儿"?而且社会上三天两头有"下放"的消息,谁也不知道"下放"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相当于"教养"?所以每当母亲下班晚了,我们都急得坐卧不安,生怕回来的不是妈妈,而是令人生畏的"通知"。

如果哥哥在家还好些,我们好像有了主心骨;尤其哥哥也不在家的时候,姐姐、弟弟和我真是六神无主了。只好让姥姥拿主意,迷信的姥姥也只能从少得可怜的薪金里拿出两毛钱,打发我们买一炷香,求菩萨保佑。

有一次,我们姐儿仨正在烧香,母亲到了家。我们急忙把香弄灭,开窗放烟,姐姐还向各处撩水,以为能把烟消掉——不能让母亲知道我们烧香,她最反对迷信。结果还是被她发

现了。我们不敢承认在为她祈祷，谁也不说话。她以为我们在玩火，狠狠地说了我们一顿。虽然受了冤枉，看到母亲平安回来了，心里还是非常高兴。还有一次，香刚买回来，母亲也到了家。为了省点儿钱，也怕万一被她发现，我们决定把香退掉。怎么能找个合适的理由去退，让我们作犯了难。姐姐年龄稍大，首先想出了主意："就对老板说，姥姥让我们买姜，我们听错了，买成了香。"我和弟弟都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这才有了勇气去退货。

父亲在被送去教养之前，羁押在半步桥看守所，这是他第二次被关在这里。从这里，又被分配到良乡、窦店、茶淀、北苑、延庆、兴凯湖等许多农场去"改造"。

只有北苑不光是农场，那里也有工厂，父亲在化工厂。记得他总是向家里要手套，从他那里拿回洗换的衣服，经常是被硫酸烧成一个个大洞，没破的地方，用手轻轻一扯就破了。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刚会骑自行车，常去给他送东西。

大饥饿年代，浮肿的人特别多，专政机关里的犯人只能加个"更"字。为了"治"犯人浮肿，少给他们吃盐，所以父亲最爱要的是黄酱和酱油。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个冬天，风特别大，我骑车赶到那里，人家刚刚把小窗口关上，我只好趴在窗台等下午上班。我眼睁睁地看着负责收东西的警察拿起饭盆出去打饭，又端回来慢条斯理地吃。

他那天吃的是大米饭、炸带鱼，这是当时最好的伙食，透过玻璃似乎都闻到了香味儿。我也正饿得肚子咕咕叫，赌气不去看。这个警察恐怕别人不知道他吃好的，故意把鱼刺"滋滋"嘬得山响。我想离开窗口，又怕别人抢占了第一的位置。

好不容易盼他吃完，又看着他喝茶、看报，等到下午上班，懒洋洋地打开窗口，说了声“拿来”。我赶快把东西一样样递过去。先递的是衣服、手套这些没争议的，想等他大意了，最后才递进去黄酱和酱油。

最后这两件他看了看又推出来，说：“不收。”

我急忙解释：“这是‘无盐酱油’。”我是跟妈妈学的，遇上好说话儿的能对付过去。

“那也不收。”

我只好把它们装起来再带回家。

我很想见父亲一面，怕和他生疏了，那不是和没有父亲的孩子一样了么？我多么希望像别的孩子一样，家里有个可以介绍给人的父亲呀。实在不行，我心中有个形象鲜明的父亲也将就了。

但这天不是接见的日子。

在罗克参加工作以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干了5天临时工，第一次收入5元钱。自从父亲被教养后，已经几乎不给罗克零用钱了。这5元钱，他多么希望能买纸、笔和书啊。但是他想起可怜的父亲比我们每个人更苦，他决定把钱送给父亲。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哥哥独自一人骑车到北苑教养所，等了许久才见到父亲，见面只有20分钟。送过洗补好的衣服和家中自己炒的炒面，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时间就到了。父亲收下了钱，以为是母亲让送的，而母亲却不知道有此事。直到哥哥牺牲后，父母回忆起他的每件小事，才知道了真相。

父亲被教养期间，正赶上大饥饿年代。他很少对我们说

那里怎么苦，后来我陆陆续续从一些同样经历的人那里，才知道饿死人是经常的，有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埋死人。偶尔分到鱼，连刺都要吃，鸡蛋也是带着皮吃。

为了告诉我们沥青的毒性（马路晒粮的坏处），听他讲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大伙儿额外得到几棵白菜，找个熬沥青的大铁锅煮一煮分了吃。煮之前把锅里里外外刷得干干净净，看不到一点儿沥青的影子。

菜煮熟后分给大伙，有两个嘴急的，不等凉一凉就吃，一碗还没吃完就死了。他俩算是救了大伙儿的命。

小学毕业那年，我陪母亲去延庆县看父亲。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还要随身托运走自行车，因为下车后还有几十里的路。车开过八达岭开始卖发面饼，车厢里立刻充满了面香味。火车上卖饭不要粮票，是难得的机会，可是卖饼看车票，我们没出北京，没资格买。买到的旅客顶多咬一两口，都小心翼翼地揣了起来。

父亲他们好像正建个新的教养所，犯人们都在砌大墙。收工回来，我们见了面，母亲悄悄问：“你是学建筑的，也砌墙？”父亲说，这里尽是工程师，都得干体力活，他不会砌，只能当小工——给人家打下手。

这时，父亲的“教养期”三年早过了，“就业”也两年多了，但是待遇和教养没什么区别，照样没有行动自由，更不用说回家看看，或者回北京工作了。北京市委有规定，有“渣儿”的人，只要户口迁出市区，就别想回来，为的是保证首都的“纯洁”、“透明”和“安全”。不久，父亲又被转到兴凯湖农场，我们送东西和见面就更难了。

“就业”的人还是有一点儿“权利”。这一夜，我们一家被

安排住进一间“单间”。这是一间极小的房子，一个小土炕占去了四分之三，站在炕上，头就碰到顶棚，隔壁的说话声，听得真真切切。劳累一天的我，躺下就睡着了，父母说些什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只是第二天回家的路上，母亲对我说，一定得想办法把父亲办回家。

后来母亲实现了自己的诺言。1964 年，父亲终于回到了家。虽然失去了工作，我们还是惊喜万分。我想，母亲一定费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的被教养的“右派”，没有一个回北京的。而无数的有为之士，至死都没有回家的机会。

直到 1979 年，父亲才被摘掉“右派”帽子。1984 年“落实政策”那天，我和母亲陪他去华北电管局。一个处长给我们宣读：“……遇崇基同志……1952 年 10 月隐瞒历史特务份子和不法资本家问题参加北京基建局工作……1979 年 6 月 28 日右派改正，按退休给予安置。”恢复工资 132 元，补发两年。问我们有什么意见。

我说：“您最好收起‘同志’两字。‘右派’虽说是敌我矛盾，好歹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特务’可是货真价实的敌我矛盾，您也好意思叫‘同志’？”

那人翻了我一眼，好像怪我“连客气都不懂，真不识抬举”似的，懒洋洋地解释说：“你父亲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过，就是汉奸、特务。”

我反驳说：“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在日本人的铁路部门工作，是不是也算特务？”人家连理都懒得理我。

父亲急忙说，划“右派”时，他的工资是 198 元，不是 132 元。那人说：“我们只找到 132 元的证据，没找到别的证据。”

父亲说，有好几个人都可以证明。那人说："没用。"

母亲说："什么132、198的，够花就得了呗。以前不给咱们，不是也过来了么？"

父亲认为不是钱多少的事，是这口气难咽。因为所谓"证据"里父亲的签名，都是伪造的。后来他又不厌其烦地写信申诉，直到6年后，他去世的前一年，才承认了198元，但是也只能"从即日起发给"。

3. 小学

1955年，我开始上小学。哥哥、姐姐都是在府学胡同东四区第一中心小学上的学，家里认为那个学校好，让我也去那里报名、考试。

还记得当时考试的情景：一排平房的几间教室，每间教室里摆了一长溜桌子，几个老师坐在里边。进第一间，问姓名、年龄、父母、住址等等；第二间的老师讲个故事；第三间的老师提问故事内容；第四间的老师考唱歌或别的表现；最后再做简单的体检。因为我从小上的是学校旁边的幼儿园，很容易就通过了考试。

由于年龄还小，不懂什么学校好不好，只感觉离家太远。从我家到学校，先要坐三站电车，再步行一站远的路，才能走到。本来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和两三位小朋友乘三轮包车上学，快毕业的那年，不知因为什么，几个小伙伴一合计，说什么也不坐三轮车了。我和父母一说，他们倒也放心，答应每天给我一毛钱，来回坐电车用去6分，其余4分算做我的零花。等到上了小学，为了零花钱宽余些，干脆不坐车了。来回步行

要用去两个多小时，好在小孩儿时间有的是，可干的事也不多。

一个人在路上闲极无聊，养成了好幻想的毛病。比如幻想自己有一把刀，无比锋利，不仅削铁如泥、砍毛断发，甚至刀刃离东西还有一尺多远，早把它切开了。平时存放刀得有一个特殊的鞘，只有这个鞘，刀切不动。用这把刀专门找恶人去打仗，把他们一个个杀得片甲不留。要不就幻想自己耳屎如何多：只要一歪脑袋，耳屎就哗哗地流个没完，立刻堆成一堆，直到堵上了耳朵眼儿。要想流痛快点儿，必须站在卡车尾部，让车飞快地开，结果给马路铺上厚厚的一层……如果在家里拣到一个废弃的铝勺把儿，就在路上的砖墙上边走边磨，费了好多天的工夫，直到磨成想要的形状，想象着它能代替毛笔，写起字来又省事、又漂亮——真正沾上墨一试，自然大失所望。

"反右"运动的大规模开始，正是在我们放暑假的时候，也是我从二年级该升三年级了。母亲怕我在学校受气，也觉得路上耽误那么多时间不值得，花销又大，让我转了学。新学校是"东四五条小学"，在东四一带算不错的学校，据说两年前还是"私立"，刚刚改成了"公立"。弟弟罗勉也在这里刚上一年级。

"五条小学"确实不如"一中心小学"。拿写字来说，我在那里算差的，记得老师几次在放学后留下我不让走，练习写字。到这里反而没有人说我写字不好了。班里的纪律也很差，自习课更是乱哄哄。更可笑的是，学生封建思想还挺强，男女生之间说句话都会有人起哄，结果直到毕业，我和大多数女生也没说过一句话。自习课虽然乱，女生说话可不行，否则有

那厉害的男生会去管，弄不好还会揍她两拳。男生之间也是谁力气大谁厉害。

我印象很深的是，学校里有一个教堂。平时我们在那里上音乐课，星期天有人来做礼拜。教堂旁边有一个大门紧闭的小院，住着一对老夫妇。我们都猜测老头是牧师，可是没见他穿过牧师的衣服，而且总是阴沉着脸，学生都很怕他。听弟弟说，我上初中以后，教堂全改成了教室，估计那时已经不允许再做礼拜了。

4. 哥哥的性格

父母都是右派的学生，在学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势利眼的班主任开始把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首先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甚至有一次竟散布什么："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罗克气愤地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从此我懂得了抗争，哪怕对方是硕大无比的"权威"。

虽然他的操行评定是"中"，然而他的品德是那样高尚。有一件事我永远忘不了：1959 年，父亲被教养没有工资，全家 7 口人（姥姥、父母、四个孩子）只靠母亲的 70 元工资维持生活。有一天，刚上二年级的弟弟去买冰棍，人家多找了钱，他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对罗克说了。罗克严肃地说："多找的钱不是你的，你应当送回去，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带着弟弟把钱退回去了。

哥哥从小爱开玩笑，比如熟识的人用三轮车送他回家，他会把上衣往上拽，脑袋缩在领子里。他以为人家回头看他，会以为他没了脑袋而吓一跳。

他好做鬼脸，甚至还做着鬼脸照了一张相。

他也爱和大人开玩笑，但从不失礼貌，并严格要求我们对长辈说话一定要用“您”。

后来虽然总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幽默的性格。他有时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赛谁讲的笑话能把大家逗乐了。有一次母亲想念被教养的父亲，心情不大好，哥哥编了一个笑话讲给妈妈听：“我小的时候写大字，家里舍不得买红模字，妈妈给我写字，让我透过薄纸拓。我总是得 3 分，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天老师翻错了页，给妈妈写的模字判了分，才给 4 分……”连妈妈也给逗乐了。他善于用幽默的语言讽刺时弊，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妙趣横生的。

他高中毕业以后，准备下一次高考那一年，只要姥姥出门，就由他给我们做饭。我们放学回家，先看见他贴在门外的菜谱。每次要做三四个菜，古怪的名字勾引起我们的好奇，但吃起来全是一个味。还是母亲发现了奥秘，原来只要家里有的作料，他每个菜一律放全。

1959 年，哥哥高中毕业。他虽然高考成绩优秀，语文、数学都是最高分，还是因为出身落了榜。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

这时候，我家正是经济上最困难的阶段——7 口人只靠母亲 70 元工资生活。母亲希望哥哥早日参加工作，协助她共

同支撑这个家，但是更希望她这个才华横溢的儿子不被埋没，她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父亲被教养后，为了节省房租，我家退掉大部分房，只剩下三间北房，两明一暗的格局。哥哥很希望自己有独立的一间，哪怕是东头儿的小煤屋呢。他说，只要安个门就行了。母亲不同意，担心这个狭长的小夹道连个窗户也没有，又潮湿，住在里面会生病。

向来心直口快的姐姐说："不就是缺个窗户吗！"话音没落，拿把斧子就走了进去，三下五除二，把夹道尽头的北墙刨出一个洞。多年黑糊糊的小煤屋里，头一次透了亮，土鳖和潮虫见了亮光吓得满处乱爬。墙那边是个服装厂，只听见那边有人喊上了："你们家大人快来看吧，再刨房顶就塌下来啦！"

几天以后，房管所来人安上门和后窗，把墙抹了白。姥姥带我们用纸糊上顶棚，又请了个当木匠的亲戚做了一张简易的桌子和一个书架。从此哥哥有了自己的屋，每天在那里读书到后半夜，姥姥和母亲没少为催他睡觉操心。

5. 我们总算没饿着

1959 年下半年，食品和百货供应已开始紧张了，什么都凭"票"、"证"。到了 1960 年，供应就更困难了，为期三年的"大饥饿"年代开始了。

那时我刚上五年级，上午还没上第四节课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了。气人的是，第四节课偏偏常安排"农业基础知识"课，老师一讲玉米、白薯、花生、瓜子这些能吃的东西，只见学

生们一个个馋得直咽唾沫。放了学，大家迫不及待地跑回家去慰问肚子。

到了家也不一定能填饱肚子，尤其是家里半大小子多的，粮食都不够吃，只好用菜汤充饥。去同学家，经常看到一家子，煮一大锅老菠菜，一人捧着一只大海碗在喝。汤里见不到油，只好多加盐，俗话说，"要解馋，辣跟咸"么，结果尽是浮肿的。

相比之下，我家还算好的。母亲向来好吃，又想得开，于是变卖她的衣服、首饰和家具去换高价食品。记得当时的高价白菜每斤四五元钱，二级工月工资才三十多元。

有了钱也不一定能买到想吃的东西，有时母亲从药房买来磷脂、秋梨膏给我们补充营养。姥姥不时地哀叹："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吃上红烧肉了。"

不久，哥哥去南郊红星农场插队，经常买些那里处理的死填鸭、大米、青菜、奶油等等，解决了大问题，我们总算没饿着。

记得有一次弟弟病了，姥姥为他包了几个素馅儿饺子——炸俩排叉儿代替肉。姥姥喜欢我，允许我尝一两个。我觉得香得不行，吃的时候咬着了腮帮子。姥姥风趣地说，那是想吃肉了。我说："要是天天能吃上饺子就好了。"姥姥说："那只能是仰巴交(饺)了。"逗得我和弟弟直笑。

哥哥去农村插队，未必想到能买这些吃的，那时对农村还不了解，只知道农村很苦，饿死了许多人。如果他不去农村，去工厂当工人、去偏远山区教书都比较容易。凭他象棋的水平，完全可以进专业队。许多人劝他走这条路，他说，有一次参加比赛，听两个老专业棋手聊天，说的都是怎么和儿媳

妇斗心眼儿的事，俗不可耐。他怕自己老了也会变成这样，干脆打消了当专业棋手的念头。

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到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既然是社会问题，就应该研究社会，了解社会。他首先选择了自己最不了解的农村。为了方便学习文化知识，他也不想离城市太远，于是，他毅然决定报名到南郊农村当个农民。

1961 年春节前，街道批准他去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他高兴得接到通知就去迁户口，连春节供应的那些副食都放弃了，姥姥气得直叹气。

6. 初入社会的哥哥

罗克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每读完一本都要作读书笔记。他每年有一套读书计划，数量是很可观的。到农村后更是抓紧了每一分钟，正如他给自己床头写的横幅："分秒必争，珍惜生命。"

他在首都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阅览证，每个月回家时都要换借几十本书。他鼓励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多看书，并常带我一起去借书，以便我能挑几本自己想看的书。因为我那时是初中生，还没资格到市级图书馆办借书证。

有时他索性写张目录，让我替他连还带借。本来图书馆规定非常严，不允许借书证给别人用，可是一看是他的名字，没有人好意思点破。原来他和馆里的人都很熟，每年还参加那里举办的新年文艺晚会。我只看了一次，他表演的是，朗诵陆游的《钗头凤》。

姐姐和弟弟就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俩也想利用哥哥的借书证，姐姐让弟弟冒充哥哥，因为她是女的，装不成男的。弟弟才十一二岁，与成年人相差甚远，人家不好再给面子。

当时他每月的工资，除了留下少量非花不可的钱以外，大部分都交给家中使用。他没有任何需要花钱的嗜好，相反他每月还尽量节省一点钱给我们买些书。在这些书上，他还常常写上一些题词赠言。

哥哥在农村时，有一阶段租住在社员家里。据社员反映，他每天都要看书到后半夜，因此得了神经衰弱。无论分配他干什么，他也总带着书，有空就看。他最喜欢被分配去看水泵，因为看书的机会特别多。在他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也对书有了浓厚兴趣，如果有空闲时间不看书，就好像对不起谁似的。

哥哥在劳动中是积极努力的。他到菜园后不久就当上了记工员，有时还带工。我们从城里去找他，他也从不放下手中的活或提前收工。有一次我刚到，下起了小雨，社员催他快收工，他故意不着慌不着忙地说："房檐流水就回去。"

我和姐姐在他那里住过几天，他常在晚饭后带我们去散步，体会大自然的温馨，还不无得意地说："这里空气多好啊，你们闻，还有一点儿大粪香。"旁边一位当地青年说："我可闻不着'大粪香'，只知道大粪臭。"

我们在那里干了几天临时工，累得实在不行，原因是缺乏锻炼，干活也不得法。

罗克的群众关系特别好：有人找他哭诉委屈，有人向他倾吐苦衷，有人请他调解纠纷，有人求他排疑解难。甚至

一位因为出身不好与恋人被拆散的青年请他为女友写了首情诗：

> 春怀动了，却是春情少。
> 梦落君边君不晓，风貌依然英俏。
> 别来不忘叮咛，如今苦借雄风。
> 何时携君玉手，相凭天上霓虹。

他走到哪儿都有社员和他说笑，他们亲昵地叫他“伊拉克”。因当时市场上到处销售从伊拉克进口的蜜枣，而遇罗克的名字中又有个“克”字，所以社员们就顺口戏称他为“伊拉克”。他从不摆出有文化的架子，他讨厌说话咬文嚼字。他常对我们说，要增加点群众语言。

他从不歧视任何人。农村有歧视养老女婿的坏习气，罗克则反其道而行之。

据说有一对社员在婚前怀了孕，举行婚礼那天没有谁去参加，只有罗克参加了婚礼。

他也痛恨一种人。那时正是三年大饥饿时期，许多同事凑钱买了两盒糕点给一个住院的病人，由公社一位领导送去。而那位领导在小汽车里偷偷藏起一盒，被司机发现了。哥哥认为这种人比明火执仗的小偷、骗子更坏。

我们只听到过一次他嘲笑那里的人，那就是公社两位领导在一次大会上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后来让台下的听众举手表决以定胜负。

罗克在农村中，更多地看到了“血统论”这个封建社会的遗毒，它在农村比在城市暴露得更彻底。越来越多的不平等

现象，使罗克认识到，出身问题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开始着重研究它，并更加刻苦地练习写作。

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他在小屋里显眼的地方，贴上了一张纸条："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他认为"无论'鸿儒谈'，还是'白丁往来'，都是一样地浪费宝贵的时间"。

罗克写了大量的文章投给报刊，但大部分因"标新立异"或因个人"出身"而未被采用。只有散文《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发表在《北京晚报》(1962年)上，影评《是古代歌仙还是现代歌手》发表在《大众电影》上。在当时对影片《刘三姐》的一片赞扬声中，惟独他在影评中提出了该片还存在某些不合情理之处。

他还写过一篇大鼓词《焦裕禄演戏》，北京曲艺团曾演出过。他对焦裕禄还有些赞赏，他总说：不必要求太高，如果每位领导干部都像焦裕禄那样，还想着劳苦大众，就太好了。

美国的黑人、日本的贱民、印度的首陀罗都成了他关心的对象。他想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他非常欣赏印度影片《流浪者》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揭示"血统论"的本质："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更为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中一段精彩的论述而折服："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

1964年初，罗克的神经衰弱已很严重，他离开农村回到城里，临走前他在自己住的小屋墙上还留下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物去人飞陋室留，斯人知唱不知愁。"

哥哥当时作的两首词，正反映他那时的心境和抱负：

游仙　　咏香山鬼见愁

巨石抖，
欲把乾坤搂，
千古奇峰人共有，
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
山下渺渺茫茫，
来路崎岖征路长，
那堪回首眺望。

无　题

千里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亦长。

7. 初中

1961年，我考上了北京第61中学。这是一所只有初中、没有高中、质量较差的学校。同龄人私下称呼这类档次的学校为“流氓学校”，其实真是冤枉。在校学生质多有些散漫，有流氓行为的不见得比好学校多，只是学习成绩确实不如人家。转年，我校成了北京市中学的足球冠军，档次这才提高了

一点儿。

平心而论，我真得益于这个学校。应了母亲的口头语，"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的学习成绩老是第一名。有时老师甚至向我"请教"：稀释硫酸的时候，应该把水往硫酸里倒还是把硫酸往水里倒。我在数学课上给老师指出失误而受到她的称赞。从此学习兴趣倍增，自然领会格外快，富裕时间就多，就有条件参加课外活动。

当时北海公园里的"少年科技馆"是最高档次的课外活动场所，我先后参加了好几项。有一个学期，数学、化学组我都想参加，可是规定每人只许报一项，我只好忍痛舍掉了数学。回家后非常难过，无奈之中想出个办法：给数学组老师写了封信，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有了一个"发现"——正方形对角线长度是边长的 1.4 倍 然后表示如何想参加数学组学习。其实一年后我们学校讲到"勾股定理"，才知道只要多看看书，就再也不好意思向人吹嘘自己的"发现"了。可是数学组老师没轻视我这种孩子式的大话，不但回信耐心解答了为什么是 1.4 倍，还准许我参加了数学组。

更难忘的是我们上初一、初二的班主任，一个教龄不长的复员军人。敬业精神无可挑剔，早来晚走还要搭上节假日，一门心思想让我们班争第一。

晚上陪我们上晚自习，让学生帮他买俩小黑面火烧当晚饭。在大饥饿年代，我想他一定吃不饱，可从来没听他发过牢骚，精神头儿老是那么足。早上，比我们来得都早，直到我们都到齐了，把他要训的话讲完才回他的教研室。

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小小窝头我吃过"，意思是他曾经因

为教务的过失坐过牢，所以什么也不怕。可是学生很怕他，尤其他教育学生的方法，一般人难以接受。

比如有一天早上，一个同学刚进教室，马上被他叫到讲台前，让这个同学背朝着大家。老师指着他脖子说："你们都欣赏欣赏这个脖子，看看泥有多厚！现在自来水一毛钱一吨，洗一次脖子能花多少钱？我想，你们家再穷，也不至于洗不起脖子吧……"直到他的挖苦话全说尽了，眼看第一节课的老师都快来了，才放这个同学回座位。

这是个男生，脖子、脸上的泥又厚，我们也看不出来他好不好意思。对女生总该好点儿了吧？不，一样不留情面。有个女生让他挖苦得无地自容，就差把脑袋藏课桌里了。

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互相写情书，被女方家长发现，交给了老师。老师在班会上一封一封地念给全班同学听，男生臊得涨成大红脸，趴在桌上抬不起头；女生也趴在桌上号啕大哭

这个老师情绪异常鲜明，正所谓"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我的学习成绩好，对我就格外好，大会、小会、人前、人后总忘不了表扬我。在班会上甚至说："我去遇罗文家才知道，他住东四那样的地方，到处是流里流气的家伙，他没学成流氓，简直是个奇迹！"为了让我把知识学得扎实一点儿，任命我当好几门课的课代表，像老师似的上讲台给同学复习……可惜好景不长，事情坏在小孩有爱开玩笑的天性，又掌握不好分寸。

我们几个小伙伴想逗一逗那对写情书的同学，由我请人写了两张纸条，内容是邀请对方在某时、某地约会，偷偷放在他们的课桌里。女生已没有这份儿心思，交给了老师；男生比

较痴情，傻呵呵地去赴约。结果被埋伏在那里的班主任逮个正着。

如果班主任心平气和地问，我们肯定会承认。不料他没等问，先把这件事上纲上线地定了性，又急忙成立一个包括我在内的“专案组”协助他破案。吓得我们反而不敢承认了，就盼着他找不着作案人，只好不了了之。想不到他可不是善罢甘休的人，经过几天认真核对笔迹，终于有了一个女生成为怀疑对象。

这个女生当然不承认，班主任于是就在她的几个女友身上下工夫，让她们揭发她。他不辞劳苦地找她们谈话，家访，催她们写材料。据说有个女生吓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我看到漏子越来越大了，无辜的人受了伤害，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于是我主动承认是“罪魁祸首”，刚才还是班主任的得意门生转瞬间成了他的敌人，所有“职务”全部撤掉不说，还要没完没了地写检查。

期末考试临近了，一点儿放松的迹象也没有，简直没法复习。我只好以治蛔虫为名开个假条，躲在家里复习。

这次考试我的成绩又很好，头放假召开的家长会，母亲又兴冲冲地去参加，满以为又能听到老师对她儿子的表扬和别的家长羡慕的祝贺。不料事与愿违，老师这次对我的好话不仅只字没有，还指东道西地说，不能光看学习成绩，第一名的不见得品德好。母亲早早地回了家，从此再也没为我参加过家长会。

幸亏这时我们升到初三，脱离了这个班主任，我才算过了关。据说他还想给我记个处分，新班主任和校长都不同意，

结果给我档案里来一条“不能和‘右派’家庭划清界限”。

8. 哥哥返城

1964年初，哥哥回到城里，又重新收拾、布置自己的小煤屋。这间小屋刚刚能顺着放一张单人床。哥哥借用鲁迅为其阜成门宫门口旧居寝室命名的“雅号”，称他的小屋为“老虎尾巴”。这间小屋又黑又潮，被褥必须经常晾晒。尽管如此，哥哥还是非常满意这间“书房”兼“卧室”。

他的这间屋，陈设十分简单：一张搭成的木板床，一个简易书架，一张木板钉成的桌和两个方凳。桌面粗糙，糊上一层牛皮纸，垫上一块玻璃板。墙上挂有两幅国画，是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哥哥又自己写了一条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贴在墙上。直到哥哥牺牲前，他一直在这间屋里生活。

我一想到哥哥，就马上会想到它，因为哥哥的许多惊世之作，都是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从这里诞生的。

我们那时候办报，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谁也不知道下一期哪天能出，应该着重宣传的是什么事。所以和哥哥要稿，全是急茬儿。哥哥向我们做了承诺，只要头天告诉他，保证第二天交稿，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一两万字的大块文章，顶多再加一个白天。

和我们永别的那一天，桌上还放着他刚写完的《工资论》。

30年了，我永远抹不掉这样一个幻想——也许我再次走进这个院落，又看见从小煤屋门玻璃上透出熟悉的橘黄色灯光，我轻轻拉开门，发现哥哥依然在灯光下，微微驼着背，头

也不抬地伏案疾书，还是那样聚精会神地为《中学文革报》赶写伸张正义的文章……为了不让现实打碎这仅有的幻想，至今我也没有勇气跨进这个院子。

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总是严格按作息时间去做，几年来从不间断。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数学、外语、宗教……读书占用了他从早到晚所有业余时间，熬到后半夜是多数。他如饥似渴地汲取人类创造的精神营养，也在为自己的事业锻造一把锐利的宝剑。

在所有领域中，他特别喜爱哲学，反复读过不少中外哲学家的名著——中国的孔、孟、墨、老，古希腊的柏拉图，直到黑格尔、马克思。他不只一次地对别人说："只有了解了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他选定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可惜，他没有机会做到了解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了。

在他快要被捕的时候，有一次说："现在我才知道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还正是胜负难分，如果能看到现代唯心主义的著作多好啊。"

回城两个月后，罗克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编写资料的合同工。尽管任务完成得出色，但"父母都是右派，本人是社会青年"，已使好心的人望而生畏，不敢长期雇用。

后来到蒋宅口小学和小牌坊胡同小学当代课老师，他很热爱这个工作。虽然只是临时代课，但他对学生非常负责。他曾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些书签、玩具作为奖品奖给学习好的学生。

他对学生并不严厉，而且善于启发学生，他曾把一个乱班变成优秀班集体，受到表扬。但是，不久也被辞退了——翻档案，谁敢要父母都是右派的人？

但是学生和他一定建立了非比寻常的感情。因为“文革”开始，各学校都在打老师，他教过的学生好多人来我家看望他，恐怕他也受到虐待。

9. 高中

1964年夏天，我考上了北京65中。它的质量赶不上4中、5中、师大女附中这些一流学校，但也算是东城区不错的学校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只有高中没有初中。

刚接到录取通知时，母亲和哥哥都不太满意，因为哥哥就是从那里毕的业，知道那里的老师很看重“出身”（哪个学校又不是？只是不了解罢了，所以多点儿幻想），如果我再赶上哥哥的班主任就更倒霉了。65中是我报考高中的最后一个志愿，他们以为我能考得更好些，当时没注意我报了这个学校。后来我认为，幸亏上了这个学校，因为它只有高中，学生年龄偏大，“文革”时比许多学校还多少文明些，否则以我后来的处境看，说不定有更悲惨的结果。

母亲本来不同意我上高中。根据哥哥的教训，她认为反正也上不了大学，这三年学是白搭，不如上中专或技校，毕业后到工厂立即是二级工，月工资三十多块，省得高中毕业还得三年学徒，每月才挣十几块钱。初中的两个班主任没少做她的工作，姥姥看我对学习又那么投入，也替我说情，才把母亲说服了。

和上61中一样，我课外兴趣有增无减，尤其热中于枪、炮、火箭、火药、炸药、催泪剂这些刺激性的玩意儿。所以对化学课情有独钟。

学校成立了化学课外活动小组并让我担任组长，从此化学实验室和化学药品库对我开放。但是我除了比别人多做几次实验以外，从来不往家拿，以免辜负了老师的信任。倒是上实验课的时候，没少拜托要好的同学，让他们每人节省一些，我都收起来带回家去。我的那点儿可怜的零花钱，几乎都买了化学试剂和试管、烧瓶。

课余一有空就翻书，专找课本上没有、对我吸引力大的东西去做。书的来源不愁，首都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科技馆图书馆都办了借书证，还能从哥哥的集体借书证里再借几本。我家附近的隆福寺街里有几个旧书店，是我阅览的地方；碰上价钱便宜的，就买下来。有了合适的资料，就该动手做了。

男孩子可能喜欢爆炸物的多，和我相邻的那个班里就有几个同学，也热中于炸药，我们常在一起互相交流经验，到学校的僻静处演示自己的"作品"。我们还各自做了手枪，到校园的小树林里打靶。但是很快学校保卫处就把枪没收了。

难能可贵的是，管实验室的鲁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女士，兴趣不亚于我们。有一次《航空知识》杂志介绍制作小火箭，我拿给鲁老师看，建议化学活动小组做。鲁老师特意组织有兴趣的几个男生，安排几次额外的活动，做了好几个"火箭"。

记得试飞那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操场上人不多。鲁老师毕竟是女士，不敢去点火，站在远远的地方看。说来也巧，前几个顺利放出去了，最后一个不知什么缘故，没飞起多高，一头扎向了鲁老师，吓得她抱头就跑。幸好火箭很快又拐了弯，总算有惊无险。

我最得意的"成果"是会制作"碘化氮"——用鸡毛一碰都会炸。但湿的时候很安全。我和要好的同学常把它撒在老师的讲台上、守纪律的同学脚下和熟悉的同学自行车座位上，看他们的笑话。

如果教室里突然弥漫着臭鸡蛋味，熟悉我的同学都会往我这儿看，知道准是我在课桌里又制造硫化氢气了。

1965 年，有许多拍得不错的电影都受到了批判，其中不乏情节感人、艺术水平较高的，像《桃花扇》、《舞台姐妹》等。学校为了让我们认识"毒草"，还要组织我们去看。只要看这类电影，我都在剧情高潮的时候，悄悄往坐椅下面撒些易挥发的催泪剂。这时候，心肠再硬的也忍不住热泪盈眶。散场时瞧吧，一个个都是眼圈通红，十分难为情——"革命青年"哪能同情被批判的人物？我真希望有了这点儿难为情，减少一点儿假模假式的批判。

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同学以为我得益于大量的课外活动，班会上让我介绍。我也装模做样地承认。其实真正的乐趣，怎么跟大家说呢？

也难怪，那时上学也太没劲，尤其是名目繁多的思想教育活动和政治课。

思想教育活动里有一种叫"讨论"。说是"讨论"，其实是"一边倒"，除非装傻充愣，最后还得"恍然大悟"，否则离"反动学生"就不远了。

那时正大讲"阶级斗争"，学校里张口闭口要带"阶级性"三字。谁说得越多，表示立场越鲜明，思想越革命。记得当时各学校和报纸都"讨论""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答案当然是"有"。这种观点引申下去，必然得出荒唐可笑的结论。有些单

纯、执著的学生,难免产生怀疑。轻的说你“阶级立场不明确”(记在档案里就是不小的麻烦),重的扣你个“反动学生”的帽子,就别打算升学了。多数学生也学机灵了:越是不讲理的,最好越说他对——顶多说你有点儿傻。你要明白了,也就悬了。

学校里大讲“阶级斗争”,当然要找阶级敌人。学生里的“阶级敌人”,自然就是“真”“阶级敌人”的后代,于是“血统论”就流行了。它不仅像传染病一样已经钻到每一个角落,而且在这几年又大大发展了。

10.“血统论”无处不在

“街道改选了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引自遇罗克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中,下同。)

过去罗克只知道在大学里有的学校干脆不招收出身“坏”的,有以设立“工农革干班”(学生全部是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为荣的;在高中,出身“不好”的要入团非常难,入党几乎没有。通过代课任教,他又了解到初中、小学“血统论”影响也相当严重。

"北京市教育局印发的调查乱班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大都出身很好。有的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小学里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中学里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发自肺腑，也许是舆论左右，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纯然是例外。否则，早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从小学下来不久，罗克正好赶上一次大批分配工作的机会，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又看到"血统论"在工厂的蔓延：

"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不许出差到外地学先进经验，不许开汽车。出身不好的工人搞成了技术革新，不能公布姓名。还有的工厂领导对党团员说：'党团员不要和地富子女结婚，已经结了的要加强教育，还没有结的就不要再结了。'"

思想敏锐的罗克很早就发现一种"理论"正逐渐使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合法化，它就是："出身即成份"论。

"出身"和"成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是"反右"后，舆论工具都把"出身"和"成份"混为一谈。罗克仅从《中国青年》杂志上收集的就有许许多多带这种糊涂观念的文章。特别是1962年以后，《中国青年》忽然显得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

青年"关怀"备至,几乎期期都登有关于出身"剥削"阶级子女的文章。1960—1962年6月,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改造问题的文章0篇;1962年9月至1963年6月这类文章5篇;1963年3月至1965年10月,此类文章25篇。

1965年发生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杨国庆砍伤两名外国人的事件,报纸社论中也单强调:"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引为借鉴。"

长期的宣传和具体政策的实施,严重影响了无知的青少年,自然而然,"文革"一开始,"血统论"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社会中的反常必然反映到家庭中来。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50年代的印度电影《流浪者》就批判过这种论调。几百年前外国有人提出了'天赋人权'、'平等'的口号,来抨击封建专制。可悲的是,我们国家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有其牢固的阵地。直到今天,'平等'这个口号还要被批判。某些人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殊不知,他们连有这点儿虚伪性都达不到,满脑袋是封建特权思想。"

三、“文革”开始

1. 一片混乱

1966年初，吴晗首先遭到非难。报刊上对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批判。许多经历过多次“运动”的长者，叹息着：“又要来一场运动了。”

善于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旨意，在“清官”、“贪官”、“罢官”、“夺权”上作起文章来了。按照他的逻辑，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等于麻痹人民，维持和延长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反面人物。而贪官激发阶级矛盾，促使人民造反，农民起义又一直公认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所以贪官比清官更具有进步作用。就是一个中学生也能联想到，照此推论下去，岳飞比秦桧还坏，刘邦比秦始皇更该受到诅咒。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好打抱不平的哥哥，我们相信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果然，罗克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寄去，都被退了回来。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和父亲一起在街道受监督、管制的梅娘女士常到我家串

门，哥哥听说她认识很多报社的人，就托她向报社推荐。梅姨警告他，推荐可以，带来恶果可别埋怨。哥哥表示，他连最不好的后果都想到了，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都知道，一旦他决定要做的事，多少人也扭转不过来。

他又给《文汇报》寄去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虽然发表了，但改了标题，删成3000字，并寄来五元稿费。罗克当即把稿费退了回去，给《文汇报》编辑部写了封抗议信。这些天他显得有些兴奋，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

哥哥有一篇珍贵的日记留了下来，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境界：

"66年2月15日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及和父亲下棋的棋友们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到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生活在今天对我来讲，成了干干净净的零。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未来只有胜利，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既无胜利也无损失罢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吗？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顾忌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是进一步把海

瑞写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是肯定的作者们，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裂'，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罗克就是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只要他看到不合理的事，就一定要说，哪怕有杀身的危险。他认为有比死更痛苦的事，这就是自欺和屈服于真理以外的东西。

这时，报纸和电台广播中，奇谈怪论和颠倒黑白的东西越来越多，思想混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于是，美其名为"文化革命"。罗克的日记中，对它是这样评价的：

"5月13日　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5月22日　报刊上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革命，我是非常有感触的。

"一、工农兵参加论战。谁掌握报刊，谁就掌握工农兵。工农兵批判的不是言论本身，而是不许'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因此，报刊上所谓的工农兵论文，现在看来是批判邓拓的，但不用换掉几个字，就可以变成下一次运动批判其他人的了。工农兵哲学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最大的障碍是幼而失学，现在又没有自修条件，要想在一天十多小时劳动之余，想在民兵、会议等等活动充斥之下，写出一篇文章来，那是十足的谎话。事实上，广大群众对这件事是不关心的。

“二、(略。这些日记是1979年,《光明日报》记者去公安局看罗克档案时抄来的,为何省略,不得而知。)

“三、争论双方:现在受批判的一方是过去代表党的。例如邓拓是市委书记,《北京日报》是市委报刊,《前线》是市委杂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又是中央委员,等等。而开火的一方,则是上海文联的姚文元,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文汇报》,即使是《解放军报》吧,也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这么看来,要说攻击党,大概应该指那些民主党派的报纸。可是这时急急忙忙把工农兵搬出来了,如果不是确定了谁该受批判,是不轻易搬出这个法宝的……内幕真复杂,只把局外人蒙在鼓里。

“6月3日　详读《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胡适的通信。实在是一般学术问题,且有相当民族感情,可惜谬解。

“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谁也不知道彭真、刘仁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会敲锣打鼓的——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效仿北大七人,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6月7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6月12日　晚上看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

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证明。

"6月17日　听弟弟、又听母亲说,小牌坊小学(罗克曾代课教书的学校)四年级组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的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作奴隶去了。

"7月18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叙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刻划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早在"文革"前很久,林彪、"四人帮"之流就开始推行愚民政策及造神运动,后来就愈演愈烈了。罗克对此异常反感。他对后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丑态,更是嗤之以鼻。记得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警察用语录本指挥交通,幽默地说:"就差让汽车喇叭改呼毛主席万岁了。"从他那里我们才知道,山呼万岁万万岁原来是封建社会朝拜皇帝的礼仪,而并非近代的发明。从他1966年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1月27日　读完《论语译注》。怪不得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中,有的人对孔夫子推崇备至。我觉得孔的学说所以远

胜于庄、墨、韩非诸家，其原因正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明确地提出学问为政治服务，明确提出圣人可以企及……因为圣人并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学而知之的。这就是把学术公开化，而不是神秘化。今天的学说正是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原因是不学无术的缘故。

"1月29日　……那时我国对外积极争取和平……对内则受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影响，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致使国家建设欣欣向荣，国外颇孚人望。治国者庶几可以无为而治矣。今天则不然，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五四年(1954年)尚肯公布预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实足的愚民政策。

"2月6日　《人民公敌蒋介石》乃陈伯达之作。始知蒋何以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

"2月7日　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可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5月2日　读《波斯人信札》(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著。)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于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

教，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5月4日　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时候，学校里早已没有学习的气氛，老师也没心思讲课了，学生也没心思听课了，都惦记着写大字报，想批判点儿什么。可是谁也不清楚真正的敌人在哪儿，报纸上批判的"三家村"、"海瑞罢官"和学校又联系不上，结果大字报上写的全是空洞无物的废话。为了显示自己"革命"，废话越长越不嫌长，有的甚至从二楼垂到一楼地面。也有的煞有介事地写上"愤愤不平"，其实真该不平的是近年推行的极左路线，可没人敢去批。

没多久，随着报刊把矛头转向了北京市委、团中央，学生们才摸准了方向。远水毕竟不解近渴，顺理成章，校长、书记作为他们的爪牙成了批判对象。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成了陪绑。紧接着学生们的批斗从文斗转向武斗，校长、老师们亲身领略了自己推行的教育路线的苦果。当然，好打人的学生是少数。

对于运动初期学生造了老师的反，罗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师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长地说："青少年的堕落难道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吗？联想到给学生灌输的东西，使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整个教育界是有责任的。说是因果报应也不为过。"现在回想起这段话，还是发人深省的。

随着学生在各个学校之间的串联，一些极左、过火的行为很快就传遍了每个学校。大学里的学术权威，无一例外地

成了"黑帮",整天挂着牌子在校园里干活、让人参观。善良而无知的学生,往往是出于好奇,去看揭露名人的大字报和往日威严、今日落魄的名人们,很少去体味被人参观的痛苦。单纯的姐姐罗锦,还以为有了机会,到中央音乐学院,找正在扫地的马思聪请教拉小提琴的事。尽管周围没有别人,他也吓得不敢鼓励姐姐学琴,反而劝她改学民乐。

2. "血统论"不再遮遮掩掩

早期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其中也有些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和它同时组织的,还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以后各校纷纷组织了这种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参加,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对这种早期的"红卫兵",人称"老红卫兵"。

他们最大的怨气,就是嫌像《中国青年》杂志这样的宣传机构和一般的学校领导、教育部门以至整个社会,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狠,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太温和了,而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就是专政对象。而北大的孔繁大喊陆平优待了"狗崽子",从此开了先声。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

他们信仰的是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所做的社会各阶级分析是,敌人——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他们的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也在其内。自己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

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至于出身介于黑七类与红五类之间的，是可以团结但不可以依赖的对象。如果本人是工人或小干部，无论多么年轻或是不是党员，父母是"敌人"的一律划归"黑七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

凡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血统论"这个幽灵，曾在神州大地游荡。它像霉菌、病毒，既作恶多端又无孔不入。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出身不好的，不仅升学、招工、提干、当兵、学开汽车、接触精密设备等等好事难于问津，甚至发生过与家人一起无辜受刑的事。

我的哥哥，从小就有一股反抗强权的精神，视"同情弱者"、"打抱不平"、"侠胆相照"为无上美德。所以在1966年8月，"红色恐怖"盛行之时，哥哥有感于"血统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写成了《出身论》。

作为一介书生，惟一的武器就是纸和笔，至于能不能发表，恐怕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只是拿给我们大家看。

3. 开始了"红色恐怖"——人类的丑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八一八"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

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不但中学有了这种组织，就连大学、工厂、机关、农村也都组织起来。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

“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就亲眼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见《“臭妖婆”自述》，原载《百花洲》1989 年第 5 期）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碱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老人的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街上走着，就碰上了这种景象：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见《树与林同在》1999 年 3 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8 月 23 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房产主”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把“房产主”全家活活打死。

就在这人类的丑闻接连不断，“红卫兵”暴行节节上升之

时,9月15日,林彪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谁家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谁家该"抄",名单由派出所、街道、居委会提供。谢富治在1966年8月下旬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次会议上就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街上有巡逻的解放军,打死"阶级敌人"他们不管,"黑五类"想反抗,有"阶级报复"举动,他们坚决维护"革命小将"的安全。

更令人发指的是,北京六中、一中成立的骇人听闻的"劳改队"。那里专门关押出身"黑七类"的无辜学生,每天他们都被施以惨绝人寰的肉刑。罗克知道这些事后万分气愤,把它写进了两篇文章,登在《中学文革报》第二期上予以揭露。

这两个学校只不过是个典型。没有打死人的学校是少数。宋要武所在的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竟逼着她们的校长当着她们的面去上吊。社会上各个角落毫无人性地残害"阶级敌人"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北京吉祥剧院,成了当时最大的施虐集中营。凡是各学

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到那里。到了那儿,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每天都用卡车往火葬场送死人。

哥哥厂里的一个同事,一个非常能说的青年,到我家讲了那里的恐怖。他说,要不是为了搭救他弟弟,要了命也不敢进那个魔窟。幸亏他嘴皮子利索,跟"红卫兵"们攀起了"阶级兄弟",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五代以上都是"红五类",他的弟弟因此"本质"是好的,是一场误会。他弟弟被释放了。据他说,如果晚一步,人就被打死了。

哥哥每次听到这些人类的丑闻,心情总是非常沉痛。他说:"应该把这些事都记下来。编个集子,留给后人看看,知道现在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与此同时,"老红卫兵"们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贴到学校、工厂、机关、农村以及社会上每个角落。他们在北京展览馆、音乐堂、天桥剧场等有舞台的地方,用一个接一个的"他妈的"这种最"革命"的语言,用口号声夹带着鞭炮这种"革命的火药味",来进行宣传,并煞有介事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黑七类"子女如何欺侮他们,旧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包庇、优待"黑七类"子女,"红五类"子女如何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等等。

会场上除了谩骂、口号以外,毫无道理可言。绝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斗胆上台辩论两句,马上会被打下台去。这也难怪,新市委书记也承认:"对联的精神是好的,只不过提法不当。"而且大讲特讲干部子弟的优越性。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作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

社会上早已畸形发展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变本加厉地被

抬成头等重大的事情。家庭出身成了衡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到有的学校去参观,要登记什么出身;在辩论会上发言,也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病历上也有"家庭出身"一项。

出身,在"文革"中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大地游荡;所谓不好的出身,像枷锁,禁锢着亿万青年的手脚,使他们从生下来就饱尝着人间的不平等。没有前途,没有幸福,没有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尽管有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依然难免祸从天降,甚至死于非命!罗克深感自己有责任为捍卫人类的尊严去纠正愚昧的偏见,揭穿阴险的诡计,哪怕献出自己的一切。

4. 荒唐

我家被抄之前,一位叫张永祥的朋友(和父亲一起在科技情报所搞翻译的,也是临时工)跑来送信,说他家那里的不少人家,就是因为在毛泽东像的背后,又放了别人的像(都在一个镜框里),被抄家的红卫兵发现,把那家人都打死了。所以现在红卫兵抄家时首先注意的就是这个。

我们赶快把我家挂的毛泽东像摘下来检查,还真有姥爷的一张大相片贴在背板上。不知道过去的人出于什么习惯,把相片用糨糊牢牢地粘住,揭都揭不下来。这下只好忍痛把姥爷的相片撕坏扔掉。

"文革"后出生的人也许会问:"不挂毛泽东像行不行?"当然不行。据我所知,当时除了厕所和牢房,只要有人活动的地方,无论公共场所还是私人住家,包括汽车、火车、轮船这些能活动的空间,都得悬挂。胆敢不挂的,准会有人来质问。

没有合适的理由，坚持就是不挂的，非带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不可。我们后来办报纸也一样，版面上没有毛的头像、没有特意印成黑体字的毛的语录，不管内容如何，已经就有了大问题了。

“文革”初期，“红卫兵”常在毛泽东像上生是非，没少折腾人。最早卖 的“标准像”，根据照相馆的规律，都是微微有点儿侧面，只照出一个耳朵。封建 、迷信的红卫兵忽然提出，伟大领袖怎么能少只耳朵？于是各“新华书店”一律不许再卖一只耳朵的标准像，改卖两只耳朵的。家家户户也不准挂一只耳朵的，全得换下来。

从此开了先河，闲得没事儿做的人开始在“像”上大做文章，颠来倒去、甚至对着阳光从纸的背面看里边隐藏着什么“反动”内容。三天两头地听说，哪张像又发现“问题”了，比如在背景的乱树叶中有看似“打倒”字样啦，有个尖刀或箭头状的图影正对着脸部啦，不一而足。往往都是等“像”收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

只有一次，有人给我买了一张毛坐在飞机里抽烟的像，告诉我，向上飘的烟雾，倒过来看是“垮台”两字。我仔细看了看，还真有点儿像。赶快再去买，售货员说刚卖完，原本冷清的柜台，突然热闹了一阵。又去了几家，也告诉我脱销。以后，再也没见卖过。

我们编辑报纸就更麻烦了。每次校对清样，都要对着光亮看，检查毛的头像和语录后面，有没有“反动”、“反对”、“打倒”或恶毒的字眼。“文革”期间这类字眼又特别多，碰到了，只好挪挪相互的位置。仔细检查“语录”里有没有错、别、漏、多的字。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谁不知道没有这些“像”

和"语录"会有多省事？真的没有，麻烦就更大了。所以家家户户、各个角落都得挂"主席像"和"主席语录"。

有些事更不好理解，简直让人无所适从。

那时正流行穿塑料凉鞋。有一天忽然有人发现鞋底花纹隐约是个"共"字。这还了得，把"共产党"踩在脚下！"红卫兵"命令，谁也不许穿这种鞋。过两天，又发现某种凉鞋鞋底花纹像"蒋"字。按理说把"蒋介石"踩在脚下该没错了吧？也不行。"红卫兵"解释说，天天穿着带"蒋"字的鞋，难道怀念着蒋介石不成？老百姓顶多换双鞋，损失还不大，可苦了凉鞋的设计者，如果有点儿历史问题或出身不好，非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不可。

所谓破"四旧"，就是要毁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而大力推行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北海公园白塔上的小佛像，曾经躲过了八国联军的洗劫，但这次却不能幸免，被一块块地敲下来、砸碎。颐和园里的石碑都涂上了红色的毛泽东语录，长廊里的花鸟、人物绘画也被厚厚的红漆盖住。罗克对此深恶痛绝，他即兴作了一首讽刺诗，前两句记不清了，只记得后两句是："惊喜石碑革命化，只恨苍天未染红。"他在日记里也记录下了这种敌视文明的行径：

"8月5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服，戴袖章……今天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骂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谁敢哪？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实在太嚣张了。

"8月22日　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50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

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8月23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荣宝斋遭到最大的洗劫。还有人声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我又看到(基督教)青年会也站满了红卫兵,大改了模样。

“据说红卫兵砸人家的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无知的人掌了权,荒唐的事少不了。

我们刚把姥爷的相片去掉没两天,我家就被抄了。果然“红卫兵”首先搜查装“主席像”的镜框里有没有别的东西。我们都非常感谢给我们送信的人,如果让他们发现了姥爷的相片,后果真是难以想象。

5. 我家被抄

社会上抄家之风愈演愈烈,我们预感我家也难逃劫难,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因为我家的“事”太多——父母是“右派”兼“资本家”,哥哥写过“反动文章”和“反动日记”,姐姐写过“反动日记”(日记已被发现,后文有介绍)。任何一条,都够抄家的“理由”。

怕姥姥年纪大受不了,先安排她到二姨家去住。二姨家情况比较简单,只有姨夫有点儿“历史问题”——解放前当过几天交通警。况且他们一直那么穷,是典型的城市贫民。如果没有“交通警”这个“污点”,她家应该算是响当当的“红五类”。

一天傍晚,母亲该下班的时候,邻居小孩儿跑来送信:

"一队人押着王姑姑从远处过来了。王姑姑头发剪去一半,脖子上挂着牌,推着自行车在前边走,一帮人跟着。"

父亲让我们子女都躲开,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我们四个和哥哥的同学李连成(分配在兰州工作,恰巧回京探亲住在我家),急忙离开了家。刚走出不远,我有些不放心父母,又返回来。还没有站定,抄家的人就涌了进来。

来的人都是母亲所在工厂的"红卫兵",领头的是个恶狠狠的女的,穿一身军装;另一位工人模样,年龄偏大,不怎么说话。后来母亲告诉我,他是"理研铁工厂"的"老"人,暗中同情母亲,经常给点儿照顾,我们应该称呼他"刘叔叔"。

女头领在未动手之前,先对我们训话,让我们主动交出反动和值钱的东西,否则被他们翻出来就不客气了。

"反右"以后,父亲没有收入,我家十分困难;大饥饿年代物价极高,母亲为了不影响我们发育,在吃上舍得花钱。除了她70块工资,全靠变卖东西度日。到"文革"时,家里已经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我想起有一盒卖不掉的假首饰,不如交出去,省得还要和他们多费口舌,就对母亲说:"把假首饰给他们吧。"

女头领大声呵斥:"不许商量!"

母亲忙解释:"那都是假的。"她怕当真的给了他们,日后发现是假的,以欺骗"红卫兵"论处,罪加一等。

女头领以为母亲舍不得交,转向我说:"你,快拿出来!"

我心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些人懂什么真假,先打发走他们再说。于是从大衣柜里取出一个镀银的首饰盒,被来的人一把抢了过去。他们以为是多值钱的宝贝,有的人一件件地欣赏,有的人来教训父母:"'反动派你不打它就不倒',有

这么多好东西就是不想交出来,什么态度?"

母亲还在分辩,"红卫兵"哪里肯饶?我怕母亲因此倒霉,连忙帮母亲解释:"那些真是不值钱的假货。"女头领正在砸姐姐的小提琴,听到我敢向着父母说话,转过身来,用手里的琴弓直向我的眼睛戳来。幸亏不够准确,尖尖的端头扎到我的眉骨。我还想和她理论,刘叔叔忙把我拉向一边,对女头领说:"我教育教育他。"又把我带到隔壁邻居陈家。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姐姐和李连成先回来了,"红卫兵"们让他们跪在院子当中,审问起来。当时北京到处张贴通缉兰州李桂子的海报,一听说李连成是从兰州来的,也姓李,以为破获了一个大案,好几个人立刻簇拥着把他送往派出所。剩下的人继续翻箱倒柜,等着我家别的人回来。

他们一定是通知了65中和哥哥所在的工厂,我校来了一个革委会(代替原校领导)的"红卫兵",把我带到学校,告诉我,当晚就住在学校别回家了。那时许多同学也不爱回家,把课桌椅并在一起就当床用,好在正值夏天,不需要被褥。

哥哥很晚才回来,抄家的人还等着没走。他一进家门,抄家的"红卫兵"也让他下跪,他据理力争,宁死也不跪下,他所在工厂的人急忙把他带到"人民机器厂"施行"群众专政",不许回家。

弟弟离开家就到学校去过夜,没见到这场混乱。

第二天一早,我急忙回家。看到父母平安无事,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两明一暗的里屋被贴上了封条,里边是将要没收的东西。"红卫兵"落下一根关门用的弹簧,小头的铁圈改成了钩状,据说这是当时流行的"弹簧鞭",专为抽在人的脸上,把眼珠钩出来。

几天后,母亲厂里来车把东西拉走了。

后来才知道,这种抄家是最"好"的——虽然砸坏了一些东西,但把日常生活用品留给了我们。没收的东西存在工厂,几年后又发还了,丢的不多。学校和街道抄家可不是这样,东西拿得一点儿不剩,不可能再发还。

我家被抄后没几天,姥姥从二姨家回来了。原来姨夫被揪出来,定为"历史反革命",从会计降为炉前工——又累又热,没有人爱干的工种。家也被抄了。姥姥受不了他们整天提心吊胆的样子,看着难受,不如不看,只好回来。

连工作都没做过几天的二姨,也马上成了"阶级敌人",浅色衣服上缝上黑布牌,绣着"反革命家属"五个字。

二姨和姨夫,胆子都特别小,他们出门在外,也不敢不戴着黑布牌,没少受气。二姨有严重的哮喘病,戴着牌,看病都难。有一天,她去亲戚家串门,人家看到她这种身份,惟恐给自己找来麻烦,愣是没让她进门。恐惧、耻辱、病痛共同的折磨,使二姨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一天夜里,她吞食过量的安眠药自杀了。

我们以为姥姥失去最疼爱的女儿,一定难过得死去活来。没想到她倒很坦然,对我们说,死了比活受罪强。

6. 兴起"大串联"

早在1966年7、8月份,有少量的"红卫兵"头头们就到外地去"煽风点火",搞"大串联"。他们当然是为了把北京的极左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但是免费乘车和参观游览却让我们这些没离开过北京的学生羡慕不已。

到9月份,65中的许多“红卫兵”们也纷纷外出。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出身的也“沾了光”,学校“革委会”不好意思拒绝我们的要求,也同意我们走,给开了介绍信。但是让“红五类”出身的跟着,还给他们单开了介绍信,证明我们是被监管的。

刚到天津,我和一个同学就溜之大吉,算计好火车的钟点,估计他们来不及追上,就乘上了南下的火车。

到了石家庄,那个同学害怕了,又返回了北京,还受到了批斗。我只身到了武汉、长沙、广州。所到之处比北京正常许多,但是也都大讲“血统论”,甚至车站里的喇叭就广播:“我们这里不欢迎黑五类狗崽子!”火车上并不拥挤,时常看到有被押送到农村去的“阶级敌人”,有座位也不许他们坐,动不动就对他们游斗一阵。遇到留着长头发的妇女,一律要把头发剪掉。

从广州,我又直奔兰州,找哥哥的同学李连成。

李连成是兰州轴承厂的一名机修钳工。上学时成绩好,无奈家境贫寒,又是“富农”出身,才上到高二就退了学当上了工人。起先在北京轴承厂,1965年出于备战思想的需要,全体迁往兰州、贵阳等地,他选择了兰州。

他见到我,十分高兴,除了带我到市里热闹的地方玩了玩,还动员我留在那里工作。他说,机修钳工和机修电工正招人,这是技术性最强的工种,有得可钻研,机会难得。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都得上山下乡,还舍不得离开家,也还不甘心当一辈子工人,所以没有答应他。住了两天,回到北京。

我到北京的时候,形势多少缓和了一点儿,学校里没有人再追究我私自串联的事。又过了一个来月,外地学生铺天

盖地涌到北京来,北京的各个学校也不再限制学生的外出。

这次我和弟弟结伴(出发的时候还有他所在的25中一位高三学生)同行,计划在外地呆一个多月。像我上次走一样,母亲给了我们每人10块钱,作为饭费。为了省钱,也防备困在路上吃不上饭,父母又炒了二斤炒面让我们带上。我们的行李非常简单——牙膏、牙刷、肥皂、毛巾和杯子。这个杯子很重要,用它又刷牙、又喝水、又可以吃炒面。衣服都随身穿着,没穿的只有一件塑料雨衣。雨衣也是必不可少的,既可挡雨,又可御寒,铺在地上就可以睡觉。

火车上和一个月以前大不一样,挤得真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所有的空间都塞满了人——过道、厕所、行李架、座位底下。就连坐椅靠背上两寸多宽的一条儿,也坐上或躺上了人,有人居然能在上边睡上一觉。在车上,根本就别想解手。

因为交通秩序的混乱,火车运行时间全乱了套,以前几小时的路程,可能得走几十小时。最受罪的一次是从株洲到广州,用闷罐货车代替客车,挤得连放脚的地方都难找——一旦抬起一只脚来,就无法落下去,除非不怕踩着别人。我就是这样一只脚站了一天一夜总算到了广州站。走下车才发现,腿都肿了。

我们停留过的城市有:武汉、长沙、柳州、桂林、昆明,最后到达广州。在广州住的时间最长,有十二三天。这时候中央规定停止乘车"大串联",只发给返回原籍的车票。如果还想"串联",只能步行,广州市委"借"给步行的人每人40块钱。我和弟弟在广州印了许多《出身论》,着急带回北京,也不想学什么"长征",就去领返京的车票。

到家,我们把外地的情景讲给哥哥、姐姐听,他们羡慕得

不得了。

我家院里空出来的两间南房(原住户被撵回农村),也住了好几个河南来的女学生,年龄都很小,剪着短短的男式发型,睡在铺着稻草的潮地上。她们等着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检阅"。我们刚进家门还看见有人来屋里烤火,见到我们在家,就不好意思进屋了。姥姥常给她们送去热水,还借给她们棉被,总跟我们念叨:"怪可怜的,一个个都冻病了。"

7.《出身论》诞生

在"红色恐怖"盛行的1966年8月14日,罗克就写下了震惊每个读者的文章——《出身论》初稿。

在"红色恐怖"中,罗克也因出身问题和写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人民机器厂关押。在关押期间,他和难友们下棋、谈天,用他乐观的精神去感染别人,给他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他甚至说服了看守他的几名青年工人,和他们交成了朋友,偷偷地在一起玩牌、下棋、讲故事。厂里发现后只好罢免了那几个"看守"的职务。

后来,他们发现罗克从来不服服帖帖,反而经常来往于"黑帮"之间,胆子又大,惟恐他在其中通风报信。况且罗克入厂时间不长,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把他放了。这时"红色恐怖"高潮已经过去了。

9月,哥哥刚刚解除"专政",就着手补充和修改《出身论》。

11月,我们去广州串联,住在同福中路小学。那里油印条件很方便,长期压在心中的愤懑终于可以呐喊一下了。我们

试探着写了几份反血统论的传单，又根据对《出身论》的回忆，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论出身》，印了几百份，贴在广州市的街头。

贴出后立刻得到了反响，很多人围观、抄写，每一份上都布满了"好得很"、"大毒草"的评语。我们高兴极了。尽管言词比《出身论》缓和和含糊多了，但在当时也是很冒险的，所以落款不能写真名实姓，编了一个"北京呐喊战斗队"。

我们把油印的传单寄给哥哥，还告诉他一种简便的油印方法。哥哥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表示，为我们迈出了反血统论的第一步而高兴，也指出了我们所写文章的不足之处，并说"署名'呐喊战斗队'似可不必。呐喊固然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埋头工作岂不更好？我希望全国每一个家庭都能组织一个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踏踏实实地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署上'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缘由"。他给我们寄来《出身论》原稿，让我们油印，还告诉我们，收到我们信的当天，他就买蜡纸、铁笔和油墨，准备在北京也油印《出身论》。

我们把《出身论》印了几百份，在广州张贴一部分，其余带回了北京。在印的时候给它增加两三个注解，只记得其中一个是对"自来红"的解释。

当时在北京流行"自来红"、"自来黑"的说法，一些"红五类"以"自来红"自居，表示生来就是革命的，无需思想改造。哥哥一语双关地讽刺道："殊不知，'自来红'只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我们怕外地不知道"自来红"是糕点名，所以加了注释。后来哥哥对我们说，这是他忽略的地方，加了注释就好多了。

我们回到北京后,看到罗克、罗锦也印了很多。我们把它贴到北京市委、国务院、清华、北大、地质学院等地。哥哥还经常去看读者有什么反应。有一次他去张贴，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对他又推又搡外加谩骂和威胁。他回来对我们说："今天我又经受了一次考验,以后我能做到坚强了。"

罗克反对"血统论",受到了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以整人为主的当权者；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形形色的血统论支持者——一些无知的、疯狂的"红卫兵小将"们,他们靠血统论起家，怕罗克的思想动摇他们的根基。这两个方面对罗克都恨之入骨。

每一个亲人都为哥哥捏一把汗：父母自不必说，就连好心的邻居也劝哥哥收敛一些,免遭横祸。但哥哥毫无惧色,他说,他从写《出身论》的那一天起就已横下一条心了。"我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除了生命,我还有什么呢?"他在《1967 年总结》中写道：

"(血统论的横行) 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抗议,强烈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赋予我的义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人做的……这些文章 (指《出身论》及其他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的十几万字的文章) 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影响了不知多少人……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假如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

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任何惩罚都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这时候,"中央文革"还要进一步打击上层的异己,发现鼓吹"血统论"的"红卫兵"们怕伤及自己的老子,有的变成"运动"的阻力。为了得点儿民心,不得不对明目张胆的"红色恐怖"和"血统论"进行一点儿限制,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直到这时,在北京才停止了大规模草菅人命的行为,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也可以组织"战斗队"了。

我在65中和几位同学成立了"北斗星战斗队",又印了不少《出身论》去张贴。不少读者来65中谈他们激动的心情,也有的愿意来帮我们做事。和哥哥一商量,我们趁机开了两次座谈会。

海报一贴出去,招来很多人,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不少人是外地来京串联的。许多人控诉、揭发"血统论"带来的暴政和令人发指的罪行,有人甚至泣不成声。哥哥每次会都去听,他当然想更多地知道人们对他的杰作是什么反应,可是他从不发言,他不想过早地让人知道他就是作者,以防有人驳不倒《出身论》的观点,该从作者身上找茬儿了——这是当时最常用的方法。

有人告诉我,师大女附中的几位同学,虽然出身是"非红五类",敢于冲破禁区,公然把自己的"战斗队"也取名叫"红卫兵"。这无疑是个震撼人心的新闻。虽然我们很讨厌"红卫兵"这三个字,可是我们更讨厌剥夺我们称呼自己的权利。她们可能也不愿与做过恶的"老红卫兵"为伍,取名为" 东方红

红卫兵",以示区别。"血统论"的维护者们,三天两头去捣乱,甚至还抄、砸过一次。不少佩服她们的人,都去表示慰问。

我不但去参加她们组织的"阶级路线辩论会",表示支持,还送去了《出身论》。不料,她们的领导人不敢赞同《出身论》的观点,让我大失所望。不过我也能理解:天天有人来找茬儿,稍有闪失就不得了,她得为组织负责。别看领导对我敬而远之,她的"兵"当中好几个人对我热情有加,后来有的还帮我卖过《中学文革报》。不知道她们哪位介绍,使我认识了羽晴。

羽晴在师大女附中也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她才华出众,相貌堪称百里挑一,又衣着得体,敢于打扮,"破四旧"吓得没人敢穿连衣裙,她敢穿,加上优雅的气质,让许多小她几岁的女孩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她每天往来于各个大学、中学之间,和两个女生编印了一份油印的小报——《动态简讯》,她们自己采访,自己刻印,自己发送。

羽晴把《动态简讯》送到65中,我们俩就见了面。一做自我介绍,原来我们两家离得还很近——都住在东四北大街。无形之中,好像关系又近了一层。以后,她索性把小报送到我家。

羽晴知书达理的风度,顷刻间征服了我的全家(除了姐姐,她已被关押)。大家都说爱看她编的《动态简讯》,尤其父母更是赞不绝口。当然我清楚,父母除了爱看小报,更希望他们的儿子能交下这么像样的女朋友。很快,羽晴成了我家最受欢迎的客人。

母亲对她喜欢的客人,总要显示她高超的厨艺。她留羽晴吃饭,羽晴大方地接受了。她听羽晴说老家在苏州,特意把

菜做得甜一些。

羽晴会说话，把母亲夸得心花怒放。大家刚撂下饭碗，羽晴急忙拉着我去刷碗，又把父母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平时我们吃完饭都不爱动，最发怵刷碗这个活儿。

8. 日记引起的灾祸

哥哥酷爱写日记，他也鼓励我们写。他送给我们的礼物常常是漂亮的日记本，扉页上还提上几句词或写首诗。从他那里我们知道，未经日记主人允许，别人是不该看的。到"文革"前，他写了有厚厚的十几本，姐姐在他的影响下，也写了好几本。

"文革"是以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接着批判北京市委，没多久又"破四旧"、抄家。从传闻得知，抄家的"红卫兵"对日记特别重视，因为从中可以发现"反动罪证"和"变天账"，有的人就因为日记被打死了。

哥哥很发愁：把日记烧了，舍不得；留着，太危险。那时他在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因为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反对姚文元、歌颂海瑞的文章，成了"准专政对象"，行动不自由。他认为我和弟弟都还小，姐姐参加工作一年了，认识的人也多，就委托她把日记藏起来。

糊涂的姐姐把哥哥的连同她自己的日记和母亲最珍爱的上百张相片，藏在一个十分显眼的地方，很快就被发现了。父亲气得破天荒地骂了声"蠢丫头"，母亲伤心得两眼发直说不出话来。听姥姥说，躲日本飞机轰炸时，母亲什么都不拿也要抱着这几本相册。只有哥哥没表示什么。

几天以后，这些日记和相片都摆到"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哥哥也从"准专政对象"升为"专政对象"，关在工厂不许回家。

到了1966年12月份，哥哥已经可以回家了，一家人以为日记的事过去了。

这时，"步行大串联"正在兴起，刚刚离开校门参加工作的65届毕业生，没赶上不久前的"大串联"而不甘心，也组织步行串联。姐姐母校的几个同学找到她结成伴儿，准备了些衣服、行李就出发了。姐姐还带了许多份我们自己油印的《出身论》，准备沿途散发、张贴。

还没走出北京市，她母校的一些"红卫兵"早已闻讯追去，把姐姐抓走，"扭送"到公安局。就因为她在日记里评论了林彪搞个人崇拜。

跟她一起串联的一个男生，哭着到我家送信儿，哥哥马上就要去公安局救她。还没离开大门，一帮"红卫兵"也冲到了我家，想再来抄家，以便多一点儿"罪证"。哥哥迎住他们辩论起来，你说一条"语录"，我说一条"语录"，十几个人居然占不了上风，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哥哥知道这么耗着对姐姐不利，就激将他们："你们敢到市委去辩论吗？"

这帮"红五类"们心说，到哪儿也没有人敢帮"黑五类狗崽子"说话，到人多的地方，他们只能势力越来越大。况且市委离公安局非常近，那里起码还有他们看押着姐姐的几个人呢。哥哥也希望接近姐姐，才有可能救她，否则公安局扣下她，什么办法也没用了。一帮人拥着哥哥走了，父母都为他捏把汗，为了救出姐姐，也只能这样了。

别人哪里知道，哥哥选择那个地方，有他的用意。

一提起市委，一般人都想起台基厂大街和那高高大大的白楼，那是"市党委"。在它的背后，正义路那边，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市人委"。"文革"一开始，这里早已没人办公，现在一个个大厅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遣返人员"（撵回农村的"黑五类"又被农民撵回来，原来城里的住房已被别人占上了）。起先他们常遭"红卫兵"洗劫、毒打，求生本能使他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十六条捍卫团"，专门对付野蛮的"红卫兵"。哥哥前些天还来这里做社会调查，把自己一件新棉袄留在了那儿。他选择的辩论场地就是这个"市人委"，那帮人也傻呵呵地跟他到了这儿。

可想而知，"市人委"的"居民"见了那群"红卫兵"，火就不打一处来。"红卫兵"们又看不出眉眼高低，张口闭口"狗崽子"、"黑五类"、"出身"这些让人烦心的"口头语"，结果招来了"十六条捍卫团"，差点儿挨了一顿揍，吓得落荒而逃，也没敢再去我家找麻烦。

哥哥带着一帮群众去救姐姐，可惜晚了一步，公安局已将她扣下。哥哥去交涉，警察说必须经过审查，没问题才能放人。

在那"宁左毋右"的年代，谁肯为一个"黑五类"的女儿说话？况且日记上白纸黑字的确凿证据。姐姐因为日记上的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被判了三年"劳动教养"。在送往教养所之前，她就被关押在父亲曾经两次"蹲"过的半步桥监狱。

在半步桥等到教养判决下来，就被送到良乡收容所（亦称"窦店砖瓦厂"）。在这个教养所"改造"，我们才能得以见面。

第一次会见的时候，她让我们带回一个空牙膏皮，回家

打开末端，发现里边有一张叠得很小的字纸，告诉我们没有人发现她带的《出身论》，已被她销毁，让我们放心——替受迫害的人说话这种事，一旦被发现，可以任意曲解，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十分危险。

几年后她回到家才告诉我们，在“砖瓦厂”干的是重体力劳动，时间也特别长，周围的人有政治犯，也有流氓、小偷，连擦脸油、雪花膏都有人偷。

那里每两个星期可以接见一次，每次我家都去人看望她，送些吃的、用的，希望她能得到一点儿安慰。根据父亲的经验，这种“好日子”不会太多。果然，一年以后，随着哥哥被捕，她也被转到“茶淀农场”去种水田，远离了北京。

9.《中学文革报》

1967年初，一次座谈会刚结束，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我，他们看了我贴在四中的《出身论》深受感动，来和我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他们也问到作者是谁，我推脱说，我是从街上的传单中发现的，不知道谁写的。他俩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只要说得有理，管他谁写的。

说干就干，几天之内，我们已经买来了纸，联系好了印刷厂，经费是王建复从四中借的500元钱。罗克知道后兴奋极了，他又连夜对《出身论》作了仔细的修改。当然，我们也忙了几天几宿。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三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尽管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如此精

辟、深刻、大胆、彻底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人们还是头一次见到；文章中严谨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练达、幽默、一针见血的语言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人们佩服作者文笔出众和材料的广泛，猜测着作者有多少人，都有些什么名人；很少有人相信，它出自一个学徒工之手。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一个外地读者告诉我们，他在火车上看见只有这么一份报，大家都争着看，全车厢的人几乎都看了。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它立刻成了价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们只好花两元钱去买原本二分一份的《中学文革报》。

卖报的场面更是动人。热情的读者把我们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自动替我们维持秩序。为了卖得快、便于找钱和防止倒卖，我们不得不规定每人必须买五份。有时我们把报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二百多人，卖到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有的读者激动地把纪念章送给我们。向我们表示支持和问候作者的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鼓吹血统论的"老红卫兵"虽然还很有势力，但不敢捣乱。也有个别在大街上给我们捣乱的，都被群众斥骂走了。

许多卖报、运报、运纸这些事务性工作，都是弟弟和他的同学——那些初中生干的；而我们这几个高中生，要接待来访者，编辑报纸，校对清样，筹措纸张，联系印刷；女生们负责处理大量的读者来信，兼管接待来访工作。

我和王建复、牟志京分工也有侧重：牟喜欢网罗写作人才，建立兄弟报刊统一战线；王热衷于组织、财会工作，有时

也写写社论和短文，没有他，简直无法想象大家怎么能有条不紊地工作；我却偏爱组织辩论会、卖报纸和蹬三轮车。只要我们仨编排完稿件，干完那些非我干不可的事以后，这三样事是我最爱做的事。有时我还拉上羽晴，和我一起去卖报，让她感受一下读者的激情。

每次报纸一印出来，我们全体（除了牟，他不屑干此事）都要出动去卖报，希望尽快把报出手，以防被人抢走。十多万份报纸，好几天才能印完，每天只能取出两万多份。除了零星的交给一些初中生和与我们有固定销售关系的同学外，其余归我们大队人马去卖。常听单独的卖报人给我们讲他们的“遭遇”，往往被过分急切热情的顾客挤得动弹不得，反而一份也卖不成，结果被追得东躲西藏，效率很低。

接受他们的教训，我们找到了最佳场地——百货大楼广场。把整车的报纸往花坛当中一放，四周有铁栏杆挡着，不许买报的人进来。有两三个人专管数报，其余五六个人往来穿梭，接钱给报。好在规定了每人必须买 5 份，交一毛钱，也不需要找零儿，两万份报纸，不到两小时就卖完了。最后那一圈人，手里还高举着钱，眼看着报纸一张也不剩了，懊丧极了，我们只好安慰说，有空常来这里看看，我们还会来卖。

回家的路上，我们就像刚打了场胜仗，中了个大奖，兴奋的情绪半天平静不下来。我在羽晴面前，更想卖弄一下自己的三轮车技，载着他们好几个人，在王府井大街的车流人海中穿来拐去，蹬得飞快，直到女生惊得叫出了声，男生也承认了“真行”，车速才降下来，我也累得快不起来了。

也难怪，《中学文革报》一半儿以上的纸（除了买印刷厂的），都是我和王嘉材（罗勉同班同学）从纸库运到印刷厂的，

还不用说再把报纸运出来，车技早就练出来了。可是羽晴不欣赏，她希望我更风度翩翩或者说话满嘴"然而"、"想必"的斯文相。

哥哥看到自己的作品拥有这么多读者，自然十分高兴。父母看到儿子们和他们的几个伙伴儿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心中也暗暗得意。他们不能说什么，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一样。倒不是怕外人知道"阶级敌人都赞成了"，以此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那是小意思。为难的是：继续反对吧，违心——罗克说出来的，不正是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吗？鼓励吧，多年的经验知道，这是在和洪水猛兽周旋，哪个父母能引导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跳？他们深知，自己还不就是因为嘴才倒了霉，但是也没有罗克张这么大的嘴、说这么多的话呀！

人的理智，很难战胜感情。母亲好几次在饭桌上不无得意地叙述她在工厂听来的议论："写《出身论》的人，胆儿可真大"；"要是在五七年，写《出身论》的准得成'右派'"。

《中学文革报》的成员来我家，她总是热情招待，好多人都享受过她的厨艺。父亲的支持就更直接些。因为他没有工作，整天在家，经常替我们代收信件、报款，抄、改稿件。30年后，《文革报》的成员在一起聚会，吃饭前特意为我已去世的父母敬酒，以示对他们的怀念。

《出身论》所以受到拥护，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人人关心的问题。正如《出身论》中所说："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

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即使某人是'红五类'，他的亲朋友好友也必然有非'红五类'或'黑七类'，所以对出身问题不关心的几乎没有。"

《出身论》的基本要点是：一、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影响，况且家庭影响的好坏，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转移。二、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三、看一个人好坏，看他的表现就完全可以了，无须再看他的出身。四、长期以来，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已成为天生的"罪人"，形成新的种姓制度。号召受压抑最深的青年争取应有的平等权利。

在文章中，罗克尖锐地指出："辩论这副对联（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墩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墩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关于出身与表现，他有两段精辟的论述："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吗？……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

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

平等，是人类尊严的象征。但是由于多年来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批判，使人见她望而生畏，谁还敢再提什么"平等"；更何况"红外围"（由非"红五类"组成的保卫"红卫兵"的组织）是一位中央首长肯定了的。罗克就是这样，维护真理他无所畏惧。

《中学文革报》在四中设立一个接待站，每天从早到晚要接待非常多的来访读者，他们绝大部分是深受血统论的迫害，而来关心《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前途并控诉血统论的。也有一些青年不顾自身处境的危险，毅然前来投奔，和我们一起办报。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往往每天多达几百上千封，以致邮局不愿送了，我们只好自己去取。许多给《出身论》作者的信我们都交给了罗克，其中一些要和他探讨种种社会问题的，他都详细回了信。有的直到他被捕前还保持着联系。

本来，由于社会上纸张奇缺，各印刷厂都忙于印"毛选"，联系印刷很难，我们只好打算再出一期报纸就不再接着出了。可是，空前的反响，感人肺腑的鼓励，各方面的物质支持，使我们不得不办下去。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办了七期，直到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许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才被迫停刊。

在这七期报纸中，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三。除了每一期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以下简称小组）的大块文章外，还有他以各种方式、不同的

署名写的妙趣横生的作品。甚至在三言两语的“参考消息”、“读者来信”专栏，他也协助选些幽默然而寓意深刻的题材，比如：“北京×××学院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曾有人规定：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能改名，若非要改不可，只能改成‘混蛋’、‘狗崽子’，例如，姓郝，则叫‘郝混蛋’等等。”“河北省易县某中学，有这样一个通令：出身好的学生进教室走前门，出身不好的学生走后门。那些出身不好不坏的人，又不敢走前门，也不愿走后门，只好由窗子进出了。”

一经确定还要办第二期报，罗克便迫不及待地写好了两篇揭露六中和一中“劳改队”的文章。申张正义，恢复人性，是罗克自认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红色恐怖”是整个人类的耻辱，不对它给以抨击，简直有愧于“人类”的称号。

前面说过，北师大女附中一些同学首先冲破“出身”这个禁区，由非“红五类”组成了“东方红红卫兵”。它的出现立刻引起血统论者的震惊，咒骂围攻不绝于耳。围剿它的惟一理由是：组织不纯。

哥哥对她们的行动很赞赏。他鼓励我们在学校里组织“红卫兵”。其实他对“红卫兵”这个词很反感，认为它封建色彩太浓。他让我们组织这样的组织，并不是想捍卫某个人，而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是平等的。

为了消除一些人的自卑感，他以“小组”的名义写了《谈纯》。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战斗小组”名义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他惟妙惟肖地刻划出“常洞瑶”是如何摇摆不定的。这在当时思想混乱的形势下不乏其人。一篇有哲理性的政治文章不仅让人看起来津津有味，而且活跃了报纸的版

面。罗克说这是仿照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形式写的，他还想写一系列"对话录"，但再也没有适当的机会了。

罗克不仅给《中学文革报》写稿，还应另两份小报《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报》的要求各以"小组"名义写了将近一版的文章。

后来我们又印了七八万份刊登《出身论》的专刊，在专刊中转载了他写给《首都风雷》的辩论文章。他编造了一个反对《出身论》的"人物"———步署明。虽然人物是假的，所持的观点却是当时流行的，语言和手法都是当时社会惯用的。所以没有人看出来它出自"小组"之手，甚至还有人来信表示拥护"步署明"的文章。可见血统论对人的影响之深，而胡搅蛮缠也习以为常了。

在以"小组"名义写的反驳文章中，罗克处处以诙谐的语言作了驳斥。使人感觉有理有据，痛快淋漓。

在四中接待站，大量的来访读者都想见见"小组"的人。"小组"总写文章而总不露面也不是办法，容易引起报社内部的怀疑，好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和哥哥一合计，他有了一个最佳人选——郝治。郝治是哥哥初中同学，和我家又是世交，为人忠厚仗义、坚韧不拔、不卑不亢，说话有理有据、诙谐幽默、无懈可击。哥哥请他到我家，把这个意思对他一说，聪明过人的郝治预见到与当权者对着干凶多吉少，可是还是答应了。以后他就成了报社成员心目中的"老大哥"（惟一的大学生），威信非常高。哥哥写的许多文章也都要和他商量。

在1967年1、2月间，一伙"老红卫兵"的头头脑脑，又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惟一的条件。它的前身，是红卫兵

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的成员，也是搞打砸抢、杀人抄家的急先锋。

罗克，就是在"联动"正在猖獗的时候，写了一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头版头条。他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通过公开发表的形式，系统地剖析了"联动"的起因和特权阶层的丑恶灵魂。他用大量事实进行对比，总结道：

"正是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自认为高人一等，再加以长时期口是心非的说教，使一些人的灵魂变得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人，创造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即足以刻划出他们的形象了。……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联动"的前身所干的伤天害理之事，何止一个六中？当时，哪个学校没有刑讯室，哪个中学没有被折磨致死的冤魂？我们在串联的火车上，看见一个"海纠"红卫兵向人们讲着自己的"功绩"：亲手打死一个老太太和她儿子——让母亲眼看着儿子被活活打死，在她快发疯的时候，再把她打死。他说："后来不让打人了，我们都养成了瘾，只好互相打着玩。"——人性，到哪儿去了？

哥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曾这样说：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惟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

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怎样一种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一些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养成了怎样一种目中无人的习气，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生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他始终是这样用善良的心，希望挽救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在这期间，有人曾向他表示要组织一些青少年，狠狠地报复这些残暴的学生。罗克启发他们说："如果有人拿棍子打你，你是打这个人呢，还是打他的棍子？"哥哥相信，历史是不会饶恕这些人类中的败类的，当务之急，是要披露它的社会根源，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去做。

"文革"初期，罗克母校（65 中）的一些学生，知道有的教师对罗克很不好，让他提供这些教师的"罪状"。他不愿落井下石，断然拒绝了。

有一次下雨，学校批斗"黑帮"，让他们在雨中淋着。回家后哥哥问我们："你们没想去给他们打打伞吗？"我们奇怪地问："难道你不恨他们？"他说："想起有些人身为教师却具备势利眼的恶习，确实可恨，但他们毕竟是人，要受到人的待遇。"

"恨之欲其死"是罗克最反对的。他希望的是公平。在对人的问题上，哥哥很欣赏鲁迅的名言："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他在日记中这样阐述自己的心情：

"……我同情他（工厂里被批斗的'黑帮'）吗？不，我对他

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习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过。……为此让他淋到雨里,岂不枉哉?"

哥哥向许多人推荐《孙中山选集》。我们看到孙中山醒目的题字"博爱",有些陌生,一时还不能理解,他说:"看看现在发明的惨无人道的刑法,看看对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草菅人命,难道不是正需要补上这一课吗?"

1967年2月,大街上散发了一份传单——《何其毒也》,披露北京五十二中一位叫郑兆南的中年女教师,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张大字报,仅仅因为她是地主出身,五十二中的红卫兵就对她折磨了47天,施以种种肉刑,强迫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当她面打死个地主婆以示威胁,骗她说她女儿跳河自杀……终于把一位优秀教师摧残死了。就是因为地主出身,死前几个医院都不给治疗。

一个地主"狗崽子",竟敢无视社会的"舆论",敢于冲破血统论的罗网,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该校工作组某负责人,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妨碍!"像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罗克忿恨地说:"这就是社会的缩影!"平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哥哥,对这样的事绝不会无动于衷,他和我去郑兆南家慰问她的家属,去采访郑生前的学生、同事,并撰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发表在《中学

文革报》第四期上。

罗克非常重视舆论工作，他常鼓励我们组织辩论会、座谈会以扩大影响。我们曾参加过许多群众组织的辩论会，进行一场场唇枪舌剑的斗争。由于《出身论》在逻辑上的严密性，我们从来没有被问倒过。

而我们最伤脑筋的就是，对方搬出许多不合理的既成事实，比如军队为什么不要出身不好的；或者搬出某些"首长"本身就自相矛盾的讲话，比如有的"首长"就分不清什么是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还有的主张查三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好举出截然相反的例子，最后不了了之。除此以外，我们总能保持上风。

有时候，正在辩论当中，"联动"就打来电话，威胁说："别让那些'狗崽子'跑了，我们的绳子已经准备好了！"——那时，他们还是很有势力的。

罗克经常参加这种辩论会，他还跟我们谈他的看法，但他不便于在会上发言。

1967年2月17日，一些学生组织邀请我们（《中学文革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一次万人大会。大会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以批判"血统论"为主。知道消息已经太晚了。哥哥在头天晚上用一夜时间写了一篇生动的发言稿，准备由我在会上代表《中学文革报》宣读。他在狭长的小屋一头伏案疾书，我和郝治倚在他的床上等着。

凌晨四五点钟，他把我叫起来，给我们念，让我们改。都认为没问题了，我们仨每人抄一部分，凑出备份，好交给牟志京去排版，争取尽快见报。

全忙完，天已经大亮，我又看了两遍发言稿，以免讲的时

候打磕巴。

上午9点，大会准时开始了。容纳两万多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原来反对我们的组织得知了这次大会，也派了好多人混进会场，大大超出预定的人数。估计组织者也没经验，还以为参加的人越多越好呢。

前两个发言都很简短，顺利通过。我一上台，会场就有点儿乱。念到一半的时候，会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有些人开始往主席台这边拥。我心说，不好，千万别念不完，否则马上付印的报纸就要改版，也不好全文刊登这篇讲话了。我不由得加快了念的速度，我感觉身后坐在主席台上的郝治、王建复他们已经离开了座位去阻挡冲过来的人群。我心里一边盼望着他们能多坚持一会儿，嘴里一边飞快地念着讲稿，人群也越来越向我靠近……当我刚念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话筒立即被抢走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旋即被狂热的人流裹出了主席台，拥进了后边的"贵宾休息室"。

我们几个（其实就是报社全体，只是没有牟，他去印厂催印报进度）被分开，又被团团围住，一片恐吓、吼叫、谩骂声，分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只觉得唾沫星子像下雨一样。按人数和势力说，我们稍有不慎，这种噪音和口水的攻击马上会变成拳脚相加，我们绝对招架不住。我们只好一言不发。郝治、王建复和我，被围得动弹不得，年龄小点儿的初中生们还能走动。

最爱和《红旗》杂志拉关系的帕汉（初三学生）故意过来向我大声"请示"，给不给《红旗》打电话，报告这里的情况。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势力非同小可，它们永远是"正确"的化身，里边的记者一出来，个

个是"钦差大臣" 我连忙答应"可以",但是作用并不明显。

过了一会儿,罗勉带进来一个小伙子,自称是"中学生造反兵团"的,故意高声问我:"我们外边有五百多人,用不用带进来?"

其实他是我家邻居,会前罗勉确实请他派些人来维持秩序,不知道为什么大会最乱的时候,他们的一个人影也没见到,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五百多人只有天知道 我装做无所谓的样子说:"不用进来,这儿没什么。"

也许这一招儿有点儿灵,也许我们不屑一顾的态度让他们摸不清我们的底细,又闹腾了一会儿就散了。

虽然这次大会后来被维护血统论的人破坏了,但是我们毕竟也造成了影响,而这正是我们的目的。

一天,羽晴高兴地告诉我,她的父母想见见我,请我到她家吃饭。

羽晴家也是七口人——奶奶、父母和三个弟弟。父亲是个化学专家,翻译、编著过许多书;母亲是中学的语文老师,"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被学生打得很厉害。羽晴看到母亲被打,第一个反应就是突然地呕吐起来。从此她再见到残暴的事,准要犯胃痉挛的毛病。虽然羽晴说的时候很难过,我却对她越发喜欢起来,我认为女孩儿最起码应该善良、有同情心。

吃饭的时候,全家都对我特别热情,尤其是奶奶,她最疼羽晴,自然对我也格外好,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菜。我实在有些吃不下去,羽晴看出了我的为难,主动帮我吃去了不少。父亲三句话不离本行,和我说起了化学,发现我中学化学学得那么好,多少露出一点儿惊讶。我听他说是研究催化剂的,就问他,有没有让黑火药燃烧得再快点儿的催化剂——我总

是忘不了爆炸物。他说,目前还没发现。

还正在兴头上,我提出告辞,我怕他们再问我别的功课,效果准没有化学好,应该见好就收。

羽晴把我送出来,走进黑糊糊的门道,我正要开大门,她一下子搂住我的脖子,飞快地吻了我一下。我惊呆了。黑暗中,看不见她什么表情,我只感觉心在怦怦乱跳。我想她一定和我一样。

还没等我完全明白过来,羽晴小声说:"该走了,别让他们怀疑。"顺手打开了大门。

第二天我急切地问她,家里人对我印象好不好。她说,挺好的,她父亲还不无夸奖地对全家说,罗文性格真够超前的——火药燃烧够快的了,他还不嫌快!

《出身论》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大街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说《出身论》"好得很"或"大毒草"的大标语。许多人把《出身论》抄成大字报张贴出去。全国各地因为传抄《出身论》以致后来受批判、被"专政"甚至被判刑的人不计其数。许多群众组织因为同意或反对《出身论》而分化、改组。据不完全统计,光北京参加对《出身论》展开辩论的刊物就有《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等小报和杂志。油印刊物不算在内。惟一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兵团战报》骂《出身论》是"大毒草",扬言要"取缔《中学文革报》"。

在《红旗》杂志记者的鼓动下,《中学文革报》的一部分人提出改变办报方向,遭到多数人反对,结果退出了。

进入 1967 年 3 月,绝大部分小报都开始了对《出身论》的

批判，原来支持我们的两三家报纸也有的"反戈一击"或不再表态了。概括他们的论点，不外乎是：一、老的阶级敌人死光了，他们的下一代就是阶级敌人。《出身论》否定这个，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二、出身不同的青年就是应该享受不平等的政治待遇，否则就是想让出身不好的青年"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三、家庭影响远远大于社会影响。四、"文革"前，旧领导优待出身不好的人，迫害出身好的人。

四面八方的围攻，正好给罗克带来纵横驰骋的机会。他写了两篇一万多字的长文，进一步阐明了《出身论》的观点，自然是妙笔生花，趣味无穷。又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写了两篇几百字的短文。他写作的特点，向来是在严肃的长篇论文里夹着几句插科打诨的话。例如：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流言可就多了……比如《出身论》作者吧，'据可靠同志了解'是一个'××× 学院'（还留过两年级）的学生。偏偏《东风报》又说'不对！'因为那里的编辑明明看到是'四中几位语文教员'在六月份写的。这么一对照，写作《出身论》不但要连累'父母兄弟都有问题'（流言云），而且本人成份也得随着流言专家们的高兴而改变。

"最不可理解的是接待站人员的'蓬头垢面'也成了一条'死罪'。那么'油头粉面'行不行？大概，那该算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了。那就剃光头吧？也不行。没有剃光头，已经是'蒋光头、赫秃头的马前卒'了，真剃了光头，那还得了？这样一权衡，无论怎样该死，'蓬头垢面'还是保险一些。"

批判《出身论》的结果反倒使它在人民当中越来越有名声了。无论什么滞销的刊物，只要借批判之名全文转载《出身论》，就立刻变得畅销。

地质学院附中的郑晓丹（郑晓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形象地把它誉为东方的《人权宣言》。她的家被抄了几十次，为保存《出身论》，一家人冒着各种危险，想出种种办法，最后用它当作花椒的包装纸而得以保存到今天。

更多的人把精心收集到的几期《中学文革报》作了极好的包装珍藏起来，把它当作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留给后人。

无数细心的同志，把它铭记在自己的心中。十几年以后，我们遇见一位当时的大学生，他还一字不差地记得那句幽默形象的比喻：“‘自来红’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1983 年的《随笔》杂志和 1999 年 1 月出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已全文刊载了《出身论》，说明它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的。遗憾的是，至今它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尽管当时的当权人物也口口声声反对血统论，但血统论毕竟是他们制造并为他们所利用的。所以在小报围剿无效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急忙给《出身论》定了“大毒草”的调子。这么一来，各个小报、组织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围剿了，原来零星的砸、抢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谁越过分越显其“左”得“可爱”。许多参与我们报纸活动的人，因为清楚我们的印刷地点，为了表示“反戈一击”，更是手下不留情。

《中学文革报》只好停刊了。连羽晴的父母，也规定她不要再和我来往。

此时，坚持到最后参与《中学文革报》活动的有 17 个人，他们是：郝治（轻工业学院）、牟志京、王建复（四中）、李金环、纪亚琴（气象专科学校）、张富英、王玲、张君若（女五中）、遇罗勉、王嘉材（二十五中）、张丽君（女三中）、王世伟、张元琪、

阎世均(十三中)、张颖(女二中)、陈家华(二十四中)。

正如一些有眼光的反对者看出来的那样，罗克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争取平等。他担心地说："十来年滋长了一种诡辩式的'理论'，承认并扩大了不平等。长此下去，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有什么区别？存在着不平等，根本就谈不上民主、自由，国家也就没有前途了。"

他在《谈鸿沟》这篇文章里，透彻地分析了血统论的社会根源和它的封建本质。因此他很佩服中国革命先驱中的两个人——孙中山和鲁迅。他说，因为他们一个推翻了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一个在文字上荡涤封建余孽。他痛心地说："想不到几十年后还要进行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

他对社会上许多弊病，都要追根溯源。对于有人利用"阶级斗争"作为打杀人民的大棒这一套谬论，他尤其忿恨。他说："以'阶级观点'使不平等合法化，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质。一提到资产阶级曾提出的平等，就一味强调它的虚伪。我们这些'无产阶级理论家'倒是一点也不虚伪，他们大言不惭地声称就是应该不平等。"

当罗克破天荒有了在一家报纸（《中学文革报》）上自由发表文章的机会时，他欣喜若狂。他不分昼夜地给《中学文革报》写稿。为写这些稿，他要收集材料、采访当事人，还要与热心的读者通信，探讨更多的社会问题。他说要向戴高乐学习，每天亲自回复上百封信。他还要坚持完成自己原先制定的学习计划……尽管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但这时他的精神是最愉快的，因为他说："我做了点有益于人类的事。"

《中学文革报》共发行7期，累计发行量几十万份，各地翻印、转抄成"大字报"的不计其数。它无疑是1949年以来，

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10. 又去"串联"

女孩子的预感能力特别强。

得知戚本禹讲话的当天下午，羽晴到我家来看我。可能多日的紧张劳累突然放松，我感到像感冒一样。她进来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不想动。

羽晴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她感觉有人会来抓我们。我笑着安慰她说，没那么严重，不就是说《出身论》是"大毒草"么，报纸不往下办就是了，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出身论》没有谁能驳倒，以前陈伯达不是也没敢下结论，还让大家讨论么？但是无论我怎么说，羽晴就是高兴不起来，认准了我们要面临一场大祸。

这天姥姥和弟弟去了姨夫家没有回来，我和姥姥的屋里难得有这么肃静。羽晴陪着我，只是默默地流泪，弄得我越发头昏脑涨、浑身难受。

该吃晚饭了，母亲把饭端来，以为我病得很厉害，看羽晴把饭接了过去在照顾我，放心地走了。

沉默了很长时间，羽晴忽然说："咱们一起走吧，到外地去。"

"干什么去？"我不解地问。

"咱们结婚。哪怕到一个穷山沟去种地。"

我忽然想起不久前，她给我讲起她的小姑，一个十分漂亮的大学生，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一个右派，两人都被分配到偏远的小城市，处境非常凄惨。羽晴父亲经常拿这件事教

育子女，不要太任性。尽管羽晴对小姑万分同情，更佩服她尊重爱情的高尚情怀，但是让她也遭遇同样的命运，那时还接受不了。现在为了我，宁肯重蹈小姑覆辙！不，还不如他们——人家是有正式的工作，羽晴宁肯去当农妇，放弃了自己当作家、化学家的理想，一辈子种地、养猪、生儿育女——这都是为了我！何况我自己也容忍不了自己干一辈子简单、粗笨的劳动，怎么可能让羽晴这样如花似玉的姑娘去吃糠咽菜、风吹日晒？假如真沦落到这一步，我宁可去死。

我不相信处境已经这么悲惨，但是还是被她的真情打动了。怕她看见我眼中的泪花，我闭上了眼睛。

我们又沉默了许久，不知道已经有几点钟了，估计很晚了。院子里静极了，没有一丁点儿声音。我提醒她："太晚了，你回去行么？"

不料她却说："今晚我不想回去了。"

我怕母亲反对，她说："我去跟她说。"

她出去一会儿回来说："我睡在姥姥的床上。"

后半夜，我被她紧紧的拥抱弄醒了。立刻，不可名状的感觉、天旋地转般的激动充斥了我的全身。

我手足无措。

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爱抚她。

好半天，我才难为情地征求她的许可，她只是轻轻地说："你干什么都行，我是你的。"

我们还一点儿都不懂，什么是性爱。

此刻，我无知得可怜，胆小得要命。

我只体会到负罪感伴随着无限的好奇，拥有了一切伴随着刻骨铭心的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几天以后，四中的同学找来几张去成都的火车票，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动身到峨眉山去玩。《中学文革报》方面的人有牟志京、王建复、羽晴和我4个。我们其实是躲躲戚本禹讲话的风头，所以我没有心思游山玩水，心里还老惦记着哥哥。尽管无数人对峨眉山赞赏极了，我对这趟旅游的评价却只有一个字——累。

四中的同学看我无精打采，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要是有你这么好的条件，早该风流了。"

我知道是说我和羽晴，不解地偷偷问她什么意思，她淡淡地说："夸你老实。"话语里露出了一点儿不满。

从峨眉山下来，牟志京和几个同学偷越边境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王建复回了北京，我和羽晴留在了成都。

我们就住在西南局办公大楼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室的豪华，让我们大开眼界——厚重的门，高高的天花板，硬木地板；外屋有二十多平米，摆放着宽大的写字台和沙发；里屋也有二十多平米，摆放着席梦司床、大衣柜等高档家具；里外屋之间，有一间十多平米的卫生间，安放着很大的澡盆，只可惜此时不再供应热水。这么气派的办公室，一套挨着一套。

刚来成都那天，火车站里有北京高校"造反派"的接待站，把我们领到了西南局，他们"占领"了这里，原来这里的当官者早已不知去向。我们想住哪套房，随意，只要能打开。好踢足球的王建复发挥了腿脚的功夫，一脚把门踹开，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家"。

只剩下我们俩了，羽晴非常高兴。她称呼这是我们的"蜜月"——其实我们对婚姻的理解，还处于无知的状态——以为可以一起躺在床上，可以尽情地搂抱，就是新婚的全部内容。

四五月的成都，即使夜晚也已经有些闷热了，我们甚至不敢脱去衣服，惟恐皮肤的接触就能使人怀孕。

头两天我也很高兴，这是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的世界，无论有什么亲昵的举动，不必顾忌着被别人发现——多么新奇的生活！

可是……比如我最爱吃对虾，如果顿顿吃对虾不吃别的，相信用不了两天我也会腻味。我俩整天形影不离，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几天以后，我就有些烦了。我又惦念起了哥哥，给家写信询问，一时也得不到回信。

这时候，四川首先在群众组织之间动用了枪炮，使武斗的形式升了级。据说连苏联运往越南的军火都被截下来用于派性的战斗，但是成都市还没有这么严重。两派的斗争焦点，在我眼里又是那么无聊——真正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地位、人权，没有人敢于正面提出来，只是互相比赛谁更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输赢全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好恶而定，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最让我反感的却是一件小事，以至因此懒得上街：每次走在街上，准能看到一二辆卡车，载着七八个穿工作服、戴柳条帽、面有菜色的工人奔赴工地。这些人敲打着自己的工具或别的铁器，扯着破锣嗓子大唱宣扬极左思潮和个人迷信的"革命歌曲"。他们全然不顾噪音和"乐器"的刺耳和形象的粗俗，竟能以丑为荣。从一个个摇头晃脑的专注神情，能够看出他们的虔诚，并非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我的一种悲哀的心情油然而生。

羽晴看我心情不太好，想尽一切办法让我高兴。

她从抽屉里找到一副扑克牌，让我和她玩。两人玩扑克，

乏味极了。她故意让我总是赢，显得她很笨，反而我更没了兴趣。

我取笑她笨，她借机向我撒娇。愚呆的我不懂得撒娇是女人的魅力所在，反而教训她，这是没出息的表现。后来我才知道，天生好强的羽晴，最反感的就是说她笨。

她教我唱她最喜欢的英文歌："I belong to you，you belong to me ……"（我属于你，你也属于我）翻来覆去那么几句，很快就没的学了。

我俩的生活费带得很少，每次买饭都由她安排，很注意节约。她总是尽量买一点儿我爱吃的，她自己吃最便宜的。

我得了一场重感冒，半夜发起了高烧，说起了胡话。第二天早上稍好一点儿，急忙去附近的医院，体温还有39度。大夫让我必须住院。

两天以后，终于退了烧。这两天羽晴急坏了，日夜坐在病床旁边看着我，嘴上也起了泡。我在半昏迷状态下度过了两天，除了喝水，没有吃任何东西。等到完全清醒了，感觉很饿。她问我想吃什么，我一时想不出来当地有什么是我想吃的，就告诉她让她决定。

羽晴知道我在北京时，十分爱吃杏话梅，到街上四处寻找。两个多小时以后，她没买到杏话梅，买来一盒陈皮梅。我也是饥不择食，看到一块块方方正正、黑糊糊、外面粘着白砂糖，以为是年糕一类的小吃，急忙大口吞食。没嚼几下，差点儿呕吐起来。羽晴发现自己惹了祸，连忙又去食堂，买回一大碗鳝鱼面。我只吃了一点儿，嫌太腥。我有点儿不高兴，嗔怪她不懂病人口味，她也有点儿生气了，说我太难伺候。

虽然又回到办公室去住，我俩话少了许多。有时我和她

抬杠,感觉到伤了她的自尊心,说完非常后悔。但是我有个不会向别人道歉的坏毛病,心里恨自己,嘴里表达不出来。而我心情不好的真正原因,是迟迟接不到家里的回信,总怕哥哥出什么事。

有一天,我终于接到了家里的信。哥哥告诉我他什么事也没有,希望我能早点儿回北京。我决定回北京了。

前几天,我也想回家,羽晴都把我劝住了。可能她以为我接到家里报告平安的信,我会安心和她在这里多住几天,想不到真的接到信了,我反而更想回去了。这次她知道再劝我也没用,也就不再劝,同意回北京了。

我们在东四我的家门口分手的时候,羽晴"狠狠"地对我说:"我永远也不想再见你!"我知道她做不到,故意气她说:"就怕你没这本事。"然后径直朝家门走去。

无知的我哪里知道,我没有珍惜命运给我安排的一次极好的机会,深深地伤害了一个姑娘的心。我永远都应该自责。但是那时,却觉得这么做很"崇高",视爱情为"软弱的感情"。记得培根说过:"一切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

几天以后,果然羽晴又来到我家,她是来向我辞行的——要陪一位女同学去武汉。如果没有前些天的隔阂,相信她一定会动员我一起去,可能她希望我主动要求去,可是我没有,她悻悻地走了。

这时候全国各地动用枪炮的大规模武斗渐渐兴起,紧接着四川的是湖北,接着又是东北吉林省。越是枪战激烈,越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几个《中学文革报》的同学在我家商量去东

北看看。这次不像去成都,没有谁给我们提供车票。最后决定由我和弟弟的同班同学王嘉材打前站，如果顺利，其余的人跟着去。

快离开家了，我多少想到了此行有一定的危险，不免也为羽晴担心起来。北京已经到处传说武汉的武斗如何厉害，说什么穿潜水服的水鬼专门在长江用刀割人的肚子。那时候正在纪念毛泽东游长江，无数群众举办游泳渡江的表演，死伤好多,江面都染红了。传闻越多,越怕羽晴遭到不测。但是她在什么地方我一点儿也不清楚，知道她家已经反对我们来往,所以也不敢到她家去问。无可奈何,随身带了她的一张相片。

这是一张上了颜色的两英寸照片，1965 年照的半身像。她穿了一件合体的毛衣,头发向上盘着,脸上露着微笑。羽晴的美,全被摄影师表现出来了。我刚接到就爱不释手,当即在后面写了一首小“诗”:“春风好,春风好,万紫千红风袅袅,貌媲春光姣。”这是我套用哥哥写的海棠诗的格式。

我和嘉材上午坐上了火车，我们本打算头一站到北戴河，与大家汇齐再去沈阳，想不到才到中途一个叫“北塘”的小站,列车员查票把我们轰下来。这时候才下午三四点,最近的一趟车要到明早四五点。

周围人家很少，到处是一望无际的晒盐场。这个小站的候车室只有几平米大小，除了两个长条椅子，没有任何东西，这就是我们过夜的地方。

我俩走到盐场的水池旁，用手指蘸了点儿水尝了尝，苦咸苦咸的,知道这是真正的海水。我非常高兴,虽然还没有见到壮观的大海,毕竟见到了海水,这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啊!

大海不会离这里太远，相信明天就可以见到梦寐以求的她了。

走了很远的路，回到候车室，天已经擦黑了。我们向车站值班的工人要了些开水，就着随身带来的干粮，算是吃了晚饭。天大黑的时候，下起了小雨，候车室的灯光招来了数不清的小螃蟹，有的甚至爬进了屋。可惜螃蟹都非常小，否则我们一定抓些留着吃。估计9点左右，车站停了电，候车室内外一片黑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们各自躺在一个椅子上早早睡了觉。

半夜，我俩同时被一阵奇痒弄醒。嘉材打开他带来的手电，没找到什么虫子，估计是跳蚤。我们把裤脚、袖口用手绢、绳头扎紧，又继续躺下睡。

不大工夫，我俩再次被咬醒，刚才扎紧的地方，鼓起一圈包。我们肯定了作恶的虫子就在身边，就在天花板、墙壁、地面仔细寻找起来。无意中我看了一下椅子面的下面，竟密密麻麻藏了一层通红透亮的臭虫！因为吃饱了我们的血，大大小小全是圆鼓鼓的，个儿大的比黄豆还大。我们不愿用手去碰它们，一人拿块鹅卵石去碾，只听见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一会儿石头、椅子都被血染红。也有许多个儿小的，动作灵活，逃到了木头的缝隙里边，不好消灭。

我俩吓得再也不敢往椅子上坐，就站着熬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来了去北戴河方向的火车，我们赶快逃离了这里。

我们顺利地到了北戴河，因为没有票，不能从出站口出站，顺着铁道走了一会儿，远离了站台，自然也就出了站。不靠任何人的帮助也能实现旅游的愿望，我们心里特别高兴。急忙给家里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该注意的事和会合的地

点。然后迫不及待地去看大海。办完了这两件大事，我们又要去找当天晚上住的地方。

不知怎么绕来绕去，在风景如画、绿树成荫的半山腰，我们发现了一处隐藏着的别墅，别墅里空无一人。从没有关严的窗户进去，看到屋里家具一应俱全，而且很讲究，只是空空的没有任何生活用品。看起来这所房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住了，我们在这里过夜是绝好的场所，也省得它在这里白白地浪费。

我们正在得意之际，忽然冒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不客气地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知道对这种人客气了反而坏事，就反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理直气壮地说是“中直”的。原来所谓“中直”是“中央直属机关”的简称，足可以吓倒一大片人，可是偏偏遇上了我这个不知“中直”为何物的人。于是我没好气地说：“什么‘中直’不‘中直’的，我还是‘中歪’的呢！”

我们的强硬，立刻让他矮了半截，口气也随之软了下来。他解释说，这个别墅原本是某个大官儿专用，现在这个大官儿没了势力，上级规定仍然不许外人靠近，他就是负责保卫的。我们和他商量，别墅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借住一宿有什么不好。他说：“这种别墅在山坡上多了，哪个不是都闲着？‘文革’前这些大官儿们没倒的时候，这些别墅一年也就用上几天，大部分时间也就是这么闲着。闲着也不许别人住，得考虑首长安全，我们不算经济账。”他求我们别给他找麻烦，千万离开这里。

年轻人血气方刚，都有吃软不吃硬的毛病，看到人家为难了，也就不再坚持，离开了那里。一边走，我一边想，幸亏是

在现在，要是在“文革”前，就冲我们扒乘火车、闯入禁区，足够判我们劳动教养的了。一些权贵是如此腐化，难怪毛泽东一号召，群众就把当权派斗得死去活来。

我们还得回车站，一来那里可以过夜，二来还要在车站迎接我们的“大队人马”。

黄昏的路上，行人非常少。嘉材和一位同行的农民攀谈起来。原来农民有个哥哥在北京教育局工作，他一定担心哥哥的命运，一个劲儿地询问北京的形势，和我们越说越投机。知道我们没有地方过夜，主动邀请我们到他家住宿，而且就在不远的南戴河村。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好。昨晚在他家吃的晚饭，今早女主人又给我们烙发面饼吃。我们不知道如何报答人家才好，早饭前，帮助人家做些挑水、扫地的活。据说主人的哥哥身体不好，想让我们往北京捎几个鹌鹑蛋，听我们说还要去东北，说不准什么时候才到北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临走，主人嘱咐我们路上小心，他说现在形势非常紧张。我们在他家住了一宿，民兵队长还特意盘问了他，他撒谎说是他哥哥的朋友，队长才允许我们留住，而且只答应让我们住一个晚上。

在火车站，我们等到了牟志京、王建复他们，同来的还有弟弟和三位女生——女五中的小玲、菁菁和君若。她们仨是《中学文革报》后期加入的，直到报纸办不下去，她们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所以都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这三个人突出的习惯是，总爱戴着大口罩。赶上那时也正时兴，而且口罩越来越大，大到买都买不到了，就自己做，把套耳朵的布带由可调松紧的活带儿改成死带儿。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还不知道她们长什么模样，因为即使我们进了

屋,在一起讨论报纸的事,也不见她们把口罩摘下来。直到相处得很熟了,有一天她们到我家,我和哥哥都劝他们在屋里就不要再戴了,我说这样和人说话不礼貌,她们才不好意思地摘了下来。这时候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君若是个少见的美人。她美就美在说不清哪儿好,而哪儿都与众不同。

据说君若上小学时考过芭蕾舞学校,仅仅因为一个动作不合格没有被录取,可见身材无可挑剔。她极会打扮,别看她穿的就是普通的毛蓝布衣服,经她亲手裁剪,早已分不清是什么材料了。走在街上,"回头率"特别高。听小玲、菁菁说,如果走在王府井大街这种人多的地方,能吸引住整条街的人。她们偷偷朝四周看看,连马路对面的行人都在朝她们看。也许这样才促使她们总爱戴上大口罩。

我能说得出的,就是她的皮肤又细又白。菁菁和她同班相处了四年,对她十分了解,介绍说,这么好的皮肤可是来之不易——四年来,从来没见过她大哭、大笑,即使笑,也仅仅是嘴角微微动一下而已;从来不吃任何带颜色的食物,以免食物的色素存留在体内;从来不吃粗粮,即使下乡劳动,粗粮占多一半,她宁可饿着不吃,也坚决不动一口粗粮;在农村,夏天无论多热,她都要戴上头巾、口罩、手套,穿长袖衣服、长裤子。每次下乡劳动,思想"革命"的同学都要对她批评、"帮助",后来发展成批判,她就跟听不见似的,"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能有这样的毅力,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八月的北戴河,正是骄阳似火、暑气逼人的季节。走在没阴凉的马路上,都能感觉烫脚。我们一行人,只有君若一人长衣长裤穿着,还戴了一顶大大的草帽。

我们多数人,过去没见过海。不用商量,从火车站直接奔向了海滨沙滩。沙滩上有木板钉成的更衣室,大家换好泳装,一个个跳下了海。君若坐在树阴里看着我们的衣服,菁菁说身体不适,也在那里陪着她。

办报纸的时候,就是王建复管财务,现在依然由他管钱,每人交给他几元,由他掌握着花。饿了,就到附近的小饭铺买面条或干粮吃。

当天晚上,大家就到更衣室去睡觉。我和牟志京穿上塑料雨衣,躺在露天的长椅上睡了一宿。

早上,我们找到海边一座宫殿式的大房子,估计是某个大单位的招待所,现在没有人有心思度假了,大门紧闭着。房侧有个自来水龙头还能流水,我们就到那里洗漱。只有君若一个人,躲在石柱后面去擦脸,可能十分注意仪表的人,最怕让人看见自己不太漂亮的形象。

吃过早饭,我们接着到沙滩和海里去玩。

下午,忽然在沙滩上遇见了哥哥,我们都非常高兴。本来沙滩那么大,即使事先约好都未必找得到,何况哥哥视力又不好。但是哥哥听力特别好,他无意中听到了我们在远处的喊叫声音,顺着声音向我们招呼起来。

我们奇怪他的到来,听他一说才知道,他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星期的病假,正好圆了他到外地看看的梦想。他还告诉我,羽晴的父母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到我家吵着要人,被他生气地撵走了。

虽然我不知道哥哥当时的态度是好是坏,但是我知道他对不满意的事儿不会太迁就。十分担心他对大家不够礼貌,因为那毕竟是羽晴的父母呀。我不由得对两位家长又同情起

来——他们是那么想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偏偏最宝贝的独生女儿又是那么活跃；两代人的感情那么深，却又永远难以沟通——太苦恼了。

晚上，哥哥领着弟弟、小玲去招待所住下，其余人利用一夜，步行七十多里，约好明天上午到秦皇岛火车站会合。

我们白天在秦皇岛市里转了一天，为的是想看看外地的“文革”形势和风土人情与北京有什么不同，更想亲眼目睹“文革”武斗中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了解人民群众在动乱下生活艰辛、怨声载道的情景。夜晚，我们要争取在火车上度过，这样可以省下住店的费用。

天刚一黑，街上的饭馆、商店就纷纷关了门。我们一行人没地方可去，这时也走到了火车站。只有站前广场上，还有一些小商贩兜揽生意，也有些乞丐和卖艺的人。我看到哥哥在一处站了好半天，原来他正专心致志地倾听一位老盲人拉四胡。听完后他把自己的零钱、粮票都给了这位街头艺人。他对我们说：“这才反映出民情。虽然他拉的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可是却拉得那么悲，这足以看出他内心是多么痛苦的了。”说得我们都对那位老盲人同情起来，我们都把自己兜里的零散钱和粮票给了他。

从秦皇岛乘上了北上的火车。

“大串联”结束以后，铁路基本恢复了正常。此时，又打破了往日的宁静，车厢里总有股剑拔弩张的气氛——没有人送水，也不再向旅客报告站名，乘务员和一些彪形大汉时不时地来回虎视眈眈地巡视。我们最关心的是查不查票，只要不查票，比什么都让我们高兴。

离开秦皇岛刚两三个小时，女乘务员来请哥哥到乘务员

室去,说有人找他。哥哥跟她走了,我随即也跟了过去。

我们刚在乘务员室里坐下，女乘务员就退下了，立刻挤进来三位彪形大汉，狭小的空间几乎到了人挨着人的程度，乘务员室的门勉强关上，两个年轻的大汉背靠门而立，一个年龄偏大、体格更壮的，在我们对面坐下。三个人满脸杀气，没有一个人说话,气氛登时紧张起来。我知道他们来意不善，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心里有些发毛。看了一眼哥哥,只见他似笑非笑、旁若无人的样子,我立刻踏实了许多,也装做无所谓的样子。

僵持了好几分钟，我感觉时间特别长，坐着的人突然吼道:"把家伙交出来!"

哥哥对着我笑了一下，我也勉强笑了笑，我俩都没有说话。

那人又连吼了几声,哥哥只是死死地瞪着他。

那人又吼道:"有枪吗?"

我们还是没说话。

"有匕首吗?"

哥哥故意对我说:"你有吗?"我说:"没有。"

这时火车经过一条很长的隧道，打开的车窗刮进来阵阵烟灰。那人指着外面黑糊糊的隧道说:"前天,有俩家伙不老实,让我们扔出了窗外!"

我和哥哥都是单薄的体形，那三个人扔我俩，我估计不成问题。

"我劝你最好还是别这么做。"只听见哥哥平静地说，依然瞪着他。

"你们支持哪一派?"那人还是很横。

"我们不清楚都有什么派别,请你先介绍介绍。"哥哥说。

那人给我们讲辽宁、沈阳主要有几大派，都是什么观点等等，口气已经缓和多了，我们也听出来他们是属于哪一派了。等他讲完,哥哥表示,他们那一派比较"革命","但是,我们还要到沈阳看一看再说"。

那人立刻变得和气起来，示意那两个年轻的离开，好像我们成了一家人，让我们协助维持好车厢的秩序。哥哥夸口说,我们在的车厢,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那人对我们的回报是：不会再有人找我们的麻烦，也不会查我们这节车厢的票。紧张的气氛一过，我立刻觉得好笑起来——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有什么来头，有不少的人，如果知道我们只是八个没伙儿没派的中学生和一个只有七天病假的学徒工，一定把鼻子都气歪了。

回到车厢,哥哥嘱咐大家,东北的派性斗争很厉害,如果有人问支持哪派,千万别急于回答，一定先听他们介绍,根据他们的倾向再回答。

在沈阳,我们投奔到王建复的姨家,总算有了吃饭、休息的落脚地方。沈阳比秦皇岛乱多了，街上经常走过一队队手持大刀、长矛的队伍。就连年轻的女士,也佩带着匕首,只不过刀把和刀鞘被装饰得很漂亮。公共汽车已经停运，有些车的车窗被铁板焊上,改成"装甲车"。

听沈阳的人说，长春比沈阳还乱，那里真正是动用了枪炮,造反派都是全副武装。这无疑勾起了我们极大的好奇,因此,不想在沈阳多呆,只在王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准备继续北上

到火车站，离发车还有几小时，哥哥他们还想在街上转

一转，我在站前广场等着，看着大家的东西。工夫不大，一个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人对我说："同学，借你的钢笔给我用用。"

我以为他要写什么东西，连忙从书包里找出钢笔给他。他接过去，并没有打开笔帽，而是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刻刀，往我的笔杆上刻字。我知道不是好事，一把攥住了他的手，不让他刻。他立刻变了脸，对我说："我给你刻段毛主席语录怎么了，你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吗？"我俩一挣蹦，马上围过来三四个高大的无赖，把我俩分开，有人还故意问："谁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了？谁？"刻字的人趁机飞快地把字刻完，就要往我的手里塞。我看周围全是他们的人，不能跟他们来硬的，连忙拒绝收回钢笔，客气地对他们说：

"钢笔，我就不要了，咱们交个朋友，钢笔送给你们留做纪念吧。如果你们想要钱，就等一会儿，我身上没有，一会儿我们那帮同学回来再给，钱都在他们那儿，反正我也不离开这儿。"

一个人问："你们来沈阳多少人？"

我说："不多，二十来个。"问我的人一努嘴，这帮人拿着我的钢笔走了。

一会儿，又一伙儿无赖围住了父子俩。我处于好奇，上前去看。他们之中的一个劝我走开，看得出来，围着的都是他们一伙儿的，我只好离开。等他们走散，我过去问那个父亲，讹了他多少钱，他愁苦地说："我总共就带了50，他们就要走了40，往前的路怎么走哇？"

又过了一会儿，十几个手持大刀的工人风风火火跑来，问广场上的人，刻字的哪儿去了，看来他们是维持治安的。我

看见远处有不少人正四散逃跑。

我们从沈阳出发，和哥哥告别，他假期快到了，必须回北京。他到北京以后没多久，又利用一次病假，去了合肥。我们其余的人，乘上了去长春的火车。

列车上明显比以前更不正常，快到长春的时候，戴着"长春公社"袖标的工作人员，开始来询问我们支持哪一派。本来我们也没什么倾向，就顺水推舟地说，支持"长春公社"。他们十分高兴，和我们约定好，下了车跟着他们走，他们会解决我们的吃、住问题。

下车后才知道，跟着"长春公社"走的人，有好几十，都是全国各地乘上了这趟车的人。我们排成了一队，顺着铁道朝机务段方向走。

走着走着，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蒸汽火车头，上面有席子搭成的窝棚，藏着三五个带枪的人。我估计车头就是他们的"战车"，吃、住都不离开岗位。

再走，就到了厂区，不仅车头、车厢多，铁道旁还有一排排平房。在房脚阴凉处，用席子盖着一个挨着一个的死人。领队的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最近枪战牺牲的，还没来得及埋葬，因为一时做不出那么多棺材。也有些尸体的席子挪开了，露出了惨白或浅黄的脸，睁着的眼睛和脸上，落上了一层煤灰。人们好像有忙不完的事，没有人顾得上去整理死人。

除了我们这些新来乍到的，每人都背着长枪，挂着手榴弹，有不少还另佩着短枪。我们不免露出了羡慕的神色，领队的说，我们也可以有枪，但是要参加敢死队去夺——或者到军分区的仓库去"借"，或者到对立面组织你死我活地抢。

人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很难保持理智。我们的行为——

哪儿仗打得越凶,越爱深入进去看,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已经有些不够正常。而平时很少表露激动的牟志京居然差点儿参加了一次"敢死队"行动。

原计划去一个武器库抢枪，该库门前有一片一百多米远的开阔地，能冲过去，武器就算到手了；如果对方用机枪扫射,"敢死队"生还的机会很少。半夜快要出发了,突然接到情报,对方早有准备,已架好了机枪在门口等着呢。正准备要出发的"敢死队"取消了这次行动。我虽然知道为了一两支枪犯不上去冒那么大的风险，但是经别人一鼓动，也干了一件想起来都后怕的傻事。

一天晚上,有人到我们的宿舍来,动员我们参加一次"截囚车"的活动。据说,"长春公社"的一些人被对立派的人俘虏了去,今晚要转移这些俘虏,不清楚到底从哪一条路走,所以每一条可能走的马路,都要埋伏下人。有枪的人不够用,只好让没有枪的人也上阵。发给的装备是:柳条帽、雨靴和长矛。出于莫名其妙的"义愤"、好奇和男人固有的虚荣心，我所在的宿舍,好几十人,无一例外地响应了号召。

我们随着带队的来到一条冷清的马路，几十人分别藏在路旁的树丛后面。带队的两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两个自制的燃烧瓶——酒瓶里装满汽油,瓶口用布条塞住,使用时把布条点着,再把瓶子投向敌方车辆。据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它是消灭敌人坦克的极好武器，我一直有所怀疑，今天正好能让我领略它的威力。

带队的好像有点儿经验，先让人用石头连续把几个路灯砸碎,使周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再告诉我们行动步骤:敌人的汽车过来的时候,他扔出"燃烧瓶",汽车最怕火,必然停住

不敢再走,这时大家蜂拥而上,把"战友"抢回来。

武斗期间,汽车是双方主要争夺的东西(军车还没人敢抢),即使白天也很少单独行走,晚上就更见不到了。等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才见远处过来了一辆汽车。当它离我们还有几十米远的时候,带队的扔出了一个"燃烧瓶"。没有想象中的冲天大火,只给马路上增添了一条二十来公分高的火蛇。过来的卡车慢了一下,就不再犹豫,一下子就压过去了。就着火光,我们看清了,那是一辆军车,车上人也不多,肯定与押送俘虏无关。

我们又等了两三个小时,到了凌晨两点左右,再没见到有汽车过来。带队的分析说,囚车可能走别的路了,于是我们撤回了宿舍。

事后我想,幸亏没有遇到"敌人"——如果真从这条路走,肯定会带着枪,我们这些长矛怎么能是人家的对手?非被杀得伤亡惨重不可。冒这么大的风险,最终我也不清楚要救的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被俘虏。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参加"敢死队"。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到"长春公社"安排的某大学里去住,而是自己找到空无一人的"文史研究所"住下了。这里不仅水电齐备、房间充足,而且还有一个图书馆,里边还有许多没有被销毁的书。

见了这些在北京难得见到的书,我们如获至宝,贪婪地阅读起来。看书看累了,就结伴到市里曾经繁华的街道逛一逛,瞧瞧"战争"环境下的街景。吃饭就到"长春公社"的食堂,象征性地花上一两毛钱,可以不限量地吃饱,有时还有红烧肉这样的好菜。我们大家都十分满意寻找到这么一个"世外

桃源"，只有君若没和我们在一起，可能她怕这里不安全，住进了大学的集体宿舍。想不到她的单独行动，给她带来一个不小的灾祸。

如果我们在一起，8个人也算是个小团体，没有人敢来欺负。冤家路窄，以前在学校里整过君若的几个"老红卫兵"偏偏在这里又见了面，她们欺负她孤身一人，不由分说，剪掉了她的一头秀发。

破坏容貌，对于好美的君若来说，无异于要她的命。受惯了歧视、老实异常的君若早已被她们吓傻，失去了反抗能力，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以至旁观的人以为她是刚被抓获的"阶级敌人"，没人敢来打抱不平。一些大学生觉得这样做实在过分，终于发了恻隐之心，找了顶军帽给她戴上。

我们得知消息赶去"救援"她时，只见她正坐在床头痴呆呆地发愣。菁菁、小玲把她接到"文史研究所"去住，寸步不敢离开，惟恐她有轻生的念头；我们其余的人去找"长春公社"的头头"理论"：为什么这里能容许存在这种野蛮的行为？

人家当然要以武斗的大局为重，对付我们只能抹稀泥，先是道歉，接着又怪君若不反抗，使人误以为她有错，接受了这种惩罚。我们提出要找那几个女暴徒算账，人家自然怕事情闹大，早把她们藏了起来。

第二天，君若恢复了常态。她把我叫到一个空房间，告诉我想回北京去。我劝她还应该和我们在一起，到全国各地多走走看看。她掀开帽子，让我看了看参差不齐的头发，苦笑着说："这个样子，怎么到处走啊。"我安慰她："有我们这么多人的保护，没什么可怕的。在外地过上一两个月，头发能长长一些了再回家，也省得受街坊们的气。"

可是无论我怎么劝,她还是坚持回家去。

她动身的那天,我们7个人都去送她。又特意拜托和她同路的几位北京的大学生，请他们好好照顾她，直到人家豪爽地答应下来,甚至打了"保票",我们才放了心。因为我们最担心的是，列车上有人看她的样子会欺负她，更担心这么注重仪表的她,一时想不开,会采取厌世轻生的举动。

还好的是,她顺利地到了家。头发刚长长了一些,她已经敢上街,到我家串门,只是要蒙条长围巾。通过这次磨难,相信她坚强了不少，起码和我们说话不像原来那么娇滴滴的了。

君若走了以后，长春市的武斗更厉害了。有一次我们吃饭回来的路上,就遇上了打冷枪。子弹从耳边呼啸地飞过去,也有的打在了马路上，把柏油路面都划出一道道沟。吓得我们急忙躲在路边的大树后面，直到枪声停止半天了，我们才飞快地跑回宿舍。

"长春公社"通知我们,不能再单独住在"文史研究所"。这时候,我们也很想离开长春了。牟志京的老家在大连,他告诉我们大连如何美,直说得我们都动了心。可是,往南的铁路已经被封锁,必须先往北到哈尔滨,绕道齐齐哈尔走。好在王建复有亲戚在哈尔滨,他对这条路很熟。

晚上有去哈尔滨的火车，我们下午就离开了住的地方,顺便看看市容。

"文革"期间,本来物资供应就很差,武斗影响了运输,供应就更差了。为了让自己控制的地盘上的居民能买到粮食,各派组织出动武装押送的车队，专门运送粮食。粮店门口总是排着长队。所有商店都像没开门一样,关着铁栅栏,上着护

板,只开一扇够一个人进出的小门。商店里面黑糊糊的,多数时间没有电,用几根洋蜡照明。下午四点多钟,商店就纷纷停止了营业,我们无处可去,只好到车站等候。

车站广场还是比较热闹,小贩们出于生活所迫,顾不上武斗和地痞的捣乱,照样摆摊做生意,卖各种简单的小吃。马路上时不时地开来一两辆吉普车,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人,有的甚至站在踏板上,一手拉住车、一手举着驳壳枪,模仿三四十年代的马弁;在人最稠密的地方,准要朝天放上几枪,像是维持治安,又像炫耀武力。周围的市民早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当作新鲜的事来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东北天黑得早,才六点多,天已经很黑了。我们都进了候车室找地方坐下,外面的小贩们点起了自制的乙炔灯,在黑暗的广场上像一群星星。

突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广场上的人群争先恐后地躲进了候车室,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原来对面楼群朝广场的人群打来一阵枪。本来是两派枪战,互相对射,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心理,把枪口转向了车站。

等枪战结束了,人们又陆续走到广场,发现打死了两个人,都是摆摊的,年龄四五十岁,一个胸部中弹,一个腹部中弹,已经没救了。他们的家人一定还在满怀希望地等着他们带回去这一天的收入,计划着下一天的安排,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经倒在血泊当中,永远不能再承担那个家了。更可悲的是,永远也不知道谁是凶手,或者向谁去讨还这笔血债。

别看相距不算太远,哈尔滨比长春安定多了。但是处处也显示出许多不正常的地方,比如:有轨电车没有人售票,许多电车连司机也没有,让一些十来岁的小孩驾驶,据说有一

次电车冲出铁轨，轧死了一位老太太；所有商店永远不打开铁栅栏和护板，让人看不出是不是在营业（这种营业方法在东北大大小小城市延续了好几年），看得出来卖东西的是多么不情愿。

从哈尔滨绕来绕去到了大连，从大连又回到北京。总共在外边游荡了一个多月。

我们到了北京，哥哥早已经从合肥回到了家。他很早就有到全国各地考察的愿望，他这一宿愿终于实现了。罗克从安徽回北京后，也给我们讲了那里民不聊生的状况。他还讲了一位妇女在派性斗争中的悲惨遭遇和她写下的民谣："秋风凉，树叶黄，落叶进我窗。初生孩伢不得见，心狠似豺狼。"

哥哥到合肥找的是他的一位"信友"丁广武。丁广武是成千上万个给《中学文革报》来信读者中的一位，哥哥看他信写得好，互相通过信件往来成了朋友。哥哥被捕以后，丁广武也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判刑20年。广武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广武入狱，她失去了生活来源，靠卖冰棍维持生活。盼儿子回家的信念支撑着她顽强地活着。十多年后，广武平反回家，仅仅过了几天团聚的日子，母亲再也无力坚持，离开了人间。

看到国家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罗克更感到需要为真理和正义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作的两首词正反映出他的心情：

菩萨蛮　（北戴河游泳所见所感）

风帆尽处涛声乱，
涛挟云改涌天畔。

寰宇贺朝阳，
霞光万道长。
百感何时了？
雁落秦皇岛。
游过阻波堤，
无堤浪更急

纪 行

淮河黄河与海河，
风尘万里泛浊波。
人生沸腾应拟是，
一场辛泪一场歌。
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
风霜日夜苦折磨。
认定汪洋是归宿，
不惧前程险阻多。
多少英雄逐逝波。

11. 事业未竟

然而，正当他为正义的事业呕心沥血的时候，罪恶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他。许多人通过一些"内部"途径，得知公安局要抓罗克。罗克听说后，无动于衷，谈笑如常。虽然父母和我们两个弟弟，想到随时有可能和他分别，心里非常难过，但看

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们也得到了一点儿安慰。

也有人劝他公开认个错,他说:"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仰。我个人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危险的暴风雨岁月里,他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声音。""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

他在日记中也写道: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他惟一担心的是:"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

接着,他也发现身后总有人盯梢。

他在给广东一同志写的信中说:"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罗克为了不给外地的通信朋友找麻烦,他不敢亲自去邮局寄信,许多信是由我们找人代收代邮的。

罗克曾给陈毅写过一封信,提到对这种勾当的看法:"这种做法既卑鄙又拙劣。有时我突然转过身来……往往对方惊慌失措。我只是一个学徒工,尚能发现跟踪,倘若是重大国事犯,公安人员这些拙劣的做法,将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

对这种卑鄙伎俩,他常常给以嘲弄。有时我们和他一起出门,他就指给我们看,哪个是跟踪他的便衣。有时罗克故意

藏起来，等那些人正在东张西望地找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有一次我和他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又遇到一个便衣，不远不近地跟着，罗克故意走到那人跟前，用很不客气的话问他："你找什么呢?"如果是毫不相干的人，也许会因此吵起来，但因为那人心虚，只好胡编了一个地名，向我们解释。罗克不走了，用愤怒的目光盯着那人，直到他灰溜溜地走远为止。哥哥笑着对我说："你别看我这么对待他，他回去不敢跟别人说，要不然别人会骂他笨，把自己暴露了。"

虽然他的处境已经非常糟糕，但一点儿也没影响他的情绪——还和往常一样地看书、写文章、作诗、谈笑风生。依然对"文革"中的反常现象有浓厚的研究兴趣。

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位南京的客人丁灏。他的父亲和我父亲是老朋友，他正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这次来北京是受南京文化局当权派的委托，到"中国美协"调查《郑板桥集》出版的情况，外调的对象是美协书记蔡若虹和漫画家华君武。

"文革"期间，被"外调"的经常是被"专政"的对象或有点儿"问题"的人，所以外调人员多数都是两人以上，用以壮大声势。经常是用大呼小叫、拍桌子瞪眼来吓唬对方。可能丁灏是顺便来办此事的吧，只有他一个人，介绍信却写着"……等同志"，表示不只一人。他问我们愿不愿意陪他去。哥哥最喜欢研究各种人尤其是平时不容易见到的人的心理，我也很想知道外调是怎么回事，都高兴地答应了。哥哥声明："可别指望我们吓唬人家。"丁灏连忙说："我也不会那一套。你们别表示同情就行了，否则我回去不好交代。你们最好别说话。"

接待我们的是"革委会"的主任，像工人模样，估计是"工

宣队"的代表。他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当即就让人把华君武叫来。听他的口气,这些"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被集中在一起劳动,有人看押着。

不大工夫,华君武来了。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态度不卑不亢,不问到的决不多说,问到的也答得很简单。"革委会"主任不时地呵斥两句"老实交代"。华君武依然该什么样还什么样。很快,丁灏没的问了,主任让华君武回去继续干活,顺便把蔡若虹叫来。

蔡的性格与华正好相反——问他一句,他能答十句,说话眉飞色舞,做出极力配合我们的样子。对主任,更是十分尊重。不料主任却对他十分蛮横,比对华君武厉害多了。他明显地已经没的可说了,主任还是不依不饶。丁灏没的问了,主任还不放过,非问他某天某时"牛鬼蛇神"在一起议论什么。蔡说:"我们在说烧菜,怎么烧好吃。"主任不表示信与不信,还是一句句地追问,想从中发现点儿要害的东西。

我们觉得没劲,起身告辞走了。主任还继续审问着蔡若虹,没有停止的意思。

走到街上,哥哥感慨地说:"从刚才的事就可以看出来,对不讲理的人,不能迁就。华君武不买主任的账,主任倒不敢对他怎么样;老蔡的表现符合他的要求了,反而受欺负。"

1968年元旦,罗克对母亲说:"今天我要闭门思过,别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他像每年一样,在自己的小屋里写了一天。他总结了自己取得的成绩和发现的错误,并订了下一年的学习计划——其中包括必读的104本书。

罗克是以自己的心、血去给人以爱。

他为之付出生命的《出身论》使无数绝望的青年感到安

慰，如绝路逢生。

他在每天有人盯梢，随时可能入狱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还忙于撰写一两万字的《工资论》，谈他对工资改革的看法及具体的建议。

他告诉我们，还要写：为失足青年终生受打击、压迫、歧视鸣不平。

他想着找机会呼吁，为"真正的黑五类"讲讲重在表现。(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他想编一本书，专门搜集"文革"发生的惨无人道的暴行，用以警示后人。

他要……

四、牢狱之灾

1. 大祸临头

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像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他被关到半步桥看守所，这是谢富治亲自授意和批准的。

这是一个北风呼号的日子，正处于北京最寒冷的"三九"期间。几天前，哥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预感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全家每个人的心中。——都知道随时有可能大祸临头，又盼着每一天能平安地过去。

这天我家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我的女朋友羽晴，另一位是沈阳11中高三年级学生孙钢。孙钢是《中学生文革报》的热心读者，他对我们报社的敬佩深深感动了编辑部每个人。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很快也成了罗克的挚友。当时学校里仍很混乱，去不去很随便。我们聚在一起，想研究一下能不能在沈阳成立个"生产组"，以便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永远在一起，过上乌托邦式的生活。那时听说有学生正组织到云南组建农场。

上午10点左右，忽然进来几个警察和便衣。他们来势汹

汹，宣布要搜查我家，并且恶狠狠地询问客人与我家的关系。孙钢具有典型的东北人性格，血气方刚，没说几句就和来人顶撞起来，一个年龄 40 多岁的头目咬牙切齿地命令别的警察："把他带走！有你小子好看的时候！"从此孙钢就失去了自由，被判 15 年徒刑！

13 年后我再见到他时，已与当年的他判若两人——那时他虎头虎脑，有使不完的劲，浑身充满活力。而这时，虽然才三十一二岁，狱中的摧残已使他疾病缠身，走路稍快都会气喘吁吁。1986 年后，他到美国定居，现在已是几十名雇员的公司老板。

搜查时，我乘警察与孙钢争吵之机，偷偷将几封外地青年写给哥哥的信藏在衣袋里，希望尽可能减少受牵连的人数。这几封信与其他我们保存的大量普通来信不同，是罗克在数千封信中挑选出来的水平较高的一部分，经过几次往来通信，已成了未见面的朋友。罗克为了避免邮检给这些人带来麻烦，特地让我的一些同学代为转收，再由我取回交给他。

搜查后，我被学校来的人带走进行"群众专政"。同时被"群众专政"的，还有轻工业学院的郝治。他是哥哥的初中同学，又是哥哥的好朋友。他家与我家是世交，他父亲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也是个刚直不阿的"右派"。罗克委托他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代表名义，参加了《中学文革报》。经常在罗克的小屋里彻夜研讨《中学文革报》准备发表的文章。

2. 群众专政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相信任何人都宁可去蹲监狱，也不

会选择"群众专政"。

虽然监狱里已是非人生活了——每人不足1平米的空间，常年处于饥饿状态，随时可能佩戴折磨人的刑具……但是，和"群众专政"比起来，这种"待遇"却算得上是好过多了。在监狱里，周围都和你是一样的人，有同情，有交流，有苦中取乐；审讯时很少施刑（因为是可供外国人参观的"模范监狱"）。而"群众专政"，既行使了公检法的职能，又不受法律约束；打手们既可以任意施虐，又不必担心受到制裁；抓错了，以致把人打死，当权者毫无责任；抓"对"了，犯人屈打成招，当权者和打手们又都有"功劳"。

那天上午郝治刚到学校，立刻遭到"群众专政"，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被关进漆黑的楼梯间，除了身上穿的衣服，牢房里只有一卷草帘子。每天饮食是六两窝头、一块咸菜和凉水。更难以忍受的是，每天必遭一顿毒打。如果哪天哪位打手迟到了，错过了施虐的机会，必会成为他一天中最大的遗憾！并且向同类连连表示"可惜我没伸上手"！——他们打人已成了瘾了。

就这样折磨了半年，郝治始终没有承认加在我们头上的"反革命集团"。同时他也知道，再这样下去他必死无疑，于是开始绝食。7天后，当局怕他真的死了，会更难挖出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只好答应他的要求：取消每日的毒打，允许他走出楼梯间到阳光下。

这时他才发现，关押进去时穿的棉袄已被血凝成厚厚的硬壳；被血凝在一起的胡子，已经有半尺多长。当他把相伴半年的草帘拿到室外，轻轻一蹾，立刻掉下一层令人毛骨悚然的臭虫，弄得他宁可睡在水泥地面上也不敢再用它。

又过了半年，1968年12月31日，才允许他第一次回家

当天晚上他去看望我的父母、姥姥。老人们一时难以认出他了——一米八的大个子，如今只剩90斤。他一进门就说："如果有坏人跟进来了，您就说正撵我走呢；如果没当场抓住我，只要一出这个门，您就说没见我来过"

妈妈那么刚强，即使在得知哥哥的噩耗时都不在人前落泪，此时却为哥哥有这么好的朋友感动得哭了。

郝治，是我见过的最有骨气的硬汉！

我虽然也被"群众专政"，每天却可以回家。为避免更多无辜的人也被打入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里来，我断绝了许多朋友的往来，尤其是认识哥哥的。在学校里只是让写写检查和交待材料，没得写了，就在一旁看书。和以前不同的，无非是受到一些人的白眼，原来要好的同学也都敬而远之。但是绝大部分要好的同学没有落井下石，甚至有人在厕所、楼道看见我，看看四周没有别人，还会说些鼓励的话，我也就十分欣慰了。

但是，好景不长。十几天后，公安局来人送传票，还故意把气氛造得非常紧张。来的警察在我面前站得笔直，称呼我的名字也提高了八度，说起话来像事先背好了台词，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当然要求我也一样必须站直了听他念。我忽然萌生要打破这种模式的念头，故意让他多说话，于是问："我是还回来呢，还是不回来了？我的东西是带着呢？还是不用带？"他憋了半天，想不出怎么用"官话"回答，只好自认晦气地说："收起来，先放着。"声调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文革"前的人，把传讯也看作一种"处分"。按严重程度

排列：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教养、拘留、传讯。运动初期，我就学的第65中学揪斗的“牛鬼蛇神”中就有个老师因为被传讯过，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就好像专政机关是个染缸，只要进去，就被染色，永远也别想漂回原色了。

恰巧，这一天正是我20岁的生日，想不到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虽然上午就到了半步桥监狱，其实基本上没人理我，只是让我在传达室旁一间空房里坐着。中午，有人给我送来两个窝头、一块咸菜、一碗水，我第一次品尝到了监狱的饭。临送我回来，才对我进行了简单的审问，大意是：这次行动还算轻的，如果以后我还继续“执迷不悟，拒不交待”的话，对我会有越来越严重的惩罚，等等。

噢，我明白了，原来这就叫逐步升级战术。记得前些日子哥哥看了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逐步升级》，刚看完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了起来。最后他总结说：“当环境越来越难以承受时，谁能坚持到最后，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正符合他一贯的办事原则。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学校召开了一次对我的批斗大会，会上还算温和。大会结束后，我刚走出会场，立刻被早已等在门外的几十个“联动”分子狠打了一顿。这些杀人都不会眨眼的“天之骄子”没少被我们的《中学文革报》揭露，这次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下手之重可想而知。我当时没有被打死，只能感谢父母遗传给我的颅骨还算结实。我的头发被人揪着，头无法抬起，只能咬牙挺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真正的幕后指挥还指望揭发出更大范围的“反革命集团”，不希望我现在就死，军代表带领

不少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从这帮暴徒手里抢了出来。以后的事，我记不起来了。

天快黑的时候，我清醒了许多，只是还感觉头、脸又肿又疼。总算还能走出学校。

上帝确实比人高明，他创造的大脑是人类制造任何机器也无法替代的，而且无论多少年后，恐怕也会有人类无法揭开的谜。

尽管我还在头昏脑涨，却想到：暴徒既然能在学校里暗算我，难道不能在路上或家门口等着我吗？于是我走出校门朝回家相反的方向走去。几乎是漫无目标，又似乎理所当然地来到了北京火车站。

火车站在"文革"期间是有史以来最混乱、拥挤和不卫生的。不但椅子、台阶和一切高出地面的地方"座"无虚席，就连地面也都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仅仅留下一条一尺多宽的走道。我转来转去踅摸了二十多分钟，终于等到了一个位置——铺了报纸的一块地面。

我躺下去，头枕着自己的胳膊，终于得到了片刻休息。我盘算着下一步去哪儿，忽然想到《中学文革报》的一位成员——陈家华。他虽然比我小两岁，可是为人沉稳、老成，总有说不完的主意，应该找他商量。为了不给他带来麻烦，我还必须甩掉可能正盯着我的"尾巴"。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原来坐着或躺着的人都站立起来，有的去提身边的行李。我躺着的这两排的人开始准备剪票上车了。我不可能再躺着了，否则有被踩伤的危险。大家惟恐被落下似的，一个劲地往前挤，马上形成了两道密不透风的人墙，任何人都难以从这人墙中穿过。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人墙"之所以排得这么紧密，是为了防止前边不排队的人加塞儿。离剪票口还有二三十米呢，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我随着队伍一点儿一点儿走向剪票口，当走进这片人海的时候，突然离开队伍钻向人海。别看挤进队伍不容易，往出走可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不用我使劲，早有人助我一臂之力，把我推进人海的纵深处。我尽量压低了身子，在人海的掩护下，走出了候车大厅，来到街上。

我急忙钻进黑幽幽的小胡同，从一条胡同拐进另一条胡同，一直到确认没有人跟踪了，才走到陈家华家。

陈家华见我这么晚来，又看到我肿胀的脸，不用问已经十分清楚了。他有一间地处后院孤零零的小屋，此外，狭长的小院只有相声大师郭启儒家后门开在这里，非常安全。陈伯母见我这样，猜想我一定没有吃饭，特意端来了可口的饭菜。是的，从早晨到现在，有十几个小时水米未进了。这顿饭，我吃得香极了，终生难以忘怀。这一夜，也睡得踏实极了。

第二天，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我去公安局要求拘留。

根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这个要求当然不能批准，又把我交回了学校，好在答应我不会再发生武斗现象了。为了防止我真的跑了，规定不能回家。1968 年除夕夜，我就是在一间只有门没有窗的储物间度过的。

在隐隐的鞭炮声中，我想起了父母，他们虽然有四个孩子，可是一个在身边的也没有：哥哥进了监狱；姐姐因为"书写反动日记"在 1966 年 12 月就被送去劳动教养；我被关在学校；弟弟去了东北，父母让他去沈阳打听孙钢的下落，顺便看望他的母亲。此时，他们的心情一定非常难受。我只能在这间

小黑屋里，默默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

春节期间，专案组的人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也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

有一次我上厕所，无意中发现茅坑两边的隔断墙和前边的门上，有不少人的感慨之作。后来我到过全国各地，才知道厕所内抒发感情也是中国的国粹，大江南北，横贯东西，概莫能外。大概人在出恭之时，血液对大脑供应异常之多，才思自然敏捷之故吧。只不过外地厕所，有关“性”的较多，难免有下流之嫌。而我校厕所内，通篇是“毛泽东思想万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政治性文字，而最多的只有三个字“狗崽子”而已。

我突然也来了灵感，凡是“狗崽子”三字后，均加上“万岁”两字。每次出恭换一个茅坑，字体全模仿就近“大作”，反正当时“万岁”二字频率极高，不乏样本。三个楼层的男厕所全部改完，就想等着看有什么结果。

几天后，果然反响剧烈。所有的“狗崽子万岁”旁都加上了“反动”、“反动标语”等批注。可是，怎么反动，谁也说不清。终于没有酿为轩然大波，多少让我有点失望。好在并没有人怀疑到我——都这处境了，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岂不知，在貌似庄严的人脸上挠一把，这好像是我家人的传统。

好景不长，春节过后没多久，我的一位十分要好的同学经不住恐吓，检举了我从东北武斗地区带回两枚手榴弹的事。专案组如获至宝，公安局的人连夜带我将手榴弹起出，狠挖手榴弹与罗克的关系。

几天后，看我交待不出什么有用的问题，就又升了一级——召开全校大会批斗。

几个打手反拧着我的胳膊，我才领略到“喷气式”是什么滋味。还有人恣意地勒着我的脖领，幸亏领勾、扣子的线都断了，才没把我憋死。

发言的人说什么我难受得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听见最后喊了一句：“扭送去公安局！”我被拖着往学校后门走。这时我的两腿早变得麻木而无知觉，根本无法迈步。

其实公安局的车早在学校后门等着呢，因此不用劳打手们大驾，只把我“扭送”到汽车里就完成了任务。这次接受了上次批斗的教训，没敢堂而皇之地走学校正门，因为不能再让我遇到危险，他们还指望我通过手榴弹这么大的事把哥哥检举出来呢！

从此，我过上了真正的铁窗生活。

3. 关进第一监狱

第一监狱地处北京市宣武区半步桥胡同。

我家有 4 口人在这里进出过：父亲在“三、五反”运动中，被怀疑偷漏税多少亿（简直是天文数字，是全年营业额的上万倍）在这里关押过；1957 年他被定为“极右”的“右派”，教养前在这里羁押过；姐姐罗锦，因“写反动日记”，在送茶淀农场教养前也在这里羁押过；如今我和哥哥又被关进了这里。

半步桥监狱（其实是看守所）主要有两座楼关押犯人——“K 字楼”和“王八楼”。名字是根据楼的形状起的，不包含褒贬的成分。每座楼里，根据楼道又起名叫第几“筒”。每“筒”的左右两边各有四五间牢房，尽里边是厕所和水房。

随着“哐啷”一声锁响，我就成了这间牢房里的一员。

人的心理往往就是这样：没有进监狱的时候，怕进监狱；一旦真的进来了，反而没有了恐惧而变成了好奇——会不会遇上传奇人物？会吃什么样的饭菜？于是我向四周环顾起来。

这间12平方米的房间，几乎被两边木板钉成的通铺占满，中间只剩下将近一米宽的走道。走道一端是门，门下放一只尿桶；走道另一端是窗，窗下放着一个小木桌和水桶、碗筷。窗上安装着铁棍，玻璃上涂着白油漆，不开窗看不到外边。

每个通铺上笔直地坐着十一二个人，前后分成两排。加上我，每个人只占0.5平方米。他们给我的最大印象是苍白和瘦，所以显得两只眼睛特别大。23双眼睛，有凶狠恶俗的，有慈眉善目的；有刁钻刻薄的，有与人为善的；有愁苦凄凉的，有乐观豁达的，但都传达着一个眼神——新奇的喜悦。后来我才知道，这间牢房已经一年半没进来新犯人了，住进来最长的已有四年多。大多数犯人已经五十开外，三十多岁的只有一两人，我是最年轻的。

我没进屋的时候，这些人正在听一个人念报纸，我进来后，大家只顾用眼睛盯着我，忘记了自己该干什么。我坐在地铺边上被46只眼睛盯得有些不自在，站起身来到门口，想往楼道里看看。

这个门是用铁皮包住的厚木门，在眼睛的高度只留下一个小窗口，用一块镜子挡住，只有一只手掌大。镜子可以拉开，看守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对里面说话或取小件东西。镜子背面的镀层被划出网格，从外面向屋里看很清楚，从屋里往楼道看，看不见。我正在用镜子看自己的模样，一位老者急忙

对我说:“别往外看,政府(看守)看见了会骂你!”原来看守经常悄悄地走到这个小窗后面偷偷往屋里看,以便监视犯人们是不是有坐姿不正、交头接耳这些越轨举动。

大凡管别人的人,无论是看守还是行政长官,都喜欢道貌岸然。所以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让别人发现自己干了偷偷摸摸的事,哪怕干这事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目的。这个道理我还明白,所以又回到我原来坐的位置坐下。

一位五十余岁,说话慢条斯理的高个子对我说:“我姓穆,是这里的学习号(负责组织犯人每天‘学习’)。咱们这里不许叫尊称,也不能叫名字,只能叫‘号’。以后你就叫我‘穆号’。不许你对别人说你的案情,也不许打听别人的案情。墙上贴着一张监规,你必须把它背诵下来,说不定政府还会来考你,你答不出来可不行。”

“不行能怎么样?”我问

“这就算你违反监规。对违反监规的人,可以给他戴手铐、脚镣、背铐,穿‘和平衣’,戴防毒面具,关小号。不光是受这些惩罚,还算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态度恶劣,将来判刑都会从严。”穆号心平气和地说,没有任何恶意。

大家一看“学习号”开了头,立刻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起这些刑法来。

原来,只要一戴上手铐、脚镣,没有三五个月别想摘下来,有的甚至一两年。最难受的是背铐,吃饭解手不方便不说,刚开始连睡觉都困难,胳膊会肿起来。只有过了这个阶段,慢慢适应了才能整宿睡觉。“和平衣”类似精神病医院的紧身衣,穿上以后上肢无法动弹。据说这里的“和平衣”是用橡胶做的,可以充气,让人难以呼吸。防毒面具的作用相同,

也是限制人的呼吸。这两者一般同时使用，防止犯人在挣扎时将防毒面具扯下。所谓的“小号”相当于“站笼”，据说关进去站不起坐不下，牢房内二十多人没人亲眼见过，所以难受的滋味只能借助于想象。

我真佩服国人的这些“发明”，既可以让人难受得死去活来，又留不下一点儿外伤，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让外国人来参观。难怪有个“国际友人”参观后开玩笑说，如果让他坐牢，他选择这个监狱。

大家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突然门上的小窗“叭”的一声打开，屋里立刻鸦雀无声。看守厉声问：“你们都干什么哪？”

穆号连忙起身立正道：“报告政府，我们正在告诉新来的犯人遵守监规的事。请问政府，新来的犯人睡在什么位置？”

看守向两边看看，稍稍停顿了一下说：“挨着你，第二个。”第一个靠墙是个好地方，睡觉时可以避免别人呼出的废气，那是对学习号的犒赏。

过了一会，看守打开铁门，扔进一条分不清被里被面，黑布缝制的棉被，又递进两个粗瓷碗和一双竹筷、几张手纸。在这里，这就是一个人最起码的生活用品。

学习号一看送进来东西，立刻吩咐这边通铺上的人，每个人再挤一挤，匀出我的一尺宽的地方来。为了防止有人多保留一点面积，学习号用筷子临时做了个尺，一个个去量，力求公平。除我以外，大家用的都是自己的被褥，褥子已被叠成原来三分之一的宽度，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翻身非常困难。

对面通铺上的人，虽然不必忙碌，也趁着乱，聊天、活动身子。别看牢房里的人年龄都不小了，却像小孩一样乐不可

支，一来可以躲过没完没了枯燥乏味的学习，二来以后可以向我打听外面的世界。

这一忙活，不知不觉到了每天送开水的时间。

牢房里只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打水打饭。此时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走出这间牢房，到楼道口去领水或饭。这个人也是"政府"指定的，估计要找那些案情轻微、没有同案犯的人担任。由于长年累月地修行，他早已练就一副顺风耳。伙房的人抬着木桶从楼下百米开外的伙房一出来他就知道了，再根据一层层、一条条楼道由远及近的蹾放木桶的声音，判断什么时候该轮到我们这间牢房。于是走下通铺，穿好鞋，准备好水桶，等着看守开门。

现在因为是水不是饭，只拎一只桶就够了。在他准备的同时，每个通铺上今天轮到值日的犯人也把每个人自备的大号搪瓷杯在通铺边沿摆成一排。我没有杯子，就找个粗瓷碗代替。

不一会开水拎进了屋，值日犯人把杯子一个个盛满，有的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拿起自己的杯子贪婪地喝起来了。只听见满屋子嘶噜嘶噜的声音，好像不是在喝水，而是在喝粥、吃热汤面。更会安排生活的人，把每天上午饭发的咸菜疙瘩省出一小块，用手纸包好，这时候从兜里拿出来，津津有味地品尝。

喝过了水，犯人们把饿瘪了的肚子撑了个溜圆。在这里，凡是入口的东西，只有白开水是管够的。所以这顿水，也是犯人的一次"享受"。有那嘴馋的，满满一大杯喝下去了还不过瘾，自己又去搬那铁捅，想把剩下的一点儿水也喝下去，旁人就会提醒他："少喝点儿吧，小心浮肿。"从大饥饿年代过来的

人都知道,在营养缺乏的环境下,一浮肿就凶多吉少了。

突然,一阵震耳的电铃声,告诉我们该午休了。不管你想不想睡觉,此刻都得躺下。大家纷纷把褥子拉出来和衣而卧。这里的规定是:午休不许盖被。

两天后,我熟悉了这里的生活规律:早晨6点半起床,看守按顺序将门打开,值日犯人拎着尿桶在前,其他人随后到达楼道尽头的厕所。这时要尽快排便,因为下一次"放茅"是晚饭后,中途想排便只好在牢房的尿桶里。非蹲非坐的姿势难受不说,必然给拥挤的牢房增加空气的污浊,难免要受到难友的白眼。看守给的时间只有5分钟,如果赶上泻肚不止或便秘,算你倒霉,绝不能等。即使这么匆忙,轮到最后一间牢房也已经在7点半以后了。

从厕所出来,二十多人又被锁进水房,这里有自来水龙头和水池,供刷牙洗脸用。此时看守打开下一间牢房,去厕所排便——总之,不同牢房的犯人见不到面。

从水房回来,值日的犯人开始擦通铺,收拾碗筷;其他人收拾自己的行李,活动活动身体或者聊聊天。这是一天中最随便的一小会儿。

约莫十几分钟,开始了每天的"天天读",不是背《毛主席语录》就是背"老三篇"。三天两头考核能不能背诵下来。这可苦了几位不识字的老农——他们连因为什么进来都不清楚,本来还指望关上两三年能放回家与家人团聚,又怕因为背不下再多关几年。所以一到考核时,急得抓耳挠腮。

两个小时后,开始吃早饭了。这是一天两顿饭中的一顿,对于常年受饥饿煎熬的人来说有多重要是可想而知的。早饭从来没变过,总是两个窝头(总共200克的玉米面)、一块咸

菜，用白开水"溜缝"。窝头和咸菜难免有大小之分，为了保证公平合理，犯人们规定了分配方法：先由值日生把瓷碗一字儿排开，无论大小每碗两个窝头、一块咸菜，然后由对面通铺的值日生在不看的情况下宣布从第几位犯人第几碗开始分发。这样，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吃到分量比较多或少的一份儿。在那个颠倒黑白的时代，我却在狱中见到了别处没有的平等！

饭后是"学习"。通常是读报纸。牢里只能看到《人民日报》，而且只能看没有报道水灾、旱情、地震、台风的，免得长了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读报是犯人们最欢迎的，因为这时读报的可以可着嗓子大喊，别的牢房都能听见——这是与外界惟一的交流方式；听的人愿意听则听，不愿听可以闭目养神。偶尔遇到有点儿趣味的文章，大家可以要求念第二遍，反正时间有的是，念多少遍也打发不完。我喜欢念报纸，每次嗓门都提得老高，因为我总以为哥哥也会在这个楼道，希望他能知道我现在的状态很好。后来才知道"K字楼"有二十来个楼道，犯不着让我们离得那么近，所以也就不再大声念了。

念报纸也是借题聊天的机会。记得有一期社论题目是《图穷而匕首见》。从这儿，我们就说到了荆轲刺秦王，又从秦王说到了东周列国，最后连伍子胥、姜太公都出来了。大家你一段我一段，说得尽兴，把下午和晚上的"斗私批修"也占用了，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中午供应完白开水是午休。一小时后又是学习，内容是"斗私批修"。监狱里的犯人早没什么"私"可斗，即使有，无非是想多吃点窝头，想挑选稠一点的菜汤之类的老生常谈。这

时候，学习号老穆就从他枕头里拿出旧报纸给大伙儿念里边“斗私批修”的文章。老穆念得极慢，全是念过几遍的老文章，让人听着只想睡，没有点儿耐性不行。

大约三四点钟，该吃晚饭了。晚饭比早饭好些，咸菜换成了白菜汤。这里的看守从来没有因为饮食问题询问犯人的民族和信仰，因为菜汤里根本没有丁点油星和肉类，不管你是穆斯林还是佛教徒，保证可以放心享用。

我进来第一顿赶上吃晚饭，觉得难以下咽，正要送给别人，挨我睡觉的孙姓老头小声告诉我：“勉强吃了吧，要不没几天你就得饿得难受。现在多吃点还能多挺两天。就算你不吃也得交回去，不许给别人。”

晚饭只有一年中的两三个节日有些变化，窝头变成全麦馒头；有时晚饭的菜汤也变成了咸菜。犯人们传说：以前伙食比现在好，政法学院学生夺权后，新上任的学生“公安部长”来这里参观，对这么“好”的伙食大为光火，从此伙食质量一落千丈。没想到没过多久，这位“学生部长”下了台，自己也来这里坐牢，尝到了如今的饭菜。

其实这只是崇尚因果报应编造的故事，可信度很低。第一，那个学生下台了，伙食却并没有因此改好；第二，这个监狱里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吃一样的饭菜——经常看到有穿白大褂的工人，手拎提盒往楼下特殊牢房每日三次的送饭，据说这种特殊的单人牢房里关着高干。因果报应不足为信，等级差别可是实实在在。即使都是阶级敌人，也要分成三六九等，这是当时中国的国情！

晚饭后又是一次“放茅”，和早上不同的是，没有了洗脸刷牙的程序。如果哪位犯人有晚上洗脸、刷牙的习惯，对不

起,只好改。

回来接着"斗私批修",到晚上9点睡觉。

每天,犯人们就是过着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我们这间牢房大部分是在"四清"运动中查出来的"四不清"的农村干部,最长的已经关押4年了。监狱里我还见到过一个大学生,是大饥饿年代关进来的。有没有比他时间更长的,我就不知道了。

虽然监规里明确规定"犯人之间不许串通案情",也随时存在着被人检举揭发的危险,可是,这泯灭不了人类互相交流的本性。

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悄悄去问身边的老孙头,才知道他是因为"瞒产私分"被关进来的。原来他是生产小队长,曾经没按国家规定的口粮标准,给社员多分了口粮,向上级少报了产量。"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被查出来,一直关到现在,有两三年了。因为是为大伙谋利,所以觉得特别冤,总希望有人来提审,好为自己辩解一下,可是从来没有人审过他。快60岁的人了,经常在睡不着的时候默默地流泪。

紧挨着他的,是一位四十多岁姓韩的三轮车工人。一看他1.85米的大个,能想象出以前一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这种人饭量都大,所以在这里比别人又多受几成罪。他是因为历史问题进来的——以前当过国民党的兵。如果当个普通一兵,顶多被群众专政,也不至于送进监狱,可他偏偏当的是机枪手。经红卫兵一推理,机枪手比普通士兵杀的解放军一定多,罪恶就大,于是在"文革"初期就被送到这里来审查。他进来快两年了,只被提审一次就再没人理会。由于饥饿,他总是愁眉不展。可是一提起吃来,立刻改掉了"学

习”发言时的口吃毛病，眉飞色舞起来——

“我们这些蹬三轮的，全得靠吃的顶着。你想，两包纸——一千多斤，再遇上顶风、上坡，吃的跟不上能行？中午，我们赶到永定门‘顺风’面馆打尖，一人一大海碗肉丁炸酱抻面。那碗，跟小脸盆那么大。先给你捞上大半碗面条——这面条是又白又细又劲道，嚼着都费劲。再给你盛一大勺流着油的肥肉丁炸酱，再给你撒上萝卜丝、萝卜缨、黄瓜丝、青豆、黄豆、青蒜末这些面码儿，已经是满满一大碗了。你用筷子一点儿一点儿地小心把它拌匀，再剥头大蒜，一瓣蒜一大口面，一瓣蒜一大口面，转眼之间，这一大海碗就吃完了——那个叫过瘾！”随着他连比画带说，我们都听呆了，下意识地直咽唾沫。他看还没把我们馋得神魂颠倒，又接着说：

“你们知道什么最好吃？有一年我给食品公司拉货，那儿处理过期奶粉。50斤一袋，才10块钱——跟白面一个价儿——可是不要粮票呀。我买了两袋，回家兑在白面里蒸馒头。蒸出来一瞧，嘿！那个香，那个白，那个暄，那个甜！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用奶粉蒸馒头，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无法验证他说的是真是假，只是想：好东西放在一起准错不了。在饿得眼花缭乱的时候，只要说到吃，都会往好的方面想。

有人终于不想再享受“精神会餐”了，给他泼冷水说：“可能就是因为你以前营养过剩了，现在才比别人饿得厉害。”老韩似是而非地点点头，又沉默了。他确实比别的人明显虚弱许多——每次吃完饭、饮完水，虚汗会把衬衣湿透。起先是脸、腿浮肿，后来站起来走路都打晃儿。

我被关进来两个多星期后，第一次被提审。从楼上下来拐几道弯，有一排平房，是审讯室。审讯我的人以前都见过，方法也一样——总有一个年长官大者，充当白脸，说话比较和气，用规劝口气说话；另几个年轻或派头小的，充当红脸，态度生硬、凶狠。一会儿这个问话，那个不说话；一会那个规劝，这个暂时回避。从上午9点多一直问到天黑，主要就是问一个问题：遇罗克知道不知道手榴弹的事。我当然一口咬定他不知道。

回到牢房，犯人们已经躺下睡觉。老穆和老孙小声说，我的饭菜都在碗里扣着放在暖气片上，以免冰凉。我打开一看，窝头和菜汤还有一丝热气，于是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

肚子不那么空虚了，人才又恢复了冥想情感的能力。我忽然被难友的关心所感动，坐在铺沿儿许久不动，泪水夺眶而出。老孙听见了我鼻塞的呼吸声，以为我为案情的事难过，安慰我说："别难过了，我们大家还为你高兴呢——才来两个星期就有人提审——我们盼都盼不来呢。快睡觉吧。"

他们哪里知道，这种提审无非是让我去陷害我的哥哥。我宁肯永远不被提审！

根据事物的"恶作剧规律"——你不希望的，它总来，你盼望的，总也实现不了——我相继又被提审两三次。着实令同一牢房的难友们大开眼界。这两三次提审一次比一次时间短。直到有一次，一个不那么老谋深算的审讯员急得对我说："你也太顽固了！我们不相信你说遇罗克不知道手榴弹的事。你敢不敢发誓，如果遇罗克知道有关手榴弹的事，就判你的死刑？"

他刚一说完，我本能地感觉得到了解脱：一、哥哥并未承

认他知道手榴弹的事；二、估计这个内容的审讯终于快到头了，顶多我发誓被判死刑就行了。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发了誓。

果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提审过，又回牢里过那种千篇一律的生活去了。但心情比以前轻松了许多。

说是千篇一律，但在平静之中也时不时地有一点涟漪。那就是自从我进入这间牢房不久，接长不短地有新犯人进来。其间也有被调出的，但出的没有进的多，所以褥子只能一叠再叠。

随着对我提审的结束，我开始收到家里送来的被褥和生活用品，从此我可以用肥皂、毛巾洗脸，可以刷牙，可以放心地使用手纸了(看守所发给的极少)。出狱后我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弟弟罗勉送来的。

大约七月份，我身边安排了一位姓徐的新犯人，五十多岁，知识分子模样。他似乎对监狱的伙食情有独钟，第一顿饭就吃得津津有味。他的文质彬彬和狼吞虎咽形成强烈反差，使我大惑不解。他凄凉地告诉我：

"我家里的伙食和这里没两样——穷啊！我是搞历史的，反右以后就没有了工作，'庄稼不成、买卖不会'，全家吃饭全靠我爱人四十多块工资，还有三个孩子。说实在的，我这么一进来，对家里倒是一个帮助，少一个吃闲饭的。我现在也内疚——我家里那么穷，可是我偏偏喜欢书，吃不上饭也买书。逮捕我那天，从我家搜出那么多书。我大女儿都吃惊了，埋怨我：'爸爸，咱们家穷成这样，你怎么还买这么多书呀！'就这件事我觉得对不起她们。"

所以，他从来不向家里要东西。他随身带来一条手帕，又

当毛巾又擦牙,晚上还当枕巾。我想送给他东西,他怕别人检举,给我带来麻烦,总是婉言谢绝。有几次我把他的手帕抢过来硬给他打上肥皂,他总是先环顾左右,看没人发觉后,连声说:"谢谢,谢谢。"

过了半个月左右,这时已是1968年7月了,我旁边又安排了一位姓沙的新犯人,六十多岁,又高又胖。说他是新犯人,也不太确切,他从1953年被教养起,一直是在专政机关度过的。

刚来那天,他穿了一双硬底的皮鞋、一身旧西服,踩着咯噔咯噔的点儿走进牢房。进屋后往铺沿儿上一坐,笔挺着腰板,微笑着看着大家。我们一时都猜不透他是什么来路,不知道是外国人还是大官儿,甚至幻想会沾了他的光能吃上饱饭。可是,一会儿就令我们大失所望——由于天热,他不得不脱去西服和皮鞋,看到他那补丁摞补丁的衬衣和袜子,我们就知道与老外、大官儿无缘了。

不过,他与外国还有点关系。解放初期,他和一些人本着建设新中国正好有用武之地的美好愿望,从美国撇妻舍子回到中国。如果他学的不是哲学与法律而是自然科学,兴许会飞黄腾达也未可知,不料他的专业正是中国最不需要的。于是1953年他又申请回美国与家人团聚。岂不知批准这种申请谈何容易?也绝不是他所在单位领导力所能及的。于是他找领导大吵,结果以辱骂领导罪被判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他以曾和周恩来在北洋军阀监狱里坐过牢为资本,坚持要回美国,结果又判了三年。直到来到半步桥,已是15年了。还好的是,他后来在那里也不用干活,待遇介于教养和就业之间,每月给几块钱零花钱。

出于我对自己将来前途的考虑，我特别关心教养和就业的生活情况，总是问这问那，他也从不厌烦地介绍那里的情况。

他安慰我说：

“你以后如果去教养，比我们那时好多了，你没赶上大饥饿的年代算你万幸！我能活下来就算不错了。幸亏我那时已按就业人员待遇，生活上比教养人员好多了。我们那时吃鸡蛋，都是带皮吃。有一次改善生活，给我们发了点鱼。我们吃完以后，一个刚来教养所的鲜族人问我们吃剩的鱼刺还要不要，我们说不要，他立刻把鱼刺塞进嘴里吃了。还有一年冬天，我们那里搬家，我走不动，队长让一个犯人用手推车拉着我和行李走几十里路，给他这大半天的‘口粮’就是一个水萝卜。”

我想起父亲当年就正在被教养，一定遭受了数不清的罪。在北郊和延庆服刑期间，我们家里人还千方百计给他送些吃的东西，后来他转到茶淀、兴凯湖，我们就不好见面了。父亲是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他从来不爱说这些令人辛酸的事。

老沙因为为人厚道，经常当作别人批判的对象。有一次在“学习”发言时，老沙讲了一段三人成虎的典故，立刻有人就批判他这是戈培尔“谎话重复多次就成为事实”的翻版，就是为法西斯翻案等等，气得老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还有一次，老沙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突然哭了起来，呜呜咽咽难受极了。看到这么大年龄的人居然像小孩一样，想必是伤心至极，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不料坐在对面通铺上一位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人说：“你别哭了！这里不许哭！你

这么委屈是不是对政府关押你心怀不满？你这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态度生硬严肃，确实令人讨厌。不过这招很灵，老沙马上就不哭了。

几天后，在一次斗私批修的"学习"会上，老沙终于抓住了那个人的某句话，也上纲上线地批判了他一顿。事后还得意地对我说："我最恨的就是他。"我劝他说，那个人也不一定有什么恶意，否则拿你去向看守汇报，说不定还能提拔他当学习号。老沙好像也同意了——不能用常人的表现来看待这里的人。

老沙肚子大，手摸不到脚。有一次喝开水剩下一些，他洗了洗脚，我帮他剪了剪脚趾甲，他感激得不行。在斗私批修会上，有人批评我说，监狱里不应讲尊老爱幼，这里的人不是同志是敌人，应该划清界限。我马上反驳说，老沙的个人卫生，能影响到公共卫生，我这么做不是帮他一个人，是为了大家更有利于改造。多亏我人缘不错，又常给大家念报，讲这讲那，别人有求必应，所以没谁再说什么了。

和老沙相处了不到一个月，我被调了号。这次是较大的调动，光我这间牢房就有我和另一个年轻的犯人一起调出。临走，我把一块新肥皂悄悄塞进老沙的行李里，他会意地向我点点头。

4. 转机

新的牢房是在"K字楼"里的另一层，两处的牢房却没有区别，规格大小一模一样。犯人都是从各间牢房里抽调来的，年轻人居多，最大的才四十多岁，东北人，木匠。

大家一到这里，都有一个共同的预感，似乎会有一个好的转机。互相一问案情，好像都不严重（当然也有不肯说的）。自然大家也随便了许多，"学习"时经常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聊天。从看守的举止上，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很少对我们严厉斥责，甚至换灯泡的时候敢到屋里坐一会儿说几句家长里短的话。

这间牢房才18个犯人，住得比原来宽松多了。更让人高兴的是，这17个人中有两个分别和哥哥住过同一间牢房。一位是个大学生，上海人，好像和哥哥接触不多，只介绍说哥哥学问深、乐观。另一个像工人模样的年轻人，和哥哥一起关押的时间较长。他说哥哥戴了很长时间的背铐，受了不少罪，可是非常坚强乐观。还说哥哥知道了我也被关进来，特别惦念我，经常提到我。我感到极大的欣慰！急忙追问他："他还说了什么了？""他说，假如我能见到你，替他嘱咐你，一定保重身体。"

有一天，终于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那时正值八月，天气热得出奇。监狱突然准许我们去浴室洗澡。

浴室在"K字楼"的旁边一排平房里，每队犯人去浴室都要经过我们牢房的窗下(距离也有七八十米)。于是每过一队犯人，我都要从窗户向下望去。如果是在原来的牢房，向窗外张望一眼都会有人制止，但这里随便得多，没有人去管闲事，只要提防着看守就行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两个多小时，我终于看见了哥哥。这时我不顾看守不看守，全身都趴向了窗户，只见哥哥依然是那么瘦弱，背微微有些驼，显得头有些后仰；还戴着那副白边眼镜，嘴角露着藐视一切的微笑，手里的毛巾晃来

晃去……没错,那就是哥哥!我贪婪地看着,好像这样就能把更多的光线收进眼里。直到他那个队伍走出了视野,我才坐回我的铺位。我放心了——我知道他精神很好。

调到新牢房才一个星期,管教(看守的头儿)忽然叫我出去,我跟他进了楼道把口的办公室。他严肃地说:“你说说违犯了哪条监规。”我矢口否认,他又提醒说:“你是不是给了别人东西?”我知道准是给老沙的肥皂露了馅,只好说:“我旁边的犯人不讲卫生,没肥皂,给了他一块。”

管教拿出我的肥皂交给了我,说:“一般我们是不会给你的,要没收。你那筒的管教说你平时表现很好,又看你是初犯,肥皂还退给你,以后注意吧 。”

原来有的人心极细,谁家送什么东西、哪个人手里有什么东西全都记在心里。我的肥皂是灯塔牌,只有市里的居民才供应这种品牌,结果老沙一使用,立即被人检举。那块肥皂连上面的字还没有磨掉。我真惋惜那个检举的人投错了胎,他不应该当犯人,应该当间谍。

尽管环境宽松了许多,饥饿并没有减轻。尤其是牢房里年轻人多,饭量比老年人大,饥饿感自然更敏感,所以“精神会餐”经常举行。谁在外边吃过什么好吃的,都会在这里炫耀一番。大家虽然吃不着,却听得津津有味,也许想着不久的将来就能吃到,所以应该先了解一下。

母亲是个美食家,年轻时做过品尝工作,又经常给我们做各种名目繁多的菜肴,所以我知道点儿菜名。于是我代表北京派,那个上海籍的大学生代表上海派,经常进行比赛。在大菜方面,我们不相上下,于是又比小吃。在小吃方面,我总是败下阵来。往往挖空心思还想不出一个新品种时,人家已

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串。甚至连巧克力这种洋玩意儿也能详细介绍它的做法。我只好甘拜下风。我这才知道,南方的食品比北方的要丰富得多。

我们这间牢房里有一个很少说话的人，像农民，又比农民白净和瘦弱，看不出实际年龄，估计有二十七八岁，神神秘秘。终于有一天，有个人告诉我，他的外号叫“屠户”，牢房里的人很少搭理他。原来他就是大兴县屠杀“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几个村中一个村的村干部。据说别的村一夜就把几十口人全杀了，他那个村却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先把真正的“五类分子”用棍棒打死，再把年轻的子女们关起来慢慢折磨。每天把这些青年男女们背剪着双手吊起来，熬死到一定数目再把他们放下来，第二天接着吊。一点点把这些人都折磨死为止。那些更小的小孩，也关进一间大屋里，每天扔给他们几个茄子吃，先留口气，等下一步就轮到折磨这些小孩了。这时陈伯达到他们村，让他们立刻放人，这批小孩才算保住了命。

听完这段叙述，我再看那个“屠户”时，已觉得他长得是青面獠牙，从此再没和他说过一句话。但是这种丧失人性的人，后来却得到了释放！

我估计我的结果，离不开劳改队或教养所。从那些“二进宫”的人那里了解到，木匠在那里吃香、好生存。恰巧同牢房的最年长者是位东北木匠，于是我拜他为师，开始了“纸上谈兵”式的“学徒”。

他很明白我的用意，先鼓励我，冒充木匠没问题，于是又不厌其详地告诉我锛、凿、斧、刨怎么使，怎么修，怎么制；一般家具怎么做。幸亏我的姥爷是木匠出身，后来虽然做大了，

盖出了北京第一座无立柱的剧场——长安大戏院，但依然对锛、凿、斧、刨怀念有加，以至于我的姥姥虽然不会干活，嘴里却经常念叨着这些工具。我从小是她带大的，耳濡目染，好像对木匠从小就不陌生。再经东北木匠指点，顿觉开窍。想不到后来插队真的干上了木工，后来到劳改队确实靠木工少受了许多罪。

九月末的一天，又一次大调号。我和各筒道抽调的一百来人，一起被调到"王八楼"里的一条筒道。军代表先召集这一百来人在筒道开会，问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一位刚摘下脚镣、年龄偏大、带眼镜的人艰难地站起来，有气无力地说："我好像看到了一点出路。"那时报纸上正大谈"给出路的政策"。军代表并未作答复，只是说明天就知道了，今天不关牢房的门，只要不出筒道，可以自由走动。

大家异常兴奋，终于可以随便聊天了，而且不管你跟谁。有人去找看守搭讪，看守们也一改常态，热情有加。

这一宿，许多人都没有睡着。

5. 学习班

第二天，三辆卡车把我们这些人拉到了北郊的北京市第一少管所。

原来，我们这些人是托毛泽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福，被送到这里参加第二期学习班的。第一期在三个月前到的这里，在我们来之前已全部释放回原单位。这无疑预示给我们美好的希望，但没有人告诉我们一定释放和哪天释放。（一个多月后，轻工业学院一位大学生从这里逃跑，被毫不留

情地抓了回来。)

这里还有一个"学习班",有五六十人,我们私下叫它"黑干学习班",成员都是被明确定为"黑帮"的子女,像刘少奇的女儿、贺龙的儿子等,已经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好像还没有释放的意思。

这里的物质条件比半步桥好多了。不仅吃得好(和大学食堂差不多)、吃得饱、床铺宽敞,还给困难的学员发毛巾、牙具、衣服。可以到医务室看病,经常组织文体活动。不变的是,每天都要用大部分时间进行"斗私批修"的"学习"活动。

学员绝大部分是学生,大学生占多数,只有很少的人是工人或教师。学员中男生又占绝大多数,女生只有六名。共分成五个组,有四五个军代表是领导。前几个组大学生较多,年龄段整齐。我们组有年龄最大的——大饥饿年代关进来的姓杨的"老"大学生,也有年龄最小的——写了一句"反动口号"的初中学生。四个高中生,十来个大学生。第五组中学生较多,大学生较少。

老杨在半步桥已经住了七八年了,临来这里的前一天才卸掉脚镣——戴脚镣是对死不认罪犯人的一种惩罚。我问他的案由,他总是说"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把我关起来"。对他的过去,他总是讳莫如深。只知道他是1960年左右人民大学的代培生。他曾对我深情地回忆起学校附近有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大妈,让他到家里去看书、做功课。老大妈最爱喝粥,每次学校食堂卖粥,他都要把自己那一份匀出半碗给老大妈送去。后来他突然被逮捕,也不知道这位老大妈现在怎样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5·16"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

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为了得到较好的营养和治疗,他假装承认自己做错了,军代表十分高兴,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待他身体稍有好转,立刻声明,承认错误是为了活命的权宜之计,坚决不承认以前有什么错。前期学习班释放了张建旗以下的几个"5·16"头目,军代表又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请回来,劝张认错,张把他们痛骂一顿还是不认错。后来虽然他也被释放了,可惜听说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同样也忘不了一位"人大"学生,在"斗私批修"中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自己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灵魂,总是谁势力大就跟谁走,总是充当打手角色,按他们当地话,叫这种人为"驴狗子"。讲得很生动,骂自己也毫不留情,军代表特意让他在大会上讲演对自己的批判。

不料没多久,学习班里一男一女两位大学生,据说密谋组织"反革命集团"。军代表召开全体大会对他们进行批判,同时宣布逮捕,重新入狱。这位女生在会上突然说,一切活动那个男生都不知道,全由她负责。这个大学生立刻用块脏抹布塞进那个女生嘴里,对她还又踢又打,再一次当了"驴狗子"——可见人的秉性有多难改。那位女生(外语学院的)后来听说被判了死刑。

有时我常想,人很像鸡。你看农贸市场里的鸡,眼看着笼子里的同伴一只只地被捉出去,在自己面前被宰杀了,它还在那里若无其事地啄食。

可是,你能怪鸡么?

元旦快到了,军代表们要求各组编排文艺节目。别的组年龄段相近,人员整齐,纷纷组织合唱、朗诵、舞蹈等节目。我

们组有男有女(只一位),有老有少,高矮胖瘦反差极大。如果整体上场表演合唱,没等唱就会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于是我结合这些人的特点,编了一台独幕话剧——《过年》。虽然剧情还离不开当时的俗套子,总算把这些人都用上了。我当仁不让地成了男主角,那个惟一的女生(翁如澜小姐)是女主角。不料,刚演了几场预演就出了岔。

翁小姐是中央美院的高材生,叶浅予的弟子。"文革"时以画"群丑图"闻名天下。不料,"群丑图"中的人物一个个相继解放,她的日子也就日益难过。后因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罪将她逮捕。她碰巧和我分到一组,更碰巧又和我分成同桌。

翁小姐不仅画画得好,针线活也堪称一流。她见我的外衣已近于褴褛,用几个业余时间缝补得改旧如新。因为是同桌,常在一起执行打水、打饭等值日工作。时间一长,发现共同爱好很多,逐渐变得无话不谈。

一天,同室一位同学,气愤地告诉我隔壁一个"联动"分子,炫耀他抄家打人时的一件流氓行为:他们垂涎一对华侨夫妇如花似玉的女儿,就借故到华侨家"破四旧"。先用皮带将华侨夫妇抽了个半死,又当着他们的面去抽他们的女儿,直到把衣服抽开抽破,展露裸体为止。由此又勾起了我对"文革"初血腥暴行的愤恨,久久不能平静。

晚间"学习"时,我忍不住问翁小姐对"文革"暴行的看法,她也有相当多的感受。会上不能交头接耳,于是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了不少痛恨暴行的话。

没想到×军代表正利用夜色的掩护,在窗外观察我们的动静,把我俩的小动作看得一清二楚。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突然跳到我的跟前,大喝一声:"把东西拿出来!"

按他“朴素”的感情想，一定以为我们在传递什么定情的信物，所以没有急于立刻动手来抢，只等我乖乖地交出来。不料我趁他不着急之时，偷偷在课桌内将字纸撕得粉碎。前边说的那个“驴狗子”听到动静，早已从别的屋跑到我们小组，急忙向军代表汇报：“他把纸撕了！”

×军代表这时才知道晚了一步，忙命令来人把我拉走，让众人全力以赴拼回字纸原貌。同时宣布我与翁小姐受“反省”处理。

几天后，那张字纸无论如何也没能恢复原貌。×军代表对我的反抗行为却耿耿于怀。既然“反省”了，不能再参加演出。可是少管所职工干部认为那个话剧不可多得，非让一遍又一遍演不可，于是男主角换人。女主角一时找不到可换的人选，翁小姐又没有公开对抗，所以还让她担任。

这时，社会上的上山下乡工作已进入后期，如果我此时不回学校就没有山乡可上下了。1969年1月初，65中工宣队的人乘一辆吉普车将我接回学校。临走前，军代表的负责人让我给哥哥写封信，劝他“好好改造”，也“争取宽大释放”。×军代表也不再对我板着面孔，诡秘地对我说：“你这么小怎么就想搞对象呢？”我急得涨红了脸，分辨说：“我只把她看成是大姐姐……”“别说了，女的大了更知道疼人，嘻嘻。”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由他去想吧，总算比发现纸上的内容结果好。

改革开放后，翁小姐去了美国。

6. 出狱后知道的

我被拘留的同时，母亲和弟弟罗勉也同时被关进工厂和学校去被“群众专政”。

母亲已经是第二次被工厂关押了。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破四旧”、“揪走资派”时，身为摘帽右派的母亲当然难逃劫难——被剃成阴阳头，衣服上缝块显眼的白布，上书“右派分子王秋林”。

本来每天陪“黑帮”们挨斗，下班可以回家。但是应了民间一句俗语——黄鼠狼单咬病鸭子。有一天，母亲在写每天的例行“认罪交待材料”时，把结尾的专用语“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无”字漏掉了。没有“无”字，无非是语句不通，谈不上对毛泽东有什么不敬。“红卫兵”可不这么看，没有“无”，就是“有”，意思就相反，就是这句口号的反意，于是罪加一等，关押了好几个星期。

一天的下午三点多钟，母亲被释放回家，她用自己编织的贝雷帽遮住了半个光头，在胡同口脱下了缝着布牌的外衣，一进院子就招呼说：“罗文、罗勉，快，把衣柜腾出来。”

我们看到母亲回家，非常高兴。但是，又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要腾空衣柜呢？”母亲爽朗地说：“孩子，咱们把它卖啦。一会儿就来人拉。”

变卖东西，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从1957年以后，父亲被送去劳动教养，一点收入也没有。母亲也成了“右派”，受到降薪降职处分。七口之家只靠她70元的工资。要供我们四个孩子上学，还要度过三年大饥饿的年代，不卖东西怎么活？卖到

"文革"期间，值点钱的东西早没了，红卫兵抄家又洗劫了一次，可变卖的东西所剩无几。

母亲拿到从信托公司得到的衣柜钱，立刻到街上买些议价（定量供应以外的）鱼肉，一来庆祝家人团聚，二来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她的口头禅是："吃进肚里，才真是你的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才刚过去一年多，母亲又受子女牵连第二次被专政。她好像已经习惯了，随看押的人到家匆匆拿走一些日常用品，急急忙忙又走了，一点也不知道这次要关多久，是否还能回到这个温暖、和睦而又残缺的家。

幸亏父亲在不久前，经一位教养难友（戴叔叔，也是右派）介绍，到营口一家工厂当临时工，侥幸躲过了对他的专政。

弟弟当时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关押他的理由，除了是遇罗克的弟弟、参与过《中学文革报》的活动以外，还因为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怀疑过"真理也有阶级性"这个口号。

罗勉一被关进学校，除了让他交待为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做了什么事，也接着批判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他同班的好友王嘉材，也因为参加了我们《中学文革报》的工作被学校关押21天。

两个月后，罗勉被释放回家。

两个月无人光顾的屋里，还是临走时被搜查过的凌乱不堪样子，桌椅上已积了厚厚的尘土，存放的米面也生了虫。父亲自从去营口做工一直不敢回来。

罗勉先去看望母亲，看见她还是被剃着阴阳头，身上穿

着缝着布牌的衣服，认认真真地打扫工厂卫生。见到罗勉异常高兴，尽量装做平静地说："我这里还好，也许不久就能回家，你还是给你哥哥们送些东西，再看看你姐姐吧。"

弟弟为我和哥哥打了两包行李，送到了半步桥，又把家中仅存的几斤白面，捡出里边的虫，做成一袋炒面，放入一点糖精，准备去茶淀农场看望被教养的姐姐。翻遍了各个角落，只找到两元钱，而到茶淀的火车票还要两元多。幸亏有大串联的经验，买了张站台票就上路了。

为了防止犯人逃跑，劳改或教养农场都远离车站。弟弟为了省钱，走了十几里才到。管教干部一看炒面，批评弟弟说："就知道享受！别学你姐姐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加强思想改造。"弟弟说尽了好话，又看在年幼的份儿上，总算答应收下了炒面。

姐姐被叫出来，事先她接到了弟弟的信，有了思想准备，见到弟弟之前眼圈早已红了，但是她不能让眼泪掉下来，否则队长会呵斥甚至中止会见——"你哭？你觉得委屈啊？你说你'接受改造'原来全是假的呀！"她要装做高兴——像过节那么高兴，要拉着弟弟的手欢蹦乱跳，感染得他也不能让眼泪掉下来。让他明白必须装笑、装轻松，才能让旁边监视的队长放松注意力，才能说上只言片语的心里话。更重要的，是一个小纸条，写着密密麻麻小小的字，全是她对哥哥的关心和思念——在这里仅有的一次"外调"，她是怎样驳斥的。她希望能设法转告哥哥，尽管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在她拉住弟弟的手的时候，就势塞给了他。

相见只允许十几分钟，他们想要说的话是那么多！"爸爸、妈妈都好吗……姥姥呢，她的气喘怎么样了……学校对

你们……"惟独对她最担心的哥哥，却只字不能提！

十几分钟飞快地过去了。在分手时，她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这可爱的小弟弟——她从小最爱的、从来未和他吵过嘴、打过架的弟弟；她曾把他写进小学作文里，做为全班范文贴在墙报上整整一学期的小弟弟；这小姑娘般、腼腆、可爱、温柔、懂事、听话的小弟弟。当两个人都站起来，即将道"再见"的最后半分、几秒钟里，她抱住了他，哭了——连声音都没有出，只是刷刷地流泪，弟弟也只能这样……不得不分手了，姐姐一步一回头、招着手，直到进入教养院的大木头门，弟弟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盯着她，流泪摇着手……

弟弟当天没有走，就等着第二天还能相见的一次机会。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已来到路边。等呀等，终于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走过来。一队队的人流在凌晨黝黑的天幕下无声地走过去，只听到踢踢踏踏连成一片的脚步声和队长们的吆喝声。突然，他在一个队伍中发现了扛着锹的姐姐，他招手，姐姐也看见了他。

他哭了，她也哭了。

队伍很快过去了，姐姐也随着人流一步没停地走了。走了很远，他还看见姐姐在用袖口擦眼泪……姐姐通过模糊的泪眼时不时地回头望着他，直到他的人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到了工地，她仍频频引颈张望——那绵延的土坝上，不是他么？他，变得只有火柴盒大小了，还在那儿一只手臂高举，向天招手。他明明分不清人群中哪个是姐姐，却知道这样做姐姐能看见他。姐姐再也忍不住，任凭眼泪直淌，跑到一个高土包上，也向他高高地招着手臂。

也许他看见了,因为他好半天没有走。

监工的队长装看不见。几个一块干活的女"教养分子"们,有两个,泪水也出来了,不住地擦;另外的几个,眼皮全红了,忍着不哭……

到车站的这十几里,弟弟是哭着走回去的。

弟弟回到北京,手里没有钱,又怕有人去家里捣乱,没敢回家,投奔到母亲开工厂时雇佣的三轮车工人——王叔叔的家。在那里受到很好的照顾,一直到母亲被释放回家。

7. 火中涅槃

罗克一共被提审八十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据一位难友说:他本人就经历过这种审讯,好几天不让你合眼,一打盹就用锥子扎。至于罗克是否也受过这种刑罚,我们不得而知。从他对难友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这种审讯是轻蔑的。

有一次受审回来,罗克竟偷回一只象棋子,一看,是个蓝色的炮。牢房里有人断言说不是好兆。罗克不以为然,他纯粹是为了寻开心。

罗克在这八十多次审讯中,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他得知我也被关进监狱时,更是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我得到解脱。

他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

"我想,假若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

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罗克在审讯中，仍然同封建法西斯专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罗克说："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他说："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

"你为什么攻击江青同志？"

"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

预审员气得大骂："混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罗克在书面材料中写道："我过去就认为 1959 年到 1963 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

他还在审讯中说："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

有一次在审讯中，审讯人员恐吓道："遇罗克，你顽固透顶，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两分钟考虑后果！"审讯人员和记录人员都出去了，屋里只剩罗克一个人。两分钟后，忽拉拉涌进十几个人，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遇罗克，你考虑好了吗？"

罗克平静地说："请让我家里送一支牙膏来。"

由于疯狂地镇压，监狱里的人多得出奇。一间 12 平方米的牢房，要关二十多人。狱中的伙食极差，每天两顿饭，每顿

千篇一律的两个窝头，一碗没有一点油的白菜汤，有时汤换成一块咸菜。每月能吃上一次全麦馒头。每天定量将近九两，所以饥饿是最长而重的刑罚。每当吃饭时，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拿个大的窝头，分汤也如是，谁都想得到菜多的。罗克却始终对难友表示谦让，从来不去争抢。

每天只有两次"放茅"（到厕所解手），而每次时间又极短，大便干燥的往往不等结束就被撵走了，这样就得回到牢房往尿桶解大便。二十来人的房间，空气已经污浊不堪，所以大家对往尿桶里大便的人非常反感。因此，每当牢房的门一开，大家像跑一样去占很少的几个茅坑，以便能多蹲一会儿。而罗克从来不去抢这个先儿。

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张朗朗）很佩服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

"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我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会影响这么大，全国各地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来信，常使我读着流泪。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着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一死。"

他对同狱中的一个中学生说："坚持真理，在任何时候都

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既然选定了自己的道路，我决不后悔，决不回头，无论前面等待的是什么样的危险，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罗克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有时也诙谐地向别的难友们说：“来世再见。”但他对生活还是充满信心的，对同伴充满爱。

每当有新“犯人”进入牢房，罗克总是把自己狱中的生活经验教给他。比如怎么样可以把被褥叠成个沙发样，这样成年累月坐下去才不会难受。戴上镣铐（尤其是背铐），怎么睡觉才能睡着，等等。

有一个新入狱的华侨，仅仅因为没通过组织向海外亲友要点儿钱给孩子看病，就按“里通外国”罪抓进来。他苦恼极了，两天都不吃饭。要是平常，大家早就把剩下的分吃了。但是罗克说：“虽然咱们都饿，但是也不能吃他的。咱们必须把饭交出去，引起看守的重视，就能提前提审他，否则他饿坏了上边也不知道。”大家认为说得有理，就不再吃他的饭了。

更使人敬佩哥哥的，是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

1968年三四月份，社会上大兴批斗之风。监狱里趁机把那些不认“罪”的“犯人”也押出去批斗。说是“批斗”，其实就是受刑，每次回来，轻则鼻青脸肿，重则头破血流以至昏迷。被批斗的人惟一得到的好处，是中午额外给两个小窝头。但在拳打脚踢之后，很难吃得下去。那时罗克的牢房里，新来一位叫刘恩海的“犯人”，体格魁梧，饿得特别难受。罗克每次被斗回来，总把窝头带给他吃，有几次罗克被打得非常厉害，一进牢房就趴在行李上不想再动了。难友们都不吱声了，同情地看着这个常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文弱硬汉。但是他仍然没有

忘记艰难地从怀里掏出窝头送给刘恩海。每次刘恩海都要落泪，许多难友也被感动得哭了。

监狱中除了《毛泽东选集》外，什么书也不准看。罗克就根据自己的记忆，给大家讲故事、历史和诗词。甚至还演过一出戏，罗克唱阿庆嫂。他还向一位外语教员学习英语。这些都是监规绝对禁止的。

他教一些新入狱的人唱一首美国黑人歌曲，歌词是："在阴暗的小牢房，想起亲爱的老慈娘，不由得一阵阵悲伤。眼睛流着泪水，心中充满希望，放开喉咙跟着伙伴把歌唱，前进，前进，战士们前进，胜利属于我们。脸上充满阳光，心中充满希望，跟着伙伴上战场。"

他善于在困苦环境中保持乐观，振奋精神。一位难友回忆道："当犯人们'学习'得疲惫不堪，背语录背得头昏脑涨的时候，遇罗克会突然出奇制胜，说几句使人兴奋的话。比如有一次轮到他发言时，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这一下子，屋里的人都愣住了。几个积极分子马上就站起来争先恐后地对他猛烈抨击："什么，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蒋介石也存在，他合理吗？"

遇罗克一点也不着急，微笑着继续逗着别人的火儿："你们考虑考虑，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吗？"

等批判者的话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他忽然作"正色"状，说："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论述过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述过这句话的合理性。）

看着那些积极分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似地笑了起来。开这种玩笑，可真得有胆！

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小偷，横行霸道的杀人犯，一听说他是遇罗克，马上都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是第一个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污辱、被损害的“贱民”作公开辩护的人！

有的看守缺少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越是夏天温度高，越是借口没有水，不让“犯人”刷尿桶、洗脸、开窗户。罗克想尽办法和他们斗争，结果被他们找个借口给戴上了背铐。

手铐在失去人性的人手里成了任意使用的刑具。狱卒动辄可以给一个人戴上，尤其是那些不爱交待问题的“顽固分子”。

最厉害的是背铐，不仅给生活带来不便，也使人无法安睡，痛苦异常。这时全靠好心的同伴细心照顾：吃饭、帮助解手，省下喝的开水帮助烫烫发肿的双手，把褥子中间叠出个坑，以便压不着手。而有时，看守专门注意有谁帮助这个倒霉的人，谁帮助他也同样会遭到惩罚。帮助罗克的不乏其人，因为许多人都受到过他的帮助。

1969 年 10 月，鉴于形势紧张，罗克和许多“要犯”都被押往河北、山西各县城看守所。据说罗克被关在河北某县。那里的伙食比北京更差，量更少，从北京去的人因为无法收到家属送去的生活用品，只好再省一点食物去换生活用品。

1970 年 1 月，突然有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到他所在的看守所。表面上对他说有一线希望，把他押回北京。刚一进半步桥，他就被一脚踢倒，戴上镣铐，关进了死刑号。有个看守自言自语地说：“赶上第六批了。”（指必死无疑）

死刑号都是每人一间牢房，暖气片挂在高处，用海绵包住。如果不是拉出去批判，从来不放犯人出屋，屋内有抽水马桶。犯人每天只能在一角蹲坐着，用锁锁住，动弹不得。看守也极严，这一批有几个年轻人急疯了。当然也有没经验的人以为快被释放了，因为看守不时说些假话骗他们："老实接受批判，快回家了。"

有时每天都要轮回地到各处受批判。每次带出去就像扔木头一样，把他们扔上汽车，被当兵的踩在脚下，用刺刀扎住后背。每个人还要在脖子上戴一个钢制器械，如果在现场喊叫，只消在后面一勒，即可休克。批斗时一名警察踩住脚镣、两名警察把住胳膊，惟恐挣扎。

脚镣上粗糙不平，铁圈上的毛刺把脚脖子刮得血淋淋的。回到牢房用布缠上，看守见到也要扯下，他们不认为这些人还算是人！

任何人也不愿含冤死去。罗克在法庭上提出："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这个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1970 年 2 月，全市对 19 名"犯人""讨论"处理办法。其中就有罗克的名字。但在处决那天，奇怪地取消了他的名字。至今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被送回死刑号的时候，又送进一批新的要被处死的人，但他们未必知道自己的命运。为了通知难友，做好牺牲的思想准备，他用嘲弄的腔调向看守大声喊着："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十几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我想跟军代表谈谈。"

1970 年 3 月 5 日，罗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一、书写了 10 万

字的反动文章；二、在狱中气焰嚣张；三、扬言阴谋暗杀。当罗克知道自己会被杀害时，拜托难友李考良，将来替他看望亲属，还说："我最惦念的就是姥姥和弟弟。"因为那时操劳一生，把我们从小带大的姥姥已经快 70 岁了，他怕她听到噩耗经受不住刺激

在哥哥的遗物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自1957 年家境一直贫寒，罗克从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后，把每月工资都交给母亲。有时母亲给他五元零用，他也只要三元，而这三元钱常常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背心实在太破烂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买好的背心给他时，他已知道要被判处死刑了。他想，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穿吧。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为了安慰母亲，鼓励弟弟、妹妹和朋友，他还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两首诗。

七绝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五　律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
义士惊庸世，奇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
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被处决之前，哥哥和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宿，互相也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五、上山下乡(上)

1. 释放回家

1969年初,"老三届"已剩下的不多——有的已经去了云南、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有的去了山西、内蒙古、陕西插队;还有的通过自己的门路,零零星星地到河北、河南、江苏、江西等地插队落户。正在组织的,是第二批去陕北插队。

从学习班到了学校,工宣队做我的思想工作——必须响应号召去农村插队落户。最好还是别犹豫快点儿报名去陕北,以后只能去更苦的山西,再往后只能越来越苦,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可不,根据这几次上级安排的地方看,真是一次比一次差。看到我痛快地答应了,就送我回了家。

这时我的家,已从东四迁到三里屯,由原来宽敞明亮的三间大北房,变成了与人合住的单元楼,我家住一大一小两间,邻居住一大间。

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母和姥姥。

父母都老了许多,笑容中充满苦涩。而姥姥已近于痴呆,只会看着我一个劲儿地笑。以前我被关押期间,他们托人四处打听,知道我将被判三年徒刑,哥哥五年。而且他们十分清楚,无论三年还是五年,哪怕一年,也永远没有回到北京的可

能。因为北京是首都,为了保护首都的安全,刑满释放人员必须留在劳改农场就业。待遇比劳改犯差不了多少，只是多挣一点儿钱和每年可探亲一次。看到我没事人儿似地回到家，简直是喜从天降。尤其看到我精神状态还和原来一样，身体状况也非常好，更是惊喜异常。我暗自庆幸多亏在少管所呆了三个多月,如果直接从监狱出来,准会让他们伤心不已。

父亲是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见了我就急于把一年来家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时不时眼里噙满泪花。母亲还是那么爽朗,拿起菜篮子对我们说:“你们爷儿俩先聊着,我去买点儿羊肉,咱们今天吃涮羊肉——庆祝庆祝。”

母亲曾在解放前的“建设总署”伙房里搞品尝,所以既爱吃,又会做,以至影响到我们子女也把“吃”看做一件大事。无论逢年过节、生日嫁娶,还是稀客临门,最重要的仪式就是吃一顿好的——打打牙祭。

1957 年“反右”前,我家有好几只铜火锅,那时候原材料好买,母亲又喜欢做菜和应酬往来。记得有一年,姥姥六十大寿,许多亲戚朋友前来祝贺,光吃饭的人就有 54 口,我家都应付得了。“反右”后,估计再也不会有这种场面,1958 年捐铜,我家的几只火锅也为制枪制炮做了贡献。紧接着是大饥饿年代,享受涮羊肉的美味与平民百姓几乎无缘,火锅自然也用不着。直到后来肉类多些了，可以吃涮羊肉了，我家就因陋就简,在炉火上坐一只铝锅,一家人围坐在炉旁就餐。倒更显得其乐融融,只是小孩皮肤细嫩,烤得有点难受。

父亲在家早已把菜刀磨得飞快,等肉一到家,他就迫不及待的一片一片地切。他为了切得薄,是那样地认真,上身都快伏到案上,肥大的棉袄已掩饰不住微微的驼背。

听母亲讲，父亲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出去扫大街，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扫大街是义务的，这是对"黑五类分子"的劳动改造。原来负责扫街的临时工现在脱了产，变成了监工。下午两三点，父亲要去接受街道干部或派出所警察的训话——经常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警察，面对几个年龄比他大几倍的老人，吆五吆六地胡说八道。这些老人们还必须用立正姿势站成一排，头要低下，认认真真地听。谁要是稍一走神，脚面上难免会突然挨上一皮鞋。三里屯这一带靠近使馆区，对"黑五类"们管得特别严。幸亏父亲是个极有涵养的人——家里人要是冤枉他，他从不反驳，只是一笑了之——否则一定得气出癌症。

好在母亲这时的处境还好些，母亲虽然没被解放，仍然在"阶级敌人"之列，无奈"阶级敌人"越来越多，层出不穷。中国人历来又有喜新厌旧和勇往直前的传统，所以对这些早已被打倒的敌人失去了兴趣，主要精力已放在新的敌人身上，母亲自然轻松许多。只是她留日的财商专业尚得不到发挥，整天与笤帚簸箕为伍。

因为人少，只有姥姥、父母和我四口人，这次吃涮羊肉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欢乐。弟弟已在两个月前去陕北插队，哥哥、姐姐还在忍饥挨饿、没有自由，我吃得没有一点滋味。母亲忙这忙那"顾不上"吃，姥姥和父亲也陪坐在炉旁不动筷子，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劝我："孩子，快吃，要不就凉了，这主要是为你做的。"弄得我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可是看到几位老人那期待的样子，我就像完成任务似地吃着。

本来，刚从监狱出来，已经馋得不行，可是看他们这样为晚辈操劳，我连滋味都顾不得想了，只是机械地嚼着。后来我

才知道,此时京城肉类还要凭票供应,幸好我胃口不佳,否则这一个月的肉量不够我一个人吃的。

这时候父母告诉我,弟弟罗勉分配在陕北延安县插队落户,给家里寄来过几封信。从信里得知,他被分配在枣园公社侯家沟大队三小队,纯粹是山沟,没有一点儿平地。还好,生产队看他体质瘦弱,知道他也干不了累活,照顾他,让他跟着牛倌放牛。但是工分比别人低些。如果年成好,估计一年能分到三四十元。这点儿钱别说将来成家、赡养老人了,每年回家看看的路费都不够。更吓人的是,那里还流行"克山病",当地人称"大骨节病"。只要得上,关节变大,走路一瘸一拐的,丧失了劳动力,寿命也很短。而且这种病的病因还没有找到,所以既不能防也无法治。

我知道,我面临的也是这种情况,惟一的希望是创造奇迹。

母亲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对我说:"罗文,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孩子,什么事都能承受得了。"直到看我点头了,才又下决心说,"自从你进去以后,羽晴没来过咱们家。《中学文革报》的别的同学都来过,我估计她可能不会理你了。"母亲看我有些发呆,急忙解释说,"咱们家这个样,不怪人家孩子。可能还是咱们自己做得不好,以前冷落了人家,不明白你的真情实意。"

确实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多少次在梦中见到她,醒来后我还幻想着见到羽晴的情景,相信她一定热烈得让我透不过气来……难道这真的全成了泡影?我那一年前的羽晴哪儿去了?我伤心极了。可是,我看到父母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盯着我,连忙装做没事人儿似地说:"没关系,人各有志。再说我也

觉得搞对象还太早。”

父母看我没有太大的反应，也放心了，直说：“想得开就好，想得开就好。”

听父母说，《中学文革报》的同学当中，只有小玲一个人没去农村，还坚持泡在北京。小玲是北京女五中68届高中生，生性活泼，一副机灵的笑眼、肉嘟嘟的总是带笑的双唇——一个招人喜爱的姑娘，又是在《中学文革报》坚持到最后的“铁杆”派。1967年9月，我们一起去过东北“串联”，又和我一起到“樱桃沟花园”埋藏过手榴弹。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小玲家。这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以前是她家的私房，“文革”初又挤进来几家邻居，小玲家只剩下北房。这时正是大家上班的时候，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

我不知道小玲的父母是否欢迎我这个“危险人物”，不敢呼喊她的名字，只好站在院子当中向里面张望。只见明亮的玻璃窗后面，是小玲麻利的身影——她正在做家务。不一会儿，她发现了我，没敢声张，急忙跑到门口，打开门向我招手。我会意地急忙闪身进去，她才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说：“怎么会是你？”不由得眼泪已经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我安慰她说：“哭什么，我不是很好么？应该高兴才对，小东西！”我知道，公安局发现她和我们一起埋藏过手榴弹，一定让她吃了不少苦。尤其她是个不会检举别人的人。

不一会儿，她又恢复了本来面目，破涕为笑了。这时，我听收音机里还播放着样板戏，转个话题说：“怎么还听这个，不腻歪？”

“谁有心思真的听啊，整天一个人在家，太闷得慌，打开

收音机就像有个小人儿在和你说话,还好一点儿。”她马上把它关了。

从她那里我知道了每一个要好的同学分配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户口还没迁走的,除了她,只有菁菁(也是女5中的,67届高中生)。但是她也躲到山西,找插队的同学去了。她说,现在学校鼓励男女生成双成对一起插队,以便能安心落户。如果我愿意,她能帮我和菁菁联系。

我知道菁菁是独生女,只有母亲相依为命,耗到现在没迁户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人家能愿意吗?

小玲看我有些犹豫,又介绍说:“我们大家都说,菁菁耗这么晚不去插队,就是在等你!你可别辜负了人家一片好心呀!你到哪儿找这么痴情的人去?”好像她非要当一次“红娘”不可,直说得我臊成了大红脸。

才过两天,菁菁已从山西襄汾赶回了北京。刚下火车,手里还拎着手提包就到了我家。见到我,她笑得脸上绽开了花,明亮的大眼睛含满了泪水。她迫不及待地向我和父母讲述着一路的艰辛:“我一接到电报就连夜出发了。要搭卡车走上百里的山路,车坏了好几回,天快亮了才赶到火车站。”最后她羞涩地悄悄告诉我,同学笑话她:“一听说遇罗文回来,看把你急的!”

每逢同学来家,母亲总是热情款待,这次更不能例外。她埋怨我:“还不让人家姑娘放下东西先歇一会儿,大老远来的。”又对菁菁说:“你们先聊着,我去做点儿好吃的。”

我们决定一起去插队。

这个阶段北京各学校分配的地方还是陕北,我所在的65中已经没有名额了,想去弟弟那里也不可能。她们女5中正组

织去甘泉县，离弟弟那里不过一百里，据说到那里以后还可以设法往一起调。小玲这时也动了心，也想和我们一起走，她实在有点儿招架不住三天两头的动员，她父母所在的工厂已经给老两口办了好几期“学习班”了，想躲又无处可去。如果四个人能在一起互相照顾也不错。

事情办得很顺利——65中同意我跟女5中走，女5中也巴不得又动员走了一个人。才一两天的工夫，手续全办好了，就等着小玲了。

不料小玲忽然哭丧着脸找到我们，告诉我们，她母亲无论如何也不让她走，舍不得也不放心家里这个惟一的女孩儿去农村受罪。说着说着就委屈得哭了。我们劝她：“不走也好，咱们这些同学有谁回北京，也需要有个人接应和联系。”

1969年2月9日，眼看要到春节了，也正是我们该动身的日子。起程那天，我和菁菁都没让自己的家长去送行，怕他们难过。只有小玲陪我们到火车站。

站台上早已是人山人海，送行的人要比车上的多出几倍。我们按车厢位置很快找到自己学校的工宣队，接过车票，听他们最后的嘱咐。

我校一位叫亚男的女同学，特意前来为我送行。尽管说话不多，但看得出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祝愿。“工宣队”连忙“教育”我说：“你看，同学一点儿也不歧视你，到陕北也一样，你就安心干吧。”

火车徐徐启动了。站台上送行的人们随着震耳的锣鼓点儿，早已经哭成一片。小玲受气氛的感染，刚才还有说有笑，此时也泣不成声了。车厢里的学生们原本强忍着的眼泪，随着车厢的晃动，全都哗哗地流了下来。

火车走动了，车下的人群也跟着一起走，有的抓住车窗不放，好像能让火车停住似的。火车越来越快了，车上的女生已经忍不住号啕大哭了。车下的人群跟不上火车的速度，站住不动了，越来越远了。车上的男生终于也顾不得男子汉的脸面，更大而响地号啕大哭起来。

整个车厢被哭声淹没了。

只有一个人没有哭，甚至没掉一滴眼泪，那就是我。

我环顾周围的同学，和我年龄相仿的几乎没有——全是些初中甚至更小的学生——大一点儿的，前几茬儿就走得差不多了。

我在想：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2. 初识陕北

火车经过西安走到铜川，就到了尽头。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四五百里山路，需要第二天乘坐卡车。

到达铜川，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从车厢走下来，又是震耳的锣鼓声。和北京不同的是，拥挤的站台上还有扭秧歌的农民，那是欢迎我们的仪式。一看就知道表演的人不懂艺术。从满是皱纹、黑幼黑的脸上，知道他们的专业是种地。都穿着破旧的棉袄、肥大的单鞋，只有头上的白毛巾和腰间的红布新得扎眼。胳膊腿都伸不直，更没有夸张的动作，眼神呆滞愁苦。一点儿美感也没有，只是给我们添乱。所以大家扫了一眼就急忙找集合地点去了，没人停下来欣赏。

幸亏当时不知道，这个站台上的仪式，花了我们每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否则更要大倒胃口。

后来我们才知道，来插队的知青每人有240元“安家费”。铜川、县城和公社三次“欢迎”花去30元，其余210元交给生产队掌管。每月发给知青伙食费10元，发一年，共120元，剩下90元解决住房和农具问题，由生产队管着，不给个人。

我插队的地方是陕北甘泉县，收入与弟弟那里差不多。虽然守着洛河，河滩地较多，农民还是非常穷。富裕点儿的，都是铁匠、木匠、石匠这些手艺人。近些年不许个人搞副业，他们只能花过去的积蓄。

有点儿钱就活分多了，可以在秋天粮食便宜时偷偷买一些，春天粮价高了再偷偷卖掉。钱挣不了多少，因为谁也不敢大干，能对付着吃饱饭就行了。一般人家可没这福气，挨饿是免不了的。手里有点儿钱，先考虑买粮食，之后才能想着买布、棉花、盐。

每年发的布票、棉花票，先仅着干活的男人。天冷了，做一身新棉衣；春天，掏出棉花变成夹袄；夹袄穿破了，用里子补外面，到夏天成了单衣。再到秋天，上身早变成了坎肩，快没法穿了。

我们的带工队长栓牛，不到30岁，有四个小孩儿，一家六口只有一条棉被。有一次家里的母鸡几天不下蛋，换不成盐，他们只能几天吃淡的。

我们十个知青，六男四女，分到一个小队，我被安排在石队长家的一眼小窑洞里住，菁菁和另外三个女生住在一个饲养员家。

石队长才三十多岁，说他五十人也会信——满口牙剩不下一两个，大骨节病使他的腿永远伸不直，走路一瘸一拐，个

子不高,脸色总是那么苍白、浮肿,长年拉痢疾。

他有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叫桂子,十二三岁,最小的还在吃奶。老婆很健壮,据说是咸阳城里人,以前是纺织工人,因为出身不好,下放到农村,又嫁到这里。如果不是脸上总有厚厚的泥,一定是很白净、漂亮,我们叫她"队长婆姨"。队长有个老妈,看不出多大年纪,很少走出窑洞。

为了省布,队长婆姨把衣服裁减得特别合身。身体曲线倒是显出来了,只是让我们担心干活一使劲可别开绽。

队长家的棉被比栓牛家多,七口人也超不过三四条。偌大的窑洞生活用品极少,除了锅碗瓢盆,地下只有水缸、木头水桶、扁担等几件东西。最值钱的要数挂在缸沿上的黄铜马勺,已经磨得锃亮。队长说,他小时候就有了,不知道已传了几代。

家里没有桌子,连炕桌也没有,吃饭时摆在炕上一个长方的木盘。讲究人家木盘漆成红色,队长家的还是白茬本色,由于年头多了,油腻发黄。

家里看不到洗脸盆,也很少见到谁洗脸、洗脚。要是真需要洗脸的话,顶多用铜马勺舀点儿水,往脸上撩上一些,把头上的羊肚手巾抹下来一擦,就算完事。别小瞧这条毛巾,可是陕北人离不开的物品。除了擦脸,天凉系在头上当帽子,天热搭在头上挡太阳,顺便还能擦擦汗,晚上解下来当枕巾。

好在陕北的土颜色发白,脸和脚上有点儿泥也看不大出来,也许这样才养成了这种习惯。当地人也说笑话似的介绍:"一生就洗三次脸——出生、结婚、入殓。""一年不洗脚,洗脚过趟河。"有文化的和好美的中学生,当然就好多了。

陕北也搞"阶级斗争",我们进村的那天,还特意召开了

斗争大会，把全大队的“阶级敌人”都展示给我们看，在他们的黑棉袄上缝着说明身份的白布牌。

“阶级敌人”中地主、富农不多，多数是“叛徒”。原来这些人都是二三十年代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1947年胡宗南带领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时，有一项政策：凡是自首的共产党员，一律既往不咎。这些自首的如今就成了“叛徒”，带上“坏分子”帽子。交出过大刀、长矛、土枪的，“罪恶”更大。

陕北人到底善良得多——没见再斗争过第二回；没几天，也没有人再戴那刺眼的白布牌；我们接近他们，也没人管。除了那些傻呵呵的爱讲“阶级斗争”的知青，我们倒更爱接近这些“阶级敌人”，因为他们往往知识多，对人也更热情。

刚一安顿下来，我急忙给弟弟去了信。没几天，他就赶来看我，一见面，我们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引起周围的人惊讶地望着我们。

他们哪里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年幼的他又是多么艰难地维系一个残破的家。

童年，他是我最好的玩伴，经常跟着我跑遍大半个北京城去寻找幻想中的乐园，回到家累得顾不上吃饭就睡着了；和小伙伴的“战斗”游戏中，他永远是我的得力助手；我侃侃而谈时，他永远是忠实的听众。“文革”时，他更和我形影不离，我们一起看大字报，听辩论会，有时一宿一宿的不回家；一起大串联，挤火车，分吃同一碗炒面；一起编写、油印反对“血统论”的文章，后来收到哥哥的《出身论》原文，又一起刻蜡版，印刷，偷偷张贴，散发；一起办《中学文革报》，卖报纸，参加辩论，受围攻。哥哥被捕后，暴徒们三天两头地来我家捣乱，我们一起到处躲避，担心着明天还能不能见面……监狱

的大墙终于把我们整整分开了一年，我还从来没和他分别过这么长时间。

弟弟还用他仅有的那点儿生活费，给我买了几件木工工具，这是我认为最珍贵的礼物。在陕北那个穷地方，谁有工具谁就是木匠。从此我就可以以木匠自居。相信不会太久，我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木匠师傅”，能够实现我走南闯北的愿望了。

3. 当木匠

弟弟只住了几天。想和我调到一起，才知道牵扯到安家费等许多问题，不那么简单，只能以后再办。他走了之后，我赶紧把木工工具整理出来。

生产队长看见我有了工具，十分高兴。因为几十户人家的一个生产小队，一个木匠也没有；拥有七个小队的大队，也只有一两个木匠。小队里本身就攒了不少活等着做；以后公社要民工，一个木匠顶两三个壮工；附近单位用木匠，还能给队里挣些现金。

高兴之余，他把生产队仅存的木工工具——一把锛子，借给我用。我听姥姥说过，锛子最难用，非真功夫不行，弄不好会刨到脚或腿上，伤准轻不了。怕露怯，我连忙说，城里人很少用原木，都是成材，用不着锛子，所以我使不好。他直说，不要紧，慢慢就会用了。

第二天，石队长就安排我开始做木匠活。队里最需要的是桌子，栓牛每天记工、会计算帐都要用。

首先要有木料。这好解决——这里人懂得，一切都向山

甲要。生产队里惟一会拉锯的是个老羊倌，也只有他家有把大锯(俗称“二人夺”)。天没亮，队长就带着我俩进山了。知道要到天黑才能回来，所以我们都带着干粮和水壶。

据说在几年前，树木比现在多得多，农民到窑洞对面的山坡上就能砍柴、伐木。这几年人口多了，对树木只砍不栽，附近早已没有树了。因为棉被少，只能靠多烧柴取暖，树木损失得特别快。现在砍柴已经没有乔木了，只有手指般粗细的灌木棵子，也要走十里开外。要想找到能破成板材的大树，起码要走二三十里山路。

陕北干旱少雨，所以土地贫瘠，树也长不大。光秃秃的山梁有人踩出来的道，道附近风硬，长不了直溜的树。只有顺着陡峭的山坡下去，在凹进去的地方，才能看到一片树林，有一两棵一米合围的大杨树。再往下走，也许还能找到更粗的，可是背上来不容易。

选好了树，用我的手锯把它从两米多的地方截断，倒下去的部分再截出两米多长，剩下的就不要了。队长用斧背砸掉树皮，我用墨斗弹出墨线，再把它绑在树桩上，就可以拉了。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摸过大锯。隐约记得三四岁时，水獭胡同的大院子里，有人拉过，那是一人在上，一人在下。姥姥触景生情，教我唱起了：“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可是我不能说不会拉，不拉就没有木料，就没法干活，就永远没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木匠。弹墨线也是第一次干，不是干得很好么？我只有让大脑飞快地动起来，每半秒钟都不走神，每做完一个细小的动作都想好下一个半秒钟该做什么。就是这么聚精会神地拉了一天！而且有一半时间是站在

一根碗口粗的“脚手架”上，只有锯口离地一米二三，我们的脚才能站在山坡上。

一段木头破出六块木板，太阳已经到西边山头了，该往回走了。老羊倌累得不行，要倚在山坡上歇一会儿。队长一边把我们该往回背的东西捆好，一边问羊倌：“罗文和你能搭上手吧？”羊倌满意地夸我会拉锯，但是找补说：“上午可把我累稀了。”我忙解释：“开始摸不准您的手法。”虽然我没露声色，心里却高兴极了。一种预感告诉我，我能够成功！

做完桌子又做犁。当地农民觉得犁很神秘，据说手艺很高的木匠未必会做犁。做不好，耕地时爱跑偏，没法用。问他们原因，谁也说不上来。我想了一个晚上，认为犁的形状复杂，都是天然长成的，没有一致性，所以有的木匠这个做好了，下一个又做不好了。其实还是中心线不在一个平面的缘故。解决了画线的问题，就不觉得有什么难了。要说真难，是我做的一个“升”。

年纪大的人都知道，过去称粮食，喜欢用“升”，十升是一斗，十分之一升是一合。是口大底小的方形量具。由于不是统一制造的，大小差别很大，市场上几乎没有人用。但是生产队坚持使用。

生产队有各种规格的秤，也不是斗和升比秤准，更不是使用上的方便；平常没有人用，只有生产队向各家分粮食的时候一定用。原来，政府对农民该分多少口粮规定极严，虽然粮食是农民自己种的，即使收成特别好，每年每人也不许超过280斤，不分大人、小孩儿。分不完的粮食，必须卖给国家，每斤几分钱，可是黑市上每斤四五毛钱。如果遇灾减产，不够每人280斤没人管，只能少分。不执行这项政策，就算犯了原则

性错误。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产量永远上不去，小孩儿生得一家比一家多。

用升和斗，奥妙全在一平一凸之间。把粮食沿着斗或升的口刮平，和不刮平冒尖量，能差百分之十几。对上级报的是平斗的数量，实际分的是冒尖的数量。

因为有平和凸的关系，升和斗的相似形就非常重要。队长说，以前的升，十平升是一斗，没错；冒尖的十升，就到不了冒尖的一斗。用它分粮食，社员意见大。做大了也不行——有人分几斗三，有人分几斗二，有人可能没有升的零头，不公平了，就有意见。

我运用了开立方的办法终于做出来符合队长要求的升。其中的难处，向别人说，没有人能理解，反而奇怪我小题大做。

社员看我像是木匠了，开始请我去家里做活。当地人叫"变工"——把他的工分记到我头上。

都很穷，没有人做家具，只是修修门窗、木桶，做个猪食槽。最多的活是"箍窑"——防止窑顶塌落安装的木头支撑。

到个人家干活，主人请吃中午饭。女主人这时候都要显示做饭的手艺，拿出自己的绝招。我最佩服的是她们做切面的功夫。

因为干旱和土质不好，我们村不种麦子，所以吃不上白面。吃面条，只能吃杂面的，最好的是荞麦面。

所谓杂面，就是豆面，原料是过去连驴都不爱吃的"蔓豆"。如果使用绿豆，就比白面还高级了，没人吃得起。豆面没有筋性，必须往里加榆树皮碾成的面，更好的是加点儿甘肃出产的"沙蒿"，豆面就变得像面筋一样。当地妇女能把面赶

得像纸那么薄,几乎快透明了;刀工也好,切得宽窄一模一样,拉开每根一人多长。可能是面赶得薄的缘故,吃起来一点儿豆腥气也没有。

别看陕北人很穷,做吃的东西很在行,能看得出来过去他们有过不愁吃喝的日子。岁数大的老人,经常留恋以前的生活——"早吃馍,午吃糕(炸年糕),晚上抄起切面刀"。一二十岁的年轻人,印象中没有这么好的日子,只有眼馋的份儿。

生产队的作息时间是这样:每天天还没亮,栓牛就吹起了上工哨。从村一头吹到另一头,要七八分钟。大约一二十分钟以后,社员都在生产队部聚齐了。这时候的工作,都安排在家门口附近。随着栓牛的哨声,婆姨们也都起了床,开始忙着做早饭。空着肚子干一个多小时的活,收工回家吃饭。吃过饭以后又到队部集合,就要到比较远的山上去干活了。留下一两个送中午饭的干些零活,其余的人慢慢腾腾地往山上走。

送饭并不轻松,十点左右就要挨家去取,每家会拿出来一个很重的陶罐。陶罐分两层,下边是半稀半干的"黏饭",上边是一小碟咸菜,最上边还扣个碗。送饭的挑两只筐,顶多装二十个罐,有一百多斤。陕北山陡,空着手上山都要气喘吁吁,何况挑着担子?干活的地方有时很远,送饭的要走一两个小时。如果去更远的地方干活,就不安排送饭了,自己带干粮。山上没有水可喝,各家的饭菜都做得很淡。

收工的时间全凭栓牛掌握,到家天准擦黑。别看他没有表(全大队才有一块手表,全小队只有一个闹钟),掌握时间极准,尤其是中午收工,无论阴天、晴天,误差超不过五分钟。

吃完晚饭,菁菁爱到我住的窑洞来看书或聊天。我常给她讲干活时听到的趣闻,她也告诉我在山上又吃到了什么野果

子。碰到好吃的果子，像樱桃、软杏、甜毛桃，她准装在衣服兜里给我带回来。

山上的野果子多极了，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有的吃；只要有，就吃不完。有些野果不好吃。又好吃、又多的是杏。这种杏熟透的时候，又甜又面，杏味十足。用手轻轻一掰就开，杏核能干干净净地掉出来。

到杏熟了的时候，生产队放一天假让大家采摘。社员们先爬到树上拣树梢上的大杏吃个够，然后乱打一阵，把地上的一个个掰开，专拣杏核装满一袋背回家去。杏肉不值钱，嫌沉，没人要；杏核可以卖钱，供销社收。也有力气大的，懒得在山上掰，背回家让家里人收拾，杏肉大部分也都喂了猪，人不敢多吃，怕吃坏了肚子。

平常日子社员请假去采摘、挖药可不行，凡是能增加收入的活动都算"走资本主义道路"。对知青就松多了，想休息或上山玩儿，就可以请假。

我们常让桂子带着去山里玩儿，她年龄小，想到队里干活挣点儿工分还不允许。她反正在家呆着也没事，和我们出去还能背回一捆干柴来。

有一天，她高兴地悄悄对我说："这个月我13岁了。"我不解地问，13岁又怎么了。她解释说："13岁以下的小孩儿，死了不能埋，只能扔到山上让鸟吃，13岁就有资格埋了。"

4. 封建

菁菁和那几个女生，最反感农民的封建意识。生产队晚上开会，经常解决社员的家庭纠纷。队长最爱说："女人就是头发

长、见识短,男人们别跟她们一般见识。"女生们总爱去纠正,队长就一个劲儿地说:"那对着呢,那对着呢。"也不知道是他说的对,还是女生纠正的对。反正也无关大局。可是有一次,真让女生们领教了"封建"的威力。

两年前,大队在一条山沟的出口,用土垒起一座坝,形成一个小水库。岸边还没有长出荒草,水质清澈透明,是个游泳的好地方。

这时正是七月盛夏,加上没有洗澡的机会,勾起了女生们游泳的欲望。她们结伴来到水库,找个僻静没人的地方换好游泳衣,陆续都下了水。

正游得高兴,被路过的一个男社员发现。他急忙跑回村里,四处大喊:"快去看女子洗澡嘞!"

不一会儿,水库岸边黑压压地站满了男女老少。不管女生们躲在水里怎么撵、怎么骂、怎么无地自容,就是没有人离开。僵持到最后,她们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湿漉漉的泳装外面,又套上了干衣服,低着头、红着脸跑回自己的窑洞去了。

从此,再也没有女生敢去游泳了。

要说当地人真的那么遵守"封建道德",也不尽然。

大家在一起干活的时候,男社员们最爱炫耀的就是勾搭上了多少个女人,大队干部也不例外。上级规定大队干部每年必须劳动多少天,由他家所在的小队安排活、记工。每当他们一来,立刻成了聊天的主角,没有别人说话的份儿。印象最深的是,讲起一个当地有名的妓女"小桃红",长得漂亮不说,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谁要是享受过她的温情,就好像有多高的身价似的。不仅大队干部吹嘘跟她有多熟,几个经济条件好的老

社员也跟着吹嘘起来。

女社员对"封建礼教"也不是那么看重。我们村有不少河南来的移民，其中少不了守寡多年的寡妇。本地婆姨一点儿也没把她们看得多高，反而说："还是她们那里好生活，到这里试试，没男人怎么活得下去？"

有一次我走在公路上，看见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打架。围观的人问其原因，原来老太太向老头借了五毛钱，老头来要账，老太太想卖身抵账，老头不干。周围的人有劝老头的，有劝老太太的，不料他们俩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变。老头认为不值；老太太认为够便宜他的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丢人。

本村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基干民兵"们，特别羡慕河对岸那个大队的民兵。原来，那时正是"备战"高峰，各村都要有民兵站岗，夜里也不例外。那个大队每次安排俩人，而且是一男一女。这边的民兵眼红得不得了，回忆起来还反复地念叨："他们可'日'美了，他们可'日'美了。"直到很长时间以后，可能外村人出于嫉妒，向上级做了汇报，才把夜班的女民兵换成了男民兵。紧接着没人再愿意去站岗，取消了这项"军事活动"。

所以，谁也别说谁开化，谁也别说谁封建，只是生活习惯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我们大队的知青，大部分来自"北京外语学校"，干部子女较多，年龄又小，开始专爱纠正农民的习惯。比如，农民把劳动叫"受苦"。"北京娃"从小受的教育是"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了人"，怎么能用上贬义词？到后来发现这种纠正徒劳无功，况且插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又不是来教育"贫下中

农"的,也就由他们去了。

人在失落的时候,往往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插队以前,一直顺利的学生是何等得意!那时是"革命小将",大方向永远是正确的,是"革命的中流砥柱"。自己也感觉肩上好像真的有什么历史使命,真的就要拥有了"世界"。到了农村才发现,其实自己不过是社会的弃儿。原本老实巴交的学生,突然都欣赏起黑社会那一套。

回北京的闲散人员,流行"拍婆子"——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女生,都敢上前搭讪。最常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在哪儿见过你。"有的女生也真爱搭理他。据说还有的因此结为夫妻。

在农村,表现更多的是叫板、"拔份儿"。通常的方法是比赛谁认识的黑社会老大更有名,谁在某次打架更不要命。当然这只是嘴上的功夫,真要打起来,除非是群架,多数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直接一点儿的对抗叫"犯照"——两个人只要一对上目光,就必须互相瞪着不能错眼珠,谁眼珠稍微移动一下,自认败阵。据说有对视几十分钟不分胜负的。别说去做了,想着都觉得眼睛累。

从"务虚"很快变成了"务实",县城里到处是劫道的。

知青专劫知青,不敢劫当地人。因为劫了知青,人家认为你们这是狗咬狗,没人管;劫了当地人,只要一喊,人家可是老乡向着老乡,准会有人来帮忙。对女生还有所收敛,因为强者、弱者太明显,不属于狗咬狗之列,容易引起当地人打抱不平。我们每月都要进县城买粮、油,往往把钱放在女生身上。

进城不被劫的男生是少数,不过也好打发他们,几毛钱、

一两块都行。我一来没钱,二来觉得是个侮辱,干脆裤兜里揣把锋利的凿子,遇上劫道的来要钱,手在裤兜里把凿子把攥紧了,让雪亮的刃口伸出兜外,明确地告诉他:“没有!”劫道的往往会说:“进里边再说。”可是没有一次跟我“再说”。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大个”。

这种不会妥协,后来让我吃个大亏,竟挨了一刀。

5. 路遇劫匪

1969 年末,姐姐教养期限快满了,我们都很为她的前途着急。如果有接收她的单位,就不至于留在那里就业,一辈子回不来。我和弟弟都赶回北京想为她的事尽点力。

我们是第一次回北京。在此之前,有不少知青已经因为想家、过不惯苦日子回过北京了。有条件的,甚至就不再回去。

探亲回京的知青,凡是窑洞没留下人的,几乎都被撬开了门,把里面的东西偷个精光。这时我们已经不在石队长的院里住,搬到了一个独立的能做饭的大窑洞。当然也面临着这种危险。

我想起应该利用我的特长——做了三个“地雷”。先把邻居的小孩儿召集来,给他们表演。我把装满火药的玻璃瓶拴在远远的一棵树上,又用长长的绳子系住拉火线,让大家在柴垛后面躲着看。

当我把手里的绳子使劲一拽,一声巨响把各家的大人也召了出来,问我们怎么回事。我连忙趁机告诉他们,我们回北京走了以后,把窑洞门和洋芋窖门都拴上了同样的“地雷”,

如果有响声,就是进来了小偷,请他们帮助捉拿。后来等我们从北京回来,不但东西一样不少,邻居还替我们把两个门又拴牢了许多,恐怕有人不知道,去晃动它,引起误伤。

弟弟和菁菁先期回到北京,我和另两位要好的同学结伴一起走。我们三个人,总共的盘缠是10块钱。一个人全程的票价就得30块。因为没想打票,几天能到北京没有把握,这点儿钱只能用于吃饭。

求道班工人帮我们搭上一辆卡车,我们就上路了。

我们的计划是乘汽车到铜川,扒乘铁路货车到西安,再到郑州。郑州是全国最大的中转站,容易找到北上的列车,到北京就不成问题了。因为乘坐的都是货车,虽然苦点儿,却省下了车钱。

在道班工人家吃过午饭上的车,才走了一半,到距离铜川还有二百多里的黄陵县城,天已经黑了。司机不想往前走,告诉我们明天出发的时间,就去了招待所。我们没钱住店,过夜的地方通常是候车室或医院的椅子。

坐了半天的车,已经又渴又饿。看到路旁有个小饭馆,没管它所处的位置是否偏僻,就进去休息,顺便买几个火烧,要三碗开水,狼吞虎咽起来。

我们正在明亮的店堂"享受"的时候,店外的夜幕下,几个劫道的知青也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等着我们出来。

饭馆要关门了,我们也歇得差不多了,准备找过夜的地方。刚一出门,就被七八个手持三棱刮刀的北京知青围上了。不用说就明白,遇上了劫道的。人家人多,又有凶器,我们人少,手无寸铁,不能硬拼。他们让我们到更偏僻的河滩去,我们当然不能去,就在那儿僵持着。

我们之中的一个同伴儿会讲几句黑话，到一边去和他们的头儿“盘道”，有一阵吸引走了四五个人，看着我俩的只剩下仨。偶尔走过一两个当地的女兵，看见我们早吓得加快了脚步，我知道喊她们也没用。只怪我穿了一条又厚又硬的棉裤，这是姥姥和母亲怕我在陕北冻着，特意多絮了许多棉花。如果不穿它,论我跑的速度,一般人别想追上。可是有了它,别说跑,腿连打弯儿都难。

我趁人不备，小声对我的同伴儿说了两声“跑”，我知道他跑的速度也不慢，只要离开了杀伤距离，一边大喊着“救命”,相信贼人胆虚,他们就会逃走。

不知道我的同伴儿没理解我的意思，还是担心他跑了我俩要受害,总之原地没动。吸引走的几个人又都回来了,我们错过了惟一的机会。

这帮人发现我个子最高，以为我最起作用，又都围上了我。为首的恶狠狠地向我要钱,我也毫不客气地回答“没有”,他恼羞成怒,一刀扎穿了我的胳膊。我一看既然如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边向人多的地方跑,一边大声喊“来人哪”。没跑出几步,厚重的棉裤就把我坠倒了。我的两个同伴儿,一个被抢去了棉帽，一个肚子上挨了一刀——幸亏扎在了纽扣上,肚皮没破。劫道的也跑了。

同伴儿搀扶着我去了医院。我艰难地脱下皮袄、毛衣,发现内衣的袖子已被血染透。刀伤有三处——扎穿了胳膊又扎破了胸侧。幸好没扎破动脉，也没扎透胸腔。医生缝好了伤口,打了防破伤风针,说,如果不感染,七天后可以拆线。

出了这件事以后,又消耗掉盘缠中的几块钱。

我们找到县公安局报案,拿出“血衣”给他们看,管记录

的警察露出不耐烦的口气说:"快拿走,快拿走!"问我们情况的态度也是充满了怀疑,好像我们不是被人劫道,是打群架受的伤;他们治安没做好没责任,我们倒像做错了事。碰了一鼻子灰,知道他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只好还回到医院熬到天亮。

汽车中午到了铜川。

很顺利,我们很快找到了去西安的煤车,天黑前就到达西安了。

这时我们每人平均还有不到两块钱,如果顺利,也得三天才能到北京。我们真感觉到了没钱的滋味,吃每一顿饭都要考虑半天,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有个同伴儿开玩笑地说,看见别人掏钱买东西,真是羡慕,恨不得当一回小偷。

在西安站的候车室,一个贼眉鼠眼的北京知青找到我们,先是套了一阵近乎,然后才说出了本意。原来,和他同行的还有一男二女,也是北京知青,也为了省钱想扒乘货车。他们每人都带着很重的行李,也带着生产队分的钱。他想抢劫他们,力量不够,如果加上我们仨就有把握了。他计划把他们骗到一个没人的货车厢里,假装偶然遇到我们,等车开起来就下手。

他带我们远远地认了认那三个人,是年龄很小的极老实、单纯的人,都穿戴得很整齐,看得出比我们生活条件好多了。

同伴儿试探性地悄悄问我:"能行么?"我说,不行。虽然我们都偷过生产队的瓜、菜,甚至有的偷社员的柴烧、偷社员家的鸡吃,但是这和面对面的抢劫不是一回事,有本质的区别。我甚至可怜起那三个小同学,想象着他们突然遇到坏人

时束手无策的样子。

但是,我说,假装答应那人,否则他还会去找别人来干。

我们没坐他说的那趟车,找了趟别的车走了——车有的是,只要往东开,都能到郑州。所有的车到郑州都要停,经过重新编组才能再走,有时要等十几小时。

坐货车非常冷,也十分脏。白天还好过,虽然弄一身的煤灰,毕竟还能忍受。到了夜晚,气温一下降,就显出了强风的威力。疾驰的车带起的强风,在车厢各个角落打旋,无论躲到哪里,风也会把衣服、棉鞋打透。天黑没多久,我们就浑身打颤,手脚由疼到麻。可是要这样整整坚持一宿!

不管怎么难熬,从西安上车算起,第三天晚上,我们总算到达丰台货运站。每人还有两三毛钱,够坐公共汽车到家了。

又过了三四天,我去医院拆线。当初伤口没上药,想不到痊愈得很快,没任何麻烦。

6. 横祸

一到北京,我和弟弟就忙着跑姐姐的事。根据她信中的指点,我们找到她工作过的玩具厂,她的一位女校友正在该厂管人事。

姐姐以为校友能给帮忙,不料事与愿违,"校友"一点儿不留情,一口咬定姐姐已被开除,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回厂工作。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她反而不耐烦起来。我们看不到一点儿希望,只好放弃了这个首选的第一方案。

姐姐的第二方案是嫁给她喜欢的北京人。她在上小学时,有个男生是她崇拜的偶像,但从未表露过。教养前还听说

这个男生尚未娶妻，让我们给她联系。根据她提供的一点儿线索，我们总算找到了男生几年前居住过的地方，但是已经找不到人了。邻居说，只知道全家迁往外地，几年来，一点儿音讯也没有。

姐姐的第三方案，就是嫁一个稍微理想一点儿的人。家里的人都为她想办法，找人帮忙，人家一听说是教养犯，想见一面都办不到，绝大部分直摇头，有兴趣的，我们也实在看不上。

有一天下午，姐姐突然回到了家，我们简直喜出望外，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问其原因，原来是她根据父母写信常提到姥姥病得越来越厉害为由，向队长请探亲假，没想到居然就批下来了。

这时母亲马上要下班回家，我们担心她看到姐姐会过分惊喜，已经习惯了郁闷的神经受不了太大的刺激，让姐姐先到另一间屋躲起来。

母亲进了家门，我们东拉西扯地说姐姐可能会回来。她起先认为不可能，直到慢慢有点儿相信了，我们才让姐姐出来。母女俩一见面，立刻拥抱起来，好半天都没有出声，只是默默地流泪。别的人辛酸得不忍看她们。

正当一家人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中，一个巨大的灾难从天而降。在满街张贴的布告上，一批供“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罪大恶极”的“罪犯”中，赫然印着哥哥的名字。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讨论”不过是走走形式，凡是被列上“讨论”名单的，哪个不是定为“死罪”？况且介绍哥哥的“罪状”又是“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书写十几万字的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按当

时的“标准”，死一百次的罪过都够。我们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不久，两个警察来到我家，好像是来了解、核实哥哥的案情。我觉得这是惟一的机会，极力表示不可能有什么“集团”和“暗杀”，因为我几乎天天和哥哥在一起，他的一切活动我都知道。来人一一做了记录，没多说什么就走了。

又过了两天，一个阴风四起的中午，五六个街道积极分子和一个派出所警察闯进我家。先对父亲呵斥一顿，又转向姐姐，质问她为什么不在外地好好改造，回北京干什么，是不是来“劫法场”。听得我火冒三丈，又“无权”把他们赶出去，于是找来案板、菜刀，以切咸菜丝为名，把案板剁得山响。几个人立刻转向我，和我大吵起来。

他们也露出这次来我家的本意，就是要勒令我们离开北京，分别回教养、插队的地方去。要不是怕牵连了父母、姐姐，我真想一刀抡将过去，管它三七二十一，先出了这口闷气再说。母亲连忙把我拉到隔壁房间，关上房门小声劝我：“得罪他们干吗，你们走了以后他们该拿你爸爸撒气了。”

我和弟弟不回陕北，怕他们找父亲的麻烦；姐姐不回教养所，怕街道通知教养所，也会给她带来麻烦。我们都呆在这里，一点儿也搭救不了哥哥。一家人商量的结果，只好离开北京。

临走之前，我们姐弟三人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虽然都没明说，心里却清楚，这次分手，谁能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呢，一定还能见到吗？父亲可能也这么想，让我们每个人都记下几个不太可能变动的亲戚、朋友地址，告诉我们，将来一旦失散可以请他们帮助联系。假如这些人都联系不上，每月的

初一、十五，在影响大的报纸上登寻人启事。

耗到最后，终于说到我们最关心，可是谁也不想说的事——哥哥的命运。他将是生、是死，我们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只剩下一个最可怜的愿望——尽快知道结果。这也只能由父亲写信告诉我们了。信里不能有哥哥的名字，因为难免对哥哥的死会流露出伤心和不满，被邮检就会让坏人大做文章。父亲突然想到了“霞”，女人的名不会让人联想到哥哥。死了，就说“霞走了”。

小霞是二姨家抱养的女儿，年龄比我小一岁，聪明贤惠又写一手好字。“文革”前那年春节，二姨一家三口到我家过年。姨夫是高明的业余琴师，总想露一手；哥哥自称有“脑后音”，想表演唱。于是他演刁德一，小霞演阿庆嫂，唱了一出“智斗”。顶数小霞表演得好。母亲当时就萌生了让哥哥娶她的念头。还没怎么深说，就赶上了“文革”，姨夫被斗，二姨自杀，小霞去了东北农场。父母一定是一直惦记着这事，所以马上想到了她。

我们要乘的火车晚上9点发车。母亲是晚班，下午2点就要离开家，她是个刚强的人，嘱咐我们几句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她比我们更清楚局势的险恶，但是，此时要表现儿女情长，只能让大家更痛苦。

吃过晚饭，父亲又不放心地叮嘱我们：“地址都记下了么，藏好了么，联系方法都知道了么……”最后他才眼含着泪说：“我也许见不到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见到好的那一天。你们走吧，路上小心。”

我们一起走出大门，一股阴冷的北风吹得我打了一个冷战，吹乱了父亲稀疏的头发，他本能地缩了缩脖子，更显得驼

背了。这时，我才发现，父亲是那么苍老。我们劝他进屋去，他说要在走廊站一会儿，看着我们走远。我们尽量装做有说有笑地下了楼，夜幕下看不见他是否掉下了眼泪。

我们走到街上回头向上看，父亲趴在二层公用走廊的矮墙上，向前探着身子朝我们挥着手，示意我们放心上路。

我们一边走，一边回头，走出很远很远了，依然能看见父亲使劲儿向前探着的依稀可辨的黑糊糊的身影。在漆黑的夜空下，他探出墙外的身影是那么小，几乎就要融化在一片苍茫的昏暗之中……

父亲，可怜的父亲……

7. 噩耗

我们照例只买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这种"特快车"在郑州以前不会查票。

我和弟弟陪着姐姐直到邢台，看着她随人流走出了站台，才放心地又回到车厢，继续我们的旅行。没有了她，我们轻松了许多——我俩是知青身份，遇上查票的告诉他们："知青，没钱。"就能放我们过去。姐姐当然也可以冒充知青，万一露了馅儿，那可不是好玩儿的。

回到陕北，弟弟又在我所在的小队住下。

几天以后，他和不少社员都很熟了，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们趁队委们在大队书记家开会的机会，向大队书记申请调动的事。

书记征求小队干部的意见，还没等他们说话，书记十几岁的儿子说："我看这娃老实、人不错。"

别人见他说开了头,也纷纷夸弟弟,表示同意他调过来。当即书记在我们写好的介绍信上盖上名章。我们到公社再换成正式的介绍信。

经过努力,终于把弟弟调到我所在的生产队。从开始下乡到现在,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实现了和弟弟一起生活的愿望。

姐姐回到教养所不久,她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教养所人满为患,忽然动员教养期满的人离开教养所,能回家的尽量回家,大城市来的无法回去,给安家费分配到附近农村。美中不足的是,所去的农村实在太穷,每天分值儿分到一毛儿。

不管怎么说,离开专政机关比什么都强。姐姐此时有如飞出牢笼的小鸟,自然又有一番心境。她被分到河北临西县,一到那里就给我们寄去一首诗《雨后的云》: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羡慕那群云呵,疾速地奔向远方……
你撒下甘醇的水,使大地滋润、生长;
你投下瓢泼的暴雨,锻炼人意志更强;
你亮出利剑的光闪,像复仇的火焰一样;
你发出震耳的轰雷,激烈地呼鸣唤响……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想变做那云,疾速地飞向远方……

除了诗,她还邮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件白汗衫。那是用她的生活费买的当地的土布,经她自己裁剪、蹬缝纫机制作的。

衣服哪儿都好，只是太瘦，肩膀窄了将近两寸，我们无法穿。如果硬穿，扣子系不上，胳膊也抬不起来。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瘦弱的样子给她的印象太深，没想着把衣服做肥大一点儿的缘故吧。

1970年3月，在陕北，我们接到父亲的来信，得知哥哥牺牲的噩耗。

那天中午我们兴冲冲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来信，回到窑洞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却是我们最怕知道的消息。

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抒发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

我和弟弟失声恸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敬爱的哥哥。

我一次又一次透过泪眼去看父亲的信，希望自己看错了字，不是"霞走了"而是"霞没走"……不久前不是有过一次么，"讨论"的20个人处死了19个，留下了哥哥，我们还高兴了一阵子……这次不能又出现奇迹么？

哥哥对我们的关心、对朋友的真诚、对长辈的孝敬，他的刚直不阿、他的诙谐幽默、他的克己助人、他的敏而好学、他的无私无畏、他的简朴、大方、执著、豁达、博文、强记、乐观、向上……他的一切音容笑貌，一篇篇一幕幕都呈现在我眼前。我追忆着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捕捉与他有关的每个细节……

天，早已经全黑了，我们也早已由哭到抽泣到默默地流泪，全然不知道已是什么时候。我对弟弟说："咱们永远不要

忘记哥哥,不要忘记这件事!”我听见他哽咽着坚决地答应了一声,感到极大的安慰。

我忽然想,我俩、父亲母亲互相还有个安慰,姐姐呢,谁能安慰她!

8. 姐姐闯关东

自从哥哥牺牲以后,我和弟弟更想和姐姐团聚了。我们先设法把她调到陕北,因为这里比她那里还富一些。几次努力以后,知道没有一点儿希望。

我俩决定到她那儿去。我们打听,除了种地,还有什么挣钱的方法。姐姐说,农闲时用手推车拉煤,两人一车,来回100公里,走三天,挣10块钱。我们天真地以为富地方的人到穷地方应该容易,其实错了。越穷,越不愿意增加人,因为地里打的粮食多少是固定的。所以连她那里我们也去不成。

这时父亲到姐姐那里住了些天,得出个结论,临西这里太穷,也不会有改变的机会,应该让姐姐无论如何离开那里,哪怕用“嫁人”这种下策。

主意已定,父亲就带着姐姐回北京了。他们前脚刚走,后脚农民砸开姐姐的屋门,把安家费买的那点东西分了个精光。

回到北京依旧分头努力,帮她物色“对象”。原先一点儿都不了解,要想成“速成夫妻”谈何容易?光弟弟就给她介绍两个。一个是同学的老乡,北京郊区的农民,“地主”出身,人真老实,只知道逆来顺受。嫁过去就是“地主婆”——当然的“阶级敌人”,永无出头之日。如果是自己熟悉、敬仰的人,陪

他受苦、受罪也认了,而他……另一个家在北京市里,自己是知青,在内蒙古插队,收入也不错。男方和他父母都对姐姐满意,可是小伙子向她透露,根本就不想在内蒙古扎根,就想调回北京。姐姐觉得太不实际。两个都没成。

我家有个老街坊,赵伯母,是个热心人。她给姐姐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工人,北京市内户口,人也很懂礼貌,而且视哥哥为英雄。

我的父母对他第一印象不错,父亲说:"只是文化程度低点儿,唉,咱们也别要求那么高了。"

姐姐和他眼看成了,他为了对得起姐姐,坦白了自己的身世,是北京有名的"车站谭子"(官方认为是小偷,流氓团伙头目)。他让姐姐做决定,只要不同意,今后决不露面。

毕竟不是一路人,怕以后生活会有矛盾,拒绝了。

赵伯母又建议,她儿子也在北大荒插队,听说那里女人少,好找对象,当地人俗语说:"有剩男,没剩女。"不如先投奔她儿子,人到了那里就好办了。

姐姐是个敢闯的人,她把这次行动比做过去人的"闯关东"。但她是女孩,父母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七拼八凑外加借,给了她十块钱盘缠。姐姐知道父亲去河北这趟,家里拉下点儿饥荒,执意不要那么多(其实还不够单程路费)。父亲说:"'穷家富路',到了那里也不能光吃人家的。再说,万一路上有事呢。"姐姐这才收下。

真应了"人挪活,树挪死"这句俗语。她这一去还真成功,不但自己落下了户口,还把我和弟弟的户口也从陕北转到了北大荒,实现了我们团聚在一起的夙愿。在那里,我们生活了四年。这是后话。

9. 夜走山路

哥哥牺牲后不久，来了两个外调的到我们村，向我了解当初给我们印刷《中学文革报》的一个工人，估计这个人出了问题。

我当然让他们满意不了。于是他们对我大呼小叫，又对在一旁陪着的大队长说了许多我的坏话，企图让大队长也对我施加压力。没想到这么一来，我就更不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大队长也不习惯这种面对面的斗争方式，没帮上他们什么忙，闹了一个不欢而散。

让他们没有得逞，我心里暗自得意，可是从此生产队的干部们，好像突然跟我有了隔阂；同队的一些知青们，也突然把我和菁菁看成了“异类”。甚至有人说在公社看见了我的档案，有一尺多厚；菁菁同住在一个窑洞的女生们私下说：“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狼’。”

这时，20里外的公社要修个水库，需要木匠，生产队把我派了去。我第一次在木匠堆里干活，正好能学学手艺。临走，石队长特意告诉我，全县手艺最高的木匠李林富也在这个工地，让我一定好好向他学习。

没两天，县里又来要修雷达站的民工，也在几十里开外，必须住在那里。陕北人最舍不得离开家，给补助，社员也不爱去。弟弟没有家的牵挂，报名去了，而且一干就是好几个月。他在那里看管、收发建筑材料。

和木匠们在一起，我才知道手艺人很讲究门第。见了面

先问对方是"门里"、"门外","科班出身"还是"半路出家"。如果是"门里"(祖传),最好还是"科班出身"(从小学的手艺),即使手艺差点儿,也受人尊敬,否则别的木匠很爱欺生。

论门第,搬出我出生前就去世的姥爷,恐怕得够"省"一级的了,他们谁也不够资格,李林富师傅对我已有几分喜爱;说到我手艺为什么这么差,我解释说因为上学,耽误了学手艺,虽然比"科班"差点儿,毕竟没干过别的工作,也不能算"半路出家"。更主要的是,农民只知道知青好打架、偷鸡摸狗,没听说也有会要手艺的,备感亲切。就像中国人听老外说相声、唱中国歌曲,即使还赶不上业余水平,也听得津津有味一样。

李师傅是公认的高手,他都对我很好,别的木匠当然也错不了。他们之间,技术上很保守,对我反而爱传授。从中我也真学到不少技术。对他们,我也很尊重,从来不介入他们之间互相取笑的下流笑话,装做听不懂,连笑也不笑,免得误会。

人家耐心地教我技术,作为回报,我只能多干些人家不爱干的累活。比如使锛子,有一定的危险,也容易砍坏了鞋底,常常由我包揽。有一次我忘了李师傅的嘱咐,脚的位置站错了,锛子一打滑,砍到我的踝骨,流了不少血。我看四周没有人,偷偷用手绢包上继续干活,没敢对别人说。因为说了也没用,反而让人瞧不起,李师傅也会怪我不重视他的话。由于伤口深,十几天才长好。好在做木匠活脚用力的时候少,能瞒得过别人。

一天傍晚,同村的社员带给我了一个口信:紧挨着我们的邻居,窑洞塌了,砸死了一位妇女;队里认为我们的窑洞那

一带土质不好,应该搬家,又给我们找了一眼空窑。

我惦念起菁菁来，因为我们离开队长家，她搬到队长家去住;我们都外出干活,她又搬到我们的窑洞去住。还是应该让她早一天搬出来。我决定当天晚上赶回去帮她搬。

吃过晚饭，天已经大黑了。社员们知道我要摸黑走二十几里山路,都惊讶极了,一致劝我第二天再走。

当地人胆子小,也非常讲迷信,天黑不敢走山路,尤其怕黑洞洞的山沟。

看我执意要走,知道怎么劝也没用,就再三嘱咐我:前边有鬼火千万别跟着走;有人喊“等等儿”千万别回头,也别答应;如果有黑影在路边的树棵子里交谈,千万别偷听,更不能答茬……看我一一点头答应了，又非让我扛把锛子不可，说锛子是龙的化身,最能辟邪。我嫌沉,还是揣了把凿子。大家无可奈何地说,是木工家什都辟邪,拿凿子就凿子吧。

一大帮人都愣愣地看着我朝黑黝黝的山里走去。我走出好远，还看见他们聚在那里不肯散去，我知道他们是真的为我担心了。

开始几里路，我走得很轻松，根本就没把那些闹鬼的传说和故事当回事。

陕北地处高原,空气又干净,能见度非常好。有月光照着可以做木匠活,即使没有月亮,仅凭星光,也能看清路面。假如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也不敢走这段路。因为左边是陡峭的高山,右边是十几丈深的峭壁,两尺多宽的小路,就是顺着河水冲刷的断层修的。看不见路的话，很容易掉到峭壁下面的河里。

因为能看见远处的树和怪石，越看越像人或动物，反而

增加了恐惧的幻想。每经过一条山沟，小路自然向黑暗的沟凹里拐去，立刻会感觉一股阴冷的气流迎面扑来。虽然陕北的初夏，气温已经很暖，还免不了打个冷战。这时候，我突然回忆起社员讲的一件件闹鬼的事：

两年前的一个傍晚，石队长收工贪了点儿晚，独自一人从山上往家走。快到村边的时候，只见他父亲闷头正在山下往山沟里边走。队长好生奇怪，这么晚了，去山沟里边做什么？他大声喊父亲，父亲就是装听不见一个劲儿地走。队长也懒得去追问，就回了家。到家才知道，父亲刚咽气，原来他看见的是父亲的魂，如果跑过去拦住，也许父亲死不了。

上个月，栓牛的哥哥突然在夜里死了，谁也不知道死的原因。一家人正忙着给死人穿装裹，隔壁栓牛忽然声音不正常地大哭起来，说话口气隐约像他哥哥。当地人很有经验，知道这是鬼魂附体，连忙问他的死因。“栓牛”说：“我半夜难受想吃药，看婆姨睡得正香，不忍惊动她，自己从瓶子里倒了些，吃错了。”社员本来没有一点儿医药常识，他不这么说，谁也不会往药上去想。急忙把“赤脚医生”找来，发现真是吃错了，剂量过大造成心力衰竭。

两三个月前，小队会计婆姨死了。娘家人来奔丧，会计突然也被附了体，向娘家人哭诉起“自己”的委屈、婆婆的不是。婆婆连忙跑到隔壁棺材前烧纸，求“她”不要再说，并许愿日后多烧纸钱。这边话音没落，那边会计立刻住了嘴。任凭娘家人怎么逼问，会计就是不再张嘴了。

陕北人平均寿命很短。两岁以前的小孩儿，成活率不足五成。据说统计平均寿命，两岁以前死的不算。即使这样计算，我估计也超不过50岁。会计婆姨还不到30岁，栓牛哥哥

顶多四十一二岁。大部分死于心脏病。

忽然，一个怪念头向我袭来：如果前边就坐着这些死去的人怎么办？越想，他们的形象越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转。猛然身后响起一声清脆的呼喊——“等等儿！”莫非真的遇上了鬼？我下意识地感觉浑身毛骨悚然！

刹那间我又恢复成了我，突然转过身大声喊：“等什么！”我自己都奇怪怎么有这么大的嗓门。只听到“扑扑扑”几声扇动翅膀的声音，四周又恢复了原来的宁静。原来困扰老乡多年的“等等儿”只不过是鸟或昆虫的叫声。

我责备自己的胆怯，嘲笑自己的糊涂。连明白的农民都懂：“活人怕死人，傻狗撵飞禽。”难道我退步了么，怎么也会相信有鬼怪？如果真的有凶恶的厉鬼，能主持因果报应的公道，世上何至于有那么多作恶多端的坏人！与他们相比，鬼不可怕，而且很可爱。

我情不自禁地向着深山、向着旷野大喊：“可爱的鬼魂们，你们出来吧，请带我去见朝思暮想的哥哥！”

10. 爱情

我们大队是个二百余户人家的自然村。因为窑洞都是就山坡形状挖的，不能像盖房那样想在哪儿盖就在哪儿盖，所以村子绵延了三里多长，我们小队居中。除了沿河川这三里山坡星罗棋布地布满了窑洞、六七个山凹、沟岔也隐藏了不少人家。我走到村头，已经有九点多，全然没有了白天的活力与聒噪。偶尔能听见婴儿的哭声和母亲的哼唱，还有就是惊醒的狗，感觉到我的脚步，有气无力地叫两声

离我们的窑洞还很远，就看见一片黑茫茫的山坡上，只有它还亮着一点微弱的灯光，我知道菁菁还没有睡觉。周围的社员家，为了省灯油钱，吃过饭就都早早地睡觉了。

东边栓牛的哥哥家，因为当家的刚死不久，家里只剩下妇女、小孩儿，睡得更早；西边就是刚刚被砸死了人的那家，估计窑里还停放着棺材（七天之内不能下葬），没有人敢再住。再往西，就没有人家了——如今我们的窑洞成了这条山沟里最后的一家。挨着刚死过人的窑洞居住，也真够难为菁菁的。换上别人，即使是男社员，恐怕也早就吓跑了。

我们养的狗"赛虎"听出了我的脚步声，从好远就迎了出来，又摇头又摆尾，还时不时地用前爪搭在我的身上。狗在高兴的时候，不爱大声地"汪汪"叫，而是亲昵地"呜呜"鸣，好像在撒娇。

菁菁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忙出来瞧，意外地发现是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想不到这么晚了，我能从二十多里以外摸黑赶回来，惊喜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是我提醒她："快进窑洞吧。"

刚关上窑门，她第一次主动抱住了我。我立刻觉出前胸被泪水洇湿了。我使劲搂住她柔弱的肩膀，希望我的胸膛能让她感觉是个依靠。此时，好像说什么都显得多余。

陕北的生活，对女知青来说，简直是磨难。天天离不开的柴和水就是两大难关。

柴要从十几里外的山上打，还要背着它上山、下山。陡坡上的小路只有一尺宽，背上柴只能脸对着山坡横着走，脸对着山下十分危险，到更窄的地方会被卡住——转身是不可能了，又看不见身后的情况，继续走随时有可能被挤下山去，扔

下柴禾人也得掉下去。女生往往事先不爱动脑筋，卡在那里只能号啕大哭，直到又过来强壮的男人把柴接住，从她头顶扔到山下去。

柴禾不是天天要背，水可是天天要用。挑水也不是轻活。陕北干旱缺水，井少，水位低。先从十几丈深的井里把水摇上来，再挑到很远的半山腰的窑洞。男人挑水都会气喘吁吁，何况女生。

我们到陕北一年以后，安家费花完了，知青们分了灶，往后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前一年挣的那点儿工分，扣除口粮钱和社员帮我们做饭、砍柴的变工，所剩只有三五块。从北京探亲回来就身无分文了。我们也差点儿断了盐，幸亏菁菁母亲在来信中夹了两块钱，菁菁立刻买了二斤盐。剩下的钱，她又买了二斤鸡蛋，好给我们单调的伙食添点儿荤腥。如果按我和弟弟的想法，就是不吃盐，也不会向家长要一分钱。

好像自己就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非要不可的，比如盘缠，还得依靠家长援助，花得也坦然；能克服的困难还指望家长解决，就觉得丢人。往家里写信，我们也很少说这里怎么苦。父母已经够苦的了，我们何必再给他们添烦恼，况且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实在没辙的时候，我和弟弟去山里锯回一些木料，我做了两个方托盘，让菁菁拿到县城卖了八块钱，我们买了二斤麻油、几百斤柴。虽然收入不多，我们仨特别高兴，因为这毕竟是凭我们的“本事”挣来的第一笔“额外”收入。从此我们自信能够不再依赖家长了。

虽然才分别二十多天，菁菁感觉像过了一年一样——这是她后来对我说的。我们拥抱着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直到腿

都发了麻，她才仰起头问我，吃饭了没有。我点了点头，又问她："咱们的窑没事儿吧？"她告诉我，队里来人检查过了，看不出毛病，但还是建议快点儿搬走。再说，旁边两家接连地死人，她也实在有些害怕。

她从柴锅里舀出温热的水，让我洗了脸和脚。收拾停当，我准备到石队长家的小窑洞去睡觉。她提醒我说："二十多天不烧的炕，睡上去会得病的。"接着羞涩地问："来时没人看见你吧？"见我肯定地点了头，然后低下头小声说："我想让你陪我聊一个晚上。"

窑洞里没有桌椅，地面又有跳蚤，能呆的地方只有炕上。每次上炕前，先要把裤腿抖搂干净，别把跳蚤带到炕上。

陕北跳蚤特别厉害，所以陕北的土炕离地面比较高，跳蚤蹦不上去。高到什么程度——据说村里老丘在1960年用28斤粮票，从甘肃讨来的婆姨，因为年龄小点儿，需要他抱她上炕。

知青刚来时不懂防跳蚤，被褥又多，咬得浑身尽是大包。跳蚤咬的包奇痒难忍，十几天也下不去。我们队一位女生，两条腿密密麻麻有几百个包，到北京的医院去看大夫，吓得大夫连忙让她住院治疗。

我们都坐到了炕里边，背靠着行李。我给她讲水库上的趣闻、我又新结交的朋友、我技术上的长进。菁菁深情地对我说："我最喜欢看你做木匠活儿，不管是拉锯还是推刨子，就是看背影我也愿意。"

我说："那好办，等我把技术学好了，咱们开个木匠铺，我天天在家做活儿，你做饭，没事就看我干活儿。"她激动地把头扎在我怀里，我搂着她的肩，给她描绘着"我们的木匠铺"

的格局、怎么把生活安排得更舒适。

陕北的气候特点是："早穿棉，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到后半夜，窑洞里明显冷了。我把棉被盖在我俩的身上，正要脱去衣服舒服地躺下，她说："不，别这样，我不想怀孩子。"

煤油灯的灯心结了焦，火苗越来越弱，最后闪了一下就灭了，窑里立刻一片黑暗。我们懒得起来去点，反而觉得这样更好——看不到眼前的残墙破壁，倒更容易憧憬美好的未来。

尽管我们有说不完的话，还是声音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慢，不知不觉地相拥着睡着了

早晨，天还很黑，栓牛的出工哨声把我们惊醒。

黑暗中我们看不清对方的表情。菁菁把棉被给我盖好，就下地去烧洗脸水和做早饭。她尽量动作很轻、出的声音很小，以为我还能多睡一会儿。其实我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但是我不想起来，想多享受一会儿"家"的温馨。我知道从此我有了自己的小"家"，这里有需要我关心和照顾的人，我也能从中得到关心和照顾。我将过上一种从未体验过，但充满吸引力的生活。我将要永远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我又多了一份义不容辞的使命

不到半小时，天已经大亮。窑洞里弥漫着发糕和稀饭的香味。菁菁很会做饭，她小的时候母亲常出外工作，家里只剩下她，环境练就了做饭的本领。她母亲厨艺更高，连相声大师侯宝林都这么评价："我就爱吃您做的饭。"到了陕北，她很快就跟当地妇女学会了当地的饭菜做法，很适合我们口味。

我不能再装睡了，揉着眼睛坐起来。她也不再蹑手蹑脚，

催促说:“快起来洗脸吧,水快凉了。”

早饭后,趁社员都到队部等着派活的时候,我也到了。大家以为我赶早从水库来的,纷纷过来寒暄,询问水库的事。队长知道我是回来搬家的,又派个社员、一辆手推车,协助我搬。我们东西不多,两趟就全搬完了。

我给水缸挑满了水,又劈出一些木柴,吃过午饭就回水库了。临走,嘱咐菁菁,需要休息就请假,别把身体累坏了;把狗喂好,它是她惟一的伴。菁菁频频地点着头,脸不时地朝向斜上方——好不让眼泪滚下来。

回到水库又干了二十来天,工程停止了。水库并没有建成,明年接着建。这二十来天里,我结识了一位姓詹的北京知青。他在附近的村子插队,来水库当民工,干力气活。他没事儿爱往我们木工这里跑,看来是很想学这门手艺。

发现我也是知青,很快和我成了朋友。他问我,木工技术好不好学,我鼓励他,用不了俩月就可以独立干活了。问起他为什么到水库来,为什么想学木工?他说,不想在生产队干活了。接着讲起了他的遭遇。

小詹比我小两岁,“文革”时上初三。他们一起插队的同学,四个男生分在一个小队,又分配来三个外校的女生。七个人当中数他年龄大。

来陕北几个月以后,有天晚上,除他以外的那三个男生一商量,直奔女生住的窑洞,非让她们开门不可。女生发觉他们来意不善,不开门,男生就用大石头朝窑里砸。

陕北的窗户都是很细的窗棂糊上一层纸,哪挡得住石头?女生吓得没辙了,一个人连外衣都没顾得上穿就给他们开了门。三个男生冲进去,一人抱住一个就强奸。结果,以后

倒成了三对夫妻。

小詹没参与他们的活动另有原因，他正热恋着一位陕北姑娘。姑娘名叫梅花，家里经济条件很好，人长得也漂亮。

论长相，陕北的女子两极分化。难看的多些，皮肤黑糙，龇牙咧嘴。好看的就特别好，细皮嫩肉，闭月羞花。相传貂禅就是陕北绥德人，可见陕北出美女是有传统的。小詹长得也不错，一米七八的高个，宽宽的肩，陕北人喜欢的平而方的脸庞。

陕北女子表达爱的方式很直接。梅花主动要求往山上送饭，得着机会就给小詹的陶罐里塞俩炸荷包蛋。不送饭的时候，她就带上一盒纸烟，等干活歇息儿了，靠近小詹坐着，趁别人不注意，悄悄把烟塞进小詹的兜里。知青的农具少，常跟社员借。如果小詹去梅花家借，梅花就把他带进仓窑，用身子顶住窑门，不让他出来。赶上梅花父母不在家，她就把小詹叫进正窑里，用相片或好看的荷包逗小詹看，等小詹有了好奇心真想看了，伸手去拿，她故意把东西抽回到胸口上，让他去碰她的乳房。一来二去，小詹也很喜欢梅花。

因为太直接了，很快梅花父亲就发现了他们俩的关系。陕北农民不像别的地方，不把北京知青看得怎么高，别看那里穷，反而看不起知青。也许是因为生活习惯差异太大，就像有的家长不愿意让女儿嫁给老外一样，梅花父亲极力反对他们俩好成。还在村里扬言："我就是把女子嫁给瘸子、拐子，也不准她嫁给北京知青！"

很快，他给女儿找了一个好婆家——男方是个售货员，非农业户口。梅花不干。他生气还有这么傻的女子，用绳子把梅花捆绑着塞进驴车，送往几十里外的婆家。

小詹觉得没脸在村里呆下去，就出来做民工。水库工程一结束，他还得回去。我十分同情他，答应只要有机会，一定帮他出来。

11. 到农大当临时工

我刚回到生产队，石队长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北京农业大学来我们村招木工，通知好几天了，不知道现在人家还要不要人。

虽然是北京农业大学，并不是让木工去北京工作。

原来毛泽东突然发了个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这十几个字的作用非同小可，偌大的一个大学，立刻从北京海淀区迁到了河北涿县。发现离北京城还不够远，还得迁！于是迁到了我们甘泉县。

这次彻底，不仅远离了大城市和县城，甚至远离了公路——从我们村附近开始下公路走土道，顺着"清泉沟"走五十多里，有个叫"清泉寨"的自然村，成了北京农业大学的新校址。这两次折腾，光搬迁费就损失了几百万。

幸亏在离我们村不远的清泉沟沟口，有他们一个接待站。我急忙跑过去问，人家告诉我，由于新建学校，得盖大量房屋，急需木工。每天都有运货的汽车往沟里开，但不一定肯搭人。学校每两个星期休息一次，两天后的星期一，正是卡车来接家住在沟外边的职工上班的日子，坐这车有把握，还在这里集合。

我把这喜讯带回来，我和菁菁高兴不说，队长他们也乐得合不拢嘴，因为这和上级摊派的任务不同，可以给生产队

挣来钱。对我，当然又是一次考验——人家能看上我的技术么？

星期一一大早，我就背着行李、工具来到接待站。有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那里，已经有不少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站到了车上。因为清泉寨村子不大，安排不了农大这么多职工住下，所以大部分职工被安排在通往县城这条主要公路两旁的村庄里。到这个接待站集合的，都是住在方圆十里范围之内的人。再远的，还有别的集合地点。

八点多钟，别的集合点的汽车到了这里，我们的车也随着他们出发了。

这50里土道，要走两个多小时。因为路不好，还有上下坡，汽车经常抛锚。这时候我们就要下来帮助推，实在推不动，就让前边的车牵引。刚下过雨，这种情况特别多，有时要折腾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好在陕北雨不多。

别看车上的职工有不少是夫妻，到了农大不能住到一起，都要住男女分开的集体宿舍，据说这是为了学军事化。估计也是为了节约地方，因为安排在清泉寨住家的就可以过上家庭生活。

汽车一到农大，大家都奔向自己的宿舍；我经人指点，找到木工组。

组长很热情，看到我也是从北京来的，他和几位师傅都表示很欢迎。工资多少，根据我的技术，几天以后再定。

我想，他们留下我，还有一个原因：我懂陕北话，便于给他们当翻译。在我来之前，有两个当地木匠也在这里做临时工，他俩不会说普通话，和大家很难交流。日常用语，连比画带说，还能凑合明白，可是技术术语就很难听懂了。甚至陕北

使用的量具，和农大用的公制也不一样。陕北单卖一种"木匠尺"，既不是公制也不是市制，我仔细琢磨才明白，它是从英制演变过来的。但是它仅采用了英制"分"的长度。英制八分为一"寸"，十二"寸"为一尺；"木匠尺"全是十进制。

既然决定留下我，就给我安排了住处。那两个当地的木匠带我到一个山凹形成的小院，院里贴着山坡开了几眼窑洞，能住人的有三眼：我们仨木匠和两个年轻的单身职工住一眼；隔壁是三位四十多岁的女士，其中一个是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另外两人是没问题的职工，当看守，整天形影不离，无论去食堂买饭、上厕所，还是睡觉、写检查；离我们远一点儿的一个窑洞，住着汽车班的班长老安两口子。老安的爱人是农大印刷厂的工人。

农大职工有着明显的等级区分。

最底层的，是正在被揪斗的"阶级敌人"，像我们隔壁的女士，过去是领导干部，犯了"路线错误"；学生当中的"真""5.16"分子，别人都毕业分配走了，把他们留下当活靶子斗；因为有了"反动言论"新揪出来的"5.16"分子。这些人没有行动自由，有人看押，走路都得低着头。去食堂打饭经常被工人们自发地批斗——乱喊一阵口号。气得当地木匠们见了这阵势扭头就走，连饭都不打了，"对着饭菜喷唾沫星子，还怎么吃？"——谁说人家不讲卫生？

地位稍强一点儿的，是戴了"帽儿"的老"阶级敌人"——"五类分子"们。毕竟是"死老虎"了，没人去看押他们，行动上稍微自由一点儿。可是最好别说话，不知道哪句话说得不是地方，被人揭发出来，新账、老账一起算，这点"自由"就没了。就这样也保不齐被揪上台去陪斗。

再强一点儿的，是没戴“帽儿”但有历史问题的。比如摘了“帽儿”的“右派”，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这些人说话、办事也得特别注意，必须老老实实接受三天两头的批判。

比他们强点儿的，是那些教授、讲师们。根据当时流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原则，年龄越大、学历越高的，地位越低；年轻一点儿的，地位还好些，个别的还受到重用——当个班组长什么的——可是绝对不许“翘尾巴”。

有不少人，年龄不大，也不是教授、讲师，就是普通职工，也得不到重用，行动也是处处谨小慎微，那不用问，准是出身有问题的。

地位最高的，要算学校里的工人。如果祖辈几代都很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虽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还真指望当领导？上边还有军宣队、革委会，那才是真正的领导。工人除了干活，只能去喊口号。不过，能有这种地位已经不错了，在农大为数很少——本来大学里知识分子就多、工人少，再除去出身不好的，某次运动站错了队的，自己虽然没站错、父母兄弟配偶子女站错了队的，平日说话不够严谨的，最后筛选下来，能够高枕无忧的少之又少。

“领导阶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安常出车跑长途，好几天才回趟家，不想让老婆晚上去“学习”(政治)，让她请假陪他多呆一会儿。老婆可不敢，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再不学习，我该变成‘5.16’了。”

“五一六兵团”是大学生组织的揭发、反对周恩来的群众团体，被林彪、江青定为反动组织。老安老婆不知道这些，只知道谁跟不上形势谁就可能被打成“5.16分子”。

印刷厂一个女工，本来是个负责人，带着大伙干活可积

极了。人又活泼好动,一天到晚和同事说说笑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往山上扛盖房用的木料,别人两人扛一根,瘦小的她一人扛一根。没几天,她就像霜打的茄子,无精打采了,也不让她管事了。原来她丈夫出了事,被揪出来成了“阶级敌人”。她也从昨日的领导,一下成了“异类”,周围的人立刻都不敢理她了。

刚开始给我分配的工作,是到附近的山上盖房,有些老师也分配做这项工作。所不同的是,我做房架,他们和泥,砌墙,平地,做杂务。

因为老师都是被改造对象,学校对他们要求严,每当早上、中午上山都要从山下扛些木料带到山上。对我们没有这种要求。

本来,上山空着手都很累,我们的工具往往藏在山上懒得上上下下拿,可是看到有的老师没上多高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实在不忍看下去,就帮那年龄大的扛。没多久,就和他们熟悉起来,甚至和有些人互相借书看。有一天,一位老师把书给我送到木工班,被班长和工人们看见。等老师走了以后,班长急忙教育我:“小遇你可得注意啊,怎么能和这些人来往?这样下去你会犯错误呀!”

工人把知识分子看成危险人物,工人和工人呢,也不是很友好。

有一部分职工去山里开荒种地,烧荒草引起了大火,烧死了一男一女两位老师。(男的恰巧是我们隔壁那位被看押的女士的丈夫,为此给了她一天假和尸体告别。)因为尸体被烧得太惨,不便让人看,叫我们木工连夜加班做两口棺材。半夜,食堂特意为我们做了顿难得吃上的面条。有个工人高兴

地说了句:“要是能吃面条,天天加班做棺材我也愿意。”

说这话的人可能平时说话也欠考虑，据说以前因为说话受过批判。此时立刻有两个木工对他进行了批判，非说他是仇恨“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可。开头他还辩解,反而招来更凶狠的语言,大有召开大型批判会的架势。他只好装老实,不吱声了,总算没倒更大的霉。也因为再闹,就影响做棺材了。

回到宿舍，两位陕北木匠说：“那么点小事就小题大做，这不是欺负人吗?他们老说知识分子不好,我们看,好着呢。”

工人们喜欢斗争的还是少数，明白人遇到斗争场面能躲就躲。有位木工老师傅,级别最高,从来不在谁是谁非上多说少道,技术又不保守,我没少跟他学技术。

干了两个星期，又到放假的日子了。班长告诉我：“我们同意你在这儿工作，但是看得出来你还是个生手，工资不能跟老师傅一样多——人家一天一块二，你一天九毛——省得人家有意见。行不行？”其实我早心花怒放了，连忙回答“行”。

回到生产队跟石队长一说，他也高兴得不得了——谁能长年地挣这么多钱？当即决定:九毛中的三毛归我,作为伙食补贴,生产队再按最累活给我记分,每天 12 分。

为了实现我的诺言，我特意去找小詹，教他如何使用几件工具，怎样冒充干过木匠活的样子。我把我的实底都告诉了他——我也没做过几天真正的木匠活儿，和他的水平差不多——怕他勇气不够,给他打打气儿。

星期一,他如约赶到接待站,我们一起乘车到了农大。刚一下车,他就犹豫了。让我先别介绍他,让他看半天再说。

他到各处都转了转,又来看我干活。趁没人,我又给他打

气儿、将他。他迟迟下不了决心,脸都憋得通红。几次我以为他拿定了主意,起身要去找班长说,都被他拦住。一直耗到中午吃饭。

吃过饭,他终于有了决心——当不了木匠,回生产队去。

趁他走,我又让他给李林富师傅捎信,告诉他这里缺木工。

李师傅很快来了,可惜只干了一个月,嫌工资低,又离开了。

这一个月,我天天让李师傅给我讲四处流浪干活的情形。从中我知道,绝大部分人家是做窑洞的门窗。陕北的窗棂很有讲究,要求既结实又漂亮,名称、花样也很多。要说挣钱,顶数给病危的人做棺材挣得多。李师傅说,有一次他给一个老头做寿(棺)材,老头几天吃不进东西,明显快不行了。吃饭的时候,老头有气无力地说:"我看你们吃得这么香真眼馋。"李师傅二话没说,一手抱起老头的头,一手夹起自己碗里的一块肉,喂进了他的嘴里。老头感动地说:"我亲儿子也没这么喂过我。"我自愧弗如——一来,我反应没那么快;二来,我怕传染病。

李师傅看到我吃惊的样子,开导我说:"吃'百家饭'就得豁得出来。你什么都吃,身体才能壮。我就什么病也没有,我们村,比我年轻的还不如我哩。"但是我想,有些事,可能一辈子也学不会。

12. 第一次领工资

转眼间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第一次拿到了工资。加上上个月的几天零头,我拿到了三十几块钱。交完生产队,我还能

剩下十一二块。手里有了钱,我和菁菁趁假日逛了趟县城,顺便沿途拜访几位农大结识的老师。

路上,我和她商量这笔钱怎么支配。她问我最需要什么,我告诉她,我最想报答我的姥姥,因为她把我们从小带大,吃了那么多苦,对我又是那么疼爱,可是还没花过我的一分钱。我小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幻想:等我有了钱,一定让姥姥享福——让她天天能去听评剧,能吃普云楼的酱肘子。

菁菁听我说起姥姥,也很赞成我的主意,提醒我说:“你们和姐姐走了以后,我又照顾了姥姥一些天,她病得不轻,已经便血了,你现在不孝敬,说不定以后就没机会了。”

我们到邮局,先给姥姥汇去几块钱。我心里感觉舒服了许多,好像了结了自己的一桩心事,尽管和小时候的许愿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从邮局出来,开始采购我们自己用的东西。我特别想给菁菁买点儿什么,隐约觉得应该这么做。可是她说什么也不同意,没等我们争执出结果,她不由分说,到柜台挑了一件我穿的棉毛衫,急忙付了款。她知道,我的内衣早已经破得不行,一年前从北京带来时就很旧了,现在缝补都很困难。这么一来,我们就剩不下多少钱了,只能再买点儿必要的副食品。

不管怎么说,这次逛县城,是我们到陕北以来,最让人高兴的一次。

农大的职工到了陕北,粮食供应也随了当地城镇居民,粗粮多,细粮少。我虽然往食堂交的都是粗粮,却也和职工一样按比例吃细粮,总觉得心里很不落忍。这次放假,我特意加工了一二百斤黄米(比小米好吃),以便食堂也能变换点儿花样。

星期一早上，我从生产队借出一头毛驴，驮上这两口袋粮食，直奔接待站的停车地点走去。菁菁要一直陪我到接待站，因为她还要把毛驴牵回来。

走到河边的小木桥，驴死活不上桥，原来它发现桥面上有漏洞。

这种桥都是每年秋天临时搭成的，夏天一涨水，桥就被冲没了，秋后再搭。因为知道用不长，建造得也十分简陋——顺长的圆木杆上铺一层玉米秸，再盖上一层土，就成了桥面。经车一轧，有的土漏了下去，桥面上难免有一个个漏洞。驴从漏洞看见下面的流水，就吓得不敢往前走了。我俩一个在前边使劲拽，一个在后边赶，才把它轰过了桥。

卡车上已经有不少早到的职工了。大家帮我把粮食搬上了车，菁菁又嘱咐了我几句，就依依不舍地牵着毛驴往回走了。

我站在车厢上看着她一步步地走远。快下河岸的时候，她回头向我招了招手，很快河岸就挡住了她的身影。我突然担心起来，不知道她能不能把驴牵过桥去，于是使劲盯着很远很远、勉强能看到的小桥。很长时间了，终于看到她用力拽着驴走到桥上。远处的青山、绿油油的庄稼、波光粼粼的水面和孤零零的小桥，在蓝天白云的背景衬托下，是一幅多美的风景画！

我正看得发呆，冷不丁有人叫我，几位年纪较轻的女教师更是冲我诡秘地笑。她们故意问："小遇师傅，刚才走的那位是谁呀？给我们介绍介绍。"直到把我臊成了大红脸。

反正在车上呆着也没事，大家都把话题转向了我，问我们插队的学生吃什么，谁做饭，干什么活，住的条件怎样，有

什么娱乐……既然是侃大山，我当然添枝加叶地把我们的生活描绘得美极了，专拣有意思的说，说得这些整天被改造得晕头转向的老师们都动了心——不知道神州大地上还真有世外桃源！

一个年龄大些的女教师问得格外仔细，原来她的女儿也随他们夫妻来到陕北，马上就面临毕业分配。我发觉自己无意的神侃，竟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忙改口说："要是女生么，最好还是找个可靠的男同学一起去，要不然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后来她让女儿到我们村去串门，住了一宿，自然对插队生活有了真正了解。

在农大，即使满腹经纶的教授，也从事着再简单不过的劳动。每天从我们工地经过的一位姓李的教授，慢慢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年老而精神，因为他总是牵着一头小毛驴，而且他戴着眼镜的大脑袋和驴的大脑袋有着不可言状的相似。他的工作是到磨房磨炸药(采石用)。跟他真正相识，是因为他的幽默。

陕北不像北京，这里物资供应极差，尤其是食品。即使在延安这个陕北最大的城市，也买不到细粮制作的食品，饭馆也只供应粗粮，更不用说零食了。县城又差了一档，到清泉镇的供销社，食品少得可怜。能直接吃的东西，只有硬块糖、柿饼、核桃三种。农大迁过去以后，购买力突然提高，这三种食品还常常脱销。

有一次供销社破天荒进了一批婴儿代乳粉，我看到李教授正在"研究"包装袋上的使用说明，嘴里念叨着："一个月的年龄吃一勺，二个月吃两勺……我六十多岁吃几勺？"我忍不住插嘴说："您得吃三百多勺。"从此我俩成了忘年交。

农大领导为了活跃生活，也为了加强思想改造，逢年过节让职工自己排演文艺节目。李教授还上过台，他和一位年轻教师表演数来宝，内容是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记得他有这么一句台词：“你是受害者，我是放毒员。”——把自己丑化成人民的“罪人”——这样领导才能满意。

几天以后，他到我那里修理一把锯，我趁机挖苦他：“您是放毒员吗？”

他环顾四周没人，自我解嘲说：“逢场作戏，逢场作戏。”

我帮他拾掇好了锯，“惩罚”性地“教育”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过去常用这句话教育学生的他，这时可不再服气，辩解道：“最不利的‘器’是我的眼睛，还是等我返老还童那天吧。”

13. 苦难的长辈

有天晚上，我接到姐姐的来信，告诉我姥姥去世了，是在接到我汇款的前两天死的，死前反复叫着我的名字。

姥姥至死也没花上我的一分钱，使我悲痛万分。

在家中四个孩子中，姥姥明显最疼爱我，可是永远也得不到我的报答了，我永远也还不了小时候许下的愿。为人善良、正派、朴实、勤劳的姥姥，为我们操劳了一生，带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我们。一桩接一桩的悲剧、无休止的磨难要了她的命，她无力坚持等着看好转的那一天。

两天以后，父亲也写来信告诉我姥姥去世的消息，还说到北京的政治形势，一阵紧似一阵。他可能以为我的木工手艺已经很棒，一再表示，愿意跟我做木匠活，过流浪的日子。对外说

是我的师傅，其实是给我打下手，给我拉拉下锯什么的，他说他会装得很像。他说，他已下工夫研究过桌、椅、板凳的构造了，说不定还能帮我画画线。

一位60岁的老工程师，为了躲避"无产阶级专政"，宁愿在贫困的山村四处漂泊，吃苦受累，学着做从未做过的劳动技能！

年轻时过度的吃苦和用功，铸就了父亲知识分子的形象——稀疏的头发，深度近视，微驼的背。谁也不会相信他是木匠。他在家很少做体力劳动，我都能想象出他干活时笨拙的样子。

吃"百家饭"容易么？东家看见不能干的木匠是不会给好脸的，人家不愿意多搭儿顿饭。我告诉父亲，走家串户很苦，很累。他却说，他早有思想准备，什么苦没吃过？宁肯死在外边也不愿在北京受气。

我还能说什么？可怜的父亲。

我恨自己不能成为技术高手，不能挣多点儿钱接父亲来享清福！

父亲从教养所回来以后，就没有了正式工作。但是他不是能呆得住的人，况且家中的困境让他也不可能呆得住。从1964年他回到了家，就一直找各种工作去做。他翻译过吴清源(日)的《黑布局》、《白布局》两本围棋书(当然不能把"右派"身份的他的名字印在书上，而是以吴的妹妹名义发表)；用毛笔小楷抄写过线装书；描过图纸；为科技情报所翻译日、英、俄文资料；送过传呼电话(每送一次收入三分钱，后来有人检举说，"右派"哪能做传递信息这种"重要"工作，万一有要紧消息呢？仅做两个月便被辞退)；还以别人的名义翻译过几本日文

科技书;去营口的工厂当过业务员;差点儿就参加了往内蒙古沙漠贩货的骆驼队……

我知道父亲是勤劳的,对工作早已没有挑剔的概念,但是,他毕竟没有耍过手艺。耍手艺要的不仅是工作的结果,工作过程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表演。东家就是看你干活的架势,来判断产品的质量。我尚且不够资格,父亲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表演能力。

我不想让父亲太失望,一边敷衍着,一边加紧磨练着自己的技术,打听着还有没有比农大更挣钱的地方。

又过了些天,母亲用"换房"的方式,搬离了三里屯这个是非之地(因为靠近使馆区,政治气氛太浓)。当然,为了让她所在单位开出换房证明,只能再做出一点儿牺牲——换本单位职工更差些的住房——从两间楼房变成两间又小又潮的平房,交通也很不便。

到了新的地方,父亲的处境稍好些,但是还免不了被强迫着义务劳动。先是扫大街,后来改为挖地洞。

当时正值毛泽东"深挖洞"的最高指示传达贯彻之时,大街小巷都要以地道相通。不料北京市内土质不作脸,不像焦庄户的黄土那么瓷实。还没等敌人的炮弹到来,自已先坍塌了,有些人还搭进了性命,于是想起用砖砌上。

幸亏父亲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对建材想必不陌生,于是被命令去烧砖,从地下转为地上作业。虽然土木工程未必有烧窑专业,但是砖和建筑总算有点儿联系,工作还算"对口"。父亲也比较乐于干这项工作,因为又可以学会一项技能,说不定将来靠它在外地还能找份儿工作。只是不拿工资,全是白尽义务。

六、上山下乡(下)

1. 路上

姐姐到了北大荒，自己的户口刚落下，又张罗着落下我和弟弟的户口。她让弟弟先过去，人在那里，事情就好办得多。我必须晚走，还要挣些钱——起码得挣出托运行李的运费和路上的花销。

弟弟离开陕北之前，又和我进了一次深山，我俩锯出一些木板，准备做包装箱用。该帮我做的都做完了，他就只身上路了。因为是一个人，不便多带东西，不好带的，等我和菁菁走时，到铜川办铁路零单托运。

一个多月以后，姐姐、弟弟来信告诉我，我们的户口都办好了，我可以动身了。说起来这户口办得并不容易，弟弟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落成。后来队长的亲戚想来落户，队里临时规定了落户的条件，偏巧我俩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落户的地方是黑龙江省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汉古尔河公社诺敏河大队七小队。以前归内蒙古呼盟管辖，"文革"期间划归黑龙江加格达奇地区。别看名称像少数民族，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汉族村落——既不放牧，也没有少数

民族社员。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小队，全村四五十户人家，二百多口人。

诺敏河大队管辖七个小队——七个自然村。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四周有江河环绕，水泡子星罗棋布；既有黝黑松软的良田，还有大片未开垦过的荒草甸子；家家房前屋后的园子有一两亩地——看得出来是个生活富足的鱼米之乡。

接到姐姐他们的信我就启程。这时偏巧在农大"支左"的部队有任务去铜川，说好了，我和菁菁搭他们的卡车。

这次接受上次被抢劫的教训，我随身带了一把偏斧作为防身的武器。这把斧子是我最心爱的工具，也是最常使用的工具。两年来的耳鬓厮磨，我早已得心应手，砍、砸的准确度极高——甚至闭着眼睛凿眼，已经不用担心砸在手上；右手腕的力气也大得惊人——如果再遇到持刀的歹徒，三五个别想占得了便宜。遇到检查身份的人员，可以说斧子是打托运包装用的，有托运单证明，不至于怀疑是凶器。

这时，正是1971年的四五月份，陕南白天已经很热了，只是夜晚还有些凉。

到达铜川已是下午四点多。办完了托运行李的手续，已经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

陕南和陕北不一样，这里盛产小麦，白面有的是，但是缺少米，就连小米也很少见。饭馆里细粮很多，就是买不到粥喝。这里人早已习惯不喝米粥了，自然有他们的办法——到处都在卖"糊辣汤"——稀稀的面糊糊里，放些青菜、海带、辣椒和盐。

让干旱的热风吹了一天的我们，只想喝些稀的，于是急忙买了两碗。

陕西人的实在,处处都能体现出来:这一大海碗汤,足足有一公升多。要在平时,我俩有这一碗足矣;实在是太渴、太饿,两碗被我俩喝得精光,直辣得我们浑身冒汗。

肚子充实了,人自然就有了精神。我们接着上路,乘的自然还是运煤的列车。

到达西安,已经是半夜了。在列车编组的地方,我们遇见了一伙河南来的妇女。一问才知道她们是来拣麦穗的。她们一共有十来个人,最大的四五十岁,最小的十一二岁。每个人的“装备”也非常简单——除了身上穿的,只有一条布口袋。一路上,这口袋就是她们的“被褥”;回家时,用它装着辛苦好几天的收获。

比起人家来,我们即使扒车回家,都要算是“享福”。起码我们能买些吃的,不至于饿着;每过十多个小时,列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刷牙、洗脸“讲究”一下。人家身上没有分文,全靠要饭充饥;顾不上讲卫生,袖口、衣服下摆就是擦脸、擦汗的“手巾”;要是饭要得多些,能填饱了肚子,在木板上睡个长觉,就是最大的享受。

一位大姐告诉我们,她们这一趟出门,怎么也得七八天。如果顺利,每人能背回三十来斤麦穗。出来早些,这一季麦收能跑两趟。生产队不提倡出来拣麦穗,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妇女们出来还凑合,队干部装不知道,男人们出来可不行。因为她们那里口粮分得少,每人一年还不到二百斤,如果吃饭光吃粮食,连半年也吃不上,即使配上瓜、菜、白薯秧,也吃不到全年。这几十斤麦穗换成粗粮,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生产粮食的人,却在为吃上一口饱饭费尽了心机!我们比他们的命运要好多了,仅仅因为我们出生在大城市,他们

出生在穷乡村。这就注定了人的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在命运上的极大差别！

农民和农民的处境也千差万别。北大荒的农民，沾了地多人少、土地平坦肥沃的光，不仅口粮分得多（人均四百多斤），工分值也很高。（诺敏河七队每天约一元左右，附近有个小杜尔本生产队，每天两块，再多公社就不让分了——哪能让社员挣得比公社干部还多？）城市郊区的农民，又比偏远地区的农民收入高多了。所以，农民也分三六九等。

从差的地方到好的地方，别说落户难，就是去开荒种地或者给人家打打短工，也是不合“法”的，保不齐会当作“盲流”（盲目流动人口的简称）给抓到“收容所”去。虽然宪法上明明写着公民有迁徙自由，那只是一纸空文。

每年尽管有无数不甘受穷的农民去当“盲流”，让专政机关及其下属“联防小分队”又撵又抓，可是很少听说有农民去和他们“理论”。这也难怪，从“土改”以来，就把农民分了几等——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二十来年，等级制度已然成了人们心中铁一样的事实，地域造成的差别，顺理成章地被默认了。再说，比农民之间的差别更大的城乡（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差别，也没见谁出头抗争。放着大的不公平不去争，偏要盯住小的不公平，和自己的农民兄弟过不去，岂不有“窝里横”之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总之，没见过有人为这种不公平据理力争。久而久之，等级制度已经演变成无须证明的“公理”，假如有人还想试图推翻它，没准人们倒会把他当成疯子或傻子。

经过三四天的旅程，我们顺利到达了北京。

在北京没呆上几天，我就只身去了东北。菁菁的母亲执

意将她留下来，据说她舅舅给某军区司令做饭，有希望介绍她去当兵。这可是平民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大好事——苦不堪言的农村生活免除了不说，几年以后复员，还能回到北京，而且必然安排个好工作，马上是二级工资。以前只知道高干子女有这种机会，如今菁菁居然撞上了红运，怎么不让人为她高兴？为了她的前途，我也不能再动员她和我一起去东北了。

为了早点儿见到姐姐他们，这次我的旅行，改变了前几次扒乘货车的方式，干脆堂而皇之地坐上了直达快车。当然还是买了张站台票就上了车，还没走出多远，我就忙着为旅客倒开水、扫地，把乘务员该干的活全包了下来。乘务员当然非常高兴，当众宣布我是这节车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协助她进一步做好服务工作，包括念念报纸和铁路上的一些规章制度。人家早看出我是因为没有车票才这么勤快，对我的奖励就是不查我的票。

这回出奇地顺利，全部铁路行程三千里地，只用了三十几个小时就走完了。

我下车的车站叫拉哈儿，是讷河县下属的一个镇。因为镇里有个东北有名的糖厂，所以镇的规模不亚于县城。拉哈儿站是离诺敏河最近的火车站，它们之间还有四十里的距离。

我是半夜下的车。小站，没有人认真地剪票，我从不远的栅栏尽头又拐回了候车室，我要在这里坐等到天亮。

全国同等规模的火车站惊人的相似。拉哈儿这种快车停靠的小站，候车室有五六十平米，四周沿墙摆满长椅，中间背靠背再摆一两行长椅。北方的候车室里多放一个大煤炉。室内永远散不尽呛人的烟草的烟雾，地上的垃圾总也清理不

净，多数候车室长年居住着一两个疯子或傻子。

拉哈儿车站就住着这么一位疯子。从我 1971 年 5 月第一次来，到 1975 年 4 月最后一次离开，整整四年，始终见他在那里生活。

这人估计有四十多岁，因为蓬头垢面，虚胖囊肿，看不出实际年龄。据说他原来是个中学校长，“文革”初期受了刺激变疯的。他从不招惹别人，也不向旅客乞讨，专门拣旅客扔在地上的食物充饥。那时吃的都不富裕，除了好心人专门给他，扔在地上的无非是些水果皮、啃不净的水果核。他不管脏不脏，拣起来就吃。如果看到地上有烟头，他也要拣起来，撕开，摊在一张巴掌大的包装纸上，卷起来当烟抽。拣不到吃的、抽的东西，就坐在地上，用手在空中写字；困了，倒地便睡。听说每年入冬，亲属给他一身棉服，可是我看见他穿的都是破破烂烂，露胳膊露腿的。

好不容易盼到天亮，站前广场开来了“农垦兵团”的长途汽车。我能搭车走三十里到公社，步行就只有十来里了。

这十多里路走得并不枯燥。虽然姐姐来信中说过，有顺路的马车经过，可以要求搭车，这里人热情、好客，不会有谁拒绝的；可是我宁可慢慢地自己走，以便欣赏这奇妙的景色。

按地图上看，这里是内蒙古大草原的一部分，可是真正的草原景象已经见不到了，有大片的草甸子，也有望不到头的农田。草甸子刚钻出嫩绿的青草，开放着五颜六色的野花，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新编织的干净的地毯，让人禁不住想去躺一躺，坐一坐。在大地微微起伏的低洼处，能听到悦耳的蛙鸣，能看到潺潺流动的清冽的溪水和静静的水泡。透过轻

轻波动的水面,能看到一大群鱼儿游来游去。

我忽然想到了吃鱼。姐姐介绍说,这里吃鱼方便极了——几乎家家有鱼网,有兴趣甩两网就够吃两顿的;秋天稻地撤水,鱼没处可去,逮起来非常容易,愿意买,两块钱一满桶,家家吃不了,晒成鱼干儿存起来。

在肉类里,我最爱吃鱼。可是在陕北的两年里,一次鱼也没吃过。倒不是陕北没有鱼,而是那里的人没有吃鱼的习惯,所以也就找不到捕鱼的工具。问他们不吃鱼的原因,原来善良的陕北人看不惯煮熟的鱼还睁着眼睛,大概联想到"死不瞑目"了吧。

不一样的习惯还不止是吃鱼,种地的方法也不一样。陕北种地,没有起伏,不分垄、沟;东北的大田,除了小麦、水稻,都爱培起一条条的垄。

2. 小马架

诺敏河的知青,原先只有四个男生,转过来我们姐弟三人,成了七个。头一年大家在一起过,第二年就分了伙,有的跟社员认了干亲,到社员家去吃、住。姐姐和治国率先合伙买了自己的房子——一座小"马架"。

诺敏河盛产苫房草,家家都是草房。这种苫房草是空心的,又直又硬,风刮不起,雨下不透,保温性能极好。铺半尺多厚的,几十年都不用换草。

"马架"和普通房屋的区别,是它在山墙上开门窗,所以山墙是南北朝向。因为不太正规,草苫得也不那么厚。加上四周墙矮,省去了房柁,造价自然低。姐姐他们没有太多的钱,

只能买得起马架。

别看是个小小的马架，里边也隔成里外间的形式。外屋有压水井和灶台，能做饭，里屋有火炕，能取暖。东北非这种形式不可，因为冬天太冷，做饭冒出的水蒸气到顶棚会凝结成水，像下雨一样落下来。如果像陕北那样，做饭、睡觉全在一起，简直不可想象。

姐姐是理家的好手，把里屋布置得焕然一新——墙壁、顶棚、窗户都用白纸刚刚糊过，窗棂中间的几个小格，还镶嵌了一小块玻璃。屋里的陈设极为简单，除了从北京带来的箱子，只有一张小炕桌。桌子、窗台、玻璃都擦得一尘不染，马上使人想起了“窗明几净”——一片温馨的气氛。

我和治国的哥哥治民很熟，治民是我和罗克的好朋友，也为《中学文革报》出过力，经常到我家来串门，我也常到他家去。但那时觉得治国很小，又十分腼腆，所以没和他说过话。想不到三年多没见面，他已经长成一米九的大个儿。虽然相貌有点儿凶，依然看得出是个单纯、豪爽的人。我俩一见面，就觉得很投缘。

我们组成了一个和睦的“家”——白天，我和弟弟、治国下地随生产队干活，姐姐在家做饭，喂鸡，喂猪，侍弄房前房后的半亩园子；晚上收工回来，我们三个男的给菜园浇水。

浇水是个很重的活，一个人要不停地压，两个人往地里拎，没有一两个小时别想浇完。青菜全靠水才能长大，加上我们的种子好，都是农大的新品种，韭菜和西红柿宽大得让社员们吃惊。一进入夏天，园子里果实累累，小葱、小萝卜、黄瓜、西红柿、茄子、扁豆、芹菜、生菜吃都吃不完。

我们在院子里也立了酱缸，晒了满满的一缸酱。东北人

离不开大酱，什么菜都爱生着蘸酱吃。入乡随俗，慢慢地，我们也品尝出了其中的滋味，也变成顿顿饭离不开了。

虽然我喜欢治国，社员们却十分怕他。原来，在我们到来之前，治国几次不要命地打架，把大家吓住了。

有一次，治国去别的大队看同学，他们向他诉委屈说，队里有个无赖，仗着满身的横肉和一把力气，专门欺负他们。谁家里寄来好吃的，先要“孝敬”他，否则就是拳脚相见。直说得治国咬牙切齿，怒目圆睁。一帮同学刚要吃饭，进来一位彪形大汉，从治国身后一把薅住了他的头发，恶狠狠地问大伙儿：“这小子是哪儿来的？”

也算这家伙倒霉，今天偏偏遇上了个“吃生米儿”的。他的话音还没落，治国抄起自己面前一大海碗刚出锅的热汤面，整个扣到了无赖的脸上。只听见“妈呀”一声惨叫，无赖已经疼得倒在了地上。治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顺手举起屁股下的长板凳，抡圆了砸下去。板凳一头砸中了炕沿，板凳面“咯嚓”一声断成两截。

俗话说：“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无赖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不要命的，急忙跪下求饶。治国手里举着那半截板凳，让他一一向那几个同学磕头、叫了祖宗，这才扔下破板凳，放无赖出去。

还有一次，一个过路的知青偷走了七队知青点一件毛衣，治国追出村外去要。那人恼羞成怒，亮出了菜刀。治国手里拿根短棒，不由分说，直朝那人头上抡去。那人想护住头，用胳膊去挡，不想治国用力过猛，那人胳膊的骨头折成了三截。

因为打架，公社派出所拘留了治国，关押了他两个星

期。没想到反而增加了他勇猛的名声，还让他结识了几个因为"内人党"冤案也被关押的公社干部。后来这些干部又恢复了工作，他们倒和治国成了朋友。

治国让社员们生畏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容不得开玩笑。

治国好标榜自己枪法好，恰好他又从北京买了支气枪。有个社员看枪膛里装的是绿豆，就站在二十米开外说："能打着我么？"治国说了句"想打你左眼打不着右眼"，抬手瞄了瞄就放了一枪，一下子把那社员左颧骨打破了。吓得社员脸都白了——要是再向上偏两厘米，眼睛非瞎了不可！治国可没有后怕的感觉，只是笑了笑说："绿豆轻，弹着点低了点儿，要是铅弹，打你左眼没跑。"

据说姐姐到了诺敏河以后，制止了治国几次替人"拔份儿"的冒险行动，也因此惹得那些知青不高兴。姐姐不管那个，当着人家面就说："你们谁愿意干谁干去，别拿治国当'傻柱子'使唤。"可能这是主要原因，促使姐姐和治国下决心买下了小马架，离开了知青点，另起了炉灶。

3. 盖公社医院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大城市的医院，都要把一部分设备、好大夫拿出来，放到偏远农村去建立新的医院，名为"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汉古尔河公社福星高照，要建立一座"天津医疗队"援助的医院。

如果没有什么政治目的的话，就其效益而言，起码也是得不偿失。除了方便了偏远农村的少数群众，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附近的大多数"工农兵"看病可就不方便了。尤其对那些

医学专家而言，更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拿在汉古尔河建的医院来说，充其量只能为周围十几万人服务，却牺牲了在天津为几百万、上千万人服务的机会，结果，专家也只能整天在门诊给人看头疼脑热的小病。

建医院需要大量瓦、木工，公社把任务摊派下来，生产队让我去医院工地干活。十多里不便于天天来回走，我索性带行李到公社去住。那里每天管三顿饭，不用花钱，生产队每天记 12 分。

来干活的木匠当中，“成份”“不好”的比重很大。细想起来，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在农村，好一点儿的差事，像会计、卫生员、农机手、电工，都要从贫下中农当中选拔，地主、富农没有资格问津。心灵手巧一点儿的人，谁甘心干一辈子出力大、挣钱少的农活？“成份差”的只好自己找些手艺来学，多少能改善一点儿命运，所以不少人就学成了木匠。我们这里所说的地主、富农“成份”，应该说是“出身”才对，因为这些木工在“土改”那年还不够成年，只能说他们的父辈的成份是地主或富农，可是谁管得了那么多？上级让怎么办就怎么办——地主的儿子还是地主；贫农的儿子还是贫农。

还别说，我们这里还真有一位地地道道地主成份的木匠。这个人是当地的老住户，姓刘。他能从“土改”运动中活过来，简直是个奇迹。

听一些老木匠说，刘木匠可是个大好人，年轻的时候就乐善好施，对穷人又极有礼貌，所以人缘特别好。土改那年，他家的成份被划成地主，不仅他父亲，连他们已成年的兄弟几个也算是“地主”。

刘木匠已经五十多岁了，还保持着过去的习惯，对谁都

是客客气气。即使对方是来学徒的小青年儿，他也是必恭必敬的。

刘木匠他们是在我们特别忙的时候招来的，和他同时来的，都是各村第一次没送来的木匠。有的手艺很好，头一次不想来，嫌这里影响他的收入；也有的手艺很差，或者年老、手慢，原先不够来的条件，现在工地缺人，“饥不择食”。

其中有一位姓张的老木匠，最爱搞发明。如果他搞的是一般的发明、革新，说不定早有了成绩，起码生活不成问题。可是他偏偏热衷于“永动机”的发明。据说搞了几十年，家里穷得吃不上、喝不上，到处都是他做的各种模型。因为太执迷了，方圆几十里的老人，没有不知道他的。

“永动机”应该是这样，给它一个外力，比如用手转一下，它就会永远转下去。可是老张做的模型，能转上三圈就十分难得了，比自行车轱辘差远了。他没有文化，没学过物理，不知道什么“永动机”，只是认为自己的模型粗糙，摩擦力大，所以才没能连续运转起来。

“文革”前，他东挪西借凑足了路费，到北京的科学院去贡献自己的发明，没想到被泼了一瓢冷水——人家耐心地告诉他，他发明的是“永动机”，早已被证明是永远实现不了的。这对他的打击非同小可。

无知的人，往往更固执。科学院的人并没有把他说服，一席话毕竟代替不了多年的文化教育。“文革”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更鼓舞了他，使他的干劲备增，还时不时地嘲笑人家“科学院”两句：“什么狗屁专家，我看全是些吃闲饭的。国家养活着这些闲人干吗！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些臭知识分子！”

他最怕听“永动机”仨字,谁在他面前说,他就跟谁急。我们干活歇息儿时,都是抽烟、喝水、聊天,他却忙着做他的模型上的零件,反正工地上零碎木料有的是。

忙劲儿一过去,这些后来的木匠们又回到了各自的生产队。

4.“林彪事件”风波

1971年9月中旬,发生了“林彪事件”。消息最早来源于知青,据说日本华语广播是第一个报道这条消息的。日本台报道的时候,英国、苏联等电台还在说“林彪病入膏肓”呢。

林彪的事出来,知青们非常兴奋,到处奔走相告。从大家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多数人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林彪一死,少了一个大搞个人崇拜的主要吹鼓手,怎么不让人高兴?

想起刚插队的时候,知青中还有不少人把毛泽东当做神。我们队的女生,就在窑洞的北面墙上,供着毛泽东的石膏像(只是不烧香),每天出工前和收工后,都要在石膏像前恭恭敬敬地站成一排,举行“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仪式上,除了念毛泽东语录,高呼“万寿无疆”,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把自己当天的一些想法,絮絮叨叨地对石膏像说,就好像那里真的有个人在听。

当然,这种仪式没有城里人坚持得那么长久,没过两月就不再向石膏像请示、汇报了——它既给不了丝毫的灵感,也解决不了干活带来的疲劳和困倦——有那工夫还不如多睡会儿觉。

人,往往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女生们发现，别看石膏像没能解除疲劳，从北京带去的大量毛泽东像章倒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山里的女娃们见识少，给她们一个像章，能支使她们洗盆衣裳或挑满一缸水或烧儿天炕。

实惠归实惠，许多人未必挣脱出迷信的束缚。谁敢当众说毛泽东也有错误，不打成现行反革命才怪！没这意思，说走了嘴也不行。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下台，让“神”自己证明了自己不神，对“神”的信徒们，也是个解脱，自然也有种松口气儿的快感——谁敢保证自己就永远不走嘴呢？

还有许多人，不一定有什么想法，只是过烦了两年多枯燥的插队生活，早就盼着发生点儿轰动的事儿。林彪的事儿不算小，所以能让他们高兴一阵子。

这阵子来我们小马架做客的知青特别多，姐姐又非常好客，总留他们吃饭。饭桌上大家最爱谈的话题，就是交流海外电台传播的关于林彪的小道消息。有那幽默感强的，捎带讲几个政治笑话，给大家添点儿欢乐。

几天以后，公社来人传达文件，传达对象是大、小队干部、党团员和知青们。

大队部的屋子里，炕上、炕下坐满了人。会前照例是一个个卷起了“大烟炮”，比赛谁家产的“蛤蟆头烟”更呛，谁家产的“琥珀香”更绵软。不一会儿，屋里到处弥漫着烟雾，连对面墙上的招贴画都看不清了。大队的妇女主任、卫生员和女知青们，羞于和男人们在一起扎堆，都站在门外躲着呛人的烟雾。男人们看着眼前没有姑娘们了，又比赛起谁能说出成套的下流话，拿对方的“老姨”开玩笑。

农村的时间不值钱，等了小一个钟头，估计着不会再来

什么人了,大队书记宣布开会,招呼外边的人进来。

公社来了好几位干部，为首的职务比较高，是公社前几名负责人之一。这次是专门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

一位干部一句一句地念给我们听，职务最高的干部时不时地插进一些话做解释。

在传达林彪“罪行”的内容里，居然还有这么一条：林彪说,“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使我们这些从来对林彪没有好感的知青们,倒佩服起他还有明白的时候。

会后,每个小队发给一份文件,让回去给社员传达。干部们再三叮嘱,一定要把文件保管好,这是绝密文件,几天以后还要收回。其实，到了老百姓手里的，哪里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越说不让丢，三小队还偏偏把它弄丢了。这下可把大队干部急坏了。先是到保存文件的小队长家翻了个底儿吊，真的是没有一点儿影子。于是怀疑它被风刮跑了，组织全大队的社员,拉网似地在大野地里寻找。足足折腾了三天,野地里像用篦子梳头似地过了两三遍，楞是没见到它的一点儿踪影。最后只好给公社打报告、写检查,这事才慢慢平息下来。

后来我们分析，一定是让三队队长他们家，把文件裁成卷烟纸抽没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纸比较珍贵,社员舍不得拿它引火用，又没有使用手纸的习惯。纸的最大用处是卷烟和糊墙、糊顶棚。既然他家没在近日糊墙、糊顶，又找不到一点儿痕迹，最大可能就是卷了“大烟炮”，只是大队那么一闹腾,不知道捅了多大漏子,吓得不敢承认了。

5. 父亲来到东北

林彪的事出来以后，北京城里对“五类分子”的管束稍微放松了点儿，父亲因此能离开北京，投奔到我们这里来。母亲因为还没有退休，一时还来不了。

父亲到了诺敏河，加上公社医院的工程结束，我也回来住，小马架显然不够用了。在父亲的委托下，治国帮我们联系了老李家，那里愿意让我们去借住。

临走，父亲知道姐姐要和治国成家，特意找治国认真地谈了一次话。父亲说：

“罗锦这孩子脾气不好，跟我都敢吵、敢闹。你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我想你一定对她已经很了解。你的脾气也不好，短时间都能迁就，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你俩结婚我不反对，但是作为家长，我不能不劝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以免以后闹不愉快。”

治国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考虑过了，我俩保证能过好，我会好好对待罗锦的。”

父亲没再说什么，带着我和弟弟到了不远的老李家。治国借辆手推车，一车把我们的行李和日常用品也拉了过去。

老李家和大多数农家一样，也是一明一暗两间宽大的北房，院里一间朝西的仓房。北房的外屋，是南北两个柴灶、压水井、水缸；里屋，是南北两个大炕。我们爷儿仨，就被安置在北炕上。才二十七、八的老李媳妇带着仨孩子睡在南炕。可能出于好奇，邻居家的两个大姑娘来给老李媳妇做伴儿，也到南炕上凑热闹。

我们奇怪这家的男主人老李怎么不露面，一问才知道，一年前的春节，老李和他弟弟喝多了酒，在酒桌上与本村的老胡打了起来。老胡气回了家，老李哥俩又追到胡家，老胡乘着酒性，用洋叉扎死了老李的弟弟。老胡当然因为杀人被抓起来，老李也因为挑唆打架被抓起来。本来关系不错的两家立刻成了仇人。两家的男主人到现在还被拘留着，不知道将来怎么处理。

老李媳妇娘家姓森，父母也在这个村。以前他们是辽宁铁岭市的工人，大饥饿年代下放到农村，森大姐嫁到这个村，她父母也把户口落到了这儿。

森大姐热情、豪爽，在生活上给了我们很大照顾，一点儿也没有图回报的意思。正如当地人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对门不如南北炕……"不到一个月，我们两家关系已经非常好了。

森大姐在村里同龄妇女中，算是文化高的，她更佩服我父亲的知识渊博和为人实在，非要认我父亲为干爹不可。这样她就成了我和弟弟的干大姐，我们俩都改称呼她为"大姐"。

老李家族在这个村里，可以算是最大的，除了他们哥俩，还有三个亲姊妹，每人都是一大家子人口。总共加起来三、四十口人，占全村人口的六分之一。三个女婿都是再老实不过的农民，所以他们在村里并没有多大的势力。据说老李是家族里最精明的一个，还当过两年小队长。我们一确立了干亲关系，这一家族对我们都不再当成外人，见面显得格外亲热。

我们住在老李家，已是1971年的秋天。

东北的秋天很短，十月下旬，就开始大雪纷飞了。陆续收

割完庄稼，打完场，到十二月初，所有庄稼活都干完了，就等着会计算完账好年终分红。有那性急的知青，不等算清了账，先从生产队预支些钱，提前回家探亲去了。农民们直到来年三月，都没什么活可干，真正过上了轻松自在的“农闲”生活。好赌博的打牌，好交友的两三个凑一块儿喝酒，更多的是串串门，一边嗑着“毛嗑”(葵花子)一边聊天。

我们离开北京顶多半年，父亲又刚来时间不长，冬天就不打算回北京过春节了。想利用农闲时间，挣一些钱。当地冬天能搞什么副业，我们还一窍不通，和“大姐”聊起来，她也是一时想不出什么——如果有事可做，能挣到钱，谁还乐意在家呆着？想给人家做木匠活，没听说谁家有活可做；说评书、唱“二人转”倒是深受各村的欢迎，我俩又不会。“大姐”无意中讲起，村里几年前曾经来过一个照相的，很是挣钱。

说起照相、洗相，我和弟弟并不陌生。我进监狱以前，学校里没事可干，学生流行过一阵冲洗相片的热潮。我和弟弟买了点儿最便宜的处理相纸，屋子临时改成暗室，也鼓捣了一阵。虽然质量不怎么样，原理都明白了。

“大姐”听说我们会照相，半信半疑地说：“那敢情好了，春节前手里都有钱，正是照相的好时候。会照相准能发大财。”

俗话说：“无本难生利。”“照相”这种副业虽然很好，但是本钱很大。尤其是照相机，论我们的积蓄，还买不起。相纸等消耗性材料还可以用多少买多少，风险不大；相机一旦买来就不能退货，万一这个副业搞不成，是个很大的损失。

年终分配了，我和弟弟扣除了口粮钱，还能分到七十多块，将够买那些材料。有没有相机，是最关键的问题。首选的方案，是能借来一台。向谁借？

当时,照相机属于高档、珍贵、娇气的东西。肯于借给我们的,必须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在众多的好朋友当中,只有王蜀璋有相机。我们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王蜀璋和他爱人(菁菁的同学)从他们插队的陕北延长县到甘泉县来看我们,还在窑洞前照了相。虽然我和他只见过这一次面,但是共同的信念把彼此的心拉得特别近。我相信只要我有求于他,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给他写了求助的信,没过几天,他就把相机寄了过来。有了相机,我和弟弟又到几百里外的齐齐哈尔去采购相纸、胶卷、显影粉、定影粉和各种该用的东西。当然,像曝光箱、暗袋这些东西,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

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俩就要尝试尝试走家串户的滋味,干上真正意义的"自由职业"——自己当老板,自己又是自己的雇员。

6. 照相

在70年代,搞副业不是光明正大的,就好像做了一件理亏的事。如果是个人出外搞副业,简直就是"违法",人人有权力制止、扣押、没收搞副业的工具。官方就有明文的规定,称这类活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即使生产队集体外出搞副业也不支持,如果钱挣得多了,甚至会强令制止。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选的第一个村子是与我们诺敏河大队一江之隔的"靠山屯"大队。选那里的原因有三个:一、李家在那里有亲戚,万一出事可以找人说情;二、那里有两个小队全是达斡尔人,据说少数民族的人不爱讲究是不是"走资本

主义道路”，比汉人反而更好打交道；三、照完相可以回来冲洗相片，不存在吃、住问题。

莫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这个地方，冬天的风很小，所以白天并不很冷，在室外照相，也不算受罪。况且照完了一拨，要等另一拨换衣服、化妆，一等就是几十分钟。这几十分钟是坐在屋里，能暖和暖和身子。

喜欢照相的多数是女人，有十几岁的姑娘，也有结婚不久的媳妇。那时，连口红都没有，所谓“化妆”，无非是梳光了头，洗洗脸，擦些胭脂、粉；把嘴唇用唾沫舔湿，抿一下红纸，代替了口红。当然都是把最漂亮的衣服穿上。更“讲究”的，还要洗了脚，穿上干净的尼龙袜子，磨蹭很长时间。

冬天的农村，找不到好看的背景。我们看着很有特色的篱笆、枯树、“勒勒车”（很大木轮的牛拉车），农民们却不喜欢，可能是天天看的缘故。他们选择的往往是村里少有的砖房或者涂着大蓝油漆的门窗当背景。如果连这也找不着，就挂起一块花线毯或床单，人站在前面。一两个人还好，四五个人，线毯、床单的大小已不够用，遮不住后边的破房，但是没有人埋怨这个不足——只要能把线毯、床单上的花纹照清楚了，人家就会非常满意。

第一天非常顺利，才半天多，120 相机的两卷胶卷共 24 张全照满了，如果每张都是好的，明天我们就能拿到 24 块钱——差不多快赶上当地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还有人想照，但是要等我们把今天照的相片送来，看着好再照。

回到李家，天还没黑。我们先把胶卷冲出来，等吃过晚饭，它晾干了，就可以洗相片了。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切也都如愿以偿，相片质量不

错。除了几张有的人闭上了眼睛或者后排人的脑袋顶部超出了画面。

当地人最忌讳照相不把人照全，好像相片上少点儿什么，就预示着他本人也少点儿什么。这时我想起“文革”初，关于领袖像一只耳朵、两只耳朵的风波，深感国人对相片的看法竟如此相似。当地的一些老人们，依然认为照相是吸“精血”的；年轻人虽然不信，但决不敢让孕妇去照，怕把胎儿照掉了；他们特别关心我们怎么处理报废的相片，生怕我们把它们扔进茅坑里或者大道上——知识的贫乏，就会把不能理解的事想得很神秘。

那时的胶卷质量很差，我们买的又是副品，底片的药膜常有小气泡，印出像来是一个个小白点儿。如果白点儿恰巧落在脸上，尤其在眼睛上，非常难看。我们就用碳素墨水小心地把相片修理一下，甚至要画出被遮住的眼珠。

第二天，我们把相片送去，得到相片的人都十分高兴，痛快地给了我们钱；照坏的人一个劲儿地追问我们怎么没照成，因为当地人流行着不少关于照相的恐怖故事。比如几个朋友一起合影，有个人总也照不出脑袋，连续重照了三次依然如故，经调查，原来那人已经死了三年。再比如，一家人去照全家福，取回相片发现少一个人，没两天那人就死了，等等。他们非常相信这类鬼怪的故事，一听说自己的相片没照好，非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可。我们只好说，是底片的质量毛病。他们还会问怎么处理的底片，我们就说“烧了”——把没用的相片、底片烧掉，是当地人认为最好的处理方法。

我们给照坏的人重新再照一次，又有几家要给出生不久的婴儿照相，还有几家要照全家的合影。

顶数照全家福麻烦。有时一次照相的有十几口人，要等他们一个个都换上干净的衣服，年轻的女人们还要描眉勾眼，媳妇们还要给婴儿喂足了奶水，以便照相的时候能保持着笑模样。等到真正要按快门，是最紧张的时候——人家要求婴儿笑的时候照，好不容易婴儿对着镜头笑了，往往大人的眼睛正盯着婴儿。下一次婴儿再笑不知要等多长时间。几个回合以后，往往婴儿就会大哭不止，老人一生气，不照了。所以只能抓拍，不能拖延。可是顾客又会有心理上的不平衡——准备了一个来小时，刚站好位置就照完了，会不会是在糊弄，是最佳姿态吗？这时准有人怀疑快门响的时候，他眨了眼。为了安慰人家，也为了保险，我们经常再重照一遍——这时可以慢慢摆弄每个人的位置和姿势，不用担心婴儿哭了。

其实我们不怕顾客磨蹭，有时候时间拖得越长越好，这样聚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照相往往是这样，就像起哄，越是热闹，跟着照的人越多；一冷清，犹豫不决的人也就不照了。所以我们从来不催他们，只有那性急的来催我们。

在靠山屯的两天算是首战告捷，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但是要想真正打开局面、提高效率，还要到远离城镇的村庄，吃住都要在那里，要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下去。

虽然还让李家介绍了亲戚，但是这决不是万无一失——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保不齐会遇上好管闲事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可不是地头蛇、无赖的对手。最好当然是有一封盖着公章的、允许外出搞副业的介绍信。

东北的大队干部比陕北的权力大点儿——自己就掌握着公章，开封介绍信不必先盖上自己的人名章，再到公社去换。但是让他们开张搞副业的介绍信，简直是幻想——上级三天

两头传达“割资本主义尾巴”，惟恐社员想多挣点儿钱，就是给他们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支持个人外出去搞副业。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一点儿化学知识。

掌握公章的大队干部往往没有多高的文化，每次我们去开介绍信，他都是让我们自己写好，他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就盖上公章。这次我也是先把介绍信写好，内容是：

各单位负责同志：

兹有我大队知青×××、×××两位同志，前往北京市回家探亲，请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

等大队盖好章以后，我用自制的“消字灵”把“前往北京市回家探亲”几个字改成了“前往你处搞副业照相”。

凭着这封“介绍信”，我们走过了许多村庄，只有一次遇到点儿麻烦，一个大队会计颠来倒去地仔细看它，看来他是有经验的，最后对着阳光又看了半天，终于加深了怀疑——改过字的地方透明度差。幸亏我们去那里，是他的朋友介绍找他的，他不好再说什么，只告诉我们那里不欢迎照相。

再后来，我们发现知青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势力，即使地痞、无赖或大小干部，也不爱惹知青。所以每到一个村子，只要有知青，先去投奔他们。因此，还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

进入腊月，是农民们一年之中最高兴的时候——地里的农活都干完了，冰天雪地的再也没的可干，整天可以东游西串，喝酒打牌，图个轻松自在。这时也是一年中最有钱的时候——生产队刚分完红，手里那点儿钱还没有花完。勤快点儿的，早早就操办了年货，杀猪、宰羊、蒸黏豆包；有办喜事

的，也都爱赶在这个时候，每个村都有迎亲嫁女的。这种喜兴的气氛，对我们照相极为有利，有时在较大的自然村，两天都离不开；最忙的时候，一天就照了一百来份，洗相片足足能忙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还没收拾完，性急的小孩已经来取相片了。

7. 置办家业

头一次到偏远的地方去照相，离开家有半个多月，胶卷、相纸都用完了，我们也特别惦念父亲。急忙把工作收了尾，乘长途汽车赶回了诺敏河。

父亲也正望眼欲穿地盼着我们回来，一个劲地嗔怪我们没有写封信回来。我们解释说，山里通信条件差，十天前发出的信现在未必能收到。

让父亲惊喜的是，我们带回来三百来块钱。有了这笔钱，我们就可以买房，有自己的小天地了。

“大姐”的父母——老森夫妇，恰巧此时打算迁回铁岭老家，他们居住的小马架就打算卖掉。马架的规格和姐姐他们的一样，另外还有一间面朝西的仓房；房后的园子很大，有一亩地左右，土质也不错。连同屋里的几件农具，要价 130 元。

父亲觉得值，就把它买下了。他主要看中了房后的大园子——要是栽满了旱烟，可以栽三千多棵，除了自己抽，还可以卖三百多块钱。

旱烟属于经济作物，比种粮食每亩产值要高出十来倍。社员都愿意在自留地里多种一些。但是毛泽东的指示是“以粮为纲”，农民多种了经济作物也算“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

公社规定每户只能种100棵,知青种多少不限制。

每年夏初，旱烟长一尺多高的时候，公社干部带领着外村上百个小学生,手里都拿着镰刀,挨家清点旱烟的数量,多于100棵的一律割掉,美其名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进入夏天了,东北的无霜期又短,此时种什么都来不及了。

栽种旱烟的收入虽然多，投入的工作量也特别大。旱烟生长得很快,长到一尺多高以后,如果雨水足,不去管它,几天就能长到一人多高。一旦让它长疯了，成色、产量就都完了。最好是只留下七八张叶子,其余都要掰掉。要是种三千多棵，那就要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掰尖劈叉，甚至下雨天都得干活。我和弟弟每天要到生产队干活,抽空要外出照相,秋天又不能放弃一年仅有的十来天打羊草（这是社员除年终分红以外最大的一笔收入)。侍弄旱烟的活大部分要由父亲承担,他还要为我们做饭，我们真担心他吃不消。可是他却不以为然,表示多大的苦都不在乎,只要心情愉快就行。

有了自己的房子，父亲忙得不可开交，他想尽量营造成一个像样的家。

我和弟弟不能错过农闲期间的挣钱好机会，只休息了两天就到齐齐哈尔去采购照相材料，从那里没回家就直奔阿荣旗一带的农村。

春节的前两天,我们才赶回家。

没进小马架，已经觉出院子增加了不少生气——除了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多了一只小狗。它才几个月大,父亲给它起名叫“悚儿”。我知道父亲最喜欢狗,自从1952年“套狗运动”把他的爱犬“哈利”强行装上了车,整整20年了,1972年，他才又有了机会养一条自己的狗，虽然它只是个普

通的“笨狗”。

马架里边，也已经焕然一新——窗纸改成了大块儿的玻璃，里屋的顶棚和四壁，糊上了雪白的纸。老森夫妇留下的12岁的大狸猫，正卧在热炕头呼呼地睡大觉。它那安然的样子，证明已经承认了我们这些新主人。

父亲告诉我们，他已经把窗下的窝收拾好了，就等着到春天，买来鸡、鸭、鹅喂养。后来他真的养了三只鹅、五只鸭子和二十多只鸡。我们每天都能吃上鸡蛋和腌鸭蛋、鹅蛋。

春节是农村最重大的节日，反正大家也没事儿可干，有人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工作。进入腊月以后，村里三天两头有人杀猪。

这里有这么个风俗，谁家杀猪，都要请村民们大吃一顿，惯例是猪肉、血肠、烧酒管够。这一顿，少说要吃走四分之一只猪，人缘好的，要搭进半只猪。剩下那半只，浇上水，埋上雪冻在背阴的窗前，猫、狗、小偷都别想偷吃、扛走，只等着过年再吃。

东北人区分猪肉的好坏，以脂肪的厚度来定。一二指（手指宽度）膘算差的，上好的肉是四指膘甚至一巴掌膘。杀猪请人吃的炖肉，都是专拣膘厚的地方，切成两寸见方的方块，有的不带一丝瘦肉，炖成八成熟，蘸酱油、蒜泥吃。不是人人爱吃肥肉，吃瘦的恐怕一头猪也不够。肉块儿切的大小也有讲究，让你夹一块儿准能吃下，夹两块儿又怕吃不了。

血肠可是东北的风味菜。别看做法都是把猪血、板油、作料灌进大肠，跟猪肉一块儿炖熟的，质量可完全不一样。好的血肠，切成薄片颤巍巍的，断面光亮，稍稍向里凹进。

等大拨的吃客走了，主人会另把杀猪的主力和知己朋友

召集到一起,踏踏实实地吃一顿。这时,上好的血肠才能端出来,炖肉也不再是简单的大肥块儿,而是肥瘦相间的五花儿肉,还配有宽宽的粉条、驰名中外的本地特产"花脸蘑"。这顿酒,要从下午两三点喝到半夜。

离年根更近的几天,家家都要蒸黏豆包。汗古尔河不产小麦,黏豆包是最好的主食。它确实很好吃,更大的优点是便于储存。东北的冬天,是天然的大冰箱,食品放在仓房里不用担心变质。但是有的食品,比如馒头、发糕,存放久了就会发干、开裂,怎么回锅也不如新做的好吃了。黏豆包则不然,无论放多久,重新蒸一下还和刚做的那么好吃。所以家家都要蒸一大缸,从磨黄黏米面、糗豆馅儿到冷冻存放,要忙活好几天。

我们是新建的家,没有养猪,也还没有完全习惯当地的过年方式,自然省却了这些麻烦。老李家的亲戚和两旁的邻居,看我们不做准备,纷纷送来他们自己制作的年货。父亲从老李家买了20斤猪肉,可惜是患了囊虫病的"豆猪肉",因为事先预订的,他不好意思反悔,留着炖烂了吃。他又从别人家买了20斤好肉,留着炒菜用。

有了自己的房,来串门的知青越来越多了,也带来不少"小道消息"和北京的见闻。过年后最大的新闻就是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即将建交,来我们小马架的知青谈论的也主要是这个话题。

以前我们受到的官方教育,都是美国政府怎么坏、美国人民怎么穷。

多数人看不惯北京城里明目张胆地造假。明明人民生活极度贫穷,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各单位领导却教职工骗外国人,说生活如何富裕,物资供应如何充足。各单位还传达一个

老太太的“爱国”事迹：她逛商店的时候，正巧一群来华参观的外国人也走进了这家商店。老太太急中生智，为了显示中国人生活的富裕，把随身带的全家一年的供给票证都买了华而不实的高档食品。等外国人走出了商店，她又把东西一件件退掉。弄虚作假的行为就是这样受到了表扬，又通过单位领导传授给广大职工去效仿。

有一种传说对人的诱惑力最大：外宾只要进一个商店参观，该商店立刻把大门关上，不许顾客再往里进，只许出。里边的顾客如同拣到了“狗头金”，买什么东西都不再需要票证，只收原来那么多钱。赶上这种机会，身上又没带多少钱的，只能自认晦气。据说那时闲着没事儿干的人，都爱逛商店。但是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没听说有谁撞上了这种好运。所以，这种传说，恐怕只是人们的幻想。

外国人生活怎么好，不久我们就十分清楚了。

美国和中国建交前，日本先与中国建了交。中日刚一建交，日本人就来寻找他们在二战结束时留下的“遗孤”。原来二十几年前，日本军队投降回国时，遗留下许多老弱病残。如今这些人有的去世了，有的改嫁给中国人，当时的婴幼儿也都长大成人了。诺敏河大队就有一位日籍的小伙子。他母亲改嫁给一位农民，已经去世几年了。他因为是外籍，上学、招工都备受歧视，快30了，还找不到媳妇，仍然和继父一起过。他还有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各一个。

他得到日本人寻找亲人的有关资料，可惜看不懂日文，找我父亲帮他翻译和给日方写信，终于回到了祖国。几个月以后，他又到诺敏河探亲，已经能给弟弟、妹妹买来农民可望而不可求的“永久”、“飞鸽”自行车了（名牌车凭票购买，对农

民从来不发给票)。我们很关心日本人的生活状况,听他一介绍,我们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

最让我感动的是,有的知青,得知遇罗克的弟弟、妹妹就在诺敏河插队,特意从几十里外的别的大队来看望我们,他们并没有因为我家的遭遇而敬而远之,反而明确地表示崇敬遇罗克。后来我去甘河办焊条厂,厂子办起来之前,曾经在加格达奇住过几个月。收留我们的朋友,也是出于这种心情,无私地对我们帮助。

当然,盲从于官方的口径,对我们怀有敌意的,也不乏其人。有时候许多人聚在一起,我前脚刚离开,就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向别人介绍我们一家人如何"反动"。有一年北京从汗古尔河招教师,条件是老高中生。我符合条件,报了名,但是没有被录取。我去质问专管知青的干部(天津派来的)为什么,他说没通过政审。我故意还问他,因为什么。他没好气儿地说:"你自己还不清楚?"——在这种人的眼里,还别说我本人坐过牢,株连九族都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就知道有几个知青,条件也够,因为父亲被镇压了,连名都没有报。

正月过去了,生产队沉寂了两个多月的"钟"又被队长敲响了。队长敲完"钟",又从村东头走到西头,挨家通知:"去永和家开会喽——"

永和家在村中央,房子宽敞——里屋是打通的两间,火炕烧得又热,开会常选他家。

这是每年例行的"生产动员会",标志着从今以后,社员又要下地干活了,结束了自由散漫的日子。其实此时大地还没有解冻,地里农活不多,加上天短,出工也记不上满分。可是公社有规定,某月某日必须进入春耕生产,说不定会来检查。

虽然《毛主席语录》里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句话，可是大大小小干部们，却常常把群众的智商视为儿童。县、公社干部，居然下达文件规定播种的日子。如果规定的日子与农时相符，农民们只当是句废话，多说一句也没什么坏处。可是他们偏偏让提前十来天播种，以为这样就解决了东北地区无霜期短的问题。农民想不执行，文件又强调着，执不执行文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只能硬着头皮去种。

苗刚出土十来天，一场霜冻要了它们的命。再去补种，已经错过了农时，产量只有正常年景的几分之一。

如果以为只有东北的干部才这么愚昧，那就错了。我们在陕北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本来山上该种耐旱的谷子，上级非让种玉米不可，理由是种玉米高产。结果不但没高产，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东北、陕北，两地相距几千公里，愚蠢的领导方法却如出一辙，可见全国得有多少这类的蠢事！我们到农村，不过才两年多，知道的也仅仅是两年多的事，可想而知十几、二十年里，要有多少这类的蠢事！

生产队借着开会的机会，又讨论了新的一年各种人事安排。等队长没什么说的了，我忽然提出，两个因为打架出了人命的人，如今在监狱关押了一年多，两家丧失了主要劳力，都欠生产队不少钱，大家应该努力救他们俩早点儿出狱。

我的话刚一出口，社员们立刻议论起来乱成了一锅粥。听了半天我明白了大家的意思：救本村的人，没有人反对，只是觉得我这是在异想天开——公安局能听老百姓的？母亲常爱说的一句口头禅——“有枣没枣先打上一竿子”——这时

派上了用场。大家一听也有道理，况且我答应出头去与旗(县)公安局交涉，众人只管签个名就行。于是再没有了争议，不少人反而表现出少有的热情。我趁机拿出早写好的“请愿书”，治国接过去就到一个个社员面前催着签，嘴里还不住地说：“要签就快点儿，别光耍嘴皮子，救人就得来点儿真格的。快！快！”原本和两家关系不好的、有点儿意见的人，也不好意思不签这个名。

多数人就是这样，别看在家门口、社员之间，能说，能骂，能打，能闹，就是发憷见穿官衣儿、吃官饭的，在人家面前，有理也说不出，属于自己的权利也不知道争取。惯得“公仆”们越发瞧不起自己的“主人”。久而久之，社员们以为自己只有听喝的份儿，如果到政府机关讲个理儿，要求点儿什么，仿佛是做了件错事。所以没有人把我的行动当回事，认定了我也就是白忙活一阵。

我拿着几十人签名的“请愿书”，找大队、公社分别开了介绍信，又找旗公安局预审科面谈了几次。我强调李、胡两家本来关系很好，从来也没闹过矛盾。老胡打死了老李的弟弟，纯属酒后失手的误伤。现在两家的生活都十分困难，也不想再追究谁的责任了。

同样的意思，设法让人给狱中的老李带信儿，叫他千万别死咬着老胡给他弟弟偿命——公安局既然认为老李是挑唆打架的，如果老胡的罪过大，老李的罪过也就大。

真应了“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这句话，两个多月以后，这桩案子有了结果——老胡被判刑7年；老李被判刑4年，监外执行。老李能回家，不管是以什么名义，就高兴万分了。农民已然是社会的最底层了，在家服刑的犯人，除了不能当队长，

待遇和别的社员也没什么区别。不像城里人，还可以用工资、转正、提干、分房等等待遇来限制服刑的。

老李也知道，能得到“监外执行”，算是自己的幸运，全县每年那么多被判刑的，未必有一两个有这运气。他知道这是我的功劳。

老李家办了一个宴会，来庆祝他能回家。吃饭的人很多，我当然成了最受尊敬的贵宾。我有生以来，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多对我的赞美之词，就连我年轻就歇顶，也成了难能可贵的标志——“贵人不顶重发”。

老李本来就很能说，几杯酒下肚更是说得滔滔不绝，频频给我敬酒，拿我当恩人看待，一个劲儿地表示不知道怎么报答我才好。

我向来不能喝酒，喝几口就会面红耳赤，再多就该恶心呕吐了。东北人又极喜欢劝酒，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双方都醉得不省人事才算以诚相待。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我只好轻轻抿一下，但架不住时间长、次数多，也渐渐感觉头昏脑涨。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我家的遭遇，脱口而出：“大姐夫，现在不用报答，等我坐了班房，你们也帮帮我就行了。”

喝酒时间长了，正愁找不着新话题。听我这么一说，一屋子的人都嗔怪我说话不吉利，太爱开玩笑。老李更是装做生气的样子责怪我：“大兄弟，这是说哪儿的话！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将来前程不可限量，可不兴说作践自己的话。”

从此，我们和老李家关系非同一般。老李家族的人，把我们都当做亲人一样。老李这个“干姐夫”，真是比亲姐夫还更关心我们，当地人的一切生产、生活的窍门，他都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对我父亲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有了他，我们再出门

就不会有后顾之忧。

开春不久，我们小队的会计被抽调到大队去当会计，经知青和许多社员的提名，让我补了这个缺。生产队的会计工作很简单，加、减、乘、除熟练就行，况且父亲在专业知识上还能给予指点，所以我干起来不费劲儿，工分却多挣不少。

谁接手一件新的工作，都想努力把它干好。我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想证明一下：因为我当了会计，马上就能给生产队带来明显的好处。

翻看一两年前的账本，发现许多公社干部都欠着生产队的钱。原来公社每年年终都规定，某小队今年给某几个干部送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明年再给另外几个干部送去相似的东西。送的东西主要是该生产队的特产，我队种大芸豆比较多，就让送大芸豆，也有的队让送土豆、粉条的。名义上不叫“送”，说是干部们花钱买，实际上没见谁给过钱，全都欠着。我问队长，为什么不去要？他说：“都是管着咱们的，有的还是前几把手，谁敢去要？”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于涉世不深的我来说，还看不惯这种明吃暗要的腐败现象，决心把十来笔欠款要回来。

公社一把手在深挖“内人党”冤案期间，被怀疑过，和治国一起被关押过，两人关系不错，我让治国去找他要。如果一把手的账还清了，其余干部的欠债就不难追回。同时，我去公社也很主要的负责人老权家要账。

老权全家和我关系都不错，我们认识是因为盖公社医院，住宿的木匠都在他家吃、住。老权子女多，老婆体弱多病又没有工作，生活比较困难，所以才揽下这么个活。几个月的

相处，老权的儿子又整天和我在一起干活，自然就建立了友谊。医院盖完以后，我们还经常走动，以至有些知青误以为我是小权的师傅。

要账工作却很不顺利。治国回来沮丧地说，“一把手”向他诉了半天苦，最后说：“治国，如果你回去不好交差，我给你写份检查带回去。”治国认为检查也当不了钱，所以就没让他写。

我也碰了一个软钉子。老权客客气气地答应我，等钱凑齐了就给我送去。可是他们一家人诧异的眼光，分明告诉我：“后悔交了一个不通情理的白眼狼。”也难怪人家会这么想——几天前，“大姐夫”的妹夫被人打破了头，半夜我送他到公社医院住进公社的招待所，在招待所当服务员的老权的大女儿，特意回家做了一锅饭菜给我们送来。我还没来得及感谢，反而给人家送去了账单！

两次碰壁使我彻底打消了要账的念头——即使从一些小干部那里要来一点儿钱，人家说不定怎么骂我们欺软怕硬呢。

生活安顿了，我急忙给还留在北京的菁菁写信，让她快点儿来。为了怕她以为这里也像陕北那么苦，我不厌其烦地讲了这里怎么富裕。

过了很长时间，写了好几封信，她终于来了。

没有女人的家，总让人感觉缺少点儿什么，有了菁菁，小马架就更像个地地道道的家了；村里女人来串门，也不显得那么尴尬。

这年（1972 年）年底，生产队分完了红，我就彻底没事儿了。前些天弟弟回北京看母亲，我一个人不便出去照相，打算

去山里的太平庄换些麦子，拉回些晒烟用的木料，多买些榛子留着过年吃。我和弟弟都非常爱吃榛子，父亲甚至认为它是天下最好吃的零食。

太平庄离诺敏河一百八十多里，多一半儿是山路。一年前，我和弟弟去那里照相，投奔的是一个浙江知青点儿。我俩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和十几个知青交上了好朋友，他们都拿出从家带来的好吃的款待我们，直到我们走，都有点儿依依不舍。让我们最难忘的是，每天晚上讲恐怖的故事。他们之中，有很能讲的，我和弟弟也不示弱。有时候我们一边冲洗相片一边讲，往往要讲到半夜，吓得女生都不敢自己回宿舍。临走，他们说，太平庄就出椽子（粗木材已经采不到了）、榛子、麦子，如果我们需要，只要提前说一声，他们就给准备好。当然，麦子需要拿粗粮换，榛子需要花钱买，椽子可以由他们采伐，不用花钱。

如果天不亮就出发，稍微走快点儿的话，天刚黑就能到。我从来没正式赶过大车，更没走过山路，平时顶多套上一匹老马，去草甸子上拉点儿羊草、柴禾。煞车也是跟大姐夫新学的，刚知道怎么捆“猪蹄扣”。

出发那天早上，天还没有一点儿放亮的意思，大姐夫就到小马架来催我起程，又到马棚帮我套好了车。知道我不会赶车，也拉不了太多的东西，只套上了两匹马——一匹有劲儿的“黑鬃马”驾辕，一匹老实的“青花马”拉里套。他本来想用两匹老实马，又怕我天黑前赶不到地方。

这匹黑鬃马脾气有点儿暴烈，最不容忍人对着它骂骂咧咧和啐唾沫，如果这样做了，它会高高地扬起前蹄向人刨去；离得远，够不着，它也会气得跺蹄子，记恨骂它的人。大姐夫

嘱咐我，路上千万不要轻易打它。

我的装束笨得像狗熊——严实的狗皮帽子，快到脚面的羊皮大衣，连指的皮手闷子，梆硬的“毡疙瘩”(毡靴)。大姐夫说，路远，必须这么防寒，否则容易冻伤。

还是当地人有经验。尽管我认为保暖的装束已经到家了，还是很快就被凌晨的寒风打透了——才走出十多里，手脚就冻得生疼。我连忙跳下车，在压实的雪地上小跑起来。

前几十里是平原，走得很顺利。一进入山区出了点儿意外——往山下走的时候，黑鬃马不习惯车推着它，突然惊了，顺着山路狂跑起来。我正在地上跟着走，很快就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连马车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我沿着公路走出好几里，陆续拣到了由车上掉下来的鞍子、草料口袋、大绳。我扛上这些东西又走出很远，发现马车卡在路边的排水沟里，车辕顶在了地上，马拉不动，只好停下。

我重新套好了马，连推带使劲吆喝着，把车又赶到路上，此时我早已是大汗淋漓。这才知道，每逢下坡，要拽住缰绳，不能让它们走快。果然一路上再也没有惊车。天将黑的时候，我到达了太平庄。

可能是为了省钱，知青点儿的好几个同学都没有回浙江探亲，他们就准备在这里过年了。有两个同学——小平、幼良要回浙江，得知我要来，特意等着和我一起走，计划在诺敏河住两天再回家去。

第二天，换好300斤麦子，买了100斤榛子，又往车上装了三十多根拳头粗细的椽子，足足有一人高。我用刚学来不久的知识，仔细地用大绳把货物煞好。为了防止下坡拉不住

黑鬃马,我们给大车装了一个刹车用的“闸”。

第二天还是那时候,我们三个顶着星星就上路了。

马的智商非常高,也十分可爱。才两天,因为总是我在照料它们,黑鬃马已经会向我点头表示友好了,回来的路上也十分听话。

幼良看我赶车很轻松,也想试一试。刚把鞭子拿到手不久,黑鬃马又惊得跑起来了。幸亏我们仨都没坐在高高的车上,不至于发生摔下来或翻车压住的危险。可是马就悬了——现在不像来时的空车,它的重心已经高了许多,遇到不平的路面非常容易翻车,一千多斤的木料要是压在黑鬃马的身上,后果简直难以想象。我们越落越远,只能干着急,听天由命!

虽然无能为力,我们还是竭力追赶着,一个个都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不知道会有什么惨状在等着我们。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有人向我们招手,呼喊着什么。等走近了才看见,他们已经把马拉住。原来黑鬃马跑上了坡以后,累得没了力气,速度慢下来了。对面赶车的农民看见我们的车上没有人,知道这是惊了马的车,急忙替我们把马拉住,等着我们来找。

经过这次波折,幼良再也不敢赶车,我们也都谨小慎微起来。一直到走完了山路,进入平原,我们的心才放下来,这时马也累得没了精神,想让它惊,它也惊不起来了。

重车比不上轻车走得那么快,进入平原离家还有五六十里,已经是傍晚了。太阳很快就隐落到远处山峦的背后,村落的上空,覆盖着一层淡淡的炊烟。走近村庄,能闻到柴草的烟香。路上人已经不多,孩子们都被叫回了家,偶尔能看见几个

干活的男人，也都是急匆匆赶回家去吃饭。女人有的高声喊着“咯——咯咯咯咯”呼唤自己的猪回圈；也有的“鸭鸭鸭”地叫着自己家的鸭子、鹅。

平原的村庄距离三四里一个，走过几个村子天已经大黑了。虽然没有路灯，四周的白雪和天上的星光足够用了，况且马的夜视能力极好，又能自己寻找到家的方向。我们甚至能一起坐在车上，轻松地休息休息。

大约十点多钟，我们终于到了家。父亲、菁菁和大姐夫都在焦急地等着我回来。菁菁说，后悔没和我一起去，害得她两晚上都没睡好觉。大姐夫也说，我刚一走，他就后悔给我套的马是暴烈的黑鬃马，应该找个老实点儿的，让他也提心吊胆了三天。父亲对路上的风险和车马的事本来一无所知，受了他们感染，也担起心来，看到我平安地回来，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急忙给我们张罗饭菜。

小平、幼良住了两天，我赶车送他们去四十里外的拉哈儿火车站。这次，我俨然是个成熟的车把势了。

8. 孩子送了人

菁菁是 1972 年末到的诺敏河，还没有进入夏季，我们忽然接到一封加急电报，告诉我们：她母亲病危，正在医院抢救。

菁菁的家庭，只有她们母女二人，她回去照顾母亲，责无旁贷。什么病，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道。焦急的她连夜乘火车回北京去了。我答应她随后就到，但是必须先去挣一笔钱，我知道这时候最需要钱，而手头一点儿都没有。

后来我们才知道，岳母患的是脑溢血，一天昏倒在街上，被“人民照相馆”的一名职工送进了医院。幸好她兜里有女儿寄来的信，医院才知道了我们的地址。菁菁赶去的时候，她已经在观察室昏迷着躺了7天（因为没有人付款，不能安排住院），嘴里还塞着7天前呕吐的东西。

岳母那时正在荀慧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家当保姆，那天出去买菜就再没有回来，荀家也非常奇怪。从菁菁那里知道岳母躺在了医院，出面帮助，这才住进了真正的病房。

十几天以后，岳母才苏醒过来，但是失去了任何记忆，除了左手，四肢全不能动。又过了十几天，可以认识最常见的人了，表达的方式就是哭，没有语言的表达能力。

对于这种病，医院没有任何办法。过了危险期，为了省钱，菁菁把她接回了家。这时，我也从东北赶回来，还带来二三百块钱，如果省着花，够生活好几个月的了。

菁菁家在前门大街肉市胡同，是一个只有三间半房子的很小的院子。院里共住了两家，菁菁家只有十平米的一间。

“文革”前这个院子都是她家的，还住着她的舅舅和大姨。“文革”初，因为早已去世的姨夫是“地主”出身，大姨因此被撵回农村，没多久吓得精神失常投井而死；1970年前后，“阶级斗争”被提高得空前绝后，舅舅因为从学校一毕业就有病没参加过工作，算是“无业游民”，撵到远离繁华地段的小胡同的一间小房里去住。腾空的房，搬来一家外贸公司的干部。

舅舅没参加工作原因很简单，上中学就得了肺结核，毕业以后哪个单位都不要他，自己也试着做几天临时工，无奈力不从心。如果他居住在别的地方，即使没有工作也不至于

被街道从好端端的住家中撵走，怪就怪他住在“全聚德烤鸭店”附近，而这家“全聚德”偏偏又是周恩来最欣赏的。每逢有“中央首长”来吃烤鸭，一百多米长的肉市胡同早早就布满了便衣，街道也嘱咐各家各户关紧大门减少走动。即使这样，还觉得“首长”安全没有保障，干脆把肉市胡同的居民当中，凡是有碴儿的都撵到别处去。

有一次我问“全聚德”的服务员，难道中南海就没有烤鸭的炉灶，派一两个最好的师傅去不比这么兴师动众的简便得多？他说：“你以为我们愿意接待这帮老爷？他们一来，不管吃多晚，我们谁也别想回家，恐怕我们走漏了风声，招来了杀手。有的‘首长’酒喝多了就管不住自己，恨不得一宿都不回去，手下的人谁敢管？非得把他夫人请来才能带他回去。人家偏偏喜欢我们这个炉烤出来的味儿，据说换个地方味儿就不行。要不怎么大师傅老得拜灶王爷呢。”

幸亏菁菁家占的房子少，人口又简单，就还给她们保留了自己的住房。假如真要撵她们娘儿俩走，还难为了街道——到哪儿找这么小的房子去？要是反而给调大了，站到了什么阶级立场！

我和菁菁虽然没登记，早已是事实的夫妻关系。但是她不希望公开这种关系，理由是，已婚的知青就不能把户口调回北京了。

其实，无论未婚、已婚，调回北京的希望都非常渺茫，更没有什么文件规定已婚的知青就不能回北京。但是，人们就是爱在自己幻想的希望中生活，谁也不肯轻易承认无情的现实，所以都盼着有朝一日能回到北京。万一有了那样的机会，只要不是全部回来，按照惯例，就要找你的不是。虽说结婚不

是犯错误,可是总没有坚持晚婚的人那么理直气壮——晚婚、晚育毕竟是政府规定的国策嘛。

我十分不习惯过这种偷偷摸摸的夫妻生活——白天呆在她家，晚上回到母亲那里，想亲热一下都得等邻居全家走了以后，关好了街门……既然还没有人剥夺我们的“结婚权”，何必自己治自己呢?转念又一想,菁菁有她的选择权,如果我坚持自己的主张，人家会说:“你们家的人回北京是没希望了,怎么能妨碍别人回北京呢,这样做岂不太自私了?”所以我只好由着她。

屋漏偏逢倾盆雨，船破竟遇顶头风——菁菁怀孕的身体越来越显形了。年初,她到东北不久以后怀上的。发现了,她很不高兴，让我带她去齐齐哈尔做流产手术。不料大夫检查完却说,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手术有危险,不给做。至今,足足又过了三个月。

好在她的身形不是太笨，穿肥大、厚实一点儿的衣服还能掩人耳目。可是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么穿戴常引起好事的老太太们不怀好意的眼光。

有一天，我带她去妇产医院做检查，顺便到治国家看望他母亲——赵伯母。菁菁向她说了当前的难处,热情、爽快的赵伯母马上说:“这有什么?你们娘儿仨搬到我这儿来住,我还能协助罗文照顾病人、伺候月子,等孩子生完了,你们愿意回去再回去。”

赵伯母住两间打通的东房，院子里其余房间住的是人口挺多的一家人。按理说赵伯母和四个子女五口人才两间房，实在不算宽敞，怎么倒能又收留我们三口?原来她的四个孩子全不在身边——老大治民在劳改队服刑，其余三个孩子都

是插队，只有最小的儿子分配在北京远郊区，每星期能回家住一天。

“文革”前，赵伯母是个会计，“文革”初全家被撵到农村，自然就丢掉了工作。农村不欢迎这些“残渣余孽”，又把他们撵回来，两三年以后，才分配她当个售货员，每月三十多块工资。这点儿工资她还要省出多一半儿，给大儿子寄食品，援助女儿和小儿子。自己想方设法地节俭——没见她给自己买过衣服，晚饭经常是从食堂带来的馒头就着黄瓜蘸黄酱吃。她常感慨地说：“当妈的就是欠儿女的。”她把儿女看得比自己重要得多。

赵伯母把我也看做她自己的孩子似的，我们住在她家，比在自己家还随便、踏实。她一点儿也没有家长作风。

岳母刚从医院回家的时候，荀慧生的女儿荀令来为我们请来一位有名的针灸大夫到家治疗，效果不错。大夫知道，我们这种贫困的家庭是请不起他的，就在每次扎针的时候，有意识地教教我，以便日后他不来了也能继续治。住到赵伯母家以前，就开始由我针灸治疗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月以后，岳母佝偻的双腿已经渐渐伸直，左手的力气也大了许多，甚至可以扶着东西站起来了。这时候，菁菁也要临产了。

菁菁没有北京的户口，住院也是个问题。各个医院的病床都紧张极了，除非急诊或疑难病症（有相应转院证明），外地户口想住院简直没门儿，何况我们还想住进首屈一指的“妇产医院”！如果耗到眼看要生下来，当急诊送到医院，也是个办法，但是来不及做各种检查，增加了危险。

赵伯母安慰我们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去试试

看。”她特意穿上一件干净的工作服,因为上面赫然印着“东四人民市场”六个字——这是块令人羡慕的招牌。

在东北有句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大马勺,售货员。”这是老百姓最羡慕的四种职业,也是当时物资奇缺、民不聊生的环境下,最能得到实惠的工作。摊上这类工作,连亲戚朋友都能沾光。北京人虽然没有这么直白,心里未必不这么想、不这么做。我们插队的一个同学的妹妹是一个小副食店的售货员,好多同学都到她那里买芝麻酱,为的是不在购货本上记录,能多买一些。

“东四人民市场”是北京有名的四大商场之一,能沾光的“好处”就不仅仅是芝麻酱这种小意思了。比如“高压锅”,是种新鲜东西,数量也没有保障,还一时无法凭票供应,往往是货来了,谁赶上就卖给谁。即使凭票供应的,也有好坏之分,好的来了,一抢而光,没赶上的认倒霉。有关系的,可以让售货员先买下来存着,知道消息再去取。身上带着“东四人民市场”的字号,地位不亚于“协和医院”的大夫,走到哪儿都被人看重——大夫可没办法老随身带着字号。

不一会儿,赵伯母笑容满面地回来了,说马上就可以住院。

几天以后,菁菁生下了一个儿子。母亲、赵伯母、荀令来这几个知道消息的人都去医院祝贺,买了许多营养品。我连忙熬好了鸡汤,给她送去。许多亲戚朋友根本就不知道她怀孕的事,所以看望她的人并不是太多。

我们都为她母子平安高兴,只有她自己整天闷闷不乐——发愁孩子怎么养。

要是我的打算,这事很好解决——我们四口人都去东北,

保准日子会过得不错——姐姐和治国带着孩子，不是过得很好么。

菁菁却不这么想。她坚决不去东北，理由是岳母没离开过北京，现在又得了病，到农村还不要了她的命？我却认为是菁菁想留在北京，她有个重病的母亲，成了特殊困难户，户口办回北京是有希望了，但前提是不能有孩子——还得装做未婚。所以她问我能不能把孩子带到东北。

我告诉她，我自己带孩子是不可能的——为了养活她和岳母，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去挣钱，孩子由谁来带？农村没有牛奶，小孩儿经常得病，稍一耽误就会要了他的命。

"有的知青的孩子，就是由北京的爷爷奶奶带大的。"她暗示我让我的母亲来养活。

"我母亲还在上班，怎么看孩子？况且我的母亲最不会带孩子，我们小时候个个不是她带大的。更主要的，我决不想再给她添任何麻烦，我们已经给父母带来够多的痛苦了。哪怕我不要这个孩子，也不愿他们再受苦恼。"

我还是听凭菁菁的决定，无论是把孩子送人，还是我们一起到东北过真真正正的家庭生活，都不想干预她。

可以商量的人不多。赵伯母私下对我说："孩子怎么能不要？他是你们遇家传宗接代的大孙子！再说，夫妻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东北农村，能过长么？"

我家人不讲"血统论"，母亲并不考虑传宗接代，只是说："你们的事儿，家长不便多干涉。我只能提个建议，你们要是还想正儿八经过日子，就回东北去。"

菁菁去求荀令来帮忙，她说："这个忙儿我能帮，保证把孩子给一个不错的人家，只是你们别后悔。罗文真的同意

吗？"她看我点头了，才放了心。

菁菁要出院的那天，令来告诉我们，孩子给了一个军人，是个汽车司机，生活条件很富裕。她还拿出一百块钱来，说是人家给产妇的营养补助。菁菁哭了，死活不接那钱，令来硬是把它塞进菁菁的口袋。

回到赵伯母家，菁菁好多天的心情都不好，赵伯母想方设法地打岔、开玩笑、说些让人高兴的事来分散她的忧郁。我也带她出去散心，害她得了场重感冒。

出了月子，我们才告别了赵伯母，又回到肉市胡同。

人最怕得脑子的病，往往会有非常的举动。我和菁菁稍显亲热，岳母就非常不满意，来了亲戚她会用肢体语言进行"告状"，让人猜测我们一定有了什么过分的举动，常常让我们感到无地自容。但是无法和她一般见识，谁让我们只有这么小的活动空间！况且我们也都知道，她得这种病，简直对她是最大的磨难——岳母健康的时候，最讲究卫生，说她有洁癖都不为过。她以前见到半身不遂的人，见他们连自身的卫生都无法保证，不止一次地说："我要是得了这病，真不如死了。"等她真得了这病，卫生还是想讲，却非常怕死；以前特别注意仪表，喜欢打扮，现在却龇牙咧嘴，顾不上发型，所以十分苦恼，惟恐我们认为她是个累赘。

为了让她能高兴，我把一把普通的木椅，钉上扶手和童车的轮子，推着她到天安门广场去散心。岳母是个喜欢热闹的人，过去没病的时候也不爱憋在家里，现在能来到街上，高兴异常，像小孩儿一样傻笑。她的怪模样和别具一格而寒酸的轮椅，招来许多行人好奇的目光。我不在乎这一切，只要菁菁能感到欣慰就行。

我们去了几次以后，有一天菁菁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在别人眼里，一定像个傻柱子推个疯老太太。"她立刻动情地把我抱住了。

我认为这就够了，我已经得到了回报。

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她们娘儿俩都有了好心情。

这时候我该回东北了——我必须挣出她们在北京的生活费。

9. 难忘旧情

夏季的一个早晨，我和弟弟刚起床，不约而同地告诉父亲，夜里梦见了二姨夫。父亲高兴地说："说明你们很重感情，这是为人最要紧的品质。"

我小的时候，和二姨夫关系最好，直到二姨去世，小霞表妹去了东北农场，我还时常去看望孤身一人的他。如果几天没见面，还非常想念他。"文革"时，他虽然被划成"阶级敌人"，又失去了老伴儿，依然改不了幽默的性格，时不时说几句笑话。我每次去他家，准给我做我最喜欢吃的大米饭、爆羊肉。

姨夫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拉京胡，最喜欢的享受是去澡堂"泡澡"。所谓"泡澡"不同于一般的洗澡，过程是这样：去之前要买些糕点；进澡堂（公共浴池）要在很热的池子里泡很长时间，直到全身的皮肤被烫得通红；然后回到大厅里自己的小床（两人一组，中间有个小桌，组与组之间有很矮的木板墙隔开）美美睡一大觉；醒来叫服务员沏壶茶，慢慢品尝带来的糕点；吃饱喝足了，再去冲个淋浴，然后才能回家。整个过程要

用大半天时间——地地道道的消磨时间。

二姨夫邀请我去了一次，作为小孩，除了对糕点有兴趣以外，对其他项目毫无兴趣。后来想起来，觉得也不够卫生。

1967年以后，我忙着办报纸、去外地，和哥哥他们忙这忙那，很少去姨夫家了。倒是弟弟经常去，让姨夫教拉二胡。以后弟弟也和姨夫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弟弟临去陕北插队，姨夫还送了一条格言——“闷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他人”。

可惜这难得的感情因为一件小事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姐姐在“闯关东”临走前，苦于没有路费，去姨夫那里借。姨夫可能心情正不好，随口说了一句：“你们遇家的孩子就是让大人不省心，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人越在窘迫的情况下，越容易有极强的自尊心。姐姐听姨夫这么一说，钱也不借了，扭头就回了家。在东北我们见了面，她把这个不愉快告诉了我们。虽然我和弟弟没有把姨夫想得那么坏，可是惟恐姨夫真的把我们都看成了累赘，自然不好意思主动去和他联系。

时间是最好的磨合剂。两年后，我和弟弟终于又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他。想不到，这时正是他去世的前后。几个月以后，弟弟回了趟北京，才打听到姨夫去世的经过。

自从我们和姨夫断了联系，苦闷、孤独的他鬼使神差般地又匆匆找了一位农村户口的老伴儿。没想到老太太自打结婚以后，没和姨夫过过几天夫妻生活，只是到姨夫发工资的时候来取生活费。姨夫发现原来自己找了一个前世的债主、现世的冤家。向老太太挑明了这层关系，老太太更是直言不讳——“要不是为了养活我那几个儿女，我才不嫁给你这个反革命呢，你娶了我就得给钱！想离婚？没门儿！”

姨夫气得没法儿，去农村求老太太答应离婚，老太太和一帮儿女竟将他推出门外。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敌敌畏”，威胁老太太，再不答应就死在她面前。这最后的杀手锏也没能唤起老太太的恻隐之心，姨夫就真的喝了“敌敌畏”死在了那里。

那年头，死了个“反革命”，是件“大快人心”的事，谁敢来表示同情，何况还是属于“自绝于人民”的自杀？

一生清贫简朴、胆小怕事的二姨、姨夫，终于到阴间团聚去了。生前脾气、爱好处处相同的一对恩爱夫妻，想不到连死的方式都那么相似。

一连好几天，我和弟弟摆脱不了想念姨夫的念头，父亲开导我们说：“离得远的亲戚你们想也没有用，不如多关心近的。咱们现在有点儿钱了，可是听说你姐姐他们日子很困难，你们应该帮帮他们。”

姐姐和治国最近买了外村的一所房子，因为离我们七小队远了，他们又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小马架售出的钱，远远不够这笔开支，所以他们的日子一下子就紧了起来。

姐姐他们买的房子里，刚刚杀死过人，位置又很偏僻——把着村子的一头，离最近的住户也有五十多米。如果不是因为它偏僻，还不会在那屋里发生那场凶杀案。

房子原来的主人姓杨，一家4口人——老爷子、儿子、儿媳和不满周岁的孙子。儿子因为天生耳朵有点儿聋，家境不很好，找了一个外地的“盲流”来“拉帮套”——相当于儿媳有两个丈夫，“拉帮套”的全部收入要归这个家。这种奇异的家庭虽然并不普遍，但是也不难见到，有的甚至维持了好多年。

时间一长,“盲流”已经不满足充当“拉帮套”的角色,和“儿媳妇”商量好出逃的计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聋子”去山里拉柴禾,两三天回不来,两人认为时机已到。

半夜,老爷子打牌回来,在北炕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鼾声大做。“盲流”抄起事先备好的洋镐,一下子把老爷子脑袋砸碎,血和脑浆流了一炕。又把小孩儿用电电死。惟恐小孩还能活,把尸首泡在酸菜缸里面。然后带着“儿媳妇”连夜出了村。

二人走出十几里,到了“儿媳妇”的娘家,他们决定先歇歇脚,等天亮了再去火车站,然后远走高飞。

“儿媳妇”的娘家人发现了二人神色不对劲儿,等“盲流”睡着了就逼问她,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家人明白此事非同小可,她再跟着他就无法摆脱帮凶的角色,惟一的出路是尽快自首。

“儿媳妇”的哥哥恰好是村里的民兵队长,立即找来几个民兵把“盲流”抓了起来,声明自己的妹妹是被“盲流”绑架,检举了杀人犯。天亮以后把他们送到了旗公安局。

事发两三天以后,公安局的人到杀人现场取证,“聋子”还没回家,两个尸首还在原地,村里的人还不知道这家出了事。可见这所房子有多偏僻。

后来“聋子”还决定要他老婆,他知道自己有缺陷,今后再重新找老婆也难。又四处托人,终于让公安局把老婆放了出来,继续和他过日子。但是这所房子死活不再要了。

姐姐他们搬来住的时候,北炕还是血迹斑斑。我们特意把北炕刨掉,姐姐后来用纸糊了一道隔断墙,把那里间壁成一个储藏室。

每次我来到姐姐家串门，如果她家里没有人，我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尤其是天将擦黑的时候，四周再刮起小风，我马上会想起“阴风四起”这句话。后来我带治国外出照相，一走就是十几天，只有姐姐一人在家，我真佩服她的胆量。

姐姐他们除了看中了这房子便宜，更看中了房子四周将近三亩地的园子和上面的十几棵果树。有了这么大的园子，他们即使不去生产队干活也闲不着，收入也相当可观；十几棵果树是海棠和沙果，存到冬天做成糖葫芦去卖，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勤快的人没有怕钱多的。这么大的园子，基本是姐姐一个人侍弄，以便治国能去生产队挣工分。她种了一万五千棵旱烟，一千多棵向日葵。每次我去看姐姐，她准是在地里弯着腰掰烟叉。我和她一块儿干了一会儿，一人掰两条垄，她能远远把我落在后边。因为干这活儿直不起腰，我干时间稍长就会觉得腰酸，她却是一大一天地这么干，有时候还得背着孩子。

冬天，场院里的活一结束，生产队大宗的活就没有了，治国住得远，索性就不到队里来了。别看他不来队里，他和姐姐两口子可闲不住——姐姐在家蘸冰糖葫芦、冻冰棍儿，治国用自行车驮个竹篮，拿到远处的村子去卖；他们种的葵花子，也是炒熟了驮到车站，一毛钱一碗地零售出去。

北京知青大多数拉不开脸面，明知道能赚钱，也不好意思做小买卖。姐姐、治国可没有这个偏见，他们认为，靠自己劳动赚钱，就应该理直气壮，一点儿也不丢人。就是熟人吃了他的东西，治国也敢要钱——有人以为是治国白送的，吃完了刚想走，治国会毫不客气地把他拦住，该多少钱要多少钱，不

管人家什么眼神。我劝他,还不如不给人家吃。他说:“我得让他们明白,买卖归买卖,交情归交情,想占人便宜就没好结果。”

治国真得算是个“把家虎”,东西不白送不说,自已在外边转悠一天也舍不得吃一口。就是掉在竹篮底下的零星果子,他也得重新穿起来、哪怕减价卖,也得卖掉。回家就把钱如数交给姐姐,自己舍不得花。

尽管这样忙碌,做小买卖的收入还是有限。当我答应带他去照相,自然高兴万分,马上购置了相机,催着我和他上路。

和他一起出去有利也有弊。好处是,个别想要赖不给钱的一见他瞪起了眼,立刻打消了要赖的念头。坏处是,小孩儿见了他好哭,往往丢了生意;而且不好找落脚点——住知青点儿还好说,如果借住在农民家,能看出来人家非常勉强。所以,不如我和弟弟效率那么高。

我们家过得有模有样加上治国勇武有力,对别的知青多少也能带来一点儿帮助。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邻村嫁给社员的一个北京知青,突然跑到我家,哭着说她丈夫打她,请求我们帮助。对于这种家务事,我们真是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大家也只能说些安慰的话。

约莫一个小时以后,她丈夫在几处找不到她,料定躲在了我家,就上门来问。我本来打算和他好好谈谈,不料治国拦住了我,大声喊:“她不在这儿!快滚吧,你!”

那人一听这口气,更相信她就在屋里,在大门外就说开了软话,表示再也不打老婆了。治国知道我长了一脸“磨不开”的肉,禁不住人家三句好话,示意我不要答茬,凶狠地对

那人说:“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以后你再打老婆小心你的狗腿！”

那人乖乖地走了。当晚，姐姐陪那女生住在我们的小马架，我们男的到别人家去找宿。第二天一早，女生惦念孩子，紧忙回家了。

我们是年初买的马架，当年夏天，父亲的老朋友——营口的戴叔叔，来信委托我们设法安置他的大儿子——理铂。这个忙一定得帮。

戴叔叔是个很有才华的工程师，原来也在北京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与父亲成了难友。幸亏戴婶放弃了北京户口，回到营口老家，几年以后，戴叔叔才有幸和家人团聚。营口不是很大的城市，有很深学问的工程师不多，所以他还能找到一份技术工作。四五年前，他为了帮助父亲摆脱困境，给父亲也在营口找了个工作。还没干上三个月，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就去营口把父亲“提拿”回北京，这举动足以把营口也捅炸了窝。戴叔叔从此的日子再也不好过了，三天两头被揪去游街、挨批斗。

戴叔叔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受不了这么折腾。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主意——身边总带着一小瓶鸡血，只要听到外面有动静，估计揪人的又来了，急忙含上一口，等“革命群众”一进屋，马上装做吐血的样子。来人一是怕有传染，二是不愿让病人死在自己手上，往往能饶他一次。靠这办法，总算熬过了风头。但是不久以后又赶上了“下放”，戴叔叔一家被撵到辽宁海城附近一个穷村子，成了农民。理铂高中毕业，自然也是这村的农民。与其都是当农民，不如到好一点儿的地方去当，这时戴叔叔想起了我们。

接到戴叔叔的信，父亲立即回信表示欢迎，没几天理铂就背着行李到了。

理铂的年龄介于我和弟弟之间。以前父亲和弟弟去营口都和他见过面，只有我和他是初次相识。虽然是刚见面，因为他聪明、随和、懂礼貌，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以后外出照相正好分成两伙——我带着治国，弟弟带着理铂。

10. 放排去

1973年夏天，理铂到诺敏河才一两个月，我们结识了一位姓陆的"盲流"。

我们的小马架接待"盲流"可不止一次，来村里耍手艺的没地方落脚、天晚了赶不回去的，只要是本分的人，我们都热情招待，有时一住就是好几天。父亲很能理解我们的心——我们在外边流浪都是投奔到素不相识的人家，受到过许多热情、无私的帮助，也深知出门在外的难处和得到一点儿帮助时的喜悦心情。

这位"老"陆不是手艺人，他是来村里打短工的。

我们村不算穷，除了冬天，不断有人雇着短工——春天搂"大耙"（用二三十根钢丝齿的大耙子把草甸子的碎草搂在一起当柴烧），夏天脱坯盖房，秋天打羊草和柴草。

老陆并不老，顶多比我大七八岁。看他身体单薄、知识丰富的样子，就知道不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后来聊起来才知道，他是长春市人，因为伯父是个不小的官，还派他去驻广州办事处工作过。"文革"一开始，他伯父下了台，他也跟着倒了霉，下放到了农村。

我们相识是在村头队部门前，公社来的干部碰巧看见了他，正训斥道："你怎么又回来了？再不赶快回原籍去，还得把你抓起来！"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陪着笑脸。

等公社干部走了，我们好奇地问他。原来不久前他和许多"盲流"被公社收容审查，罚他们干了一个多月的义务劳动。因为干的是给家属宿舍抹墙，所以干部们都认识他。前几天刚把他遣送走，没等到原籍，他又返回来了。

出于同情，我们把他带回家。一聊起来发现，他上知天文、下懂地理，讲起故事不亚于评书演员。他干过许多工作，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放木排。

在我们村往北三百多里，是远近闻名的"小儿沟"。据说那里还有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盛产落叶松和各种硬杂木。正是因为交通不便，山里的木材运不出来，才没有把原始森林破坏掉，每年的开采量不大。

木材往外运的惟一通道，是靠流经小儿沟的诺敏河。把山上采伐好的木材两头凿出孔，穿成木排，顺着河漂流到下游，这就是"放排"。

木材一直是紧俏的物资，农民盖房想买一些还要申请"指标"，价钱也不低。但是放下来的木排必须卖给旗物资局，物资局的收购价并不高，放排的所得不是很多。可是，诺敏河汇入嫩江以后，沿江有许多高价收购木材的人，可以把木材卖给他们，所以放排的额外收入非常高。不过必须给物资局剩些，否则来年再去申请采伐，就不会批准了。

从上游到下游，设立了许多关卡，每经过一处都要清点数量，在采伐证上盖章，按说没有空子可钻，可是莫旗的人多数嗜酒如命，给关卡的人几瓶烧酒，他就会在采伐证上写上，

若干木排撞散,实剩多少。

放排是个极其危险的工作。有的河道水流湍急，一旦木排撞在岩石上，散落的木材和后边冲过来的木排就会把人挤死。据说有三个知青放排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当时撞死了一个；一个爬上了河中的孤岛、冻饿而死；另一个游到岸边，走进了原始森林，找不到出路和食物，上吊而死。不仅危险，而且苦、累，但是可观的收入还是吸引了大批的人愿意去冒险。

老陆是个很能说的人，他能把原本很艰苦的工作描绘得妙趣横生。治国一听说放排，兴趣比我们仨都高，他最向往的就是生活在深山老林、住帐篷、过原始蛮荒的自由生活，也整天围着老陆打听这打听那。老陆有说不完的趣闻，直到把我们四个说得恨不得马上就去小儿沟。

几天以后，我们在大队、公社开好了介绍信，我和理铂就去旗物资局办采伐证。

虽然物资局希望多采伐木材，但是并不轻易批准放排。因为只要批准一伙人去，就要给几百块钱的贷款、每人三尺半的劳动布（做裤子用），如果中途出了意外或变故，这笔钱很难收回。为了能办成手续，我特意带去了一铁筒精装的“红双喜”香烟。

这烟的来头可不简单，是托菁菁的舅舅从总政治部买来的，市场上绝对见不到，即使有钱也买不着。烟买来，父亲舍不得抽，就准备求人办事的时候打点着用。

北京普通市民每月凭购货本供应十来盒香烟。最好的是“前门”和“牡丹”，只能买一两盒，其余要搭次烟。有外国人看着的首都尚且如此，小城市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对农民来

说，除了能买到敞开供应的最差的劣质香烟，别的什么也买不到。

有这好烟,办事确实顺利得多。50支的一筒,不一会儿去掉了一大半儿。等我临走时,两位女士进来故意问:"听说你们这儿才刚来人拿来的烟特别好抽,还有没?"

我赶紧把剩下的全交给她们,装做不在乎地说:"剩不多了，你们喜欢就都拿去。我不知道咱们东北也愿意抽这牌子的,下次再来多带来点儿好了。"

老陆不是莫旗的人，没资格申请，我只能报四个人的名字。采伐证当即就办好了,又贷给我们400块钱,开了张买14尺布的证明。这400块规定了用项——买两头牛、两架勒勒车、伐木的工具。

"勒勒车"是达斡尔人常用的运输工具，汉族人也叫它"大轱辘车"或"草上飞"。顾名思义,车轱辘直径很大,起码有一米四;适合在没有路的草甸子上行走。整个车——车身、车轮、车轴，都是木头做的，只有在车毂和车轴摩擦的地方，镶上了铸铁的圈和键；车轮外圆简单到只用手腕粗细的小桦树圈成,所以车子十分轻便。驾车的都用牛,没见过用马,可能马那么快的速度非把车拉散架了不行。

放排的事儿一经确定，我让弟弟代替我生产队会计的职务,又把老陆请来,让他详细讲讲工作的细节。

老陆从穿衣、吃饭说起,直到如何将木材脱手,打通各个关节,足足说了两天。我们从中得到了不少知识,比如进山不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以免刺激野兽；对人威胁最大的动物是黑熊，但是它很少伤人，万一被它追赶应该绕着树兜圈子，它追不上自然就气走了；真正厉害的是"瞎虻"(牛虻)，本地

瞎虻只有两三个苍蝇大，山里的一只能装满一个火柴盒，牛被它叮上会疼得拖着木材疯跑，极容易造成人和牛的伤亡；牛是采伐工作不可缺少的帮手，砍倒的木材全靠它拖到河边，人的力量是绝对办不到的，一定要用年轻力壮的公牛；几个月内吃不上青菜，最好的副食品是臭豆腐、酱豆腐、黄酱、大葱，务必带足……

山上的忌讳特别多——不许坐在采伐后留下的木桩上；不许说一切不吉利的话，甚至连吃饭的“饭”因为与翻船的“翻”发音近似也不能说。当地人的讲究就更多了，根据女人代表不吉利，晚上睡觉梦见了老婆第二天都要停止一天放排。

如果光是我们自己，说什么都没关系，可是如果和别的放排人在一起合伙，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否则找不到朋友。即使不想和别人合伙，总得雇熟悉当地水路的人领航吧，他们也非常在意各种忌讳。

老陆通过几天和我们接触，了解我们是那种不信邪的人，你说向东，我偏要向西，非要和说不清道理的东西对着干不可。所以特意对我们嘱咐了又嘱咐，让我们一定得注意山里的忌讳。

想不到老陆有声有色的描绘，把姐姐也说得动了心，执意要和我们一起去放排。我们几个一合计，她去了起码能给我们做饭，是个作用很大的帮手，况且治国一走好几个月，留她一人住在偏僻的大院子里，治国放心不下，所以就同意了。我们的计划是，一旦木排下水了，不会游泳的治国和姐姐从旱路回家，排上有我们三个就够了。

姐姐高兴异常，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找了一个最漂亮

的硬皮本，在头一页写上“放排记”三个大字，字的周围画了山、水、林等花边图案，甚至写好了“前言”。她说从出发的第一天起，要记录上详细的经过，一定能写成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

第二件事，是缝制我们五个人的裤子。物资局批给我们的布，是四个人的裤子材料，现在多去了一个人，非要让它出五条不可。姐姐自有她的办法——每条裤腿裁瘦些，再配上一个红花布被面做的裤腰，楞是多挤出了一条。我们嫌蹲不下，难看，她说，穿解松就好了，山里哪有什么人，不用在乎好看难看。

我们几个，这时候忙着到附近各村买牛，买车，到供销社买臭豆腐、酱豆腐、采伐工具。

四五天的工夫，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五个人、两挂牛车就上路了。第一站是四十多里外的县城，牛走得慢，估计天擦黑才能到达。在县城住一宿，第二天再继续朝小儿沟的方向走。父亲、弟弟和大姐夫把我们送到村外。

一下子要离开父亲那么长时间，我们有些不太放心，一个劲儿地拜托大姐夫多操心照顾好父亲。他口气坚决地表示，一定让老爷子比我们在家的时候过得还好。父亲和他也再三地嘱咐我们处处小心。

牛车缓慢地在公路上走了一天。车上装载的是我们的被褥、蚊帐、食品、工具。为了让牛走得快一点儿，除非太累了，我们尽量不坐在车上，跟着它步行。天将黑的时候，我们走到了县城——桌旗镇。随便找了一个大车店住下，安顿好物品、车、牛

莫旗的大车店都差不多——临街的房子住人，打通的几间屋子南北都是火炕；尽头，用木板隔开两三个单间，是女宾和肯多花钱的人住的；一进门的那个明间，南北各一个大柴灶，为的是给两排火炕烧火取暖，顺便给旅客烧热水；房后有个大院子，可以停放许多车辆，也有牲口棚和厕所；院子里有人精心地看管，只要拴好了，不用担心车上的物品丢失。

住大车店经济实惠，自己带行李还能更便宜。只是卫生条件很差——旅客在外边吃完饭回来，纷纷抽起了旱烟，顷刻间房子里烟雾弥漫，接着就不断有人被呛得大声地咳嗽，劈劈啪啪往地上吐着粘痰，甩着鼻涕，在炕沿上蹭干净黏糊糊的手指。地上这么脏了，多数人上炕却不知道脱鞋，直到把行李铺好了，这才把鞋脱掉。

住大车店都是赶路的人，没有睡懒觉的必要，有的四点多钟就起床。他们一折腾，别的人也别想睡，索性也就起来，早点儿赶路。

我们在街上的小饭馆吃过饭，刚回到店里，服务员叫住了我们，说旗公安局来人通知，让我们务必带着证件到公安局去一趟。

莫旗镇是个很小的县城，没走多远就到了公安局。接待室里坐着公社派出所的警察，见到我们先是问，有没有采伐证。我们以为他们怀疑我们是乱采乱伐，连忙把证件给他看。他收起证件，口气严厉地说，公社党委决定，一律不许知青上山放排，理由是避免发生危险，证件当即没收。我问他，这些天的损失怎么算，物资局的贷款怎么办？他说，这些都由公社去和生产队、物资局交涉，让我们少受损失。

我们无可奈何，失望地回旅社去。临走，他还威胁说，如

果还继续往北走，旗公安局将动用司法手段强制把我们押送回公社。看他那种不友善的态度，不像是关心我们的安全，更关心的是我们正往荒无人烟的北方走。

11. 开办电焊条厂

为了放排，耽误了许多出外挣钱的时间，既然“排”放不成了，还得抓紧时间去照相，以便能按时给菁菁寄去生活费。

随着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越来越勤，农村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对一切挣钱的活动都要尽量限制，认为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照相也常常受到妨碍，好心的人就会劝我们：“别在这儿照啦，下乡的工作组在村儿里住着呢。”

在农村生活，平常很少花钱，粮、菜、油、蛋都是自己产或换来的，如果还有别的需要，还可以向生产队预支。所以平时即使不挣钱也能生活得不错；城里人就不同了，用什么都要花钱买，没钱寸步难行。我还是决定把菁菁娘儿俩接来。

1974 年春天，我回到北京，把接她们的意思对菁菁说了。

一年多了，没有任何代表政府的部门对她们表示过关心，菁菁想在北京落户的愿望看不到一点儿曙光。她很能理解我的难处——让一个农民养活两个城里人简直就是奇迹！能坚持一年多，已经够难为我的了。所以她愿意跟我走，只是说服不了亲戚们。

我给她出主意说，假如她们和老太太感情这么深，让她们和她一起生活，我们每月付 30 块钱生活费。这个方案一提

出来,果然再没有人挽留岳母了,只是来哭着道别,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似的。

这一年多,岳母的身体不见多大好转——只能说简单的单字,拄着拐杖站立。旅途我必须背着她,所以不能带很多行李。火车并不是直达,中途要在齐齐哈尔转车。我们必须得算计好车与车的衔接,争取不出站台,用最短的时间到达终点,否则解手就是个大问题——最快也要在车上坐 40 小时。

几个月前,我们在小马架的后身,又盖了一间宽敞的平房。这样,菁菁她们来就有地方住了。

房子几乎全是靠我和弟弟、理铂盖起来的。除了房顶的几根檩子和门窗的木料是花钱买的,基本就没再花什么钱。

北大荒盖房不爱用砖和土坯,最爱用"垡子",认为它保温性好,又不怕洪水泡。

垡子是用垡锹在草甸子上挖来的。在没开垦过的低洼处,多年的草根已经连成厚厚的一层,用垡锹把草根切断,切成长方形的一块,起出来就是盖房用的"砖"。这是非常累的活,全是弟弟利用生产队活不忙的时候抽空一点点儿挖出来的。

理铂是个手艺很高的瓦匠,我是木匠,所以我们不用求人。屋顶没有用草,理铂的经验是黄土加盐就可以防雨,这样又省了不少钱,只是需要每年再抹一遍。

岳母在诺敏河过得很好。院子里都是土地,她可以放心大胆地练习走路,加上吃的都是新鲜的粗粮,有充足的日照,没多久,她就能走很远的路了,大小便也能自己解决。

夏天,母亲熬到了退休——终于不用到工厂天天打扫卫生,接受批判了。她也来到我们这里,住了几个月。天气刚转

凉，她的气管炎不能适应东北的气候，只好回北京了。其实，母亲很喜欢在我们这儿住，原因很简单——她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受到尊敬——简直与北京的处境有了天壤之别。

封建落后的地方，几乎没有老太太参加工作，有文化的就更少 所以母亲在本地一出现，着实让当地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她当过多大的官，敬意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从我第一天到拉哈尔儿车站接她就发现了。

因为火车是晚上到达，当天摆渡已下班，无法过江回家，必须在拉哈儿镇住一宿。用马车来接，还得安排车、马住店，不如我先安排母亲住下，第二天治国和弟弟再赶车来接。

在旅店登记的时候，服务员小姐见来了这么个气质不凡的老太太，一个个都惊呆了，连证件都忘了向我们要。一会儿送干净被褥，一会儿送热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殷勤的服务。后来遇见了公社干部，他们也对老太太尊敬有加。

要论文化，母亲比父亲又差远了，父亲可没享受过这种殊荣。这也很好理解——父亲太不修边幅；况且有文化的男人太多，因为文化成了倒霉蛋儿的更多——还是"物以稀为贵"的规律在起作用。

一个朋友告诉我，虽说眼下什么物资都缺，电焊条更缺。许多工厂因为买不着电焊条影响了生产。

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学的父亲，是做电焊条的，有时我去他家串门，常见他父亲摆弄瓶瓶罐罐做实验，据说是北京电焊条厂的技术权威，让我羡慕不已。真希望自己也能干到这种地步，能有这种在家就可以钻研的工作。

好的环境与机遇，必须靠自己去创造。对我来说尤其

如此。

我又想起母亲的口头禅:"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我为什么不试一试?做不成,顶多白搭工夫;做成了,会带来巨大的好处。应该做,而且说做就做!

我利用前一次回北京的机会,去图书馆找资料,去电焊条厂买原料,去手工生产的厂家参观。然后我又做了一些样件,请附近工厂的焊工师傅评价,一次次地改进。到临回东北的时候,已经能做出不错的样品了。

到了诺敏河,找不到电焊机,我们就利用水缸里加盐水的办法,做了一个"土电焊机",照样试验焊条,给大家焊农具。焊得我和弟弟脸上都脱了皮。

有一次生产队去公社机修厂修机器,遇到电焊的活,焊工强调没焊条干不了。我给了他几根,他使得很满意,直问我从哪儿买来的。我说是自己做的。他露出嘲笑的口气说:"你会做电焊条?你要有这本事就不用呆在生产队了,早有多少厂子请你去了,还不得发财!"

我没理会他信与不信,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何不利用这项技术,寻找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甚至自己办一家工厂!

回家对父亲一说,他十分高兴,鼓励我说:"人就应该有高一些的理想。"——家长总是高看自己的孩子,他相信我什么事都能做成。

想办工厂是我早就有的愿望了。以前也对母亲说过,她总是感慨万分地说:"我们都是从开工厂过来的人了,现在再让我们开工厂,决不会有人开了——都寒了心。如果有一天,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你一定得有个思想准备,到时候会让你

生一肚子气。但是我还是不反对你去开工厂，因为这是正道。即使失败了，你也能长本事，也没白过这一辈子。”

甘河是鄂伦春自治旗最大的城镇，有三万居民和两万流动人口。全镇一半儿以上的人是林业局的职工和家属，第二多的是铁路职工和家属，少量的是服务行业和政府部门的职工和家属。由于甘河林业局设在这里，它比旗政府所在地的阿里河镇还大一些。我选择在这里，是因为有个朋友在镇公安局工作，能够帮我引荐到合适的单位。

联系得差不多了，我带着菁菁娘儿俩在甘河落了户。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在镇里办成了电焊条厂。

铁路系统为了安置他们的家属，给了我们投资，我买了不少原料。

当时最紧张的焊条铁芯，想不到轻易地解决了——林业局每年报废的焊条有好几十吨，为了买我们的焊条，情愿把废焊条无偿送给我们。废焊条的药皮经过粉碎，又可以代替一部分原料，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

旗工业局听说我们办起了工厂，派人来视察。我当着来人的面，立即做了两根焊条，还让他们在上面做了记号。

第二天，我拿着刚做好的焊条，随来人去工业局汇报工作情况，让他们找焊工当场做试验。一根焊条还没用完，局长就高兴地说："不用试了，我听声音就知道这焊条好使。小遇，我支持你们厂，需要钱、物资尽管说话，局里绝对支持！"到我们厂去的两个人，见局长都这么高兴，又添枝加叶地说了我们不少好话。

没过几天，就给我们送来了计划物资申请表。除了铁芯，其他材料都好买，我只申请了钢材。

别看全国钢材都非常紧缺，鄂伦春旗的物资局倒有的是。原因是我们这里太落后，全旗几乎没有生产产品的工厂，我们厂虽然小，可能还是破天荒的第一家。现有的几家工厂，只能干些修理的活。尽管对物资需要量少，可是它也要享受县一级的待遇，因此我们能沾上光。况且我们还生产的是紧俏商品。

我把理铂叫来当助手，又招来几个工人，一个作坊式的小工厂就正式开工了。我对这个厂充满了信心。

七、第二次入狱

1. 命运的捉弄

如果我老老实实地当农民，心甘情愿地与锄头铁锹、骡马车辕打交道，顶多与招工、返城无缘，也许不会有人找我的麻烦。可能由秉性决定的吧，刚刚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小康”生活，成了那个不算穷的村庄的首富以后，又不安于现状了，偏偏跑到鄂伦春自治旗甘河镇办起了“电焊条厂”。

当时电焊条奇缺，我除了有点儿化学基础知识，对制造电焊条一无所知。凭着“人家能干我就能干”的自信心，居然就把它做出来了。既然旗工业局都表示了支持，加上朋友的努力，我的户口也从“农业”变成了“非农业”，还另外多给我一个户口指标，为的是解决我妻子菁菁的户口。

命运的捉弄让人无法抗拒，先让你尝够了甜头，更大的苦头就该来了。

恰巧这时，我和哥哥的朋友治民（姐夫治国的哥哥），刚刚服刑6年出狱。治民没少为《中学文革报》出力，和哥哥又经常形影不离，肯定也受到哥哥一案的牵连。但是他从小的遭遇，练就了不寻常的社会经验。从审讯一开始，他就一口咬定自己不懂政治，只是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否则哪能判那么轻？

他服刑期间，我以他弟弟的名义看他，才知道他那里是个采石场，劳动强度极大，不受工伤的极少。他说等刑满时，让我想一切办法，也要帮他调离劳改队。现在帮他的机会有了，我急忙把这个户口给了他，把他的身份从“刑满释放人员”一下子变成了“林场知青”。

治民家境比我家还难。“文革”一开始，全家被轰回农村“老家”。说是“老家”，其实早已进城几辈子了，农村里一个亲戚也没有。那里除了留下他父亲当做供批判用的“活靶子”以外，其余五口又都被撵了回来。治民老大，下边两弟弟、一个妹妹。

到他刑满时，弟弟妹妹都插了队，母亲下放当售货员。六口之家只有母亲一人有三十多块钱的工资，其余人（除了治国）挣不出自己的生活费。治民作为老大，本来应该帮助父母，却还得让母亲援助他。出狱了，终于有了尽兄长义务的机会，饥不择食，偷了两辆自行车，准备卖出钱给弟弟妹妹们。

治民来到甘河，自行车也随他运到甘河。

我俩久别重逢，自然有一番说不完的心里话。两天后，他提议去我插队的诺敏河见见我的父亲和他的弟弟（我姐夫）。

我到甘河有几个月了，也正想回去看望父亲。诺敏河离火车站四十多里，这下两辆自行车也派上了用场。正好治民两天来没把车卖出去，我安慰说：“农民买车难，你的车到那儿好卖。”

父亲见到了治民，犹如见到了自己的大儿子。一向笨嘴拙舌的老人，此时更是泣不成声——四年了，他还没有从失去爱子的痛苦中摆脱出来，何况又见到了爱子的生前好友？治民也激动起来，马上跪下说：“爸爸，您就把我当儿子吧！”我

同样感动万分，自愧不如治民能给老人带来那么大的安慰。真想痛痛快快叫他一声“哥哥”,但是嘴就是张不开。

治民在我们这儿住了好几天，整天陪父亲聊天解闷，和他弟弟倒没说几句话。自行车很快都被人买走了。他还用两天的时间,只身到几十里外一个地痞家,追回一笔欠债——我和弟弟外出照相时,“借”给人家的一百块钱，以为再也要不回来了呢。父亲当着治民教训我:“你和罗勉跟治民比，差远了,社会经验太少。”

我惦记着焊条厂，和治民要动身回甘河了。弟弟到北京看母亲还没有回来，我们只好撇下父亲一个人走了。值得欣慰的是,有了治民这几天的陪伴,父亲精神状态好多了。好在姐姐家离着也不远。

俗话说:“知足者常乐。”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一定少吃许多苦。

治民有了“知青”身份、城镇户口,还不知足,想变成北京户口。原来他女朋友的母亲,负责“知青”安置,有办法。我劝他,应该现实一些,所谓“知青”身份只能蒙不了解的人,北京的专政机关不会买账。他也表示了同意,答应不办户口,只是看看女朋友。

我送他坐火车走了以后才发现，他刚办来的户口本被他带走了,知道我的劝说毫无用处。他回到北京,就被埋伏多日的警察抓住了,后来又被判了7年刑。

人家顺藤摸瓜,自然追查到了我这里,我就成了窝赃、销赃犯被抓了起来。

想不到,我的遭遇,竟导致了姐姐婚姻的彻底破裂。

姐姐在莫旗生活了四年，在那里，她终于第一次成立了

自己的小家，有了一个儿子——我父母的第一个隔辈人。但是，她也第一次尝到了离婚的痛苦。

尽管姐姐在她那本轰动一时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里，一点儿也没提到我与她的离婚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我成了他们最终分手的导火线。她不提我，是因为直到现在，她和弟弟也认为我和父亲帮助治民，是干了一件丢人的傻事。

派出所没收了治民那两辆自行车，买车的人知道是我帮他销的赃，来找父亲、弟弟，非让他们赔偿损失不可。父亲也为了减少我的“罪过”，把人家买车花的钱，如数都给了人家，闹得全村满城风雨。

谁愿意把屎盆往自己家头上扣？姐夫难免跟社员说，我是罪魁祸首，拐带了他哥哥。为了以后在村里好处，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

虽说北大荒的妇女都在家里干活，姐姐也多少听到点儿风言风语，偏偏她又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主儿，知道我多咱有过占人便宜的毛病？原本就有过危机的婚姻，这下就非吹不可了。

一年前，他们曾闹过一次婚变，后来经过我的父母和她的婆婆（前面提到的赵伯母）劝解，尤其婆婆使用了孙子的感召力，让小两口又复了婚。这一次连这一招儿也不灵了。

又过了一年以后，姐姐也正是衣食无着、需要依靠的时候，赵伯母千方百计把姐姐请到她家，立刻把我外甥领了出来，让一年多没见面的母子俩亲热，赵伯母在一旁劝说。姐姐当时什么感受，别人不得而知。临别时，赵伯母抱着孙子送出好远，小孩儿招着小手，一个劲儿地喊“妈妈”。姐姐强忍着没回头，大步流星地走了，任凭孩子一声一声地呼唤。

几年后她对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还忍不住流泪。她说，只要她回一下头，恐怕再也走不动了。姐姐多少有点儿母亲的性格，向来好报喜不报忧，有苦往自己肚子里咽，不肯轻易在人前落泪。一定是她痛苦至极，虽然我不清楚她与姐夫分歧究竟在何处，我想他一定是让姐姐伤透了心，姐姐才能作出这种选择。

2. 加格达奇看守所

加格达奇是个小城市，但它是大兴安岭地区的首府。由于人口少，看守所也不大，只有 8 间牢房。看守所地处闹市之中，所以街上的车声和高音喇叭的歌曲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1975 年 5 月，我从甘河镇被押送到这里时，天已经黑了。收走了我的手表、腰带，把我关进了一间空牢房。我以为会给我扔进一条棉被，不料白白等了一宿。

我在铺板上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后半夜就冻醒了，以后再也没睡着。路上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在烟雾腾腾的车厢里，我看见了失魂落魄的父亲。本来就不修边幅，这次更不注意穿戴了——棉袄顶多系了两个扣子，里边的衣服几乎都没有系扣；皮带松松垮垮，裤脚已秃噜到地；帽子胡乱扣在头上，帽檐歪向一边——我的遭遇使他一下子垮了下来。难怪车上的小偷盯上了他，把他辛苦一年种旱烟挣的三百多块钱偷了个精光。

父亲是从几百里外我们插队的村子赶来看我的。

他和我们一起生活有三年了，这样既能给我和弟弟管家，又躲开了北京街道对他的“专政”。父亲是个勤劳的人，除

了养鸡、鸭、鹅、猪，还利用房前屋后的园子种几千棵旱烟，每年也是笔不小的收入。自从哥哥牺牲以后，父亲对我抱很大希望，不只一次说过："就是你成家了，我也和你们一起过。"我出了事，无疑对他打击太大了，他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再见到我

从他呆滞的目光和突然苍老了的面容就可以看出他的绝望 刚一听说我出事，他就来了，下了火车正看见我被押上火车，于是他也上了这趟车。父亲的身份，加上多年的教育，见了警察就十分恐惧。他不敢过来和我说话，只是一路上在一旁远远地看着我。我尽量装做无所谓的样子，以便多给他一点儿希望。快到加格达奇站了，父亲知道我该下车了，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些字，举在胸前让我看。离得远，灯光又昏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只是趁警察不注意，朝他笑了笑，他就把纸收了起来。

反正也睡不着，顺便看看这所监狱的格局。

它是一排坐南朝北的平房。沿窗是两米宽的走廊，把窗与牢房隔开。每间牢房朝窗那面是铁栅和铁门，其余三面是水泥墙壁。铁门很矮小，进牢房必须低头哈腰。牢房地面比走廊低半米，要下两三级台阶。除了一米宽的地面外，其余约 12 平米面积是高出地面约 30 公分的大通铺。地面两边是瓷水池和马桶，但不经常供水。所以也不提倡使用马桶大便，每天还是两次放茅。铁栅外装有一人多高的黑布帘，平时布帘开着，以便看守巡视一目了然。有犯人经过时，看守把布帘关上，以免同案犯之间使眼色。犯人不能去动布帘，除非是女犯。因为看守都是男性，女犯要解手或换衣服可以拉上，是她们能享受到的一点儿隐私权。

第二天早上，我被送进另一间牢房，里边已经有六个人了。这些人除了一个靠着行李半躺半坐在自己的褥子上，其余的人都脸对着墙盘腿坐着,像和尚打坐,样子很可笑。估计这是看守们从"面壁思过"这个词组得来的灵感,发明了这种惩治犯人的方法。

"像他们那样坐着,好好反省去！"看守说完,把铁门使劲撞上,落了锁,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我坐下后悄悄问身旁的犯人："那个人怎么可以躺着呢？"

他小声说:"他认识这个班长(对看守的称呼),一会儿换班了,别的班长一来,他也得像咱们这么坐。"

不一会儿,看守把各间牢房布帘一一拉严,开始放茅了。有时从西边8号开始，也有时从东边1号开始，没有一定之规。厕所在院子里的一角,从牢房出去要走很远。能听到脚镣声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地传来，从而判断出该第几间牢房了。戴脚镣的都是违犯了监规的人或重犯，哪间牢房有几个戴的、是谁,大家早已十分清楚,声音也有所区别。在一进一出之间，相邻两间牢房的犯人可以互相看见，但是不允许说话,否则按违犯监规对待。如果有同案犯,安排的牢房尽量相隔远些。假如同案犯超过了三个，只好选择不太要紧的两个人相邻。

犯人们最感到好奇的还是女犯，所以每次放茅时，女犯都要单独走,直到她们进了牢房以后,看守才放第二间——好像看守的职责就是与犯人作对。

在等待放茅的时间，犯人们可以在牢房里来回走动，伸展腰腿,互相说话,相当于休息。这时有人问我案情和外面的

变化。我也去了解他们，才知道这间牢房关押最长的一个人是一年半，其余都在一年以下。

放茅回来还可以很随便，等着吃早饭。这里也是早、晚两顿饭。早饭一律是玉米面糊糊、咸菜，晚饭是窝头、菜汤。逢年过节窝头换成全麦馒头，菜汤里有点油星。照样定量不足，犯人总处于饥饿状态。

吃完早饭就是"面壁反省"，中午午休可以和衣躺下，午休一小时后饮水，然后又是"面壁反省"，直到下午四点晚饭。晚饭后放茅，接着还是"面壁"，直到晚 9 点睡觉。周而复始，成年累月。

这个看守所从来不给犯人发报纸，好在街上的广播喇叭经常播放新闻，牢房里时常进来新犯人，所以外面的事情大体也知道一些。如果遇上个心眼好点儿的看守值班，会找些"老三篇"之类的小册子分给各个牢房，他明知道没有人会去看，但允许我们谈"感想"，犯人们立刻会高兴得欢呼起来，因为可以背靠行李休息了，又能海阔天空地神侃。这时他会嘱咐大家："小声点。"

在甘河镇，我有了自己的家。房子是林场工人老窦大哥的，他们夫妇只有两个上小学的女儿，住着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其中一间连同里边的家具，都无偿地借给我们用。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一来二去我们两家好得像一家人一样。后来焊条厂成立了，他又把两间空房借给我们用。我被关起来，妻子和岳母更需要他们的照顾了。每次菁菁来"看"我，要乘半夜的火车。到火车站之前，要走很长很长漆黑的路，都是窦大哥远远跟着，直到看着妻子进了站台，才往回走。第二天很晚菁菁才能回去，照顾岳母的工作，也要落

在他们夫妻身上。

说是菁菁"看"我,其实是看不到的。拘留审查期间不能会见亲属,只能送些东西。我被拘留了半年多,她来了好几次,每次都要赶在早上七点至九点之间,我们"放茅"的时候。一队队犯人走过看守所的大院子,她趴在木板围墙上,通过板缝向里张望。每次张望的人很多,有看热闹的,也有不少犯人家属。只要听见脚镣响,张望的人立刻聚精会神起来,嘴快的会说:"快看,又过来一队!"不知由于伤心,还是板缝太小,风太大,妻子眼泪早把视线弄模糊了,根本看不清哪个是我。可是每次都来看,直到一两个小时以后,所有犯人都过完。

姐姐和弟弟也这么来看过。

弟弟是在我出事不久来的,为了商量怎么搭救我和帮助菁菁母女解决生活问题。

人家怀疑他也和这案子有牵连,把他列为监视对象,不准外出。队里的知青趁别人不注意,驾车把他送到几十里外的火车站。不巧路上被人看见,向生产队报了信。

弟弟在候车室等车的时候,看见民兵队长带着贫协主席进来。恰巧身边坐着一位以前结识的农民小张,弟弟告诉他,刚进来的两个人来找麻烦,不想见他们。弟弟用棉帽把脸遮严,小张用胳膊搂着弟弟的脖子,身子挡着来人的方向。那两人只注意踅摸单独的知青,不去留神本地人,楞从他们眼皮底下过去了。

姐姐是一个多月以后来的,专程来"托关系","走后门"。和她同来的,是我们在农村认的干大姐。大姐看村里风声不那么紧了,说她在加格达奇有亲戚是司法界的,准能帮上忙。再说,"别人的忙不帮,罗文的忙一定得帮"。因为两年前,是

我号召村民联名写信，又亲自跑好几趟旗公安局，让她丈夫获得了“监外执行”的机会，少坐了几年牢。

姐姐买了不少礼品，又搭上两人来回旅费，什么结果也没有。于大姐的亲戚连句安慰的话都没舍得说。这也就是“有病乱投医”，一时犯了糊涂。细想一下就能明白，于大姐要是有这“道”，还用得着我们搭救她丈夫？

有时我感觉自己还算是幸运的。据说在我进来不久前，这里的看守打犯人成瘾。他们专门寻找犯人的小过失，比如交头接耳、打瞌睡、多打了饭、互相打架等等。有时为了防止犯人听见他的脚步声，隐蔽在铁栅的坎墙后边，光着脚爬着走，以便捉到有过失的人。捉到后就要施以刑法。

刑法的种类很多，最厉害的是让犯人站在坎墙上，两手背后伸出铁栅，看守用结实的鞋带将犯人拇指用猪蹄扣拴住，另一头拴在吊布帘的钢丝上。然后一脚将犯人从坎墙上踢下去，犯人脚够不着地，就这样吊着。非得等犯人连求饶的力气都没有了，脚下已是一滩汗水时，才将其放下。承受力差的犯人肩膀脱臼、马上休克的都发生过。经常的是，将犯人提出牢房，或戴上手铐用脚踩，或让犯人趴在地上，用竹板打屁股，直到肿起来为止。我认为最危险的是，一位貌似正派的看守，让犯人对着暖气片把腰弯成 90 度，再让犯人两腿尽量分开。这时犯人头已经很低了，看守突然用脚使劲踹犯人的屁股，让他脑袋直冲暖气片上一道道铁棱顶过去。这个犯人后来头顶上肿起一个很大的包。

看守所里的犯人，尤其是流动人口，许多是从收容所升级转来的。据他们说，收容所里的刑法比这里更恐怖，而且也不必非捉住犯人的过失不可。除了看守们以殴打犯人取乐，

还让老犯人对新犯人整治,看守在一旁观赏。

听说人人都要过关的叫“骑摩托车”:让犯人做出骑马蹲裆式,双手做出握住车把状,嘴里还要模仿马达声和喇叭声,两脚只能前脚掌着地,脚跟提起。几分钟后,肌肉已疲劳过度,自然哆嗦起来。这时那些流氓成性的犯人觉得“好玩儿”了,还要命令“左转”、“右转”,挨整的人必须按他们说的方向眨动左眼或右眼……纯粹是拿人取乐。如果模仿得不好或拒绝模仿,肯定还会有更难受的刑法等着你。冬天,为了防止犯人逃跑,晚上一律把衣服收走,只许穿背心、裤衩。有一次,一个犯人实在忍受不了了,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在半夜只穿着短裤跑到几公里以外的市公安局去避难,据说耳朵和睾丸都冻坏了。

在这种无知的看守管理之下,能不接连出事吗?何况被关押的也有当权者的亲属。我所在的看守所,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看守用冲锋枪托击中一个犯人头部,这个犯人立刻卧床不起,三个月里吃完饭就呕吐,从来没排过便。后来只好让他保外就医。在我进来之前不久,估计上边有了指示,调走了几个打人凶狠的看守,就很少发生公开整治犯人的事了。

社会上的一切活动,都能反映到看守所来。尤其是三天两头的各种“严打”,只要一开展,进来的人立刻多了,被判刑送走的人也多了。就连“批林批孔”这种活动,也有人因此倒了霉。

我们牢房就曾送进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据说是“孔孟学会”的。从进来那天起,就没见他说过一句话。提审时都要由犯人背着他进进出出。加格达奇市的商品粮以粗粮为

主，市民每人每月只有二斤细粮，其余只能买玉米、高粱制品。但是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享受全部细粮。在看守所也不例外。这位老者和我们的伙食就不一样。这种敬老精神是惟一让我称道的地方。

看守所里也有能吃细粮的，那就是确实有病的科级以上干部和老外。这里单独关押着一位苏联人,不仅伙食好,看守还常陪他打扑克，踢足球。不知道这种敬老的纯朴民风与崇洋精神是否有联系。

这个看守所里，最多的案由是盗窃和两性关系。有个生产队长,和他几乎没法说话。只要他一开口,出不了三句准要说到“性”的内容。他是因为利用工作之便,将两名少女骗到地窖里进行强奸被人告发入狱的。但是一经调查，那两名少女是地主富农的后代，所以仅判他两年徒刑。宣判时他在看守所已被关押了一年半，不值得送劳改队了，于是让他在看守所干些杂活,能吃上饱饭,几个月后提前释放回家。他在看守所里始终得意洋洋。

同一间牢房的一位姓张的犯人，因为是富农分子（其实是富农出身，因为解放那年他才不到10岁)，偷了七只猪崽，被判7年徒刑。假设法律是公平的,假如精神的创伤可以换算成经济价值的话,两位少女的贞操、她们的人权、她们全部痛苦的代价,每人相当于一只猪崽!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公正”!

有的犯人,你不得不可怜他。从我进入这间牢房起,就看见一个人终日以泪洗面，眼睛都变了形。他已被关押七八个月了，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老婆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他整天为她们发愁。

他的案情，本来很简单：他的外甥曾交他保管一个纸包，

里边是一本铁路代客票。若干天后,外甥又让他把纸包烧掉,他就烧了。后来外甥犯了案被抓,他也被抓起来,才知道那本票是偷来的,他就成了销赃犯。没想到外甥又与张三共同做过案,张三又与李四共同做过案,李四又与王五共同做过案……最后加一起共十几个人,公安局总算挖出了一个巨大的盗窃集团。他虽然除了他外甥,不认识这个"集团"里的任何人,可是"罪行"却天天见涨。那本车票按每张最大面值相加已有一万多元,再加上张三、李四等人盗窃总数累计已达七八万元。根据团伙从严的政策,这个"集团"首犯(外甥)被判20年,其余15、12、10……往下类推,他居中,被判8年。这个"集团"刑期累计一百多年。

同样"团伙"作案,被判刑的轻重却有天壤之别。有四个中学生参与一场斗殴,打死对方一个人。四人之中的一个人(某甲)因为家里有办法,关了几天放回家去了。几个月后,临判刑前一天才又把他"请"回了看守所。宣判的结果是:首犯,因为有斗殴前科,被判18年,两个从犯被判6年、5年,某甲只判教养2年。据说死者死因恰巧还是某甲的凶器造成的。

所以一个外号叫"小上海"的犯人就说:"第一,最好不偷;第二,一个人偷。"

"小上海"是上海知青,因为瘦小而得名,是个屡窃犯。他头一次被抓就想金盆洗手了,可是遣送回农场后农场不再收他,只好又以偷为生。终于第二次"进宫"。

在这里,他经常想出一些小花招,打饭时能多打出一份儿。但是他从来不自己独吞,而是均分给牢内每人一份儿。有时候看守蹑手蹑脚地走过我们这间牢房,打算抓下一间牢房的犯人的过失时,他要么就敲敲墙,提醒他们;要么就喊"报

告班长",然后编个需要报告的理由——破坏看守的偷袭。有一次实在想不出理由了,说"天下雨了"。气得看守冲他说:"下雨和你有什么关系!起来,罚站!"

但是也有一个人作案,判得也不轻的。有个铁路工人(电工),因为从仓库里偷走一手推车棉大衣被捕。他对我说:"没办法。我知道早晚要被抓,所以见到坐过牢的我都要详细打听狱中的情况。我知道在劳改队当电工最容易逃跑,因为单独行动的时候多,没有人看押。"

我说:"你为什么要偷呢?"

"缺钱哪!我爱人是三期肺结核,上不了班,医药费就不少花。这种病还得买营养品,现在都是凭票供应,不花高价买不来。我那点儿工资能够吗?"

原来他已是第二次被抓了。第一次被抓差点被判刑,恰巧关押他时,公安局要上街搞宣传需要宣传车,没有人会安装广播喇叭。他帮助装了一部车,算是有立功表现,教育释放。这次成了累犯,他知道不会判得太轻。我问他,即使逃出劳改队,又没有户口,又没有工作,有家也回不去,怎么生活呢?

他笑我太书呆子气。原来沈阳有"××面馆",是个接头的地点,有人专门替人做假档案和户口簿等等。而且拿着这份假档案可以去找一家接收单位,"就怕我爱人等不了那一天"。

后来他被判了15年,他除了不放心爱人以外,一点儿也不为这么长的刑期发愁。他认为顶多三年,就会找到机会逃跑。不管他能否成功,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他乐观地对待生活。

前面提到判7年刑期的“富农”，听到判决也没有一点儿丧气的表现。他的理由是：“我早请人算命了，我这一灾躲不过去。可是不管给我判几年，我顶多在劳改队呆4年就能出去。”他说的也许是真的，4年后正是改革开放纠正冤假错案的时候，像他那种轻罪重判的案子，有可能得到改判。

不管怎么说，乐观总比悲观强，否则伤心加上劳改队的超负荷劳动，可能会要了一个人的命。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具体说，我会不会参与盗窃自行车的活动，随着时间一长，人们都有了明确的看法。我的家属也托加格达奇的朋友四处打听，终于得到了准确消息——“‘十一’前就准备接人吧”——判刑，往往要赶一个时机，一判就是一大批；放人，也要赶一个特殊的日子，凑成一批人，以显示党和政府对百姓的关怀。

正当我的妻子守着她瘫痪的母亲翘首以待我回家团聚的时候，一份厄运，正从北京邮到看守所。

对我的“函调”回复了。一个审讯员打开了邮件，对另一个审讯员说：“人家说1969年便宜了那小子，让咱们这次严判。”

这一幕恰巧让正被他们审讯的我同牢的难友看见了。他回到牢房就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他不知道我1969年有什么事，只是听到是北京来的函件，而且不是好话，担心与我有关系，因为看守所里只有我一个是北京人。我当然十分清楚，除了我哪能那么巧，还有人在1969年拣到了“便宜”？我知道没希望了。

果然，给我判了5年徒刑。罪名是参与盗窃活动和“思想一贯反动”。宣判会是在年底举行的，因为年底要向党汇报一

年来公安战线的“业绩”，于是又凑了一大批。还挂着牌子游了街。

我觉得冤，准备上诉。牢房里的犯人都相信我冤，但是没一个赞成我上诉，理由是：“有一个上诉赢了的么？不加刑就不错了。”可是我还在坚持，因为无论如何我与盗窃也挨不上边。“思想反动”有事实吗？

加格达奇一位关心我的朋友，了解到前前后后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得知当初决定判我三年徒刑。判刑前由拘留改为逮捕时，我据理力争认为自己无罪，拒不在逮捕证上签字，结果以态度恶劣为由，刑期由三年改为五年。经业内人士指点明白了，如果我上诉，只有更坏的结果。

看守所的所长和管教对我有了点儿同情心，破例在上诉期间让我会见家属，以便让他们劝我放弃上诉。我终于明白了。

一些看守是同情我的，临离开看守所时我们一行二十几人每人都要在胳臂肘弯处绑一道“法绳”，以示与正常人的区别。这时走来一位看守把我拉到一边说：“我给你绑。”其实他是怕别人把我绑得太紧。他极松地把绳系上，小声对我说：“想开点儿，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到劳改队好好改造。”

3. 集训队

被判刑的犯人送去劳改队之前，先要到集训队受训一个月，教你怎么老老实实当一名劳改犯。同时根据刑期、特长等等分往不同的劳改场所。

集训队位于黑龙江省泰来县城，它负责中转全省各看守

所送来的劳改犯。这个县得天独厚，劳改农场和监狱自然比别的地区稠密。

每逢节假日，县城到处都是"就业人员"来逛街，也形成该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知道现在是否开辟成旅游热点）。当地群众受宣传教育影响，视劳改犯（包括就业人员）为洪水猛兽，畏而远之。偏偏坐过牢的人无论是服装、气质还是相貌都与当地人格格不入，就像北京人能区分出外地民工一样，所以很容易受到歧视。比如两个"就业人员"走进一家饭馆，跑堂的立刻会喊："'新生'两位，"柜台里的人马上会应："小心钱包。"时时处处在提醒你：虽然获得"新生"，但永远不是个真正的"人"。

刚一进入集训队的大院，就领我们去换衣服。自己带的衣服一律不许穿，发给我们的是清一色的灰布棉衣。在这里"老"犯人也有人穿自己带来的衬衣、毛衣、坎肩等，一律要在前胸和后背用油漆写上很大的"犯"字，以防止犯人化装逃跑。

这里每天也是两顿饭，像我这种小饭量的人基本能吃饱了，菜汤也有了一点儿油星。

集训队每天都要进来不少人，总显得人山人海似的。一排排的屋子里，两边都是上下双层通铺。学员总数要2000名以上。每四五十人分成一组，由两名以前来到这里的能说会道的文化程度较高的犯人带领这几十人"学习"。"学习"内容有"认罪服法"、"交代余罪"等等，也有时针对犯人的一点儿小过失上纲上线地批判一阵。

许多犯人都对自己的判决很不满，或者认为冤枉，或者认为判得太重，以为到这里能进行申诉，其实错了。这里的犯

人头儿（或称组长），先是千方百计找出你不冤的“理由”，实在找不出了，就会说：“这里是执行单位，你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这里管不着以前的事，你只能老老实实改造。”——耍起无赖来了。再不服气就要组织大伙儿进行批判，把你打成“反改造分子”，批判你“抗拒改造”。新来乍到的谁见过这阵势？往往冤枉的也不说了——犯不上跟他们怄气。

为了巩固“认罪服法”的“成果”，也为了让犯人更看不起自己，紧接着就进行“交代余罪”活动。

动员大会上许愿：交代出什么罪行也不加刑，就是过去杀了人，别人都不知道，现在说出来也没事儿。反之，被别人检举了，该加刑还加刑。

许多人为了减轻思想压力，纷纷说出自己还干了哪些缺德事。我们组这四五十人之中，没交代出余罪的只有我和两三个人。于是我们这三四个人立刻就被叫到一边坐着去，不能和有余罪的人坐在一起，成了“另类”。

组长先是表扬一位年龄较大的教师，他承认自己占了公家的便宜，贪污一车煤——干坏事倒成了“光荣”！紧接着就指桑骂槐地说：“某人，坐在那边的一个，资本家出身，哥哥被枪毙，自己一贯思想反动，不承认自己有罪，能让人信吗？他这是在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破坏……”大家一听就知道他在说谁。

过几小时，他又这么恶狠狠地说下一个没交代余罪的。

两天后，不交代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对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纲上得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硬，就好像接下来非领着大伙儿把我揍扁不可似的。突然，组长又跟没事儿似的对我说：“过来坐吧，来，帮我写写总结材料。我就觉得你的字清

楚。"——敌情对我的攻击结束了。

集训队还编了一些文艺节目，有戏曲、歌剧、快板、话剧等等，内容也离不开认罪服法和加强改造。每期结束时演上一场。

看完演出，我们就分到各个劳改单位了。我和许多10年以下刑期的犯人，分到了一个劳改农场。

听老犯人说，农场是最苦的，也容易逃跑，所以把刑期短的送去；刑期长的去了怕会没心思活下去，所以分配到监狱工厂。

其实这完全是犯人善意的猜想。防止逃跑是可能的，至于想不想死，那是你自己的事。农场里就有不少20年以上刑期的。

4. 劳改农场

北方最寒冷的时间，是在1月上、中旬。自从"文革"以来，我的许多变革似乎都发生在这段寒冷的日子里：1967年创办了《中学文革报》；1968年哥哥入狱；1969年我去陕北插队；1976年，还是这段时间，我们几十名犯人分乘两辆卡车、轧着路上厚厚的积雪，经过几小时的颠簸，来到了劳改农场。

这是××农场×分场，除了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农田外，只有这一片孤零零的房屋，就像一座村庄。一排排新而整齐的砖房，是干部职工的住家；不远处一排排残旧的房屋，是"就业人员"及家属的住家 "村"里还有小学和商店。离这些房屋稍远的西边，是六百多名劳改犯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用土垒的高大院墙围成四四方方的大院落，墙上拉着电网，四角有岗楼。再往西，是看押犯人的部队营房，一个连的编制。

我们乘的车停在了围墙大门外，我们一行几十人背着行李鱼贯进入院里。院里有坐北朝南8排砖房，每排房约30米长，住着1个中队，共6个中队。最后两排是伙房和礼堂。

我们这些人分别被安排进前三个中队，这是最苦最累的水田中队。年龄特别小或服刑前职务较高的干部，安排进伙房工作，他们属于四中队。四中队其余的人是菜农和少量的电工、木工、机钳工。前4个中队都是一百二十多人的编制。五中队只有几十人，专门干一些单独出动的零杂活，比如看水、看地、开农机等等。六中队人更少，饲养牲口，酿酒，看粮库。病号队住着十几个行将就木的病人，负责种植中草药和制作犯人服用的药丸，犯人医生也编在其内。他们和六中队占一排房。

大墙内10米，用铁丝网又围成一道墙，不准犯人越过。犯人的生活污水和粪便，就排到这两道墙之间自然渗下，而犯人生活用水，又从院内压水井抽出，名副其实的“窝吃窝拉”。

前四个中队，在通长的监舍内，顺长方向是南北两排火炕，北炕上面又搭了一层上铺。我们是新来的犯人，又都比较年轻，被安排在上铺上。

犯人的粮食定量是每月48斤，伙食费10元5角，即使自己生产的粮、菜也按市场价计算。粮价(玉米面)已占去将近一半，还要买煤和炊具，所以很难再买更多的油和菜。如果做些轻微的劳动，还勉强吃饱，但是在田地里劳动的犯人还是总感到饿。

“饥饿”历来是某些统治者治人的法宝。它不仅能惩罚那些“不良分子”，也能把良民百姓管得服服帖贴——整天为一口饭奔忙的人，哪还有精力搞危害政权的活动？

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天还不亮，值日的犯人大组长（负责全中队）已把大家叫醒，该起床了。各小组值日生急忙穿好衣服，马上去伙房打来菜汤和窝头。多数人顾不上洗脸刷牙，三口两口把饭菜打扫干净，然后打点自己的行装。

东北的气温经常在零下二三十度以下。凌晨出发，要走几公里才能到干活的地段，回来时天要擦黑儿，中午还要躺在露天地休息一会儿，所以保暖十分重要，马虎不得。犯人们都要在线袜外面包上塑料布，外面穿上毡袜，再穿上胶棉鞋。有的还在棉裤脚上打上裹腿。如果粗心大意了，脚上磨出了泡，那就要比别人多受一份洋罪。其次还要注意帽子、围巾、手套，缺一不可。

第一天我们干的活是深挖干渠，每人的工具是锹和洋镐。

看押的士兵穿着皮大衣，和队长坐在小驴车（犯人戏称“驴吉普”）上，跟着这一百多人的队伍来到田间。带班大组长（犯人，不用干活）给每个小组划分了地段，小组长又给每个人划分了地段，队长规定了要挖成的尺寸，我们就甩开膀子干上了。

零下几十度的冻土其硬无比，洋镐刨上去只能砸出个小坑，只有顺着这个小坑继续准确地往下砸，才有可能像打石头那样砸出一道裂纹。顺着裂纹再一镐一镐地刨下去，才能刨出一块脸盆大的冻土，然后把这块冻土搬出渠外。如果在大地解冻以后干这种活，效率会提高100倍，可是不干它干什

么？能让犯人呆着么？

老犯人已经干出了经验，很快能刨出一大块一大块的冻土，有的甚至一个人抱不动，要请别人搭把手。幸亏我在学木工时会使用锛子，而且可以左右开弓，准确度也较高，比其他新犯人速度快些，可是也早已汗流浃背，穿不住棉衣了。毕竟几个月没参加劳动了，身子有些虚。

队长走过来，看见我满头大汗的样子（天生脑袋好出汗），又见我使用洋镐很得法，没说什么走开了。他忽然看见一个笨手笨脚的新犯人还穿着棉衣，马上冲他吼着："穿棉衣能干活吗？脱了！"

中午，驴车把窝头菜汤送到地头，虽然盖着棉被，菜汤已经有点儿凉了。大家怕它更凉，都是先把菜汤三两口喝了，然后再去品味"香甜"的窝头。

在呼啸的北风中吃完饭，就在马路当中，找块平整向阳的地方抱头躺下了。我早已累得不行，感觉躺在地上就跟躺在席梦司床上一样，也顾不得冷不冷，很快就睡着了。大组长虽然不干活，此时他不能睡觉，必须替队长他们看着犯人，以免有人趁机逃跑。约二十多分钟，他把大家叫醒，又让我们接着干活去。

傍晚收工回来，五人一排在大门外站好，由大组长点数进院。折腾了好一会，到监舍时天已经黑了。

我们到水房打来热水洗脸洗脚，值日生已把晚饭打来了，还是窝头菜汤。

吃过饭不长时间是晚间"学习"，要坚持两小时，只有节假日才能幸免。"学习"的内容不外乎批判自己，认罪服法等等。有时候队长指定某人是"反改造分子"，大家就轮流发言

去批判他。同样几句话你说一遍，他说一遍。实在没的说了，有两个不会发言专爱动手的人，会上去把那个人头按下来，或者往后撅他的胳膊，喊几句口号。也有时候有那心术不正的犯人，突然攻击别人，什么不好好干活说怪话啦，于是上纲上线。当然他是有目标的：或是队长以前指定批判过的，或是和他有矛盾的，或是新来乍到的。

"学习"一结束，大家就可以睡觉了。我趁机赶快去刷牙。

这就是劳改犯一天的生活。

只要不化冻，我们每天干的活就是刨冻土，直到虎口震裂、手掌磨出一个个血泡又变成一层厚厚的茧子、手指伸不直也攥不了太紧。回到监舍只盼着吃饭和快点睡觉。

心眼儿好一点的老犯人都会教新犯人干活儿的诀窍和注意事项，比如在田间地头大便时，不要选在看守和队长的上风头，也不要把屁股朝向他们，更不要去惹他们。

他们讲，不久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向来爱捣蛋的犯人被队长恨上了，在收工的时候，当兵的让他留下来。等大队走远时，强迫他举起一块大石头。当他刚把石头举过头顶，当兵的向他开枪打死了他。后来根据现场认定，他是在向看守行凶时被击毙的。虽然我在农场期间没有发生过当兵的打死人的事，可是和我一起从加格达奇来的一位难友，因为和当兵的争执了几句，被刺刀把腿扎了好几刀。当天晚上我去看他，犯医已把伤口缝合了。幸亏没扎破动脉，否则赶不到监舍就没命了。准许他休息两天，然后照常出工。

很快，春节到了。这是犯人最盼望的节日，因为吃得好、放假时间长——三天。

三十晚上那顿饭就开始改善了：吃细粮和带肉的菜。许

多人舍不得一顿吃光，装在饭盒里存在库房，留着过年后慢慢吃。

初一上午，伙房按组发放白面和饺子馅，让大家自己包饺子。这时刑期长的老犯人早把一年才用一两次的擀面杖拿出来，施展他们的手艺。这是一年中仅有的和睦景象，好像大家成了一家人，就连那些“反改造分子”也和大家一起说笑了，与平时“政府”教育的，不能讲团结，要互相斗争的原则大相径庭。

晚上伙房的饭简单些，也是细粮和炒菜。以后每天的两顿饭都不错。

别的分场的犯人，还在春节期间来我分场演一场文艺节目。当那男扮女装的角色出场时，哪怕化妆得跟丑八怪似的，台下犯人们也会高声喝彩，尖声怪叫。

犯人们利用这三天的假期，还得把自己的棉衣、棉被拆洗缝补好，这都是四季离不开的装备。这时候，只见院内凡是能挂东西的地方，都晾着棉絮和布片，虽然不雅观，却有一股生活气息。

春节刚一过，就要动员春耕生产了。所谓动员，主要是召开“宽严大会”。由分场政府干部主持，宣布哪些犯人表现好，减刑一年或半年，哪些犯人抗拒改造或曾经逃跑过的，加刑几年。然后又给犯人讲其他分场的典型案例，比如，有的为了逃避劳动，用斧子把自己手剁下来，犯了抗拒改造罪，加刑三年等等，来教育我们。接着各中队犯人代表纷纷上台表决心，拿着早已写好的(每年都相差无几)发言稿朗诵一遍。开头都是几句顺口溜，中间是“出大力流大汗”、“拼了命地干”、“少活××年拿下高产田”等等气壮山河的决心，结尾是当时流

行的口号，一连串的“万岁”。

真正的春耕生产开始了，我才知道刨冻土的活儿是轻的。

此时定额出奇的高。比如培田埂（拖拉机耕地时犁平的田埂再重新建起来），两人一组，一天要培起30米长的二十多条。按规定的高宽尺寸，总土方量达到一百多立方米。往往是刚培好一条，跑着去培下一条，连中午休息的时间都取消了。每天干完活，往回走的力气都快没了。和我一起来的一个年轻犯人，受不了这种劳累，想了一个办法——把腿割开一条小口，放进一个虱子。这样每天都会发低烧。他到医务室说自己得了肺结核。犯人的医务室没有任何检查仪器，更不用说X光了，只能凭犯医判断。为了防止他“传染”更多的犯人。只好让他住进了“病号队”，每天干些轻微的体力劳动。

有了田埂就可以放水了。根据水平面把地弄平——把高出水面的土扔到低洼处。老犯人总是说，我们是幸运的，头下水前允许我们自己花钱买水靴。他们以前没有水靴，有时早上水田里还结着冰茬，也得光脚下去干活，许多人都落下了寒腿的病根。

但是插秧就不允许穿水靴了，据说是怕把地踩出坑——在人和庄稼相比时，准是庄稼更重要。虽然早晨水非常凉，可是此时已不会再结冰了。

插秧不是很累，只是腰疼。一天总是弯着腰干活儿，几乎不休息，否则怕延误了农时。惟一的休息方法是，用一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算是减轻点儿腰肌的压力，还最好别让队长看见。

水田最累的活儿之一，要算是割稻子。它没有什么省力

的窍门,除了累,腰也直不起来。定额是每人每天1亩,完不成的吃完晚饭去监舍外罚站。有时别的犯人已经睡了两个多小时了,队长才下令允许睡觉。想在外面站着打个盹也难——蚊子咬得太厉害。

在这里我懂得了:人的可塑性很强,人是任何苦难都能承受的。

每年都是这样春种、秋收。许多老犯人就是这样度过了20年。

有一个老犯人,20年的刑期还差一个月就到期了,他实在干不动了,向大组长请假想休息一天。大组长不敢做主也不敢去向队长请示,结果那个人死在了田里。

在劳改队死了白死,哪怕为了抢救公物或受到意外伤害,也不会颁发荣誉证书或给家属一点儿抚恤金,就像牲口死了一样,只是不被吃肉。

在20年刑期的犯人里,有许多都是北京的"老乡"。这些人受了十几年认罪服法的教育,认罪态度都非常好,从来没听他们说过要申诉争取改判之类的话。可能他们知道翻不了,所以过得也十分心安理得。更重要的,是一些事实对他们的教育。

一位比较年轻的北京人,是刚到就业农场就业又被判刑来这里的。他说在他们就业的农场里,也老进行认罪服法教育。有个人不服气,队长组织大家对他批判。那个队长是出了名的狠心,把这个不服气的农工(就业人员官称)两个大拇指拴住,反剪着吊起来,悠来荡去。

过了好一会儿,这个农工求饶说,两个拇指没知觉了担心残废了不能干活。这个队长不相信,让人用火烧他的拇指,

结果拇指动了一下。队长大发雷霆,农工居然敢骗政府!于是接着悠。后来这个农工真的成了残废,去上级单位告状,上级裁定:允许不干重体力劳动,工资由原来的 32 元降到 18 元。残害人的队长照样当队长,不可能受处分。

劳改犯给农工起了个形象的名字——“二劳改”。

秋收结束后,农活儿不那么忙了。分场开始一年一度的基建工作,从各中队抽调木工、瓦工组织基建队,于是我被选中,调到了四中队。

9 月中旬,全国召开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劳改队也不例外。为开这个会,劳改犯得到了半天休息。说是休息,其实一点儿也不轻松。当王洪文念悼词时,队长要求犯人以立正姿势站得笔直,还不许戴帽子、手套。九月份的东北气温已在零度以下,追悼会仪式那么长,犯人们一个个冻得耳朵、手指通红,发麻。

等到默哀三分钟的时候,要求姿势更严,好几个队长在人群里到处巡视。谁脑袋低得不够低,上去“啪”的就是响亮的一巴掌。有个犯人被打了还想分辩几句,立刻就被五花大绑起来。

又过了几天,“四人帮”被揪出来,明白的犯人都知道,这回总算有了盼头。

5. 四中队

到了四中队才知道,这个中队的犯人比前三个中队“享福”多了。

首先是能吃饱。伙房工作的就不用说了,那些干技术工

种的劳动强度低，饭量自然也小。即使大田作业的那三十多人，因为和菜打交道，直接入口的东西多，所以经常能得到补充。有时窝头剩下了，就送给水田作业的朋友。其次是很少有大强度的劳动，劳动环境也好。每年发的衣服、鞋能省下来一些，可以和附近的老乡换些好吃的东西。有个外表傻乎乎的家伙，甚至利用晚上看瓜地的机会，勾搭上一位农妇，解决了性饥渴。被队长怀疑上了，差点儿给他加了刑。

老天爷可能还是尽量做到公平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偏偏就降临到四中队头上。

一天半夜，可能是有人的嚎叫声把我惊醒，我睁眼一看，只见天花板正徐徐落下。人在急的时候动作格外敏捷，我抓起棉衣就向门口冲去。当我刚刚冲到门外，身后已被顶棚全部覆盖在下面。屋里到处是灰尘，漆黑一片，只听受伤的犯人在哀鸣。大约几分钟以后，逃到外面的人才恢复了神志，跑到别的中队求人来帮助救人。

幸亏顶棚是从北边先塌下来，被上铺阻挡了一下，然后中间落下，又被南边炕沿阻挡了一下，结果南北两边翘起，没有压住多少人。受伤最重的有三个人。上铺两个人，一个耳朵掉了一只；一个挺英俊的小伙子脸被砸得变了形。下铺的人只是受了场虚惊，没一个人受伤。南炕有一人被顶棚的木料压住胸部，拉出来没多久就死了。他刑期总共才三年，已经过了两年。

入殓前，劳改队通知了家属。死者老婆（一个黄瘦的农村妇女）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到我们的工具库房去看死者。小男孩还不懂事，他爸爸离开他的时候还小，没什么记忆，索性在库房外边玩耍。女人进了屋，也没有哭嚎，只是蹲

下身,把死者的领扣和鞋带解开就走了。只能自认倒霉,否则只能找老天爷算账去。

队长让我们木工用板皮做了个棺材,草草埋葬了事。

出了这件事以后,我们木工着实忙了几天,急忙检查其他监舍顶棚的质量,该重新加固的加固。

有人开始攻击木工组组长,说他是在搞破坏。这个土匪出身的组长平时为人很正派,队长对他印象也好,20年的刑期马上期满了,所以对他没有批判起来,只是免去了他的组长职务,由我来接替。

劳改队里有几种人处境好:

一是有较高的文化,嘴皮子又顶劲,说理头头是道,说混能骂能吵的,容易被队长看中,培养成中队、大队的犯人组长。给他们献殷勤的犯人少不了,不但不用干累活,还有吃有喝。

二是"滚刀肉"——要豁出来连死都不怕,不管队长施以什么刑法,永不服输的人。也容易被队长任命为中队组长去管别的刺儿头。还有个犯人,说什么也不去干活。强拉到地里也不干,开各种会批判也不干,最后把他双手拴住,用一根长绳拴在拖拉机后面,硬拖了他好远,眼看就没命了(幸亏路上没有障碍物),他还是不干活儿。队长也只好服了,让他长年住病号队。

三是有技术的,尤其是木工、裁缝,谁都用得着。

当木工组的头儿,除了根据队长规定的任务,分配给适合的人以外,更主要的,是给几位难友淘换吃的。还要注意分配公平,不能起内讧。

木工工作是重体力劳动,营养跟不上怎么完成任务?再

说,几年以后都得回家,谁不想留个好身体面对将来呢?

"四人帮"垮台以后,当兵的不那么仇视犯人了,营房常来找我们修门窗和桌椅等,新来的连长还找我们做了一套家具。队长为了搞好军地关系,规定部队有活儿不必请示队长,随叫随去,只是进营房门时小心,跟岗哨说清再进,别发生误会。

没多久,我们和炊事班的几个人打得火热。除了干些修修补补的公活儿以外,他们个人的要求更多,什么板凳、马扎、箱子、小柜,永远也做不完。给我们的回报是豆油、馒头、花卷……其实他们不是细粮吃不完,细粮只占定量的一半儿。加上吃细粮时当兵的使劲儿地吃,下顿粗粮就吃不多了,所以吃一顿细粮得搭好几顿粗粮。可是,如果剩下了二三十个馒头,百十来人给谁不给谁?干脆,全给了我们。

我给大家订了一个规矩:无论什么好东西,大家都是平分;只限在车间吃,谁也不许带回监舍;想周济朋友,用伙房发的饭去送。大家都明白,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长远,都欣然同意了。

1978年底,部队杀了只猪,发现有囊虫病,不敢吃,问我们要不要。我认为经过高温煮炖,吃是没问题的。只是一只大猪不像一两瓶油,让队长知道非同小可。衡量再三,还是补充营养更重要,同意要。只是不能一下子把猪拿回来,只能先存放在营房一间空屋的顶棚上,随吃随取。

东北的冬天,是天然的冰箱,不用发愁猪肉变质。我们的木工锯都伐得飞快,切割也十分方便。这只猪足足够我们吃上一个冬天了。

没有不透风的篱笆。这只猪快吃完的时候,被人检举了。

其实我们做得很秘密。每次炖猪肉的时候，都选择在收工以后，锅里放上合适的水和盐，不加香味调料，加进灶里几根粗壮的木柴，就离开车间。第二天，香味早已散尽，锅里的猪油已经凝固，木柴也全烧尽了。吃的时候尽量不加热，切成每人一块，等午饭送来了，和在菜汤里等于加了热。

队长想得很复杂，他猜想我们一定用部分猪肉与别的犯人做了交换，尤其是劳改队严禁的烧酒。岂不知我从来不沾烟酒，当然无法承认。于是他认为态度不好，决定给我戴上手铐，关在“小号”里反省。

所谓“关小号”，就是单独住一间空屋，除了每天两次去厕所，其余时间全锁在屋内。伙食标准也减至三分之二，改成吃两顿。虽然形式模仿看守所，却比看守所强多了。我周济过的难友闻讯纷纷赶来，问我有什么需要，教我如何把手铐打开。我请他们务必多给我找几本书来。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出版了一些好书。无奈劳改队读书人太少，大多数人吃饱、睡足尚且没有解决，哪有多余的钱和精力去买书看？所以难为了几位难友，跑遍了各个监舍，才找来五六本书。这几本书，陪我度过了一个来月的“小号”枯燥的生活。

从“小号”出来，接着罚我去水田中队干活。

大约一个月以后，有天大队负责教育、宣传的干部忽然问我，会不会做乐器。原来，分场想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笛子、二胡这些乐器，犯人手里有，缺少洋琴、月琴、三弦。我知道又来了好机会，马上答应下来。结果从水田中队又调到6中队，干活儿就在大礼堂，只有我一个人。在劳改队，这简直到了“天堂”。

我根据乐手提供的尺寸，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还多做了一把吉他。一些农场的职工听说我又做木匠活儿了，通过大队干部，想请我做些当时流行的沙发和板式家具。我当然乐此不疲，一来可以避开水田残酷的苦役，二来可以提高我的手艺——出狱后我还要凭它去走四方——至死也不能当“二劳改”！

1979年9月的一天，负责接待来访家属的队长忽然找我，说有人找我调查情况，在会客室等我。我三步并做两步地走进会客室。两位来人自我介绍说，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来了解遇罗克案件的实情，让我不要有顾虑地介绍一下。

从报纸和新闻广播中，知道现在正大力地平反冤假错案，农场里有少量的犯人已提前释放。我本能地感觉这次是真的要了解事情的真相。记得在1970年，在哥哥被公审前夕，也有两个警察到我家“了解”亲属对哥哥案情的看法。我当即表示他是被冤枉的，加在他身上的那些“罪状”是无中生有的，可是有什么用？跟没说一样！我相信时代不同了。

我只勉强说出：“他太冤枉了……”几个字，就泣不成声。

哥哥含冤去世9年半了！在这9年半的时间里，每当我想起他，都会伤心地落泪；在这9年半里，我从不主动提起他，以免陷入极度痛苦中不能自拔；在这9年半里，亲朋好友对我说起他，我都是难过地要求不要再说了，这时我宁可用我的死去换回他的生——死，毕竟是痛苦的，但这只是一瞬间，而活着的人却永远要在痛苦中回忆，况且他是那么无私和有为！而在我痛恨的人和敌视我的人面前，说起他，我还要装做镇静和无动于衷。尤其是在他们亵渎他光辉的名字时，我恨不得和他们拼命而不能！9年半，我用漠视代替了激情；用冷笑

代替了抗争;用饮泣代替了纪念;用忍耐代替了冲动。我时时刻刻都记着哥哥的最后一首诗:"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他要做的太多太多,9年半,我能为他的遗业做些什么?我痛恨我的无能!

我哭得伤心极了。我脆弱吗?不,我从来不在恶人面前落泪,在该哭的时候我甚至学会了笑!是委屈吗?不,从我懂事起,就认为表露委屈是丢人的事,连在父母面前也不会这么做。是乞求吗?不,我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向全世界挑战!

我还是在哭。我在怀念敬爱的哥哥!这是9年半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可以表露我的真情!哥哥,你瞑目吧。

整整的半天时间,我其实只说了很少的话——所有对遇罗克的指控,都是无中生有的。

回到监舍我便闷头躺下。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我没有取回属于我的这一天的囚粮。

几个月后,1979年12月,在父母的一再要求下,我被释放。

我终于自由了。踏上归途的列车,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北京——我多么想早点儿见到父母、妻子、姐姐、弟弟啊!

这时,离我的刑期结束,还差半年。

八、后 记

1. 迟到的晚霞

哥哥被平反了。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1942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8年11月1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1979年11月21日

仅此而已。

母亲于1983年、父亲于1988年分别去世了。值得欣慰的是，他们都等到了哥哥平反和自己不再是"阶级敌人"的一天。

母亲又成了区政协委员，整天忙于她热中的社会工作，经常累得犯哮喘病。我们常劝她："该休息就休息，您的工作不一定有多大作用，也就能给卖肉食的个体户解决两个猪头。"她总是憨厚地笑笑。父亲倒是很辩证地认为，如果不让她这么忙，未必能多活这两三年。

父亲1937年毕业，只干了20年的对口专业工作，就被罚去做繁重的体力劳动，再也没用上所学过的专业知识。倒是他的日语知识派上了用场。改革开放前翻译了几本书，不能署自己的名字；改革开放后又写了本《科技日语翻译技巧》，七十多岁还教了几期学生。他最得意的是弟子们来看他，"遇老师"、"遇老师"地叫。

他们胆怯过，苦闷而不知所措过，在是非面前可能首先想的是自己的家庭和子女。因此有时我觉得他们很平凡；有时又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倒不是因为他们有着惊人的毅力，没被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灾难所压垮，而是在歌颂、赞扬声中，

父亲告诫我们“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母亲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提醒我们千万别忘了曾经支持、帮助、同情过我们的那些朋友。每当我接受了别人的道歉，原谅了人家“文革”时期的过失，他们会鼓励说：“人应该懂得宽容。”

我很内疚，总是把对父母的敬仰深深地埋在心里，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向他们表露。当我做了父亲的时候，才知道，父母又何尝不喜欢听子女的表扬？

一个大学生告诉我，他们上法律课的时候，老师说，在1981年，全国讨论遇罗锦该不该离婚。大学生觉得非常可笑，难道爱情也要由别人决定吗？我纠正说，不是可笑，而是可悲。尤其对于当事者来说。更不用说“批判精神污染”的时候，姐姐还成了“典型”。好在她终于过上了清闲、安稳的日子，在德国有个幸福的家，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她知道，国内许多刊物在造她的谣，说她嫁个老头，或是嫁过好几个人都不如意，说她穷困潦倒，说她卖身……我问：“你不想反驳么？”她说：“只要他们不怕让人瞧不起，由他们说去吧。比起失去哥哥，这点儿苦恼算得了什么？”

最近，我又写信请她回国看看，她还是没有答应，她说：“我被那块国土伤得太厉害了。有一天，当我们能像人一样被对待时，不仅我，许多海外华人也都愿意回去。”当然，政治避难的大陆人，想回去，大使馆也不一定给签证。

我下海比较早，觉得“文革”耽误的时间太多，等不及工厂里的论资排辈，1984年就扔掉了“铁饭碗”。弟弟当时和我想法不一样。他领导的科室因为创利大，他成了北京市“劳模”，很受厂领导赏识。可是姐姐寻求政治庇护以后，他再出差想坐飞机，居然没有人敢给他开介绍信。批判姐姐的文件

竟也发到了他所在的工厂，幸亏厂领导很给面子，没有往下传达。弟弟不想让人家为难，干脆辞职下海。

1999 年 1 月，由徐晓、丁东、徐友渔编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并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与会许多专家、学者，对罗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知名的人士，也越来越肯定了他的功绩，主张建立他的塑像。

哥哥在 1966 年 5 月 3 日日记中写道："(《波斯人信札》)我设想在某王国内，人们只许可土地耕作所绝对必须的艺术存在——虽然土地为数甚广；同时排斥一切仅仅为官能享受与幻想服务的艺术；我可以说：这个国家将成为世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何谓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代的共鸣。孟德斯鸠可谓不朽，其洞察力已经逾过二百年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哥哥所走的道路，重读哥哥的著作，也完全有理由说：遇罗克是不朽的，他的著作是不朽的！他的纪念碑，就建立在人民的心中。

我为哥哥，为我的家庭，为我所做过的事而自豪。

1999 年 9 月 3 日

2.《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跋

——忘记历史,悲剧还会重演

将近20年后的今天,人们才又有机会缅怀遇罗克,不能说不是我们的悲哀。

自从1980年,全国报刊大张旗鼓地给遇罗克平反,称他为英雄以来,我遇到最多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政府给没给他定为烈士?给家里多少抚恤金?"

今天,我给大众一个回答:没有谁授予遇罗克烈士称号;给我父母的,只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是的。"烈士"称号难道需要恩赐吗?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就是最好的回答。

罗克的事迹见报后,我家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我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是整个民族命运的缩影。在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善良的中国人眼里,希望从中看到民族的希望。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她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的态度,政府、政党的开明与否亦如是。

人们希望对许多事情有个"说法",但往往又很失望。

我父亲是个有作为的工程技术人员,他首创的"竹筋楼"小区,经过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还屹立在良乡镇上。随着工程的结束,他旋即被打成"右派",开除工职并被劳动教养多年。80年代中期,他被通知得到"改正",补发两年工资。这就是二十多年被折磨的代价。"右派"是改正了,但还保留着"汉奸"身份,就因为他曾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过——这就

是"平反"!

母亲因为没有被开除公职,尽管被降薪降职,"改正""右派"身份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这就是"平反"!

父母是超脱的。在给罗克平反后,公安局专案组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物质要求,只要求将因受《出身论》案件牵连第二次入狱的我尽快从东北监狱释放出来,要求所有受《出身论》牵连的人(听说有一千五百多人被判刑)都得到解放。

我们有幸在这里回顾过去,请不要忘记"文革"期间死于非命的冤魂。罗克曾让我们帮他收集资料,准备予以逐步揭露,但没有机会发表。他不会去理睬这个路线、那个路线,他关心的是人的尊严。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奥斯威辛、格罗斯·罗森等集中营,那同样是20世纪人间的悲剧。为了警告人类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让人们忘掉它,许多国家建起纪念馆,德国总理跪下忏悔——以便更深地记住这段历史,避免悲剧的重演。从而也使人们减少了对日耳曼民族的恶感。

萧乾先生说得好,我们只抓住"文革"闹剧的几个演员,无法保证没有第二次"文化革命"。因此他们建议建立"文革纪念馆"。

我很感谢本书的编者们,他们使许多人知道或记起了,中华民族还有大讲"血统论"这段历史,或许以后因此不再讲"血统论"了。但是有人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讲了",我不得不提醒他:现在应届高中毕业生想考大学,不是还要父母所在单位的党委证明其父母的出身、成份和政治表现吗!

因为有许多人关心，现将我和亲属的情况做简要介绍：

母亲，王秋林，于1984年5月去世，享年66岁。她是个无比刚强的人，对人总爱面带微笑，但内心的痛苦死后我们才从她的日记中知道。她最后一次日记是那年5月1日，是哥哥的生日。她又想起了哥哥四五岁时，每天坐在台阶上等母亲下班的情景。有一次母亲走到他身边，他才惊醒，羞涩地说："妈妈，我睡着了。"母亲上下班每次经过工人体育场——宣判哥哥死刑的地方，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

父亲，遇崇基，于1988年去世，享年73岁。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弥留之际，已经不认识谁了，嘴里还叨念着"罗克，罗克……"

姐姐遇罗锦，从1986年以来一直在德国居住、写作，过着清闲的日子。我多次劝她回国看看，她总是拒绝。我想，是因为这里会引起她太多痛苦的回忆。

我和弟弟遇罗勉，一个学机械，一个学电子，自认为是绝好的搭档，所以一直在一起工作。近年搞"水刀"的研制。制成的"前混式水切机"被专家称为世界首创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得多。

我还要介绍一位在书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最值得我敬佩的人物——郝治（牟志京文中误写成他弟弟的名字——郝汉，还把魏雷误记成顾雷，纪亚琴误记成王亚琴）。他是哥哥的中学同学，也是我家世交，说话幽默而有见地，是我们《中学文革报》中惟一的大学生——轻工业学院的。为了掩盖他父亲是右派的身份，化名马列。在血统论盛行的年代，仅右派出身，就足以"证明"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了。他能考上大学，简直是个奇迹，为此勒令他休学一年。

罗克每次写完一篇文章，首先要给我和郝治看，让我们帮助修改。我能提出的意见不多，而郝治能出不少主意。罗克被捕后，我俩被看成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或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分别被“群众专政”，关在学校里。我的命运比他强，在学校里处境好些。他被关在黑暗的楼梯间，每天遭受一次毒打，吃的只有窝头咸菜。六个多月，他宅死不承认什么反革命集团。但是他也知道，这样下去必死无疑。于是绝食7天，校方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不再毒打，放他回家。他走到阳光下才看到，自己的棉衣已被血凝结成一层硬壳。他是我知道的最有骨气的硬汉！

后来我的命运又不如他了，由于有手榴弹一案在身、也是出于审讯的需要，从群众专政又升级为拘留审查，关进了哥哥正被关押的半步桥监狱。当时受《出身论》一案牵连，被判10－20年徒刑的还有：安徽的丁广武、沈阳的孙钢、广东的杨玉鉴、银川的云杰。

《中学文革报》刊登的惟一的一幅漫画，是一位年轻的“右派”工人画的，他叫任众，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委托我向《中学文革报》知道他身世的成员表示感谢——因为没有一个人检举他，否则他的处境不堪设想。是的，不仅是他，我们每个人都珍重那段纯洁、高尚的友情。

1998年12月22日

附　录：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苏双碧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20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

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

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狱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没有想到这几句

话又引出一桩公案。就在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发表后几天的一个晚上，一位老太太冒着呼啸的寒风走到我的家门。在问准我的姓名之后，她说：你文章中说，凡是和姚文元《评新编》有关的冤案都要平反，那么，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老百姓你管不管，我的儿子就是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害的，你管不管？"说着，声泪俱下，话音哽咽。她叫王秋林，是遇罗克的母亲。我一下被问住了，和《海瑞罢官》案有关而被杀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况且，遇罗克能不能平反具体应由公安局来做。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伸张正义，替受害者鸣冤，并努力去促成这个冤案的平反。于是，我说："根据党的政策，有错必纠。如果你儿子被杀果真是个冤案，也应该平反。"我记得很清楚，她听到我的话之后，她经受委屈、迫害到已经有点木然的眼神，突然闪出一缕微微的光芒。看来，她多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啊！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我，希望我能替她儿子伸冤。信的内容很简单，记得是写了如下几点：

1. 她儿子遇罗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因为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谬论，即被当成反革命抓走。

2. 遇罗克写过《出身论》是为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血统论的，绝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3. 她儿子被杀是冤案，要求为她儿子平反，还她儿子和受株连的家人一个清白。

信不长，只有三四百字，但字迹清秀工整。后来才知道，王秋林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曾经当选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1957 年反右派时因替一个

"右派"辩护，被划成右派。而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原在水电部任工程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成"右派"。从此，这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变化，遇罗克兄妹都成了"右派"的子女。

我送走王秋林老太太之后，重读她留下的这封短信，心情沉重，竟然翻滚了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向领导汇报后，并经领导批准，以记者身份携带《光明日报》介绍信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在他们热情的帮助下，下午四点钟，我来到了保存遇罗克全部档案的北京市中级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把我带进一个存放"文革"中案件材料的办公室，办公桌和地上都铺满厚厚的一层灰尘，看起来已经好久无人接触这些材料了。他指着墙角的一大堆材料说："这些都是有关遇罗克的档案，够你看的。"说着，他帮我把这些材料搬到一台乒乓球桌旁边，一共24卷，堆在一起差不多有桌子那么高。

面对着这么多材料，我有点发怵。这么多材料，从何入手？同时，我又感到这么多材料足可以揭开遇罗克案子的秘密了，我倒显得有点兴奋了。赶在五点下班前，我草草地翻开了一些审讯记录、死者的日记、诗词、口供，以及侦破计划，最后的判决书等等。我认定这是个冤案，材料很典型，必须下工夫弄它个水落石出。第二天，我约请我的同事张义德、赵少平二位，又来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从此三人看了整整两天材料，才把材料看完，并对《出身论》以及遇罗克其他文章、日记、诗词、审讯记录作了一些必要的摘录。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遇罗克是被错杀的冤案，便以《光明日报》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说明派记者研究了全部档案材料，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平反。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的平反，做了大量的

工作。那么,遇罗克是怎样被错杀的呢?

《出身论》触犯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遇罗克的《出身论》大约写于1966年冬季,“文革”初期曾经流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个论调曾经支配着一个时期的红卫兵运动。遇罗克为反对这种血统论,而撰写了《出身论》。这篇文章在《中学文革报》刊登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惟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可知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为了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一种错误理论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而这种错误理论却是来源于“左”的思潮在用人制度上的惟成份论。“文革”初期,全国青年何止千百万人背着“黑五类”的黑锅,从心灵到肉体遭到摧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便无法安定。遇罗克是怀着对国家对民族忠诚的愿望来写《出身论》的。

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勉的回忆,《出身论》最早是由遇罗文在广州印刷的,并带回一部分到北京,随后在北京解放军报印刷厂印了三万份。报纸出来后,一抢而空,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加上传抄、复印,《出身论》流传非常广泛。每天都有大量信件从全国各地寄到北京,寄到遇罗克手中。不可一世的“四人帮”一伙,此时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的一篇文章吓呆了,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于1967年4月13日点

名批判了《出身论》,诬陷《出身论》是反动的。从此,遇罗克的行动就不自由了,出门时经常有人盯梢。而且这种监视、盯梢越来越严重。当时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把遇罗克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但盯梢并没有放松,而是把对遇罗克迫害的重点又转到《出身论》上来,并把一个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欲把遇罗克致于死地而后快。到1967年的冬天,遇罗克已感到“四人帮”一伙对他的迫害正在加紧步伐。他在给广东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经过一段磨练,他对有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他在信中说:“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事,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的。即使将来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了。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分配工作,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他在给广东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心情非常沉重地写道:“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年代,他已意识到,凭他所坚持的真理是无法抗衡这股恶势力的,他预感到:“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是失败)。”但他认为就社会历史进程来说,他不相信历史就会这样写下去,他信中说:“我相信这个问题终久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也是维持不住的。”

上面两封信是他被捕之前不久给朋友写的，说明他对当时的处境和形势已有充分认识和思想准备了。

当然，遇罗克的判断是对的，这时"四人帮"一伙，已经磨刀霍霍，正在制订逮捕和加害遇罗克的计划。1967年10月20日，在一份《向刘××局长汇报时的指示》中说，要"发动群众破案"，认为"破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位局长还说，遇罗克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件"。认为《出身论》是"在破坏瓦解我们的阵营，动摇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并说遇罗克案"是一个胡风式的反革命集团，是陶铸式的人物"。对如何整理遇罗克的材料，他说："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上纲。可按毛主席编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办法来写。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可见，对遇罗克的迫害，一开始就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重视，被上层所重视。对遇罗克定罪的调子，是在逮捕遇罗克前就定好的。这样，材料编写时可以上纲，可以捕风捉影，不管搜集到什么材料，都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从这个"指示"看，"四人帮"一伙，确实对《出身论》怕得要命，一位善良的青年只不过写了一篇有见解的《出身论》，就被他们当成一个大案来抓。

在这之前，10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另一位局长刘××对遇罗克案就作了两条指示：1. 中学红代会批判《出身论》，还是请红代会照旧批判；2. 批判后怎么办，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好好研究。可见，当时对遇罗克所注意的仍然是《出身论》，至于如何处理遇罗克，"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作出决定，并不是由遇罗克本身是否有罪作出判断。在他们看来因为写《出身论》就铸成了他的"罪过"，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了。

12 月 30 日，公安部李× 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谢富治于 1968 年 1 月 1 日批了“同意”两个字。就这样，遇罗克被逮捕入狱。

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遇罗克起而迎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批驳了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歪曲和诬蔑。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1966 年 2 月 13 日，《文汇报》把它作为反面文章刊出。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遇罗克似乎很早就预感到，他对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一帮人，大多进行尖锐的批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批驳姚文元，他除在报上写文章公开批判姚文元外，在日记中对姚文元在理论上的错误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1966 年 1 月 2 日，他写了一篇《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姚文元“认为历史上无清官”的“机械主义观点”。2 月 15 日的日记中写道，尽管《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当成“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他认为他是“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他为自己敢“全盘否定姚文元”感到自豪。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他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

与名俱焚',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而在5月13日的日记则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子。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这篇日记充满着对姚文元的蔑视,和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任意愚弄群众的极度不满。

遇罗克被捕后,日记落到"四人帮"一伙手中。"四人帮"的审讯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说:"当时就是要宣布《海瑞罢官》死刑,姚文元是革命左派,你不仅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且攻击姚文元。"遇罗克回答说:"我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影射某某人。""我也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预审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遇罗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希望政府实事求是。"

在"文革"初期中另一个风云人物陈伯达,遇罗克对他也大不以为然。他读了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读了此书"始知蒋何以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当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难哉!"打着批判资产阶级的旗号,宣扬封建主义,在当时盛极一时,陈伯达的言论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林彪断章取义的语录本,同样是打着

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行为。由于现代迷信盛行，社会上对领袖人物无原则的颂扬，成了风气，所以，遇罗克认为陈伯达的错误是“最起码的”，比起有些人来，也不过如此。

遇罗克这段话，本来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在被捕以后，这也成了一条大罪状。当预审员要他交代这个“罪行”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我“攻击过陈伯达”，“认为他是左倾教条主义”。预审人员指责他，说他攻击戚本禹，实际上是攻击中央文革。遇罗克断然拒绝这种指控，他说：“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戚本禹是代表中央文革。”审讯人员指控他攻击江青时，遇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从这些答话，可以看出遇罗克是敢作敢当的，他并不回避事实。而对那些无中生有的陷害，诸如什么遇罗克要仿效张良行凶等等罪名，遇罗克痛斥“四人帮”爪牙：“这是什么时代，怎么不实事求是呢?”

遇罗克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他都有宽广的视野，有独到的建树。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他对当时扭曲了的文化现实，指出：“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史上进步的继续。”对当时的文化流弊，他痛苦地写道：“哲学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当他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之后，颇有感慨地写道：“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其原因是“重事不重情”，这是“当今艺术之流弊”。而对当时报上号

召对毛主席要"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他反对这样的提法,认为这是"把真理当成宗教"。

综观遇罗克当时对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的某些言论的批评,以及当时他对经济、文化现状的一些批评,都是理智的、有远见的,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并不是什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多次拒绝"四人帮"一伙的无端指责。

为反对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献出短暂的一生

1970 年 3 月 4 日, 遇罗克在这一天被"四人帮"一伙杀害,成了因反对"四人帮"一伙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殉难者。遇罗克究竟犯了什么罪, 非杀不可? 笔者从遇罗克的有关材料中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觉得他的"罪行"都是上纲上上去的, 全部记录构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冤案。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一个善于思考无罪可言的青年,竟成了"四人帮"的刀下鬼。那么,"四人帮"是以什么给遇罗克定罪呢?留在遇罗克材料中的判决书,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条: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 二是 "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 三是 "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下署"1970 年 3 月 5 日"。

从这个判决书可以清楚地看到, 通篇都是大帽子, 是上

纲上线的言词，并没有半点能构成犯罪的具体内容。至于气焰嚣张，态度的好坏本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遇罗克的确不愧为一位坚持真理的战士。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样给遇罗克罗织罪名的。

谢富治于 1968 年 1 月 1 日批准逮捕遇罗克。1 月 5 日对遇罗克进行第一次审讯。当审讯人员问遇罗克“有什么问题”时，遇罗克说：“我不知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说“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遇罗克说：“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当追问到《中学文革报》时，遇罗克说：“如毛主席知道我写《出身论》这件事，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是第一次审讯，遇罗克心地坦然，并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随后从 1 月 9 日到 1 月 16 日，几乎每天都进行审讯。集中追查他的“反动日记”和“反革命小集团”。遇罗克有写日记的习惯，当他被跟踪、盯梢，处境危险时，他因为在日记中记了许多人和事，怕自己说不清楚，也怕拖累别人，就都烧掉了。他只留下一本，托他妹妹遇罗锦保管。遇罗锦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曾东移西藏过，总感到不安全。最后转移到中山公园的公厕里，不幸，却被清洁工人发现了，最终落到审讯人员的手里。因为日记中确实攻击过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等中央文革要员，成了他们对遇罗克定罪的绝好证据，所以穷追不舍。遇罗克当然也明白日记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作了说明：“日记写时有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不和写文章一样，没有经过推敲。”当审讯人员说他日记内容反动时，

他断然回答:"不反动。""我这本日记由头到尾看,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遇罗克的争辩是无济于事的,最终还是以"反动日记"当作杀害遇罗克的罪状之一。接着审讯人员穷追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对此,遇罗克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当审讯人员强加于罪时,遇罗克愤怒地指出:"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这本来是光明磊落的保证,但"四人帮"一伙既要置遇罗克于死地,黑白可以颠倒,有无也可以更替。"四人帮"一伙气急败坏地说:"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这已经是定论。"

"四人帮"一伙对遇罗克一案,既不实事求是,也从来不听取遇罗克的任何申诉。他们指责遇罗克说过"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指中日邦交)"这样的话,并因此破口大骂遇罗克:"是反动,是卖国贼,叛徒!"遇罗克拒绝对他的诬蔑,说"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连影子也没有"。"四人帮"一伙竟然凶相毕露地叫嚷:"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给你定罪。"遇罗克说:"我不承认",你们"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其实,事实不事实"四人帮"一伙已无所谓,不是事实也照样可以定"罪"。他们声称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既然遇罗克的"罪行"是用"思想"看穿的,也就不需要为一条材料是否事实进行争辩了。

至于判决书说的"扬言进行暗杀活动",既然是"扬言",也就没有构成该杀的罪行,这一点,审判人员自然也明白,他们"取证"了几份材料,说法也并不一致,不足以为证。遇罗克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他断然否认这件事,说"这是没有的事",

“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

遇罗克确实没有估计到，就凭几条“莫须有”的材料，就会把他杀了。这是他对“四人帮”一伙的凶残估计不足。后来他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是“死反革命”时，他才意识到“四人帮”一伙已对他露出“杀机”。当即给“四人帮”一伙写了一封信，要求“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死反革命’。”这种最坦诚、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遇罗克就这样被判处了死刑。

当遇罗克预感到“四人帮”一伙就要对他下毒手时，他并不感到畏惧。他惟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读书计划上，还有几部哲学著作没有读完；在写作计划中，长篇《工资论》，还有待于修改；与朋友探讨的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且，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极“左”思潮还在泛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伙还在横行……他只有把未竟的事业，寄托于朋友，寄托于未来。至于个人，死何足惜。他喜欢历史，历史上的无数先烈就是用头颅和热血开拓了社会前进的道路。他从容不迫，他潇洒自如，写下了临终的诗篇。他在《纪行》一诗中写到：“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充分反映出他是抱着为真理献身的激昂心情，而在《赠友人》一诗中则写下了“遗业艰难赖众英”，“乾坤持重我头轻”的不朽的诗句，坚信未竟的事业会有“众英”来完成，他所思虑的是社会、是祖国，至于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显示出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胆识和英雄气概。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6期）

跋:我与遇罗克一家

任 众

半年前，我有幸读到了此书的初稿。罗文精练的笔锋和我熟悉的历史镜头，让我一口气把书读完。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沉思、愤恨、伤感、缅怀、祈盼……一起涌上心头。

有人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不会忘记,不能忘记,也不敢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因此忘不了遇罗克一家，以及所有为了社会进步与自由而奋斗过的英烈与先哲。如果我们忘记了，不仅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与追求,更可怕的是,灾难降临在我们身边却还来不及察觉——就像人家打来了棍棒，自己连用手遮挡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和遇罗克一家人邂逅于一段中国少有的荒诞岁月里，我们自 1957 年被强行戴上了“黑刺冠”以后,一直处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卑微境地中。“文革”竟然又把那段历史激化了一步：对那些本已失去反抗与申辩能力的冤屈者再加以打击!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成了遇家的邻居,住进了东四北大

街519号一间东屋,紧挨着罗克的小屋和他家的北屋。院子里原来有五户,是个非常团结、和睦的集体。"文革"时,有两家被"红卫兵"撵回了农村,空出了东房和两间南房。我当时的夫人刚调到街道工作,分到了东屋,南屋搬进一家街道积极分子。

罗克一家人为人都非常好。

他的姥姥,是典型的"老北京"——礼貌、善良、助人为乐。没有人能对她说出个"不"字。

他的母亲,性格豪爽、热情,堪称女中豪杰。她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很有吸引力,不愧做过社会工作。最让我佩服的,是她的乐观向上,没见她发过愁——即使头发被剪成了"阴阳头",照样和你谈笑风声,开怀大笑。

他的父亲,性格和他母亲截然相反,平时沉默寡言,总爱叼个大烟斗,喜欢看书、下围棋。但是一旦遇上了知己,或是诚心求教的晚辈,他也会口若悬河,甚至背诵大段的外文、古诗,引经据典。遇老虽然是学建筑的,文学造诣极高,尤其擅长语法——可能与他精通日、英、俄三门外语有关。他的好学,无疑给子女带来了好的影响。常听罗文说,"文革"前,他总是捧着数、理、化书入睡,上厕所都要从兜里拿出个小本去琢磨,那上面是他画的几何难题。

说起遇老,不能不提他设计的"竹筋楼"。

因为是建筑领域的首创,所以是他中年时代的得意之作。"文革"期间,他曾自豪地对我讲过;到了他的晚年,仍然没有忘记对我讲述此事。

我想,"竹筋楼"也许算不上惊世之作,尤其发达国家不会采用,但是在物资紧张的年代,她的意义非同小可。在遇老短暂的技术生涯中,她或许竟是遇老的"绝唱"——四十余岁就

去被强迫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此与喜爱的专业永别。

1957年，千千万万个人才，就像遇老一样，被人为地埋没了。我的朋友当中，有的甚至过早地丧了命。

听遇老介绍，当时搞这种创新，风险非常大——成功了，顶多受个表扬；一旦失败，对待他那样的“旧知识分子”，后果不堪设想——遇老的一个朋友，设想把隧道里的通风管道改成竹筒，目的是节约钢材，结果被认为图谋放火而遭到逮捕。

事实也正是如此。遇老的创新，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紧缺的钢材，按当时计划的使用年限(实际使用的时间是计划的8倍以上)，就节省了几十万元——功劳不可谓不小。但是，转年就把遇老打成“右派”，开除工职，送去劳动教养。

1988年，遇老去世，我决心去采访“竹筋楼”，以此来纪念遇老。直拖到1998年我退休以后，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罗文和我同行，他负责摄像和拍照。我们侥幸地遇到了两位当年参加施工的工人，他们详细地给我们讲了施工过程，又夸“竹筋楼”的坚固、耐用。但是，问到谁是这项技术的发明人，他们却一无所知。

罗文、罗勉都擅长发明、创造，与遇老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社会剥夺了他从事科研的机会，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而子女连上大学的可能都没有——两代人的不幸，由此可见一斑。

能为上亿个“贱民”争权利，以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遇罗克无疑是天下第一人！

他是个英雄，是首屈一指的烈士。

然而，官方没有把他定为“烈士”。我大感不解，为此问过

罗克的母亲。据她说，也曾经有过申请的打算，但是有关部门答复，必须先追认罗克为中共党员。她认为罗克生前并无此要求，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

好在人民是公正的——虽然罗克没有官定的称号，却总有人不断地怀念他；有称号的许多人，反而很快被人们淡忘。

从《我家》一书中，我们才知道遇罗克一家人，为了宣传《出身论》及其人权思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遭受了巨大的磨难。我因此敬佩这一家人。

还让我佩服的，是他们在逆境中生活的能力——没有被灾难所压倒，反而像野草，永远能挣扎着站起来，欣欣向荣。我看过许多描写知青的故事，罗文他们的知青生活，却让我耳目一新。但愿年轻人能从中受到教益。

1984 年 5 月 14 日，罗克母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因为是东城区政协组织的，规模很大。

追悼会后，我去遇家，安慰忧伤中的遇老。

久别重逢，老人眼眶里饱含了泪水，用力地握住我的手。我的问候使他情绪稳定下来，话也渐渐多了。他用着北京人特有的客套语——"您"字对我相称。

我想起了他家的一桩桩不幸，忍不住表示劝慰。他却以出乎寻常的平静口气说："哎，谁让你赶上这个时代了呢，那有什么办法，……"

我提到了"右派""改正"的事，他似乎有些激动，说："改正什么，不是还给你留着尾巴吗！"

说着，他起身在书架上翻找着什么。一会儿，他找出几张文件的复印件让我看。这是"华北电业管理局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发下的，"关于遇崇基同志工资问题的调查情况"。

当年因“右派”问题,遇老的工资由 198 元降到 132 元,在“落实政策”后未能得到恢复。遇老为此向“中央统战部”进行了申诉。这个“调查情况”就是针对“统战部”的答复。

文中不但坚持了 132 元，而且字里行间尽是“小资产阶级,资本家成份”、“一贯通过行贿,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情节严重”、“隐瞒历史特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问题,参加北京基建局工作”等等。

所谓“落实政策”的执行人,看来实在不情愿为“右派”彻底解脱困境。或许因为他们在极左的空间里过得习惯了,早已丧失了同情心;或许他们十分明白,如果没有了“右派”之类的“阶级敌人”,也就没有了他们存在的必要。所以对“右派”只能“改正”而不能“平反”。

尽管不尽如人意，然而我们还是有了“铁树开花”的感觉。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宽松了许多。

在罗文、罗勉二兄弟的陪伴下,我们和老人共进了午餐。这一日的相处,竟成了我和遇老的最后一面。临别前,他把有关他的“平反”材料复印件送给了我,让我感受那时“改正”的恩赐性。后来我找原单位索要自己的那份“改正”材料时,发现除了留有许多“尾巴”之外,还莫名其妙地进行了偷梁换柱!可见被冤屈、被扭曲、被丑化、被摧残的这些“右派分子”是多么难以“脱胎换骨”! 他们能生活下来又是多么艰辛!

好在人民日益清楚了历史,日益明白了“右派分子”并非历史的罪人。相反,“右派”在今天的社会上越来越得到良好的口碑。这口碑是在人们的心底矗立起来的，她安慰了所有1957 年蒙难的幸存者。

遇老对于“改正”还是“平反”、留不留“尾巴”的问题,表现

了无足轻重的态度。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别处。

他问我对日语是否有兴趣。我说,很感兴趣,只是学得太少。他竟高兴地把一本《科技日语翻译技巧》送给我,并认真地在上面签了名,告诉我这本书是他编写的。

我默然了,禁不住在心中为这些可爱、可敬的知识分子们赞叹:他们竟然能在家境如此不幸的时候,还在竟相进取!他们不正是以这些智慧的成果奉献给世界的吗?而他们又向社会索取了什么?

《我家》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不仅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生活哲理,写作手法也简明扼要,给读者留有充分的回味与想象空间,是值得提倡的文风。

愿读者读完《我家》这篇真实的历史回顾,得到深刻的感悟,能在努力的工作与愉快的生活之中,警觉那极"左"的历史重蹈覆辙。

2000 年 1 月 22 日